



八股文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其特点是结构严谨，对仗工整，内容空洞，形式重于内容。八股文在明清两朝盛行，是当时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八股文在清代达到鼎盛，是当时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八股文在清代达到鼎盛，是当时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股文鉴赏/龚笃清撰. —长沙:岳麓书社,2006

ISBN 7-80665-775-4

I. 八... II. 龚... III. 八股文—文学欣赏—

中国—明代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812 号

八股文鉴赏

作 者:龚笃清

责任编辑:曾德明 朱树人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2.875

字数:342 千字

印数:1—7,000

ISBN 7-80665-775-4/I·756

定价:25.00 元

承印: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高新技术开发区 M1—3

邮编:410013

电话:0731—891194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前 言

曾德明君要我写一本《八股文鉴赏》。我本山人野性，不惯遵命作文，这回，却欣然而从。因为多年来岳麓书社的朋友们待我不薄，要书给书，有事办事，如今人家要你给他们办点事，你能端架子吗？投桃报李，我再迂腐，这点人情世故，这点好歹我还是懂的，这个命便非遵不可了。

我那本《明代八股文史探》出版后，虽溅起了几簇浪花，获得了好评，但毕竟是在“探”，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些问题认识还不那么深入、那么正确。经过了这些日子的学习、揣摩、分析、比较，自认对八股文的认识又深入了一些，颇有些话想给读者倾诉一番，现在岳麓书社的朋友给了我这么个大好机会，我还能装乔做致，拿捏一番吗？

于是，便有了这本小书的编纂问世。

也许是对塑造士人灵魂发挥了五百多年效用的八股文功用有了真切的认识，也许是依例要在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百年之际弄点应景文章，总之，近年来谈论科举制和八股文的文章多了起来，冷门货一下变成了热门货。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隔靴搔痒之论，例如，对什么是八股文和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便众说纷纭，给人以莫衷一是之感。八股文是什么？明清两代许多学者都论及过，但与今人一样，大多是各执一端，未窥全豹。

八股文又叫制义、制艺、经义、时文，八股文只是一种俗称。它是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其谋臣刘伯温精心创制的。

它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且要摹仿古人语气,根据程颐、朱熹的传注来阐发题旨。

为了让题目中蕴含的义理得到深入、全面的阐发,八股文设置了特殊的程式,即必须先破题、承题,再起讲,其标准体式的正文部分,必须用有声律要求,两两相对的四个有逻辑关系的对偶段落来阐发题旨的精义奥旨,在规定的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中将题旨阐发无遗。

说到底,八股文是一种有固定的程式要求,专门用来阐发《四书》、《五经》义理的特殊命题论说文。作八股文是在床铺底下抡板斧,螺蛳壳里做道场,要困难见巧,困难显才。

比照时兴的说法,八股文是明清两代士人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只不过它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而已。学习心得体会写得好的很少,古往今来,这是通例,故顾炎武说明代万历以前,能留之久远的八股文不过数十篇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用以作育官员的一种素质训练课程。有人说,“时文托空言,不适于用”,人们一考取进士走入仕途便将它丢在脑后,写八股文只让人徒耗精力,毫无用处。从明清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八股文写作是一种素质训练,不能看其训练的方式与手段,而要看其效果。

冯桂芬说:“盖以考试取士,不过是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由于明清的统治者以八股文写作的优劣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这就是清代乾隆初年军机大臣鄂尔泰所说的“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加上朱元璋又有不经科举不得授官的规定,受利禄的驱动,明清两代士人无不竞奔于科举之途,童而习之,自觉自愿地去攻读儒家经典,尽力把握程朱传注,体会孔孟思想,掌握正、反、起、承、转、合等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方式,皓首穷经,尽力把八股文写好。久而久之,经过八股文写作的训练,士人们便有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文化素养,促使他们去修心养性,完善人格,牢固地树立起了儒家正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培训出了有效的思维方式和能力。从具有这种素质的人才中选拔

优秀者充任各级官员,尽管八股文从此被他们忘记一空,然而这两种素质却永久地留存在其心中,发挥作用,他们便足以担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大一统王朝的重任。明白了这一点,您能说八股文只能让人徒耗精力,毫无用处,是亡国之祸源吗?

八股文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形式,这也是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都未弄清过的,他们以为八股文必定会有八股,至少也要有六股、四股。他们不知道,文有八股这是一种标准的体式,是八股文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八股文初创时期,不过敷衍书理而已,其词简朴,其文短小,根本不分股,只如古文一样,依题之字面分两段或三段阐述其义理而已。故其时将八股文叫做经义。

永乐后期和宣德时期,八股格式虽已出现,但不常用,大多数两股四句,或对或散,尚无定式。不少八股文采用的仍是散体结构。

从正统到景泰、天顺的三十年时间里,八股格式开始普遍使用,不过仍不排斥两股、四股,甚至是散体结构的八股文。

到成化以后,八股格式才开始普遍使用,八股格式成为正体,其他均成为变体。在考场上若用变体考卷则会被视为不合式而被黜落。事关个人前程,士人们自然会遵循功令,写作八股正格之文,八股文到了这时才成了货真价实的八股文。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不齐,至成化后则裁对整齐,机调圆熟,纬以义法,文体已定。

这种状况也只维持了百来年的时间,到隆庆、万历之后,八股体式又被逐渐放弃。

由于八股之法,排比均有定式。本来一题之义理,有须博衍数十端才能讲尽者,也有只要举其一端便可扼要而阐发无遗者。若不从实际出发,一律只准用八股来阐述,那么内容多端者就不可能阐发尽,而题义只要一段便可讲尽的又必须凑成八股去阐释,且每一说必作一出股,然后又必摹其出股之语作一对股,斤斤然句栉字比而不敢或乱。照此规定写出的文章不仅不能正确阐发题旨,还严重地束缚士人思想。所以从嘉靖后期开始,特别到万历中期之后,士人们便趁朝政腐败,统治者控制力大大削弱和资本主

义萌芽时商业行为与意识冲破了封建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成长,思想解放与个性自由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之机,对苛严的八股体式进行了冲击。他们厌苦八股拘牵法脉陋习,自八股格式外,又使用了两平、三平、四平,前后截、散体等结构来写作。即便是用了八股,其句子也不一定讲求对偶,或对或散,均无不可。特别是到天启之后,废弃八股格式已成为士人的一种集体行为,八股格式只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历史符号。以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发感叹说:“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循矩矣乎?”

八股文的文体格式便是这样不断地演变着的,以为八股文必定要具有两两相对的八股格式是一种误解。

应当指明的是八股文格式的发展演变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进行的。在八股文初创阶段,朱元璋规定只要讲明书理即可,阐发题旨可用古注疏,而不专主程朱两家,故其时体式尚宽,八股未创。到永乐中期后,朱棣为加强思想控制,颁《御制四书大全》和《御制五经大全》,罢黜古注疏,只用程朱传注,与此紧密关联,八股文的八股格式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并开始推行。八股格式的设置,其目的就是迫使士人在规定的程式之内,将程朱所注释的题旨义蕴,一层层递进,一层层深入地阐发无遗。在写作八股的过程中,士人所受程朱理学浸染的程度也会不断加深,他们所受思想控制的力度自然也会加大。

到嘉靖之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业行为与意识冲破了封建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极大挑战,要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社会思潮冲击着整个社会。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反抗用八股格式来束缚、控制士人思想便成为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于是从万历开始,八股格式便被逐渐放弃了,常用的是四股文、二股文,甚至是散文。

本书就是为了帮助读者诸君了解什么是八股文和八股文的形式而编纂的。因为只有明白了八股文是什么,才能了解八股文



的功能,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和対社会的巨大作用。而了解了八股格式的发展演变就可以懂得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八股文来控制士人思想,和八股文是如何来影响社会的。明白了这两个问题就掌握了八股文的真谛。

为达此目的,本书将明代名家的作品作为入选对象,因为明代是八股文的源头,在明代,八股文经历了创制、完善、定型、鼎盛、衰颓、变革、振兴的发展、演变过程,八股文的功能、原生态及变化态,正格与变格,对社会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在这个时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只要把握了明代八股文,就等于把握了八股文的全部形态。因为清代八股文继承的是明代诸体皆备的成熟形态,没有那么多的曲折演变过程。之所以选取名家之名作,是因为这些八股文更能显现八股文的特征,更能反映八股文的演变过程,更能显现这些历史名人不为人知晓的另一面。特别是将各个时期的名家名作依次排列剖析,便能组合出一部八股文的发展史。八股文到明末已发展至极致:诸体皆备,作法齐全,臻无施不可之境,在技巧上达后世不可企及之高峰。故选取明代名家名作,就足以让人们领略八股文的神采风骨,认识其本来面目,也让人领略八股文的魅力。

在评析这些名家名作时,我对这些名家的生平经历和思想作了较详的剖析,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们看到八股文的功用。因为八股文与其他文体不同,它对士人灵魂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巨大作用,他们的世界观又直接影响他们的言行,不述及其人其事则难以显现八股文的这种独特功能。

文题是八股文的灵魂,它决定了八股文的内容。八股文的文题类型达数十种之多,特别是一些连章长题,字数多达几百字,为了让读者们见识一下长题之长,我在正文里将这些全章题全文照录,但在目录中却不宜全抄,故只依明清八股文选本的惯例,写出该题的第一句,后加“一章”或“一节”等字样,望读者们见察。

笔者才疏学浅,书中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有高明来摘谬,私心不胜感激。

编写完这本书,正逢狗年春节,听着门外热闹的鞭炮轰鸣,看

着窗上快活的烟花辉照，心中生出丝丝快意，将长期伏案引发的颈椎麻痛和烦躁情绪驱赶得干干净净。人说狗年吉祥，难道这就是吉祥之兆？我兴奋起来，决心乘势而出，将已经筹划好了的《明代科举史》和《清代八股史》写出来，莫辜负了那一堆堆爬梳好了的难觅资料，将那些学术空白填写出来。

龚笃清

丙戌年正月初五于长沙百明千清斋



目 录

- 浅说八股文 (001)
- 一、什么是八股文
 - 二、八股文的文体
 - 三、八股文的题目
 - 四、八股文的发展演变简史
- 八股文评析
- 黄子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079)
- 评析：现存最早的八股文，文涉歌颂，体似宋元经义
- 杨 慈：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 一节** (082)
- 评析：标准八股文的“始基”之作
- 于 谦：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085)
- 评析：于谦和他那个性毕露的八股时文
- 薛 瑄：仪封人请见 一章** (090)
- 评析：大儒薛瑄及其有纯儒风度的八股文
- 商 辂：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095)
- 评析：商辂及其古质庄严的八股文

岳 正：今夫天 一节 (098)

评析：岳正和他貌似乎淡，实则品位雅纯的八股文

王 恕：乡人皆好之 一章 (101)

评析：直声动天下的王恕及其清微细净之文

丘 濬：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104)

评析：有转移文运之功的丘濬和他的明体达用、雅正俊伟之文

李东阳：由克殪至于汤 三节 (109)

评析：力倡文法的李东阳和他巧法兼备的八股文

王 鏊：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114)

评析：被称为制义开山的王鏊及其众法皆备的八股文

王 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120)

评析：理实气足的王鏊时文

王 鏊：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123)

评析：法备辞雄的王鏊时文

钱 福：春秋无义战 一章 (126)

评析：时文大师钱福及其正大醇确的八股文

钱 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一节 (130)

评析：手法新奇又典则深严的钱福时文

罗 伦：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 一节 (134)



- 评析:开创了长题局法的罗伦八股文
- 吴 宽:子在齐闻《韶》 一章** (138)
- 评析:生性不喜时文却又以学者型八股文鸣世的吴宽及其八股时文
- 顾 清: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143)
- 评析:顾清及其有“制义之极则”美称的八股文
- 唐 寅:禹舜皆酒而好善言 一章** (147)
- 评析:风流才子唐寅及其方严正洁的八股文
- 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151)
- 评析:文武双全的思想家王守仁和他体识高卓、文质得中的八股时文
- 王守仁:子哈不得与人煮 二句** (156)
- 评析:善于演绎推理的王守仁八股文
- 李梦阳:管仲相桓公 四句** (158)
- 评析:复古派文学健将李梦阳和他朴老古淡之时文
- 唐顺之:子莫执中 一节** (162)
- 评析: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山祖师唐顺之及其坚凝浑厚的八股文
- 唐顺之: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六句** (170)
- 评析:善于融经液史的唐顺之八股文
- 唐顺之:武王纘大王 二节** (172)

评析：化比偶为单行，有散文化倾向的荆川八股文

茅坤：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175)

评析：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家茅坤与其古雅温醇的八股文

归有光：天子一位 两节 (181)

评析：时文大师归有光及其使制义一术百世不湮之八股文

归有光：宋径将之楚 一章 (185)

评析：具有清醇淡宕之致的归氏八股时文

归有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188)

评析：湛深经术、淳古高逸的归氏时文

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一节 (191)

评析：善熔古文时文于一炉的归氏八股文

瞿景淳：天子一位 六节 (195)

评析：名列明代八股文四大家的瞿景淳及其理醇法圆、平易气厚的八股文

瞿景淳：事君敬事而后其食 (199)

评析：机巧圆融的瞿氏八股文

薛应旂：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 一章 (201)

评析：著名学者薛应旂及其学理精醇的八股文

王世贞：天下大悦 咸以正无缺 (204)



评析:文学家王世贞及其清真健拔的八股文

张居正:生财有大道 一节 (208)

评析:以豪杰自许的张居正及其政治家型八股文

许孚远:夫子为卫君 一章 (212)

评析:文武全才的许孚远及其理熟而词快的八股文

王锡爵:知止而后有定 一节 (215)

评析:首辅王锡爵及其融贯经史、精理明辨的八股文

胡友信: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218)

评析:与归有光齐名的胡友信及其理真义精的八股文

胡友信:书同文,行同伦 (222)

评析:雄浑典雅、理足气充的大师八股

邓以赞: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225)

评析:邓以赞及其恪守雅正传统的八股文

汤显祖:女有馀布 (229)

评析:才子型的八股名家汤显祖及其清纯生动的八股文

汤显祖:我未见好仁者 一章 (233)

评析:才子笔下的八股文具有文学色彩

汤显祖:其君子矣 四句 (236)

评析:非真才子无此穷极工巧之作

董其昌：春省耕而补不足 为诸侯度 (238)

评析：书法大家董其昌及其工巧流丽的八股文

赵南星：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245)

评析：东林党人赵南星及其针砭时事的八股文

顾宪成：敢问交际何心也 一章 (250)

评析：东林领袖顾宪成及其题理纯正，写法新潮的八股时文

顾宪成：惟仁者能以大事小 一节 (258)

评析：内容庄雅有度，体式不循常格的万历传统派八股文

陶望龄：于问公叔文子 全章 (260)

评析：引领时代潮流的陶望龄及其奇矫之文

陶望龄：出门如见 四句 (267)

评析：开奇矫文风先河的会元墨卷

王思任：许子冠乎 (269)

评析：为人谑浪却为文高洁的王思任及其清雅之文

王思任：人莫知其子之恶 (274)

评析：洁净中含静光远致的晚明小题文

钟 惺：孔子曰诺 (279)

评析：钟惺及其古文与时文相融合之八股文

钟 惺：象日以杀舜为事 (283)

评析:独抒己见,追求深幽孤峭风格的钟惺八股文

周延儒:小子 (286)

评析:大奸周延儒及其意蕴万千、飘逸秀雅的八股文

周延儒:微服而过宋 (291)

评析:构思精巧、生动活泼的权奸小论文

章世纯:天下有道 四节 (294)

评析:雄踞于天启八股文坛的章世纯及其以善于融会旨趣,发挥理奥而著称的八股文

金 声:德行:颜渊 一节 (299)

评析:被后世称为“文章最高,忠义最烈”的天启八股大师金声及其悲凉雄奇、理深情真之作

金 声:言不顺,则事不成 (303)

评析:借题以抒胸中积郁,寄托感时伤事情怀的金声八股文

金 声:天下之民举安 (305)

评析:朴质老辣,用法无痕的大师八股文

项 煜:其争也君子 (308)

评析:只用八股文操练嘴巴及文笔的项煜及其刻意求新之作

项 煜:禽兽逼人 则近于禽兽 (314)

评析:技法高妙的截搭题文

卷之二



- 叶绍袁：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 (317)
评析：名士风流的叶绍袁及其万变不离本源的八股文
- 叶绍袁：涕出而女于吴** (321)
评析：文采风流的晚明小题文
- 文震孟：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 (323)
评析：方正峻洁的文震孟及其激昂悲愤之作
- 谭元春：道并行而不相悖** (327)
评析：谭元春及其古文化了的时文
- 谭元春：曾皙嗜羊枣 一章** (330)
评析：善作翻案文章的晚明八股
- 艾南英：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332)
评析：崇祯八股文振兴运动的主将艾南英及其有感而发、朴质坚辣的八股文
- 艾南英：无伤也** (339)
评析：借经义以道世事的崇祯八股文风
- 陈际泰：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342)
评析：才气绝伦的陈际泰及其纵横开阖、新意迭出的八股文
- 陈际泰：子曰：直哉史鱼 一章** (347)
评析：气势雄浑，于正内见奇的陈际泰文
- 曾异撰：圣人之忧民如此** (352)

评析:勉为制义却成名家的曾异撰及其奇气排荡之文

黄淳耀:庄暴见孟子曰 全章 (358)

评析:身文并烈的八股文名家黄淳耀及其古健老到、沉郁苍劲的八股文

黄淳耀:见义不为无勇也 (364)

评析:直刺时事、发抒忠愤情怀的救亡时文文风

陈子龙: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367)

评析:欲靠振兴八股文来挽救世道人心的陈子龙其人其文

陈子龙: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374)

评析:清新古健的陈子龙时文

罗万藻:位卑而言高 一节 (377)

评析:人品高洁的罗万藻及其清微淡远的文品

侯峒曾:孔子曰:天下有道 一章 (381)

评析:节操忠烈的侯峒曾及其借经义以抒激愤之作

刘 侗:送往迎来 (386)

评析:得竟陵派精髓的刘侗及其奇雋古雅的八股文

刘 侗:摹子 (391)

评析:语言诡奇、句式短促的刘侗小题文



浅说八股文

一 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又叫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是一种俗称，它是明代朱元璋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

也许是政治制度创制大师朱元璋谋虑太过周密深远，在构建八股文时配置了太多的文化要素；也许是这些文化要素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太过深厚；也许是人们在解读时渗入了太多的感情色彩，未能客观全面……反正存活了五百多年，又废止了百余年，凝结了无数士人爱恨情仇的八股文身上有着许多难以破解的密码，时至今日，连什么是八股文都未能准确解读。

八股文是什么？六百年间，有多少才智之士作过破解，只不过在八股文弊端未显时从肯定的角度去破解的多；而当其势衰颓，弊病尽露时从批判的角度去解读的人便多了起来。若从破解者的身份去辨析，则科举顺利者从肯定的角度去破解的多了，科途多舛者从反面去破解者不少。如：

八股文是“攫取荣利之资”，“如人涕唾”，八上公车而不遇的明代八股文大师归有光如是说。

非孔斥圣、骂名震烁古今的李贽却与他唱了反调，说八股文为“古今至文”。

“六经子史，商彝周鼎也；唐诗元曲，法书名画也；明之八股，则泥佛彩花也”，“虽穷工极巧，旋瞬即坏”，“诸体之难，莫过于制

义，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也……嗟嗟，八股之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乡试屡经败北，以一领秀才青衿终身的晚明著名文士张岱如是说。

与张岱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陈弘绪在崇祯年间却说：“八股，学问聪明之会也。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即人才川岳在是。故辛亥（洪武四年明太祖开科举之年）以来八股未窥而能诗古文者鲜矣。”

清兵入关后，在腥风血雨的武器批判之中，晚明尽显的八股文弊端暂时隐藏了，据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说，“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除开一批明朝遗老遗少为哀痛故国之破灭而对它作批判性破解外，大多是从正面对它进行解析。所以尽管在康熙二年、雍正时及乾隆三年都有废存八股文之争，但终因八股文能“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三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见《清史稿》），“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见《清稗类钞》考试类），而终于将八股取士制保留了下来。

然而，“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谬种流传，非一朝一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校邠庐抗议》），从批判的角度去破解八股文的言论又多了起来，废止之说甚嚣尘上，终于导致光绪二十七年废除八股文的上谕颁发。

在此期间破解八股文的言论值得重视的，有少年科第且为著名古文家汪琬之说“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池北偶谈》）；

有受乾隆赏识，命之编选《钦定四书文》之时文大师方苞所说的八股文“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钦定四书文·奏折》）；

有历数科未中举人之袁枚的“时文加以割裂搭截，侮圣人之

言哉”(《小仓山房尺牋》);

有久困科场的龚自珍云“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

有历二十年未中举人,十年才成进士的名士李慈铭之八股文“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越缦堂日记》)。

以上所有言论无不各执一端,虽也从一个方面接触到了八股文的某些奥秘,但离破解八股文这个密码尚差得很远。特别是某些批判言论,你千万不可将其当真,那只是一种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反映。如黄宗羲在明末清初那场批判八股文的思潮中也是个主将,但从内心深处,他并未忘情于八股文的妙处。老年时,认为自己的孙子八股文写得好,为让孙子能顺利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他竟去拉关系,要手握重权的徐乾学为其开后门,通关节。他在《与徐乾学》信中云:“小孙黄蜀,余姚县童生,稍有文笔。王颢庵公祖岁总科考,求阁下预留一札致之,希名案末。颢老相待甚厚。舐犊之情,实为可愧。”此信尚存,白纸黑字,不容辩解。顾炎武骂八股文误国,甚于焚书坑儒,可他两个最喜爱的外甥徐乾学兄弟都在入清后以八股文显,成为高官。王船山的儿子以时文名,孙子也当教谕,教人写八股文。如此行状,不由人不对前贤之言行真伪顿生无限感慨。也许他们是想让其后人以八股文去败坏清朝江山吧,出于为尊者讳,我们只能作如此想。

那么,八股文到底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八股文只是一种有着特殊要求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是明太祖朱元璋及其谋臣刘伯温为作育、选拔具有儒家正统观念和一定思维能力、政治文化素养的人才而精心创制的。

既然用于考试,就难免有利有弊。古人云:“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冯桂芬说得好:“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变科举议》)什么剿袭,什么束书不观,什么“皆空言剿袭而无用”等等弊端都是由于人们为利益所驱动,欲轻取功名而将其聪明智巧用之于这些投机取巧的举措中才产生的。这正应了柳宗元

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中的那句话：“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所以任何只执其一面而不及其余的言论，都不能破解八股文是什么这个问题。

若从写作的角度来破解，八股文是一种有着固定格式的，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

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它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且要摹仿古人语气，根据程颐、朱熹的传注来阐发题旨。如果应试者对程朱的传注领会得深，能发掘出题旨中的精义奥旨，且完全合乎程朱理学，能起到替圣贤立言的效果，那这样的心得体会就有中选的可能。明清统治者就是从这些心得体会式的八股文中选拔出一批批有较高政治、文化素质的官员，从而维护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不过，这种心得体会有着特殊的程式，须先破题、承题，再起讲。其标准的正文部分，必须用有声律要求的四个有着逻辑关联的对偶段落来层层深入地阐发题旨，写出心得；要在规定的正、反、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中将自己所领悟到的心得体会阐发无遗。作八股文有如床铺底下抡板斧，螺蛳壳里做道场，要困难见巧，困难显才。写作这样的心得体会，的确是在“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愚钝者是难以入选的。

古往今来，学习心得写得好的极少，像八股文这样有着如此苛严程式的心得体会就更难写好。难怪顾炎武说万历以前，能够流传久远的八股文不过数十篇而已。

若从功用方面来破解什么是八股文，则可以说八股文是明清两代培育官员的一种素质训练课程。

许多否定八股文的人都说八股文“所习非所用”，因为操习八股文的人一旦中了进士、举人，走上仕途之后，就将它掷于脑后，忘个精光，毫无用处。这是“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这种说法是只看事物的表象不看其实质，犯有片面性的错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今日中外中小学设置的许多课程，都有如八股文，学非所用，一旦走出校门便将其丢在了脑后，过不了多久便忘个精光。我们难道可以说，学它们是徒费精力，虚耗年华

吗？其实这些课程的设置，不在于它能给你多少可用的具体知识，而在于它训练出了你在漫漫人生征途上所必需的某种素质。比如学数学，我们在中学学过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到今天，那些浩如烟海的定理、定义、公式，我们能用上多少，又还记得几多？这不是徒耗年华与精力吗？可是别忘了，正是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们掌握了综合、分析的能力，使我们的思想能条理化，这些能力，不是让我们受用一辈子吗？

同一道理，尽管除一些从事教职的官员外，明清两代绝大多数官员不用再写八股文。其八股格式也被渐渐忘却，八股文的词句离他们渐渐远去，可是八股文写作所训练出来的儒家世界观和正、反、起、承、转、合的思维方式及思维能力却让他们受用无穷，永远在规范其言行，指导其行为方式的择取，而这些便是封建社会一个官员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

朱元璋创制八股文，规定文题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择取，发挥要依据程朱传注，要做到这点，非要将儒家这些经典的白文和注释读得烂熟不可。而行文时要顺口气代圣贤立言的规定，逼迫你非细细揣摩题目中所包蕴的孔孟真实思想和情感，用他们的思想去思、去想、去说不可。这样一来就将你与儒家正统思想的距离大大拉近。八股文讲究内容的雅正，还注重文内气势的流转，魄力之厚薄，格局的大小，词藻之枯腴。你要写好八股文，使气机畅通，魄力雄浑，格局宏大，词藻华美，就非要遵从八股文的格式要求，先练好破题，承题，再起讲，再提二比、中二比、后二比、束二比，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练好不可。长期的、严格的思维训练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施行。

由于朱元璋规定非经科举不得予官，而明清科举中又最注重七篇八股时文，所以士人们受利禄的诱惑，无不自觉自愿地去攻读儒家经典，精心揣摩程朱传注，设身处地体会孔孟思想，追摹古人之语意，肖其口吻为文，掌握正、反、起、承、转、合等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方式，皓首穷经，呕心沥血将八股文写好。久而久之，经过八股文写作，士人们便具有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文化素养，牢固地树立起了儒家正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培训出了敏锐的

限制思维、集中思维和精细分析、高度概括的能力。从具有这种素质的人才中选拔优秀者充当各级官员去治国理政,便足以担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大一统王朝的重任。这便是八股文的特有功能,这就是八股文的素质训练所造成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以破解什么是八股文这个密码了。什么是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按着特殊的格式规定,特殊的行文方式,用以阐发题目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培育具有儒家正统观念和一定思维能力、政治文化素养的官员的科举考试文体。它与明清王朝厮守了五百年,在科举途中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效忠朝廷的能臣循吏,也构筑了一道堤坝,拦阻了一伙伙倚仗祖荫意欲跳跃龙门、染指政治的纨绔高干子弟,更放逐了一些才情不羁,下笔千言却不知时务的风流俊彦。从而造就出一支具有较高政治、文化素质的官僚队伍,保证了明清两代较长时期国富民安局面的出现。

尽管八股文如同天上一片渐行渐远的彩云,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它的光华却永远留驻在明清两代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人物当中,不可磨灭。八股文凭借其独特的功能及社会渗透力曾经影响,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社会。我们不能因众口一词的辱骂将其妖魔化,也不应因载有八股文的古籍濒临消亡而将其忘却。研究它,了解它,把握它,理性地评判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 八股文的文体

现代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都认为八股文应体分八股。其实,这完全是对八股文缺乏研究的表现。自古以来,文无定格,所谓八股者,原是指两截题而言。上截两虚两实,下截两实两虚,谓之八股。后来统称为八股,但其格亦不可拘,因为八股文又叫时文,它的体式随时代的变化而在不断改变,所以顾炎武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日知录》)清代道光时李祖陶曾说:八股时文“日新月异,五百年无一定之规”(《文选制义·序》)。文分八股只是诸多八股文体式中的一种,只是一种标准体式。它产生于一定的

历史条件之下，也曾独霸过八股文坛，但好运不长，时代一变，各种变体都破土而出，它又成了诸体中的一体，被赶下了霸主之位。不过，毕竟八股体式是八股文的正宗，被历代视为正格，并且它的产生、定格及鼎盛和变革、突破，与统治者为了使儒家思想得到准确、全面、深入的阐发，从而更好地对士人进行思想控制与士人反对这种控制密切关联的，所以，我们只能在把八股文的标准体式弄明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领悟八股文的真谛。

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八股文的标准体式完备而苛严，由破题、承题、原题、起讲、入题、提二比、中二比、过接、后二比、后二小比、大结等部分构成，结构严谨，章法细密。现将其主要部分的构成及作法略作介绍。

破 题

破题是八股文体中的第一个部分。破题沿袭了南宋经义的做法。

所谓破题，就是破说本题的大意，也即是将题义点明。明代写作八股文的程式规定，无论文题的字数如何之多，或数句或数节，或一章或几章，也不管内容如何复杂，破题都只能用高度概括的几句话破开题字或题意，否则便为违式，会被考官判为不合格。

从明代初期直至万历初，八股文的破题用三四句，到万历中期之后，破题则只能用二句话了。

作破题先要将题意融会于心，弄清本题在经文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上下文的关系，关键在于抓准题目的主旨，肖题之神，用几句话，破尽命题之意。

作破题时要恰如题位，不可连上，也不可犯下。破题时语带上文称之为连上，语侵下文谓之犯下。

破题时又不能漏题，不可骂题。题中义理没有破全叫做漏题；若将题中字眼全部写出，不能浑融，叫做骂题。

破题有拈上截题的字贯串下截题的；有拈下截题的字贯串上截题的；有于题外拈一个字贯串全题的；有并不拈一个字而语意自然融贯的。破题时命意不可勉强，用意不可生凑，措词不可拖沓，文字要恰如题神，总以圆洁为上。

破题有明破、暗破。所谓明破，就是照题字而发明题意；所谓暗破，就是照题意去破而不露出题中的字眼，换言之，即是将题目的字眼，暗暗用同义词掉换。

如题目为“孝弟”二字，直接去分割“孝弟”二字之意义即是明破。如破时用“伦”去代替“孝弟”二字，就是暗破。

破题又有正破、反破。所谓正破，即是按照题目意思直接去破。所谓反破，就是按照与题意相反的意思去破。

例如《学而时习之》这个题目，若按照学习应该“时习之”去破，则为正破；如破时以学而不“时习之”去破，则为反破。

破题又有所谓顺破、逆破。所谓顺破，就是按照题面字眼，依照次序，自上而下去破。所谓逆破，就是将题面的字眼颠倒过来，自下而上去破。

例如破《学而时习之》题，先破“学”字，再破“时习之”即是顺破；如破《其为人也孝弟》题，先破“孝弟”，次破“为人”即是逆破。

破题的二句，或上句破题意，下句破题面，则上句即为题前；或上句破题面，下句破题意，则下句即为题后。

破题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上句领章旨，下句讲本题的；有上句讲本题，下句承章旨的；有上句冒全章，下句切本题的；有上句讲本题，下句或推开，或吸下，或直断，或虚抱的。又有先用断语起语而破本文者；有题意在下者，先照下，次还题，方不犯下；有题意本上者，先取题，次绾上，方不犯上。总之要相题下笔，丝毫不能马虎。

总括破题之法，总不外乎破意、破句与破字三项，三项中以破意为上，破句次之，破字为下。破字即是将题目中之字词换一个同义字词再行说出，其法最为简单。

破题是个小全篇，全篇之神奇变化，在破题时已见端倪。

古人说，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即是说，破题一作，通篇文章的主脑、框架、脉络便已定，作文者只有抱定破题，一层层、一步步作下去，不能随己意为之。

八股文之破题，贵在冠冕堂皇，贵在流利，贵在大雅，贵在古律，贵在自然。一点俗气、滞气都来不得。具体而言，长题之破贵简

为说明破题的方法，现举例加以说明。

如以《论语》中处处可见之“子曰”二字作题，有人作破题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个破题所用的方法是顺破题面，以“匹夫而为百世师”破题中的“子”，因为这个子即孔子，孔子以一平民而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且破中又不能出现孔子之名字，故以“匹夫而为百世师”来破“子”，真是贴切妥当，恰到好处。因为孔子每一句话，都被后世当做不可违背的至理名言而遵行，所以破题中使用“一言而为天下法”来破“曰”字。这种破法又叫暗破，因为破题中不明露“子曰”二字，而用与其意义相同的句子代替。

承 题

所谓承题，就是将破出的题意承接下来再加以说明，或者将破题未尽之意加以发明阐述。因为破题只有两句，只可包括大意，故其意义浑融，又不能挑出题目中所有的字眼来破，所以承题时便将破题中的紧要字眼，拈一二个，承继说明。对高手来说，承题宜把重点引向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淡化文题在原书中的原义。

明朝中期以前承题为四五句，至万历时承题则固定为三句。

承题的方法是，要与破题相关照，正破则反承，反破则正承；顺破则逆承，逆破则顺承；分破则合承，合破则分承。总之，宜明承而不宜暗承，要一起一伏，自相呼应，明快关联，不可使破自破、承自承才行。

题目中牵涉上文者，承题的第一句必须从本题说起，即便是与上文关系紧密，难以撇脱上文，也要先承本题倒入上文，才能使题位不乱。这一条十分紧要，若乱了题位，即是违式。

承题中的承是接的意思，即是要将破中重要意义承接，要接上而生下，以圆转不滞、轻便飘逸为上。

承题最忌平头，亦忌合脚。凡承题首句与破题的首句有数字相同为平头；末句与破题的末句数字相同为合脚。只是平头容易避开，合脚却难以提防。

承题须要有开合议论，纡徐委曲，如登着羊肠小道，令人一步一止而九叹息方妙。若承题一直说下去，没有转折层次，只是个加

字的破题,那就不叫承题了。如遇长题不能逐句承出,则宜选取关系重大者笼括之。

破题于圣贤帝王诸人,须用代字暗讲,不能直指其名。承题则直言之,如尧、舜则直称尧、舜,孔子则称夫子、孔子,其余诸人皆依题直称,无须避忌。

承题的首句用“夫”字、“盖”字、“甚矣”字。“夫”字是承上意而点明之词;“盖”字是承上意而推原之词;“甚矣”字是承破意而恳切言之之词。清代承题的末句必用“乎”字、“哉”字、“耶”字、“欤”字等虚字,但明朝则无此硬性规定,一般不用虚字。

原 题

明代万历之前之八股文,在承题之后用以领承题目上文,以说明本题发言之原委,即要提出圣贤为何而发出题中之言,谓之原题。成化、弘治后也有将原题置于顺口气即起讲之后的,但不如用于承题之后妥帖。因未顺口气之前承上文,则置上文于上,本题在下,体裁便顺了,否则容易将义理颠倒。但到万历时,即不常用原题,承题后即入口气谓之起讲。

起 讲

起讲位于承题之后,又名小讲。明朝时把起讲称作“发凡”,又叫“原起”,起讲是明末及入清后的称呼。

明代八股文的起讲很简短,仅三五句,不比清代,长至十句左右。

起讲的主要内容是将破题与承题所阐明的题意作进一步的发挥、补充。它要引申、讲明题义,或说明题目内容的背景等。文章的主题即在起讲中确定。

起讲是全文发挥、阐述的开始。有如人的脑袋,精思妙义,先从这里产生。

起讲必须扼住全文之纲领,总括全题,而发其大旨。因为破题、承题仅可解题,其要言妙道,微言大义,首先要在起讲处发掘出来。如果把一篇八股文比作人的身体,则起讲就是人的脑袋和眼睛。如脑袋、眼睛都摆不端正,全身就不像个样子了。所以善于作八股文的人,必须先着意于起讲。其要害全在“要起得起”,包笼

全篇大势，以散行浑写题意，切题而不拘泥，虚灵而不空泛。既能发全题之神，将题理、题意浑括包举，又能顾及全篇的布局，使人读后能耳目一新，神气俱爽。这样写来方才是好起讲。

起讲要使破题、承题所揭示出来的题义在面上展开，给下面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提出可供发挥的论点与问题。

作起讲时有上文的则本上文来说，无上文的则会本题意说。起、承、转、合，或由正而反，或由反而正，意要分明。单行中可用排语，也有散行而浑写者，方法不一。总的要求是要相题位置，总括全题，笼罩全篇。

起讲开头，有用一二句浑起的，也有拈出题目中的一二字明起的。起处或用陪衬，或高一层，或先一层，或后一层，都是虚写。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模糊不清，也不能将题意说尽。

接着，便用一二句承接，于是转一题位，后用一句收住。或紧抱本题，或回顾上文，或拖逗下文，虽然虚实不同，总要一气相生，不走题位。

如果题目是承上的，起讲时便要本上文而跟抱之，开口便要扣住题。做截上题，起讲时应避免与上文相类似，故意要融浑，切不可连上。其法或正起翻转（文下题全反为正，半反为翻）；或反起正转；或正起正落，反起反落。

起讲宜虚不宜实，宜活不宜死，无论哪种题目都是这样。

起讲贵有议论，因有议论才会虚灵。若不作议论，必须融会题意虚讲，不可一口将题义道尽。

起讲是文字入题之处，若抓不准文章的发展线索，就会漫无边际。所以必须从题目的发展线索上说下来，无丝毫走样才行。

起讲的方法众多，有陪衬法、对形法、根据法、影射法、重扼法、轻脱法、点逗法、浑涵法等。其共同的关键在于安顿上文有法，不至令书义颠倒。且只出题之半面，不能将全题和盘托出，须留有馀地，否则后幅无法展开，又不必过长。

起讲或对起、或散起。对起者要炼词，散起者要运意。这是正格。但炼词者必须用意警策而后工，否则便流于花丽；运意者必措词古健而后胜，否则就显得气势弱小。

八股文法

起讲醒题的便捷方法是一反一击。反者拗折题意,击者攻入题旨,尽管只一二句话,就使全题突显。

破题、承题都是断作,从起讲以后,便须设身处地体味口气。如题目中的话是孔子或哪位圣贤说的,便要设身处地揣摩其心理,替他把题目中的那些话再加阐发、分析,代替孔子或那位圣贤说出几十几百句在题目所规定的时间和场景下可能说出的话,而且要句句合符那些圣贤的身份和口吻。八股文代圣贤立言,要想在顺口气时便与圣贤合一,不得不逼入深细。口气各人有不同,有缓者、急者;有嬉者、笑者、怒者、骂者;冷言而刺者;正色而谈者;欲吐还吞者;痴子之或喜或惊,强作解事者;有目盯着上文冲口即出者;有故意藏着掖着不说又突如其来者;有言在此而指在彼者。顺口气时必须设身处地揣摩其事,想见当时古人心目间神情表现,代为曲曲描出而不走题意,方称酷肖。而所依据的解释,又必定要出自朱熹等人的注解。但也有些题目,如记人、记事或连章等题是不顺口气的,只以我意来断作,这也是作文的正格。还有些口气题,也是断作,直至起讲之后方顺口气。还有些口气题,全篇都是断作,这就是变格了。

凡顺口气题,起讲的首句开头,用“意谓”、“若曰”、“尝思”、“尝观”等字,用“且夫”、“今夫”、“且”、“今”也可。惟有断作题,只能用“今夫”、“且夫”、“且”、“今”字,其余均不能用。

为说明起讲的写作方法,特举几例说明。

居则曰不吾知也(正起法)

黄淳耀

以诸贤而不遇,宜其不能无感也。(以上破题)

夫诸贤何如人也,而莫之知耶?居而有感,则其望世殷矣!(以上承题)

今夫遇合之难有生所共悲也;意气之感贤者所不能忘也。士生斯世亦既蒿目时艰矣,而犹然伏处衡茅,又安能默默以终耶?(以上起讲)

这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八股文大家黄淳耀所写的名文《居则曰不吾知也》的破题、承题和起讲。

这个起讲以悲怆的笔调将由破题、承题所揭示的题义作进一步的发挥与阐释。作者针对明末贤能之士遇合之难发议论,为生当斯世,蒿目时艰,有心报国却无处施展的贤能之士大鸣不平。疏宕之中,殊多萧瑟悲凉之感。可见好的八股文也能表达情感,体现个性。

起讲首句从正面指出当时遇合之难让世人共悲。次句承上句说明诸贤的感叹。第三句转入说明诸贤感叹的原因。第四句切次句,第五句切首句作结。短短五句起讲,用正起之法,一层层将文章的主题表达出来,虚灵圆转不滞。

一匡天下(反起法)

唐顺之

霸佐有辅世之功,圣人所以取之也。(以上破题)

甚矣,圣人善之公也!以管仲正天下之功,夫子称之,其亦不没人善之意欤!(以上承题)

自今观之,春秋之时何时也? 繻葛一战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 蔡师一败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其孰能起而匡之。(以上起讲)

唐顺之是明代嘉靖时最有名的八股文大家,这是其八股文名作《一匡天下》的破题、承题、起讲。

这个起讲,从反面说起,只说春秋时天下不正,而反衬出管仲一匡天下之功。文字庄重古健,足以显现大家风范。

起讲首句以问句方式掀起,暗指春秋时天下之不正。接着用两对句承接上句而说明不正的具体情形。第四句擒上,末句引出管仲做收合。

有攸不为臣东征(叠衬法)

姚希孟

周王以义正名,而有不臣之讨焉。(以上破题)

夫不臣于周,此其罪未可定也,而遂以不臣之罪征之,所谓名以义起耳。(以上承题)

且君臣定位也,而至于天怒人怨,亲离众叛之秋,则君臣又非定位矣。故兴王崛起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

之者为王佐，亦为帝臣，带砺之所必及也；逆之者为贼党，亦为乱臣，斧钺之所必加也。（以上起讲）

姚希孟是明万历、天启时的名臣，以恪守儒家正统受世人称道，这篇《有攸不为臣东征》即充分表露了他的道义观。

这篇八股文的主题可用“以义正名，名以义起”八个字概括，起讲即从此说起，显得大义凛然。

起讲从首句至“则君臣又非定位矣”止，发挥“名以义起”。然后以“顺之者昌”为衬笔，“逆之者亡”为正笔，两次阐明“以义正名，名以义起”的道理。由此可知，昌明博大之文，必须叠衬，文气才能厚重。分析此文，可以知其大概。

入 题

入题又叫领题、领上、落题，也有称为落笔者。

起讲之后，即用一二句或三四句过渡性的话，把题义接入下面的八股正文之中，所以称之为入题、领题。

入题为题目的咽喉之处，出入吞吐皆在此处，故应与起讲、提比相关联，最忌硬写几句话，却与起讲、提比两不相涉。

入题“要领得起”，即要以高呼虚荡，摄起全篇之神。因入题是联络起讲之文脉，振动下文提比之气势的处所，要使题前部分与正题部分结合得严丝合缝，关键全在于此，故必须重视。

入题的方法是，题目有上文者领上文以入题；无上文者，可虚虚叫起本题为入题；无上文而有下文者，则要照应下文，领题后仍要留出下文地步；题目有上文兼有下文者，则领上入题划清本题所论内容的界限，意思仍要留照下文。有从本句领者，或逆题下截而入，或顺题上截而入，但都应相起讲之势而为之接应，才不脱节。若全章或连章之题无上下文者，则用浑括领起以入题。若题目字数多，而仍有下文者，应从上文串到本题末句，或明点末句之字，或虚笼末句之义，以清题界，仍宜落到题前。

以上破题、承题、原题、起讲、入题五个部分，都是在申明、破题解义上作文章，只有起讲刚刚开始发挥，故都属于题前部分，是布置于八股正文之前的格式。此后，才进入文章的主体即八股

部分。

八股文的正文包括提二比、出题、中二比、过接、后二比、束二小比、大结几个部分。它要根据题前部分所破解出来的题义,围绕所确定的主旨,对儒家的微言大义进行具体的阐发,以表现作者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与把握的准确程度。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为全文的主体,每比分为二股,共计八股,明代制义俗称为八股文就是这么来的。

八股文要“代圣贤立言”,即设身处地贴着儒家圣贤的心理和思想去阐发儒家正统思想,主要在这一部分中进行。

八股者为提二比(又称起比),中二比(又称中比),后二大比(又称后比),束二小比(又称结比)。但束比也有提前用于起比或中比之后者。比者对也,起、中、后、结各两比内,凡句子的长短、字之多少,与声调缓急之间,都须两两相对成文。此即八股的基本格式。明代前期因体式未定,八股文中相对二股有时字数也可有多少;到成化之后,功令已经严密,对偶要求工整,声律要讲,八股要分;嘉靖之后,开始化比偶为单行,股不必设,散体结构比比皆是。为联系各股之间或全篇之间的关系,还有些过渡性的文字,如提比之后有“出题”,中比、后比之间可有“过接”。明代八股之后用大结作为全文收束,可触及时事。

由破题开始至大结,通篇文字必须语意连贯,中间之“出题”、“过接”都用散句,目的是以之点醒文义,使之一气贯串,尤板滞转捩迟钝之嫌。也不可重复隔绝,层次不清。这是八股布局谋篇的要点。

八股之中相对的二股须各有意义,且意义不能相同,相同便叫合掌,为违式。

相对两股的构成有七种方法:剖一为两,补一为两,迴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

八股文十分讲究起、承、转、合的逻辑关系。从全篇来讲,起讲为起,提二比为承,中二比为转,后二比为合,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严密。分而言之,提比、中比、后比之内又各有起、承、转、合。

明代天启、崇祯之前,不称提比、中比、后比、结比,而只称一

二比,三四比,五六比,七八比。作时须把握各比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生五,生六,生七,生八,依次相生,各比之间便自然契合。

在明代洪武初期,八股文尚无定式,大体是仿宋代经义的形式,与论体相似,以经文来命题,文有破题、承题,八股体式未备,对仗不讲究工整,语连上文或侵犯下文也不禁止。

然而,这种初创的体式只适宜于敷衍传注,不利于引导士人全面、深入地去阐发题旨中的微言大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讲究文章内在逻辑关系的体式不能有效地训练士人的思维能力。于是,一些有才识的乡、会试考官便根据其经验,沿着讲求篇法与音律的方向去探究,对这种体式加以补充、完善,并利用刊刻程文的方式将改造后的文体公示于众,于是,八股便逐渐变为文体中的必备部分。

到永乐末年,最迟也不超过正统年间,制义中的八股形态就已基本定型了。如永乐年间于谦的《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题文,王恕《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及《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题文,就已具标准的八股格式了。

到成化年间,八股格式已完全定型。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会试,出《乐天者保天下》题,其程文是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又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会试,出题《责难于君谓之恭》,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目中包含两个并列的意思,叫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所以后来就称之为八股。下面分别对提二比、中二比、后二比及结二比的要求和基本作法进行简要介绍。

提 二 比

提比有出、对二股。提比是八股文刚刚进入正文的部分。不过,这个部分还只及题之半,而未及全题,所以提比又称为题前。

在作提比时,就要在题前着笔,提起全篇之势。

提比的内容贵虚不贵实,贵短不贵长,以总论为主,要点在出题意而又不把题意说尽。但虚不可迂远,短不能局促。要精炼紧凑,为中比、后比留下发挥余地。虽然提比贵短,但由于明代八股文字数规定有下限无上限,故有的提比句数较多,这亦是正格。一个题目必有一个题目的所以然,提比就是要去揭示它。提比揭示出的文题的所以然便叫原题。

提比“要提得起”。其要诀全在原题。不知原题而横出意义,岂但干本位不称,并中比、后比之文亦无根本关系了。

提比的写法或一意生两意;或就题中取两意提起;或承上文取两意说下;或两意交互;或一比反,一比正;或在起处反,收处正;或纯用反语。方法多种多样,但要相题而用,不同的题目,不同的条件用不同的方法,即选用最适合那个题目的方法。但无论用哪种方法,都要开口便见题旨,而又不可将题旨说尽。要有含蓄,有蕴藉,而又爽快不滞,这样的提比才合乎要求。

以下选取明代末年提比名作二则供有兴趣者揣摩,以认识提比的作法。

君子无终食

章世纯

是故为仁者,始必有所争于其大,而后必有以及乎其细。辨之富贵贫贱之分,凡皆为大端,而恃大端,遂足成德乎?日用饮食之故,其类甚纤,而其来方于此多也甚密,离合之数,方于此多也,君子亦谨持其隙而已。(提比出股)

抑为仁者,其始必有所甚矫,而其后必有所甚安。持之富贵贫贱之交,凡皆为自矫,而徒矫持,遂可为纯德乎?廉介节义之事,虽性所许,而非情所愿,循习之久,遂为自然。君子亦常谨其放而已。(提比对股)

这是明末江西八股文坛四大名家之一的章世纯所作《君子无终食》一文的提比。它暗融大、矫,大、小是从富贵贫贱终身之间说,矫、安是从不处不去无违上说。两说都有次第,但两股对仗并

不求工整。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赵南星

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斯人非独可惑也，夫以求福之心胜，而用是以行其佞谀之计耳。（提比出股）

通于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虚无，斯人非独可罔也，夫亦窥利之志殷，而藉是以媚悦之术耳。（提比对股）

这是明朝隆庆、万历时的名臣，文学家、八股文名家赵南星的名作中之提比。这篇文章针对为求媚而祭不当祭之鬼展开针砭。在提比中出股指出非其鬼而祭，不是该人不明天地之性，而是因为求福之心太切，故以之来行佞谀之计；对股指出不是因为不通于万物之情，而是求利之心太殷，所以靠祭不当祭之鬼去献媚取宠以邀利。虽只寥寥数语，就将“谄媚”者的用心揭露无余，又为下文预留了发挥空间。

出 题

提比之后，常常会用一二句或三四句散句醒出全文之文眼，叫做出题，又叫点题。有的文章在入题部分即已点题，此处则不用再出题了。

八股文之有出题，好似画龙要点睛，因为从破题、承题之后至提比，文章作了几乎有一半，而题之全身未现，故提比之后，必用文字点出文题，以醒读者之目。

点题须承接提比的意义而碎点之。其方法为：或将题目字眼顺出来点题；或将题目的字眼颠倒逆过来点题；或只点出题目的紧要字，而将其余全部略去；或全出本题，复以余意补充；或前出一半，后出一半来点题；或分层次出题；或点题半面，全题留至后面再出；也有浑养全局，至终篇才出题的。总之出题的方法多种多样，都要视文章发展的需要而采用，但无论怎样出题都要做到分明而不含糊才行。

中 二 比

中二比是正面阐发题中所蕴含要旨的重要部分，又关上锁下，故必须精确切实地发挥题意，回答题目中所提出的问题。下笔

前要将题目中的每个字都加以咀嚼,弄清其确切的含义,看还有什么前人未发的新意在内;要进一步搜寻题中正反神理所在之处,然后把题目中的所以然阐释清楚,一笔也不能模糊恍惚。

中二比是全篇的中坚,文题的正面发挥阐释处,议论固然要沉着,但须为后比留有馀地,题意不可说尽,这便是古人说的要实中留虚,因为后二比与中二比一样,都是全篇发挥题意的主要部分,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

作中比务必要立梁柱,照柱意阐发,其方法有正起,有反起。正起则反承,反起则正承。转落题中要爽快,不要纠缠。实发稳合,如题而止,甚至不可有一个字超出题目之外,一切都要在格式之中。

至于起承转法,俱与题翻,而正合一笔收住,要做到这点是很要点经验与笔力的。也有中二比全反,到后二比才正写者,那么中二比应虚且浅,后二比自然要实且深了。这也是一种写作方法。

抱上之文题,必须以本题起止,中间用倒入之法才不会连上,不然,题目界限会不清楚。

明代八股文的中二比一般较短,为四五句,短到两三句的也有。到明末,中二比才有长比出现,其文大开大合,尽情发挥题目之义蕴。每比长至十多句的则算变格。

为让大家明了明代八股文中二比的形态,现举二例加以说明。

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王 鏊

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中比出股)

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中比对股)

这个中比,摘自明代成化年间乡、会试均第一的八股文大家王鏊之《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题文。该篇是王鏊的代表作之一,备受称赞。这个中比无出题,用直下法,分承上截,直落下截。因为提比已将夷狄之患、猛兽之害说透,故中比便直落下截,无须多述。

春秋无义战 一章

钱 福

但就中而言,若召陵以义胜,而犹有借名之力;城濮以威胜,而不无假义之功,则固有彼善于此而已矣。而要之,皆非义战也。(出题)

是何也?天下有大分,上下是已;(中比出股)

天下有大权,征伐是已。(中比对股)

这是明代弘治庚戌(1490年)年状元钱福的名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一章题文的出题与中二比。

出题紧接提比,“彼善于此”二句仍缴入首句中,看题极清。中比极短,寥寥数句,提起下节,屹立如山,为通篇之关键所在。

后 二 比

后二比为阐发题旨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位,所以要在这里抓住题旨立意的实处,尽力发挥,将题中未尽之意说尽讲透。

后二比又是承接中二比而来的,中比没有说到位或讲得不透彻的意义,要在这儿补全,讲透。这也就是所谓的接中坚而表后劲。

后二比在阐发中二比未尽之意时或推开,或衬托,好像人体的两腿部分。

后二比出笔要庄重、实在。因为中二比是以松灵的笔调为之,后二比若不反其道而行之,则不足以振起全篇之精神。

后二比还可通过联想来拓展题意,使题旨更加充实,全面。还可以对前边的议论再加评述,发表感想。所以,后二比是最能显现八股文作者功力的地方。

后二比的写法或反或正,或擒或纵,须相间为之,要与提比、中比不同。

后二比开头常用虚字。若后二比是要进一步发挥题意,则可用“且”、“况”、“或谓”等虚字。若后二比是承接中二比的,则常用“盖”、“惟”、“若此”、“是故”等虚字。

后二比文气舒长,每比多至十来句。若中二比作得很长,则后二比短如普通的中二比,这要算是变格了。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归有光

以吾之天而触彼之天，则事前而机动，不独盛世遗音可以宣化，而治乱贤否所感之不同，而其归同矣。（后比出股）

以彼之天而契我之天，则世隔而心通，不独朝庙歌声可以平心，而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其致一矣。（后比对股）

这是明代嘉靖时最有名的八股文大家、古文家归有光的时艺《诗三百》一节题文中的后比。作者在此前已将题中所蕴含的诗歌与创作的道理，诗的“劝善惩恶”作用都已做了阐释发挥。后二比则从诗对人性的作用，做进一步发挥，把题意说尽说透。虽只寥寥数句，其目的却已达到，由此可见作者功力之深。但两股中有的意思有相同之处，这又是违式的。

心之官则思 二句

艾南英

盖耳目之役，以气动也，心之思亦以气应也，均是气耳。惟官在思而惕之以思，则以理驭气，而行乎感应之途而无差。（后比出股）

耳目之官，于吾身为视听之职也，心之官于吾身亦臆窍之列也，均是形耳。惟官在思而宰之以思，则以性治形，而握乎明聪之主而不乱。（后比对股）

这是明末有名的八股文大家艾南英的《心之官则思》二句题文中的后二比。

艾南英此文避开题中以“思”来区别大人与小人的意思，而发掘出新的意义，讲善于用心之必要，故文章比他人的显得有创意。后二比在承继发挥上文未尽之意时，把“思”与人的一般感知相区别，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问题，其见解颇为独到。

束 二 比

束二比有回应提醒全篇，归结全文之意。如说八股文的前半篇为点睛，则此处便可称为结穴。



束二比应就本题之意而照应全篇,若前六比意犹未尽,可在此处推原章旨,或归抱上文。对那些逆趋下句,明出下句者,要视后比落句的意思来收束全文。其原则是要含蓄,这样才能使文章有悠然不尽之意,给人留有馀思。

对于那些无上下文者,可归总本题,总括本篇,但应爽利雄健,不要冗杂拖拉。若在末句收结,必与开头相呼应。发挥题义而未点睛的,应在此点明。

因束二比在文章之末尾,写作者写上文时已竭尽全力,至此易草草收场,以至影响全文质量。故明代人强调在“结穴处犹宜慎思,勿以苟且见讥”。

明代八股文中因四股或六股已将题意讲透,常有将束二比略去者。还有的将束二比提前,放于中二比之后,谓之中二小比。到清朝乾隆之后,特别是到清朝末年,八股文大多只有六股,就是将束二小比省略掉了。

由于束二比一般都很短,所以束二比又有“束二小比”之称。

下面举明文中束二小比之例,以示束二小比的形态及作法。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王 鏊

吾知藏诸閤閤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中比出股)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廩,而后为吾有也。(中比对股)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中二小比出股)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中二小比对股)

这是明朝八股文大家王鏊的名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程文之中二比及由束二小比转化而来的中二小比。

作者在提二比阐发百姓足之后,于中二比阐述百姓足,君主也必然足的道理。然后将束二比提至后二比之前,补足阐述百姓足后对消除国家的忧患的作用,使全文层次井然有序,由浅入深,既将题义说尽,篇法也十分完备,成为明代及清代八股文之范文。

我未见好仁者

汤显祖

夫力之足不足也，以用而见也，未有以用之，胡为而遽罪乎力？（束比出股）

仁之成不成也，以力而决也，未有以力之，胡为而绝望于仁？（束比对股）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八股文大家。《我未见好仁者》题文是其代表作。该文紧扣题意，一层深入一层地阐发“成德者之难”，“因言弃德者众”的道理。在束二比中，更指出“成德者之难”是因为许多人只是把仁字挂在嘴上而不去力践实行，从更深层次阐发了题目“我未见好仁者”的含义，从而使全文显得圆满、深刻。

大 结

明代八股文在篇末阐发孔孟等圣贤的言论完毕之后，可自抒己见，或数十字或百馀字，谓之大结，又称收结。

明代初期大结可涉及本朝时事，以此来了解应试者有无政治头脑。到后来朝廷对言论控制逐渐加严，恐怕有人藉此以自炫，便只准讲前代之事，不许涉及本朝。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叶经巡按山东时作乡试《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题程文，其大结中有“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等语，明世宗以为是讥刺自己，一怒之下，将叶经活活杖死。自此以后，士子们心存惊惧，作大结皆草草了事。但也有些不肖之徒，往往在大结中暗藏关节，以交通考官，谋求一第。故至清朝康熙时悬为厉禁，大结至此而废。

明代八股文要求从破题开始直至大结，通篇语意要一脉相贯，中间所用出题、过接都不用排偶，而用散句，目的是点醒文义，使之一气相生，无板滞转捩迟钝之嫌。全文不能重复隔绝，层次要历历分明，不可夹杂不清。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明清两代各种八股文本刻选本及八股文稿本、抄本的收藏。在一本明末清初佚名者的八股文写作心得的

手抄本中,有一首八股文写作六字歌诀。它用精炼的文字将八股文的写作心得写了出来,颇有参考价值,现公之于下:

破为一章之主,
 承接破意而彰。
 起要一针见血,
 犹如擒贼擒王。
 虚虚笼起题意,
 最忌说尽中藏。
 领题务清来脉,
 入手方有主张。
 提比贵发议论,
 题情逼起为良。
 虚比流连取致,
 娇花美女可方。
 通篇不宜直露,
 出题尤贵悠扬。
 六比实发题面,
 字字抽出宜详。
 后发题意未尽,
 掉转顾盼如环。
 八比到此结束,
 前边照应勿忘。
 文成人归翰苑,
 数峰余韵春江。

以上各节对明代八股文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剖析,但嫌零散,为让人对明代八股文的结构有个完整的认识,特录明末一篇题目平正的名作以作范例,就此可略知其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钱志骥

论文于名位之情,欲其思为可就焉。(以上破题)

夫患无位,患莫知,未为失也。因所患而责立与可知

之实，君子正不以彼易此耳。（以上承题）

且人欲表见于天下，则必思天下责我之厚，与我副天下之难。夫其厚责者，皆我所必不可辞，而其难副者，又皆天下所必不肯恕。使分量不足以相酬，则自为表见之处，适自为沮丧而已矣。（以上起讲）

彼夫名位二者，君子之道待以行，待以传者也。惟吾道因名位以为功，斯名位益恃吾道以为重。（以上入题）

是故大儒穷通显晦，至集四海之耳目，群相倾注，而未始有震物之嫌。（以上提比之出股）

乃衰世之乡党朝廷，至挟三代之诗书，出以应求，而不免有抚躬之疚。（以上提比之对股）

然则无位何患哉，患所以立焉耳。夫国有事而后有官，其欲得者故事之臣，非居官之臣也。无论宠利难忘，惧失正直立朝之本，凡此时艰所属，得毋优于细务，而重任其将颠覆乎？试为置身负乘之时，君悔授政之轻，臣叹荐贤之误，耻尚可赎耶？早夜以思，或翻幸弓旌之未逮耳。（以上中比之出股）

然则莫已知何患哉，求为可知焉耳。公论有荣而亦有辱，其可畏者荣我之人，即辱我之人也。无论幽独易欺，惧蹈声闻过情之耻，即或细行所飭，得毋悦于凡众，而圣贤其犹摈弃乎？试为设计败名之日，父母陨其家声，朋友伤其同道，身尚安容耶？早夜以思，应转虑游扬之过盛耳。（以上中比之对股）

盖事理各有指归，在外者为功名，在我者为德业。（以上束比之出股）

生人止此心力，正用之为戒惧，而误用之为怨尤。（以上束比之对股）

功名迫而怨尤生，几欲以考课选举之权，徇人情之躁竞，此儒术之伪，其弊遂受之人才也。（以上后比之出股）

戒惧深而德业懋，正将以获上信友之道，励下学之藏修，此士习之严，其原在正乎心求也。（以上后比之对股）

用患者宜何居焉。(以上落下)

上面所录,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八股文名家钱志骏的一篇体式标准的八股文。但与成化、弘治时的标准体式相比,仍有不同之处。因其中比的每比起首两句已出题,故该文即未另作出题。文末无大结,只用一句作落下。由此可知,明代八股文因题型种类繁多,体式变化亦繁杂,即便是在定型之后,其体式也处在依时而变的动态状况。

八股文格式在明初即显雏形,永乐之后,八股格式即已常用。到成化、弘治时八股格式已完全成熟并以功令将其固定化。自此,八股文的标准体式便普遍应用。但变化仍在进行之中。各个部分有先无后有的,也有先有后无的。各个部分的字句也有由少转多或由多转少的等等。如破题、承题、起讲部分,句数在不同时期便有不同;大结由初时的可痛快发挥以表政见经过逐渐萎缩,以致完全取消。八股部分到万历之后,简化为二股、四股,连六股都少用,八股已成凤毛麟角,以致顾炎武要惊叹万历之后,士人已不知八股为何物了。这时大量的八股文甚至弃股不用,只依题而将文章分为二截、三截。有的干脆用古文的散体结构来写八股文也被视为合式,甚至被奉为名作。所以,对八股文体要以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审视,不要拿标准体式去硬套,否则,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八股文文体格式的功用

八股文是一种形式非常程式化的考试文体。明、清两代和近现代都有人批评八股文的文体格式,说它是机械的、刻板的,严重束缚思想,阻碍社会进步,戕害人才的一种无用之物。这些话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反问一句,既然八股文百无一用,为什么明、清统治者却要用它来考选官员呢?以这种有百弊而无一利的文体去选拔人才,岂不是在挖自己江山的墙脚,是在为自己掘坟墓吗?雄才大略如朱元璋、玄烨等人,智商不比我们低,人不比我们蠢,一门心思用在如何巩固其皇位上,难道会去做这等蠢事?明、清两代用八股文取士达五百余年,也确实选拔了一大批治国名臣;刚一考取进士,分发至县、州去任知县、知州,一般都能称职,凡此种

种,能用“无用”一言而蔽之吗?一种文化制度,无论其弊端如何之多,凡能长期存在,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八股文文体格式的功用究竟在哪儿呢?

首先,在于这种程式化的或用现代语言来说是标准化的考试文体格式便于评判试卷的好坏,能加快阅卷的速度,提高阅卷的效率。

在明代,特别是到了明代的中晚期,无论是哪种级别哪种类型的科举考试,县、府、道试考童生也好,岁考、科考考生员也好,乡试考举人也好,会试考进士也好,应试人员数量都十分庞大。因为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只有科举一途可走。明代且规定,非经科举不得予官。这种制度驱使别无出路而又心慕功名利禄的读书人无不往这条路上挤,故无论哪一级的考试,阅卷任务均极为繁重,考官们承负着极重的压力。

先看童生考秀才的人数,这是明代各级科举考试中应试者最多的。

明代在东南沿海及江西等经济较发达、文风较盛的地方,每个州、县至少有童生数百人,多者达上千人,且这个数目还在滚动式增加。因为明代对各级应试者均无年龄限制,有白发苍苍者仍在应童试,而新人又不断加入,童生数目便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他们受功名利禄的引诱,绝大多数会以通过科举搏取功名为出路,因而各县、府应试的童生数量也会越来越多,其阅卷任务自然也会不断增大。

经过县、府两级考试均获录取的童生,还要经过督学道按临各府时的道试录取方才成为秀才。

据《日知录》中说:“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员三万有奇。”这是明代早期的生员数。

到明代中期,据明末学者王弘说:“正德十年始有附学之名,计天下廩膳生员共三万五千八百许。”加上与廩膳生员数额相同的增广生员和“无常额”的附学生员,其总数至少在十五万人以上。

隆庆四年参加应天乡试的生员数是多少呢?据《大政记》记载说,当时“调用江西提学副使陈万言:‘科举校士遗落者,悉诣巡按

刘思问求复校,几四万人。”仅应天府一科乡试未取之生员即达四万之多,据此推算,当时全国生员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明代晚期生员的数量有多少呢?据顾炎武说,晚明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则数量更多。

这么多的生员,每三年要参加由督学道按临各府时所举行的二次考试,即为防止秀才荒废学业而进行考核的岁试,和为选拔参加下科乡试合格者而设立的科试。明代规定,丑未辰戌年为岁试之年,寅申巳亥为科试之年。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府参加岁、科考的生员加上应道试的童生,少则千余人,多则数千人。明末最著名的八股文大家艾南英曾参加过七次乡试,所应岁、科两考可谓多矣。他在《应试文自叙》中回忆他参加岁、科考的情况时说:“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三)艾南英为江西东乡人,其地经济并不发达,而应岁、科考及道试的童生数量达数千之多,其他经济发达的府、州,应考的人数将会更多。由此可知,督学道所主持的岁考与科考的阅卷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明代各省所举行的乡试,应考的人数量也十分庞大。

而乡试较之童试和岁考、科考,其试题量和考试科目都大有拓展。其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第一场是为了测试生员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的程度。第二三场则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识见及撰写各种公文的能力。

明初规定凡“生员之学成者”由县、府、布政司层层送试,无名额限制。后因考生日多,为了节省经费,不得不对考生实行限额,便先由督学道以科考加以筛选。乡试中各级学校生员一直是考生的主体。这些经过乡试前的科试选拔,名列一、二等的均可参加乡试。加上未入仕的儒士、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粘带的已仕官员也可应试,其应试人数仍然相当庞大。如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浙江乡试应试者“凡一千二百有奇”(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二)。隆庆四年庚午(1570年)应天乡试,仅落榜生员即达四万人。到万历

以后,又明确规定每录取一名举人,可允许三十位考生应试。据万历《大明会典》所载,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南直隶录取的举人数为一百四十五名及一百五十八名(见《大明会典》卷七十七、七十八),则其应试人数应为四千三百五十名及四千七百四十名。这么多乡试考生,仅第一场的八股文试卷即分别为三万零四百五十本和三万三千一百八十本。其阅卷任务十分繁重。

明代规定,凡乡试中式举人,都可参加会试,只有正统元年丙辰(1436年)和弘治元年戊申(1488年)曾两度规定举人三次会试不第便取消会试资格,但因窒碍难行,均不久即罢。因为此举断了众多举人前程,反对者众。

举人们为功名利禄计,谁也不愿将猎取最高功名的机会放弃,加上举人赴京赶考,官府还计路程远近发给路费,故无特殊原因,举人们都会赴京参加会试。

明代初年,因乡试开科不久,取录的举人数量不多,参加会试的人也相对较少。以后随时日迁延,举人越来越多,会试中式者最多的一科达四百七十二人,少者仅数十人,一般在三百人左右。据丘濬在成化年间说:“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丘濬:《大学衍义补》)故举人数量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到明代中期,每科会试,应试举人达万人上下。会试三场所考科目与乡试完全一样,这样阅卷的任务自然也是十分繁重的了。

数量这么巨大的试卷待阅,阅卷的考官却屈指可数。

县、府试阅卷者为知县和知府;道试、岁考、科考的阅卷者为督学使。这就出现如明末艾南英所说的“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的现象。

明代乡试阅卷者为主考官两人,同考官四人,后不断增加,到明代后期达到十四五人。

会试的阅卷者,洪武十八年乙丑(1385年)规定为主考官两员,同考官八员。后因应试者逐科增多,阅卷任务太重,便随实际需要,屡次增加同考官数量,到明代后期已增至二十人。

待阅卷试卷堆积如山,阅卷者人数却是如此之少,而阅卷时间又十分短促。

明代规定,乡试头场从八月初九开始。头场试毕,于十二日由主考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的时间,大省为九月五日前,距开始阅卷不过二十日左右;中小省为八月二十日以后揭晓(见丘濬:《大学衍义补》),距开始阅卷不过十馀日。在规定时间内如考官校阅试卷未毕,将被御史弹劾而受到处分,重者竟至丢官。

会试头场为二月初九日,也是十二日开始分卷校阅,最迟至三月五日之前必放榜公布录取名单。

明代大奸臣严嵩曾任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年)的会试考官,据他说,那次会试从二月十五日试毕,不过十天就阅卷、录取完毕。到二十七日即将录取名单张榜公布。(见严嵩:《铃山堂集》卷二十七《南省记》)

试卷是如此之繁多,时间是如此之紧迫,阅卷者又是如此之少,限迫逾期便要受到弹劾。而文章又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若无格式化的文体,要想如期完成阅卷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假如一定要按期张榜,则只有马虎草率了事,这就会使大量合式的文章漏失,有失抡才大典的公正性。

明代陆世仪曾记叙过当时考官阅卷的马虎情形:

“试官阅卷,以数日为期……中间酒席谈笑,去其过半。约计士子前后场文,不下二十馀万首,试官虽神人,三四日间亦不能遍阅,其积弊至于只阅前场,又只阅经义。”(陆世仪:《甲申臆议》)

八股文这种严格程式化的考试文体就能很好地解决阅卷中的这一难题。它能大大提高阅卷的速度,便于评判试卷的合式与否,使所有的试卷都能如期一一阅过,从而保证抡才大典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比如,八股文文体程式规定破题只能用两句便要將题意破解出来,如用两句话没有破解出题意;或虽破解出了题意,所用句子超过了两句;或破题中涉及孔子、孟子等圣贤之名而未用代字;或破题未能扼题之旨,肖题之神,这篇文章便不合式,可以废弃,不

用再往下看。这就省却许多阅读时间。

破题作得合式,但承题没作好,或者顺破顺承,反破反承,或者句子超过了规定的数量等等,于是,又可不再往下校阅,将其黜落。

到起讲时,看其是否顺口气,若口气错了,或其口气顺得不贴切,也可将卷黜落。

若全篇皆合式,则看其是否做到了起承转合。从破题到大结,语意是否一气相生,文脉是否清晰,层次是否清楚。这些方面做得好的,即可由房考官加上批语,推荐给主考官,以求取中。这些方面做得不如人意者,虽通篇尚合式,也可将其黜落。

所以,正是八股文文体的严格程式化,才能使考官们一目了然地检校每份试卷,以其每个部分及全篇是否合式来决定其或取或落。这样便大大节省了阅卷时间,提高了阅卷效率,使堆积如山的试卷都能如期一一遍阅,不至有因时间紧迫而不阅或马虎塞责、偷工减料之现象出现。从而维护了考生的权益,使其获取功名的机会不致丧失,抡才大典的客观性、公正性得以体现。

反之,若没有文体的严格程式化,县试、府试、道试、岁试、科试、乡试、会试,人数这么多,每篇文章格式不一,方法各别,题目虽是一个,却你有你的写法,我有我的写法,五花八门,考官们每篇文章要反复阅读,仔细咀嚼,方能分出其主脑,理出其脉络,体味其神理。这样下来,一天都难看几份卷子,堆积如山的试卷要校阅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这样又如何保证抡才大典的公正性、合理性?

所以程式化是考试文体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也是八股文文体格式虽然呆板、僵滞、束缚人的思想,却又能使用五百余年,与明清两朝共存亡的原因之一。

八股文能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抡才大典中使用五百余年方衰亡,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考试文体的格式,能有效地对学习写作这种文体的人起到培养其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其思维能力的作。用今天的话说练习写八股文是一种素质训练。这也是八股文文体格式的最大功能。

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把逻辑学与八股文联系起来,指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然就耳目所暗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

这段话是深得八股文的真谛者方能说出的中之之言。

应当明确指出,明代统治者创制八股文并用于科举取士,其目的是为培育、选拔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员,而不是为了培养学者、诗人、文学家。有人曾嘲笑中过进士、状元的人写不好诗,李白考不上进士诗却写得比进士、状元好,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科举根本就不是用来培养诗人的。八股文也不是用来培养专门人才的,例如自然科学家,且那时还不可能产生这种观念。八股文这种文体就只能用来作育封建官员。从训练、培育、选拔合格的封建官员这点上来说,八股文是切切实实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明王朝所需要的官员首先必须树立系统、牢固的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必须忠诚于朱明王朝。这一“德”方面的要求,由规定八股文的文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阐释发挥其微言大义必须依据程、朱等人的注疏,以及八股文必须代圣贤立言等规定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封建官员所需要的办事能力、治国才能,则可通过八股文文体格式写作的长期练习来培养。

明代的初级官员系由取得进士功名后立即授予的。如知县、知州、推官、六部主事等。这些人刚从科举场中走来,除开要在各自岗位上获取实际工作经验外,还需要哪些才能呢?

最主要的需要认识事物的尖锐性与敏捷性;分析事物的客观性与辩证性;把握事物本质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一句话,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要思路清晰,具有较强的分析与概括能力。例如,担任知县、知州这些亲民官,他们上任后的主要任务是办案审案,维护社会稳定;教化和安抚百姓;发展农耕,收取赋税。那些刚刚从科举场中走出来的知县、知州们一般很快就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在自发蒙开始的、长期的八股文写作过程中,为掌握八股文文体格式,而经受了严格的逻辑训练,使得他们的

思想条理清晰,具有了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

学习八股文的写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先学作破题,再学作承题、起讲,然后起、承、转、合,先提比、后中比,再后比、再束比,一股股地把八股学着写完。在这个把八股文文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做会、做熟、做好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严格的思维训练。

作破题就是训练写作者的概括能力、思维的准确性以及多方面、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八股文写作规定,无论文题有多长,内容有多复杂,甚至思路很窄,很怪僻的题目,也只能用两句话把它的意义破解出来,而且这个意义还必须是题目中最为重要的,即要把概念的内涵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破题的方法又有正破、反破、顺破、逆破、暗破、明破,先破题面,再破题意等等之分。这样经过长期的学习破题写作的训练,就培养出写作者的概括能力、思维的准确性和从多方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承题的练习,则可培养八股文写作者正反思维的能力,训练思维的全面性与条理性。因为按规定,承题必须将破题中的紧要意义承接而下。若是前面用的是正破,这儿便要用反承,反破则用正承,顺破则用逆承,逆破则用顺承,明破则用暗承等等,总之要与破题之法相反相成。在承题的写作过程中,自然受到了逻辑思维的训练。

起讲要讲究起、承、转、合,或由正而反,或由反而正,还要求理路清晰,脉络分明,能总括全题,笼罩全局。你要掌握起讲的方法,就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久而久之,写作者的辩证思维能力、周密考虑分析问题的能力都会得到提高。

至于八股文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的写作,更是训练写作者思维的全面性、系统性、辩证性的有效手段。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着正反、先后、轻重、因果等等多方面的关系。人们在不断分析、把握事物之间的种种关联时,就能使思维受到各种逻辑训练。八股文组织有序的文体格式就在各部分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与全篇之间设置了种种关联,因而在写作时必然会使思维的全面

性、周密性、清晰性、辩证性受到训练。

如八股文的起讲与正文部分的八比规定要有起、承、转、合的关系。而各比之间,各比与全篇之间,又要虚实相映,排偶精警,相互关联,相互呼应。它们都要紧紧围绕全文的主脑进行阐发,又要面面俱到,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阐发题旨,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写作八股文的人就在八股部分的巧妙设置中受到全面思维、辩证思维的锻炼,使其分析问题、概括问题的能力藉以提高。

总之,受到八股文文体格式写作训练的人,对那些即便是内容极为狭窄的问题,也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核心与本质,并用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思维的方式,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在处理问题时,从小就在写作八股制艺中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立即会浮现出来,指导他有条不紊,有板有眼地应对。

在明代,读书人除了走科举之路外别无显身扬名之途可走,故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会从小就攻习八股文。直到考中进士,方才将它弃于脑后。

在这个漫长的八股文写作过程中,思维方式受到了严格的系统的训练,思维能力则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中了进士马上走上各种岗位去充当初级官员时很快就能适应的重要原因。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思维能力的强弱,与其受没受过系统严格的训练有很大关系,更与是否长期受到严格训练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受到八股文文体格式的训练,使得读书人具有了较强的思维能力,这是八股文文体格式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也是八股文历久不败的重要原因。

三 八股文的题目

八股文是一种功令极为严密的命题作文。八股文的题目在八股文的写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明代学者凌义渠说:“夫有题,然后有制义。”

清代学者刘熙载说:“文莫贵于尊题。”

清代另一位学者焦循也说:“时文之意根于题。”

他们的话,都一语道破了八股文题目的重要性。

八股文是将“文以载道”的古训发挥到了极致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文题即决定了八股文所载之道,即八股文的内容。

八股文的文题又体现了明代统治者创制八股文的根本目的。

文题是八股文的标识。八股文的各部分必须紧紧围绕文题来阐发义理,文题也就决定了八股文的作法。

文题还是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基础。离开文题,“代圣贤立言”这一八股文的义理表达的重要方式就无从着手。

明代对八股文文题的出处,命题的方式,题目的审定,题目与文章各部分的关系,都有着严密而完备的规定。要掌握八股文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必须弄清八股文文题的来源、功用,认题的方式,文题的演变,文题的种类及其作法。

八股文题目的由来及其功用

八股文文题出自《四书》、《五经》这个科举考试试题库。

明太祖朱元璋虑及深远,为培养千千万万能维护其封建统治、忠君爱国的合格官员,他颁诏从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起在全国进行乡会试,并规定:

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选举志》)。这即是说,朱元璋与刘基为尊奉儒家经典,把《四书》、《五经》作为八股文的试题库,八股文的文题全部取自《四书》、《五经》的经文。

在明代初期,八股文文题讲究明白通晓,或一句或数句,或一节或数节,或一章或全章,不加割裂截取,意思必须完整,连单句题都少,被后人誉为“题皆明白正大”,并无偏全、承上、冒下、截上、截下等怪题、偏题。

这种出题的方法及所出题目的形式,与宋代经义毫无二致。追根溯源,明代八股文的命题方法即是承继了宋代经义的做法。

为了驱使士人们更加深入地钻研儒家经典,宋代经义的题目都要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来充任。

流传至今的宋代经义名篇的题目如王安石的《参也鲁》题出自《论语》;《以子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题、《杨子取为》二节题

均出自《孟子》。

苏辙的《至于治国 从我》题、《诤辞知其》四句题、《天下之言》全章题均取自《孟子》。

杨万里的《至于治国 从我》题、《杨墨之道》二句题取自《孟子》。

汪立信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题、《孰谓微生》一节题取自《论语》；《与谗谄面谀之人居》题取自《孟子》。

文天祥的《箕子为之奴》题取自《论语》，《愿比死者一洒之》题取自《孟子》。

张庭坚的《自靖人自献于先王》题、《惟几惟康其弼直》题取自《尚书》。

将之与明初之八股文题相比较，如于谦的《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题、王宗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及《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题，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题、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题，可以看出两者同出一源，其命题方式及题目形式毫无二致，二者都属后来所称之大题一类，皆明白正大。

元代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亦是承继了宋经义命题的方法。

明太祖朱元璋仿宋代经义的做法，取《四书》、《五经》中之经文为八股文题目，用心极为良苦。他欲用这种方法驱使天下读书人去熟读精研儒家经典，使其在儒家经典的日浸月染之下，自觉地接受儒家思想观念。

朱元璋基于“治本于心”的理念，对以儒家经典控制士人的思想，树立其忠君爱国观念极为重视。他懂得，要想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必须让他们从小至老终生与儒家经典为伴，去熟读钻研《四书》、《五经》，从而使他们长期在儒家经典熏陶之下，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而在八股取士制中，规定八股文题必取自经文，是诱使读书人自觉攻读《四书》、《五经》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明代科举功令严密，士子下场应试，不得携带片纸只字，还规定对题意的阐发，必须根据程颐、朱熹等人的传注所认定的义理，不能别出心裁，自由发挥，否则即为违式。写作时还要认清题位，即该题目与上下文即全句、全节、全章的关系。明代中期以后，各种名目的偏全题、截题、搭题充斥考场，《春秋》试题中，还出现所谓的比题、合题、影搭题，如对《春秋》所载各位王、公、侯的元年，就有《元年 春王 正月 同生 礼聘（比同生传）》这样将经文与传注进行截搭而出现的怪题、难题、偏题。

要想顺利地应付这样的考试，应试者不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能提头知尾，或随便拈出一字即能背出全句、全节、全章，则下场应试时遇到上述的偏题、怪题，就连题意都会弄不明白，落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文章又何从着笔？

要想在下场考试时能读懂题，并能准确把握题义，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文题，哪怕只是一字题，或出的是《春秋》中的影搭题，都能应付自如，一题到手，即能马上记起上下文，知道它在何句、何节、何章，并能根据程颐、朱熹等人的传注，去把握题中的微言大义，非得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如泥，方能将书义弄得明透，方才能看懂题目，才能按程颐、朱熹所提示的意义去进行发挥，甚至注所未备，补为发明。否则，不仅看不懂题，到头来只能落个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或者是隔靴搔痒，抓不住要义，这都是功令所严禁的，这样的文章中选的可能性等于零。

在明太祖朱元璋“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的祖制之下，只有应科举方能出人头地的读书人，便会倾其精力、年华，从小至老，只要未曾释褐入仕，便会逐字、逐句、逐节、逐章地去攻读、钻研《四书》、《五经》，力求融液经史，把握精髓，不仅会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还会精心揣摩以掌握其精义。年长月久，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处世哲学、忠君思想、行为准则便会浸染其全部身心，他们便会以此来规范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成为朱明王朝的忠臣孝子，成为朱明王朝的中坚力量。

清朝道光皇帝曾说过：“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整个明朝共开过

九十一科会试,从所取中的二百七十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来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道德行为上都是没有污点的,虽然成就有高低,但都能遵奉儒家的思想行为规范,奸恶之徒只是极少数。由此可见,通过八股取士制,首先是八股文文题必取由经文的做法,使明太祖朱元璋“治本于心”的理念落到了实处。从宣德到弘治,八十年承平之世,最终实现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的文官选拔制度,一批批具有儒家正统观念的人才被培养出来,占据了明代各级官位,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其间有摹套幸取者,而蒸陶经书,审顾矩矱,朝廷亦每收拔十得五,拔十得三之效焉。”(《同治直隶澧州志》卷十二《选举志》)这便是朱元璋以经文为八股文文题的最大功用所在。

八股文的认题

对于八股文本身而言,八股文的文题,具有很重要的内在价值。

首先,八股文文题决定了八股文的基本写作方式。离开了文题,八股文的文体形式便徒有其表,而无其实。

八股文的文题,决定了破题的方法:即要用最简练的几句话,将题意破解,并要扼定题旨。

承题则要将破解出来的主要题意承接而下,加以申明。

起讲则要总括全题。

提比、中比、后比、束二小比这些八股文的正文部分,则要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阐发题目内蕴的义理,发明其微言大义。如提比要领起题意,后比要充实题中未尽之意等等,要在八股正文中将题义说全,说深,说透,使其精义毕现。刘熙载的“文莫贵于尊题”(《艺概》卷六《经义概》),指的就是八股文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要紧紧围绕表达、发挥题义而展开。偏离了文题,八股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要做到“尊题”,就必须准确地把握住题旨,并在全篇中全面深入地加以阐发。

文题又是八股文的灵魂,代圣贤立言的基础。

明代科举功令规定,八股文除开记事题和连章题不入口气外,其他各种题目都要入口气,以代圣贤立言的方式将八股文要阐发的义理表述出来。

所谓代圣贤立言，即进行起讲之后，要追模古代圣贤讲话时的语意，肖其口吻以为文。

而代圣贤立言的基础又是八股文的文题。

八股文的文题全都取自经文，它们要么是孔子、孟子等圣贤及其弟子们的言论，要么是他们之间或与他人的问答。功令规定，八股文除记事题与连章题不入口气外，其他各类文题均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既然八股文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就必须做到“文必肖题”（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书香堂笔记》中说：“每题各有题之形貌，文亦必与之相称，而后为肖题。”即是说八股文中语言所显现出的精神气质、口气、声音、神采风貌都要与题目中的人物酷肖。有题字的地方，固然要从字里行间、语气语意去揣摩题中人物的个性、心理，说话时的口气、神态，然后按其口气行文。即使是没有用文字表现，而在题目中包蕴有的意义，也要设身处地，按题中人物的思维逻辑、个性心理去想象其神情语气，然后代为写出。入口气、代圣贤立言要做到“肖题”，非对八股文的文题有透彻的把握不可。

八股文又强调“文贵如题”（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

即是说，凡题义中有的，文章里面必须要有，若没有则叫减题。

凡题义中没有的，文章里头也不能有，若有，则叫做添题。

添题或减题都不符合八股文“文贵如题”的要求，都是违式的。

尊题、肖题、如题，这是八股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不做到这一点，八股文必定不合功令。

而要做到尊题、肖题、如题，首先要读懂题，认准题，要能在下笔之前即准确地把握住全部题旨，及其与上下文的关系。

八股文文题各各不同。明代人说：一题有一题之面目神情。所谓面目即是题目之外在形象，或长或短，或整或散，或实或虚，这就是八股文文题的外在面目。所谓神情，就是指文题的意思与上下文的关系，或注上，或注下，或有言外之意。不能区别、认识文题的面目神情，就驾驭不了文题。

王夫之也说过：“若经义，一题自一理，一篇自一意。”（《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三十一则）

所以,明代八股文大师茅坤就把认题列于八股文写作要诀中的首要地位。他说:“一曰认题,题中精神血脉处,学者须先认得明白,了了悉之心中,方可下笔,然后句句字字洞中骨理。予尝论举子业,浅视之,则世所剿袭帖括亦可掇一第,苟于中得其深处,谓之传神可也。孔孟学问宗旨虽同,其深浅大小亦自迥别,学者苟以孟子论学之言掺入孔子,便隔一层矣。予故论为文须首认题。”(引自王步青《分课小题续编·发凡》)

茅坤是明代著名的八股文大家之一,这番话显系其经验之谈。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八股文学家王步青亦说:

“摹写虚字眼处是题之情也。题情不得则题理不真,所讲求之法亦死法耳。故认题为文家第一丹头,此不磨之论。”

认题既然是八股文写作的首要任务,关系到八股文写作的成败优劣,故明代人对认题作过深入探讨,对认题的要点及方法有大量论述。

他们认为,一题到手,首先要认清本题,把握题旨。

一个八股文文题既有题面,又有题意。题目的外在字、词、句、节、章便是题面;题目的字、词、句、节、章所包蕴的义理,即文题的题意。

要认清本题,首先要将题面认清楚:它们是由什么字、词、句,以什么方式相组合的。

对初学者而言,尤其要讲实字,以观义理,虚字则审其精神。这是明代人公认的认识本题的办法。若实字的意义不明则行文中措词必多浮词,虚词的精神不审则出笔必成呆相。但初学者常常忽视虚处,所以认题时应切实弄清词的虚实。

然后再认准题意:要逐字、逐句、逐节、逐章地咀嚼其含义,看它们所包蕴的义理是什么?有多少义理?其主旨何在?本题的题眼何在?是体现在题中的虚字还是实字,是在字句之中还是在无字之处。还要将白文细注,反复涵咏,看它来龙在何处,窍妙在何处,归宿在何处,用何局法,立何柱意。经书章有章旨,节有节旨,提纲挈领,最为紧要,故要弄清程颐、朱熹等人对本题的字、句、节、章是如何解释的。他们为何会这样解释?在他们的解释之外还

有不有其他的解释？有不有言外之意？他们是否将本题的意义阐释已尽？还有有不有发挥的余地？还有有不有没有说到或说尽的地方？如此等等。

总之，要自出手眼，将题层层拆开，不要囫圇吞枣。若字面无可拆者，便将意思拆开。其无上下文者，须就本题字字咀嚼品味，一分一厘，都如在天平上秤过，则书旨可以了然。若题有上下文，先将来去踪迹，一一审明，然后将本题分位，认定分清。

只有这样全面、深入、多角度地去审视题目，才会知道题中某种实理宜发，某种虚神宜摹；某一字不可滑过，某一句不可着迹；才能认准本题题意，尽发题目意蕴，全面、准确地把握题旨。题之真神既得，自然口口咬着，作文时才不致发生减题、添题的错误，而会尊题、如题。下场时，考官才能从其所作之文去“观穷理之学”（王鏊：《制科议》），识辨作者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和理解的程度。认题若不到真切处，则作文之意与主司命题之意必不能契合无间；认题不到微妙处，则行文必不能超出于主司命题之意。这样一来，虽选声练色，也只是皮毛功夫，无关痛痒。

认题的第二要务是要认清本题的题位。

所谓题位即是本题在经书中所处的位置。

在《四书》、《五经》中，一句中之各字，一节中之各句，一章中之各节，其含义往往是相通贯的，如果不联系本题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单单从本题来发掘则不可能反映出该题的全部意义。故在八股文的认题中必须认清本题的题位，以划清本题的题界。

在进行八股文写作时，一题到手，应仔细分辨该题的出处，弄清它出自《四书》、《五经》中的何句、何节、何章；它所在句、节、章的主旨是什么？一章重在哪一节？一节重在哪一句？一句重在哪一个字？来踪去路，要看得融会贯通。更要弄清本题与它们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是因果关系，还是正反、先后、轻重、并列、递进等等关系。

刘熙载有句中肯之言：“题有筋有节。文家辨得一节字，则界面分明；辨得一筋字，则脉络联贯。”（《艺概》卷六《经义概》）它指的就是作八股文时只有认清题位，才能把握住本题与其上下文的

关联。作八股文要以顺口气为主,则上节万万不能预透下节,前节绝不可即侵后问,故一题自有一题之界,只有划清本题与上下文的界限,理清本题与上下文间的发展脉络,行文时才不致犯上连下,违反功令。

认辨题位的方法是:先近看,即仔细体味本题之上下文的含义,弄清它们的主旨及其与本题的内在关联。然后从远处着想,看要怎么做才能融合本题所在的句、节、章的主旨。章旨在本题者,阐发本题的义理即是阐发章旨。若章旨不在本题而在其上下文,则必用本题去统摄它。只有这样与上下文相勾连去考虑,认清了题位,划清了题界,才能把握住本题的真正内涵。

认题还要认清本题中所涉及人物的个性、心理。

一题到手,要弄清本题中的话是何人说的,然后在用轻、重、急、缓各种读法读题的过程中,仔细体味文题的语气、声调,琢磨题中的说话人及题所涉及的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动态,及声音神貌。题目不同,则人物口吻各各不一,“入孝出弟”、“不重不威”等题是策励口吻;“巧言令色”、“攻乎异端”为设戒口吻;“平仲”、“子产”等题是赞叹口吻;“古之道也”、“吾不欲观”等题是慨叹口吻;“管仲器小”等题是明贬口吻;“何如其知”等题是冷讥口吻等等。只有把各题包含的人物口吻弄清楚了,才能为作文时顺口气、代圣贤立言铺平道路,做到“文必肖题”。

认题还要认清本题的题型。

由于八股文文题是从经书中摘取的,摘取的方式与组合的方法有许多种,便构成了不同的题目类型。如单句题、连章长题等等。到天顺之后,还出现了割裂经文的截题、搭题等怪题、偏题。由于每种题出题的方式不同,其作法便各异。王宾客云:“法者题中天然之度,如匠氏之绳尺,乐师之律吕,行军用兵之行伍阵势也。题不一题,法不一法,故有单句题,即有走窄路之法;有枯窘题,即有走阔路之法;有截上题,即有不粘不脱之法;有截下题,即有神行官止之法;有截上下题,即有纳上吸下之法。”(雍正手抄本《狐白前集·序》)若分辨不清题型,便不可能选准合题的写作方法,那么文章就难以作好。王夫之说:“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

不可以题从法。”(《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五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认题时必须认清题型。

刘熙载说:“善认题,故题外无文。”这是对八股文文题认题作用的高度概括。

明代人曾对不同的八股文题型总结出不同的认题方式。

那些无上下文,题目意思独立完整的全题,无论是一节题、两节题,还是数节题,都要讨个结聚,也即找出题中最为关键的部分。这个结聚或在文题的上部,或在文题的中部,或者在文题的下部。这个结聚或者是个虚字,或者是个实字;或者是一个字,或者是一句;或者是几个字,也可能是几句,在作文时须一一分辨清楚。有些题目题句虽同而题意迥别,写作时若挪移混杂,会贻害不浅。因经书中论天,论命,论性,论诚,论道德,论仁、义、礼、智、信,论政,论学等类,逐章各有归宿,不可假借抄袭通用。

八股文文题的嬗变

有明一朝,二百七十馀年间,八股文文题经历了一个种类由单一到繁多,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内容由完整明白到割裂牵掇、古怪难解的变化过程。

在明太祖洪武年间,由于朱元璋对科举制义文的要求是“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太祖实录》),“凡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明会典》),故这时的八股制义,文题皆明白正大,全系取自《四书》、《五经》中阐述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和治国之道,意义独立完整的整句、数句、整节、数节、全章的经文。当时连单句题都很少出,更无割裂经文出题的现象,一些相同题目在乡、会试中还反复地出。如从洪武到建文朝间的十几年里,乙丑(1385年)、丁丑(1397年)、庚辰(1400年)三科会试所出的试题中都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文题。

正是在“惟务经旨通畅”的思想指导之下,这个时期八股制义的文题种类不多,只有后来被统称为大题的单句题、数句题、一节题、数节题、全章题和连章题等数种,它们的意义都是独立完整的,并无截头缩脚的题目出现。这个时期的经题仍仿宋代经义,或出数题之大意中相近者,或相反者,听各为条答。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1391年),考虑到当时的科举试题太过明白通晓,难以测试出应试者水平之高低,难以识别应试者才学之高下,朱元璋方才下诏,明确规定:

“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说问意,以观才识。”

皇帝颁诏,各科乡、会试的主考官当然会执行,但由于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总的原则是“惟务经旨通畅”,故当时八股制义的题目,仍未脱整齐明白之整体格局,只在难度上有所加大而已。

但是,这种出题的路子很快就走到了尽头,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化作文的试题库,《四书》、《五经》的容量是有限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余字。其中《论语》一万一千七百零五字,共五百一十二章(见郑晓《今言》)。《大学》、《中庸》,连同程颢、朱熹的注释,也都只有几千字。而《孟子》一书,原有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因为其中有“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具初步民本思想,有背君权神圣的言论,朱元璋“怪其对君不逊”,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年),令老儒刘三吾将这些有碍字句尽行删去。全书总共删去八十五条,只留下一百七十多条,二万字,更名为《孟子节义》,刻板颁行全国学校。规定删除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刘三吾:《孟子节义题辞》)

《五经》的篇幅虽然略长,如《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可明代规定应试者只试本人认习的一经即可,而明代首场七篇文章中,各人认习的本经即要出题四道。《五经》又可以出多少试题呢?据顾炎武说,明代乡试和会试,“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就《春秋》一经而言,除开崩、卒、葬等不可用于命题的文字外,可供出题的即有传文的部分可出之题,据明末《春秋》学者梅之焯统计,虽不是顾炎武说的数十道,但也不过七百馀道(梅之焯:《春秋因是·序》,光绪《麻城县志》卷三十二《艺文》)。《礼记》中之《丧服》、《檀弓》等到明代中期后皆删去不读。《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微子》等篇;《诗》则

删去淫风变雅；《易》则删去《讼》、《否》、《剥》、《明夷》、《困》、《旅》等卦不读，能出的试题更少。

这么少的篇幅，别说意义完整的句、节、章的数量有限，即使每个句子、每节、每章都用来出题，数量又能有多少呢？

而一个容量这么小的标准化作文试题库要应对的考试出题量却是无穷尽的。

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等编纂《大明志》，其中将大明疆域分为十二行省、一百二十府、一百零八州、八百八十七县（见郑晓《今言》卷之一，第五十一条）。

就按明初的行省、府、州、县数量来计算八股文试题数，数量也大得惊人。

每三年各省要进行乡试，首场要作四书义三道，五经义题各四道，加上永乐后的应天府，以及三年一科的会试，每三年全国乡、会试八股制义试题即为三百二十二道。

各省的提学道每三年要按临全省各府及直隶州，对所属生员进行岁试与科试，全国十二个省的岁、科考八股文题每三年要出七百二十道。

至于科举考试中最基础的童生考试，即俗称的小考，按明初全国九百九十五个州、县计算，县试即要出八股文题四千九百七十五道。

童生的府试阶段，所考场次及题目量与县试同，按全国一百二十个府（不包括直隶州）计算，全国的府试应出题六百道。

童生的道试正场为四书文二篇，童生道试是提学道按临各府时进行的，故全国十二省童生道试时所出八股文题应为四百八十道。

以《四书》、《五经》这个容量有限的试题库来应对如此巨大的出题量，不过三十年，《四书》、《五经》中意义完整，可出正大明白之题的句、节、章便会出光，重复命题的现象在所难免。

明代八股文命题方式固有的弊端所引发的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会产生明代八股文考试过程中一个不可根除的痼疾：即剿袭与拟题。因年长月久，《四书》、《五经》中无章无节无句，无

不有程文可供剿袭。

所谓剿袭,即是应试者先猜题,猜中试题后,在考场中把背熟的范文背抄出来,以求中第。

由于八股文试题不可避免的重复性,引发了一部分幸进之徒的投机之心。他们揣测主考官出题的心理,场屋可出之题,他们早已预拟。“不过于《四书》、《五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三场》)

剿袭的关键在于拟题。当时拟题的做法五花八门,真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二类。

由于乡、会试“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有钱人家能延请名士到家猜题作文让其子弟“记诵熟习”,入场后“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往往得中。那家境平常之士则采用其他办法,即选背程墨与时文,入场之后再抄誊上卷。

明朝前期,乡、会试结束后,官府常将该科优秀文卷及考官拟作的程文刊刻,合称“程墨”。刊刻程文,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开始,到嘉靖时,民间刊刻试卷及程文之风大盛。因为“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故纷纷“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附《生员论》)。

由于八股文取士制中命题所固有的弊病,引发了大批士子的投机取巧之心,他们猜题、拟题、背诵剿袭时文,往往高中。这就破坏了公平、公正取士原则。因录取的名额有限,这些幸进者挤占了

大量名额后,不少有才华、有才能的才学之士便无缘名登两榜。这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其一,它“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三场》)。其二是“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附《生员论》)。其三是使那些有才学而不得科第者心灰意冷,从而对封建统治者产生怨愤,危及国家的稳定。

据现存的资料记载,这种利用八股文命题的弊端而兴起的拟题、剽袭现象,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科举制后五十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明仁宗实录》中说,明仁宗洪熙元年乙巳(1425年),郑府审理俞廷辅就指出:

“近年宾兴之典,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其实才十无二三。”

这则记载表明,早在明代科举制推行的初期,八股文命题方式的固有弊端所引发的剽袭、拟题之病症即已出现。到明代中期以后,受利益驱动,剽袭之风大炽。

因民间书坊刊刻的时文太多,应试者入场剽袭,考官们往往不能辨识。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1619年)会试,福建晋江举人赖克俊,以《书经》为本经应试,“其前场七艺,尽录坊刻,自破、承直到结题,不易一字”,却被房考官赏识,取为第二名,朱卷传出后,致使“众皆哗然”。但因科场则例并未明文规定剽袭是违法,赖克俊依然名列进士金榜,这就引得天下士子,竞相效仿,拟题背程文之风便愈演愈烈了。

至明代晚期,即使对科举所重的本经、四书文考试,应试者也普遍不读原文,“所习多俗儒纂录支言长语”之八股程文而已,“天下之士,靡然从风”,“成于剽袭,得于假借”,以致“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明孝宗实录》卷四

十七)。

这种状况,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激愤地说道:“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八股文命题方法固有的弊端所引发的上风败坏,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已到了非加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便会危及明代统治的根基。

然而,朱元璋所规定的祖制是不能改变的,八股文之文题必出自《四书》、《五经》的原则不可变更。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为国选取有用之才,考官们只得在命题时采取改变经言的组合与截取方法,避熟就生,避易趋难,变明白正人为晦涩难懂,不惜将经文割裂变化,将句子截上裁下,掐头去尾,于是一批截头缩脚、意义割裂、晦涩难解的偏题、怪题便出现了,让应试者头疼不已。

这种出题方法的变革可以加大出题的数量,减少重复命题的现象,使猜题的命中率有所降低,有一定扼制剿袭、拟题的作用。

然而这种做法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弊端。因为在明代正统文人眼中,《四书》、《五经》“不惟大事业出其中,节义文章亦莫能外”(凌义渠:《正文体疏》),而“尊《学》、《庸》、《语》、《孟》之书,断以考亭之章句,因裁以为题,敷陈词义,如一出于圣人之言,其道精微变化,尚矣”(艾南英:《明文定序上》)。如今割裂经文来制题,就有可能歪曲孔、孟等圣贤言论的真情实意,失却《四书》、《五经》的奥旨精义,致使歧意纷陈。朱熹、程颐为编造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而精心构撰的注解也会被毁弃。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创制八股文时的良苦用心,即以八股文作为向士人们灌输圣贤义理的工具,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儒家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忠君爱国,以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而割裂圣语,剪断经文出题所造成的曲解孔、孟言论的后果对明朝统治者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它将使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萌生,势必危及朱明王朝的统治。

所以这种新的制题方法出笼不久,就招致了许多笃信儒家经典之士及有远见卓识者的批评。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指出:

“经义之设,本以扬推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

明代的最高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它的危害,正统六年辛酉(1441年),明英宗颁诏曰:

“出题不许摘裂牵缀,及问非所当问。取文务须淳实典雅,不许浮华。违者,风宪官纠劾治罪。”

弊病虽已明了,禁令也已下达,但割裂经文出题的做法却无法制止。

首先是士人们受功名前程这一根本利益的驱动,拟题剿袭之风不可能根绝。这样,考官们在阅卷时就要冒分辨不清文章是否属于剿袭的风险。若把剿袭的程文当优卷录取了的话,在磨勘时若被发现,将会受到御史弹劾。所以主考官在命题时必然会绞尽脑汁出偏题、怪题,让应试者背诵剿袭之法无处施展。割裂出题是考官应对剿袭、拟题之风的利器,他们当然不会放弃。

另一方面,为维护科举取士的公平、公正性,同时也为了维护考官们的名誉,以免取中剿袭来的文章而落个日不识文的恶名,而程文满天飞,谁个能篇篇皆识?故考官们宁可冒“摘裂牵缀”出题可能招致纠劾治罪的风险,也不会放弃割裂经文出题的方法以对付背诵剿袭的士人。

所以,尽管皇帝有禁令,“摘裂牵缀”出题的情况却愈来愈多,至迟到英宗天顺年间,八股文文题中最为怪诞,最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截搭题也出现了。

据《春明梦馀录》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就当时八股文乡试试题中的弊端向朝廷上疏:

“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典雅。比者,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镂程文,乃太简略而不纯实。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

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曰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应认题,与考官相械,即被屏斥。乞敕自后考官出题,举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第六十九卷)

这篇疏文传达的信息表明,从明英宗正统六年辛酉(1441年)下诏禁止“摘裂牵缀”出题,到天顺年间,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不但八股文试题“摘裂牵缀”的行为没得到有效扼制,反而出现了割裂经文更为厉害的“截搭题”。从浙江乡试所出《春秋》试题可以得知,当时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曰搭题,实则射覆”,在玩文字游戏。以致连那些“素抱实学者”都不能认题,“一应认题,与考官相械,即被屏斥”。

景泰年间进士,后为阁臣的丘濬也说:

“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大学衍义补》)

丘濬这段话也是说的天顺年间之事,所谓“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指的也是截搭题。

这种截搭题,取经书中之一句,截去其上半,而又搭以下句之上半,用这种方法来出题,则无句不可“截”,无句不可“搭”,想猜题抄袭就极为困难了。

然而,截搭题对经文割裂更甚,背离儒家思想也更远,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陆陇其在谈到明代八股文文题时便从截搭题歪曲了儒家经典的角度进行批判:

“先辈作文,必择明白正大之题,虽虚缩亦不屑为,以圣贤精义不在此也。至所谓搭题,则又与虚缩不同矣。虚缩题虽非精义所在,然犹是圣贤口气,可以渐求其精义。若搭题则并非圣贤口气矣。语势各不相蒙,强而合之以为题,于是作者不得不穿凿附会以为文,其有害于人心、学术不小……今学者未有主持风气之权,既不能必主司不出此种题,亦当知此为先儒所深病,而不以穿凿附

会自矜，庶几中流砥柱也。如《壹戎衣》六句题是言武王纘绪之事，《未受命》句是言武王暮年不及制作以起周公之事，并非缴上文明其不得已也。今因出题者连上文，作者便以此意成文，虽于理无碍，然此处立言本意，则风马牛不相及也。”

顾炎武在谈明代八股文时曾指出，在明代早期，“其单句题亦甚少”，全为明白正大之大题，至正统以后，割裂章句以出题的现象愈来愈多，特别殊异之题纷纷创制，以应对因制题方法所带来的拟题、剿袭之风。最初虽有不少人对这种制题方式大加挞伐，但随时日迁延，也便见怪不怪，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怪题、偏题便为朝野所接受。大约从弘治、成化之后，便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八股文文题之列，正式地列入了县、府、道试及岁考、科考等小考，甚至乡试的考场之中。加上万历时争趋禅学，天启后又在八股文中引用诸子思想，好异谈空，含糊混过，如以良知为致知，以格物为诚意，论知止则如坐禅入定，论是知则云本体一明，大事了毕，将朱熹传注放掷一边，这都违反了朱元璋以《四书》、《五经》经文命题的良苦用心，曲解了儒家经典，对明代中叶以后的士风、学风、人心、学术均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明末有人作诗说“断送江山八股文”，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八股文文题的种类

为了扼制科场中的剿袭、拟题行为，也为了加强士人们的思维训练，大约从宣德年之后，历科的乡试、会试主考官们便改进了八股文文题的制作方法，创制出各种怪题、偏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场中背诵剿袭的舞弊行为。

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降：应试的士人们在纷繁复杂的新型试题面前会感到茫无头绪。这一点从明代万历年间任过侍郎，天启年间当过户部尚书的名臣李长庚谈《春秋》出题的情况便可见一斑。

他说：“国初经题仍宋经义，或出数题之大意中相近者，或相反者，听各为条答。而后乃以某传某句搭题：或传意影搭，或脱母搭，或取左氏搭，或取各注疏搭，若射覆臆钩。他经人闹止虑文之不佳，《春秋》人闹先虑题之不刁。”（李长庚：《春秋衡库·序》）

题既不识，又何从下笔？清代八股文名家王步青说：八股文

“法自理生，理从题出”（王步青：《分课小题续编·发凡》），文题即决定了八股文的写作方法。应试者在变化多端的文题面前，即便能敷衍成篇，也会千人千面，无理路、脉法、规律可循。考官们在阅卷时便无法把握、评判其优劣取舍，既增大了判文的难度，又拖长了阅卷的时间，这对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会带来负面影响。

为了使考卷有脉可寻，不至无法规范，考官们便依文题的内容或按其组合的方式将各种试题进行归纳分类，冠以不同名称。他们还对各种不同类型的题目，分析研究出各自不同的写作方法，然后写出程文以作示范，指示各种文题的写作方法及规则，限制束缚，让应试士子们遵行。这样一来不仅使剿袭、拟题的命中率大大降低，阅卷时也就容易把握标准，正确评判。一卷到手，只须看其是否遵从该题的法度及规则便可决定其取舍。

事关应试士子们的功名前程，天下士人们便会依题型去揣摩作法。久而久之，这些文题的类型及其所规定的作法便会定格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大约从嘉靖之后，各类新创的文题便在全国的县、府、道试及生员的岁试、科试中普遍使用了。

明代人根据八股文题中句、节、章的形式与意义完整与否，将其分为大题和小题两大门类。每大门类下又有各种名称的题型，各种题型的作法各自不同。

所谓大题，就是八股文文题中句、节、章的形式与文意俱完整的题目，换言之，便是明代人通常称之为明白正大的平正之题。大题这个门类之下，又分单句题、数句题、一节题、数节题、全章题、连章题、单扇题、数扇题等。

明代会试规定只能出大题，各省乡试基本上出大题，但有时也出小题。清代则大量出小题试士。

由于明代八股文的字数只规定了下限而无上限，即沿用明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诏令中五经文限五百字以上，四书文限三百字以上的规定，所以尽管明代士子作大题时虽有功令限制，犹可发一通做道德完人之痴劲，放言议论，直抒胸臆，就题发挥，将文章写得波澜迭起，神完气足，晚明时尤为这样。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前，受夷夏之防的心理支配，有人借八股发出不合时宜的言论，

故严禁借题发挥。

八股文的小题是为防止科举考试中的剿袭、拟题之风而创制的特别殊异之题,始现于正统前后。因其对写作者还有很强的思维训练作用,故到嘉靖以后,小题的种类越创越多,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塾师及县、府各级学校都用这种题型去教习学生;在童生的县、府、道试及考核生员的岁试、科试这些小试中无不使用。有时乡试也出这种题,故社会影响极大。岁月迁延,应试士子遵循不废,各种小题便成为普通之格式,讲诵之阶梯。

小题因是割裂经文,变化制题方法而成,繁简纷歧,其句式及语意均不完整,故题意难明,题情难得,纤佻琐碎,粘上连下,拘牵甚多。写作时要前瞻后顾,上避下闪,稍有放纵即违题旨,触犯准则,写作的难度很大,犹如俗语所说的戴着镣铐跳舞,舞是难得跳好的。清代八股名家戴名世指出:“制义之有大题、小题,自明之盛时已有之,而小题尤号难工。盖小题也者,其势最为逼仄,而其法律更为谨严,往往有毫发之失而遂至于千里之隔也者。”即便是高才能文之士,也视小试为畏途。因为小试常出小题,特别是清代小试用小题更为普通。有钱人家宁可花钱给子弟捐监生,绕过种种小考,直接去赴乡试。当时有些人由少年考到头白才考中秀才,中秀才后却可轻易地考取举人、进士。小试中小题难作,是其难以入泮的重要原因。

明代有一人考到四十二岁才入泮中了秀才。入泮后,刚好又是乡试年,一试而中举,联捷而入词林,前后总共才一年多的时间。感慨之余,他作了一副对联以记其事,联曰:

县考难,府考难,道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

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日已登瀛。

作各种类型的小题,因其割裂了经文,往往会出现理解上的歧见,甚至歪曲儒家经典。所谓有一弊必有一利,小题虽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儒家经典统一士人思想造成了危害,却对习作者起到了训练思维能力的作

用。学习小题的写作,要从很冷僻、狭窄、怪异、抽象的题目中理出头绪,审明题理,把握主旨,并在种种严格限制之下把文章写出

中国文学史

来,这便对思维的准确性、条理性、概括性、全面性、辩证性进行了有效的训练,培养了写作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学表明,人的大脑,若经过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训练,则其智力会大大提高。明代特别是清代科举考试中从童生起便以学习小题写作而对其开展思维训练,于培养人才、增强其思维能力起到了巨大作用。

小题的写作还有助于大题写作水平的提高。戴名世指出:“夫大题也者,其体崇,其势阔,固可以纵其驰骋,然其法律之谨严,要无不与小题同。夫惟久而熟焉于小题,而大题已举之矣。吾闻有明先正之为制义也,小题时时不释手,虽临场屋犹作小题数十篇。故先正大题文之正,由于小题文之工也。”(《戴名世集》卷四)

小题的名目繁多,有的同一种题型有多种称呼,故确切数字难以掌握,估计至少在四十种以上。如从题目的形式来分,有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承上题、冒下题、承上冒下题、半面题、上下全偏题、上全下偏题、上偏下全题、截上兼下全题、截下兼上全题等等;若按题的内容来分,则有虚题、典题、枯窘题等等。题型不同,特点各异,作法也花样百出。若欲依次讲述其例,遍引各题之作法,即使连篇累牍,仍难详述其奥妙,故不赘述。

四 八股文的发展演变简史

八股文是朱元璋建立科举制度时创制的。它的创制、发展、演变史,就是一部以程朱理学来加强对士人思想的控制,与反抗这种控制的斗争史。只要循此线索,就可把握八股文的发展变化规律,理解它为何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形态。

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诏,是年八月,在京师及各行省举行了乡试。“初场试《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次年正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明太祖实录》),三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于所试的《四书》疑问及经义所采用的仍是元代的格式,以此作标准选拔出的官员不符合朱元璋欲藉科举选拔具有儒家正统思想治国人才的理念,故洪武六年癸

丑(1373年),深感失望的朱元璋下令暂停科举,而对选用什么样的考试文体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一停便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朱元璋和刘伯温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比较,创制了后来发展成八股文的明代制义,并于洪武十五年壬戌(1382年)诏令重开科举。

张岱说:“我明自高皇帝开国,与刘青识定为八股文字,专精殚力,一题入手,全于心灵精脉声口骨节中揣摩刻画,较之各样文体,此为最难。三场取上,专注头场。”(张岱:《文苑列传总论》)张岱所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朱元璋创制八股文的情况。

朱元璋在最终确定采用科举制后,即以八股制义取代宋元经义,以之作为取士的主要依据,这就是《明史·选举志》中说的“其文略仿宋经义”。

在朱元璋精心构撰的八股制义中,文题是其灵魂,文章的实质内容,即体现在文题之内。朱元璋和刘伯温吸取宋、元经义的做法,规定八股制义的文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对题中包蕴的微言大义,必须依据古儒和程颐、朱熹等人的传注来阐发,不仅不得别出心裁,自抒己意,还要“代古人语气为之”,即要体会题中语气,处处把自己设想为古代圣贤人物来代之阐说。士人们“一题入手,全于心灵精脉声口骨节中揣摩刻画”。

朱元璋还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到宣德以后,更形成选官“以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的局面,且“三场取士,专注头场”,即只注重头场的七篇八股制义,这就诱使天下士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无不竞奔于八股文写作之路,并以之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童而习之,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八股文的写作中去,不登进士金榜,极少有人丢弃八股文的写作。朱元璋精心设置的从《四书》、《五经》中摘取字、句作文题,并必须依照程、朱的传注,以古人语气来阐发题旨的做法,使八股文成为向士人灌输儒家正统思想的最有效工具。

清代学者、八股文名家方苞以过来人之经历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他说:“制义之兴七百馀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儿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

历史经验表明,儒家正统思想最适合中国封建社会,以之为指导思想,并用以培育、选拔人才,最容易造成思想、文化的大一统,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八股文由初创到逐渐定型的过程中,其内容由最初的为皇帝歌功颂德向阐发书旨中的微言大义演进。特别是朱棣颁行了《御制四书大全》、《御制五经大全》之后,书中的传注只取程颐、朱熹二家,士人们在八股文的写作过程中对程朱理学的依赖性便越来越大,思想束缚越来越严。

八股体式的逐渐完善,又保证了儒家思想得到准确、全面、深入阐发。

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八股文的体式完备而苛严,由破题、承题、原题、起讲、入题、提二比、中二比、过接、后二比、束二小比、大结等部分构成其标准格式,结构严谨,章法细密。不过,在洪武十七年甲子(1384年)重开科举时,八股体式刚刚创制,大体沿袭宋元经义的做法,除破题、承题、起讲为体式中的固定部分外,八股之式虽也有人使用,功令中却未把它列为必具部分,句子或对或散,对偶不限,音律不论,人们并不刻意追求文章格律,故此时八股文未成定式。

然而,初创时的八股体式,不利于考生大量增多时判卷的快速、准确,只会方便敷衍传注,而不利于对文题所含微言奥旨的全面、深入阐发;正文部分或对或散,文无定式,不宜于培养士人传统的诗、赋写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体,不足以承担逻辑思维训练的任务。改造、完善八股文文体形式的任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长期的乡、会试考试实践,一些有才识、有思想能力的考官们便根据所积累的丰富经验,通过刊刻程文与墨卷的方式对八股文文体不断进行改造、创新,增添了八股部分,从而使八股文对义理的阐发能更深入、全面,对思维能力的训练更为有效。

分析八股文文体从初创到定型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它是沿着强化文章内在的起、承、转、合逻辑关系和讲究声律的道路前进的。自通篇言之,起讲为起,提二比为承,中二比为转,后二比为合,其间的逻辑关系十分严密。分而言之,起讲、提比、中比、后比

之内各有起、承、转、合。这样的篇法设置,既可使文题内蕴的义理得到全面、深入的阐发,又可有效提高写作者的思维能力。

对八股文文体的改造和完善,不仅表现在对篇法的探求与改进上,还表现在对声律的注重。为使八股文作者得到文辞的训练,考官们吸纳了唐代试律诗和试赋的特点,改变了八股文初创时八股部分或对或散,单行散句尚复不少的作法,规定八股中相对两股必须对偶成文,这使得八股文的格式变得严密完备。齐全苛严的功令,更使人困难见巧。这样,“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江国霖:《制义丛话·序》),“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吴宽:《匏翁家藏集》)的八股文已告定型。从此,便越来越强调在八股格式的框架内来深入阐发书旨,使人困难见巧,训练士人在种种束缚下的思维能力。

程式完备的八股文专取《四书》、《五经》中的字句命题,文章只能恪守传注来阐发题旨,行文的方式,篇章的结构,词句的使用,甚至字数的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写作时还须精心揣摩古代“圣贤”的心理、思想及行为方式,代圣贤立言。这些规定有一项不达标便被视为不合格,就会与功名富贵绝缘。在切身利益的驱使下,写作者必然皓首穷经,竭尽心智去揣摩八股文的作法,久而久之,他们的思想便融入了儒家正统的范畴,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八股文就这样成为明代最高统治者构筑思想文化大一统的最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培训出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和一定思维能力的大批官员,为巩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士人思想的自由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其功罪都十分明显,因而在它身上集合了许多的背反现象。

八股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无论是内容或格式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故被人称为“时文”。顾炎武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乾隆皇帝说:“时文之风屡变不一。”这些言论都揭示了八股文随时代而变化的属性。追寻明代八股文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八股文的面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折射出时代变化对它的巨大影响。清代道光年间学者李祖陶曾说过:“制义创自半山,明以来沿以取士,其初不过讲明书旨,其后纬以义法,文

体渐成。其后荆川、震川之徒，以古文大家气魄，运之时文，遂臻极盛。又其后或讲机局，或尚才情，或喜词藻，日新月异，五百年无一定之规，或征引及于子书，或摹仿涉于集部。至我朝，变态已极，莫可端倪，或思深力厚如天崇名家，或崇论宏议如国初老辈。”（李祖陶：《文选制义·序》）

这段话以精炼的语言，准确地勾勒出八股文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了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为后人研究明清八股文史指示了门径。从朱元璋与刘伯温创制八股文之后，明代八股文便进入了完善、成熟、鼎盛、变革、衰颓、救亡的发展变化过程。

从洪武到成化前的这八十来年的时间，是明代八股文逐渐走向定型的阶段。

洪武时，文体初创，程式未定，经义不涉八股，且多用颂体。永乐后期，八股格式已广泛使用；到宣德后期，八股格式已基本定型，完成了由颂体向论说体的演进。从此，八股文在周密的逻辑和工整、对仗的固定格式规范之下，题旨得以全面、深入地阐发，写作者的思维能力得以提高。明代前期思想定于一尊，言论定于一律的文化专制局面，主要赖全国士人自觉自愿的八股文写作过程得以形成。

由于明代前期的最高统治者大多能励精图治，社会风气较为淳朴，故这时的八股文内容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其文短小，格式简单。永乐、宣德时期大多两比四句，或对或散，尚无定式，为宋四六之流派。其词简朴，绝无华词丽藻，“不过敷衍书理而已”（《明文传薪·序》）。这时的八股名家如于谦、商辂、岳正、丘濬、王恕、李东阳等，其文浑朴，无意求工，而古质庄严，笔力沉雄，精光毕露。其雅正之风，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的许多八股名家所尊奉。

在这个阶段，八股文题基本上都是意义完整的整节、整章经文，连意义完整的单句题都少。这种命题方式，不致割裂经文，从而保证了朱熹以传注构撰的理学系统的完整性。

然而，《四书》、《五经》这个试题库的容量有限，年长日久，这些经典中没有哪一个意义完整的句、节、章没有出过试题。这就产

生八股取士制中一个不可根绝的弊病：拟题与剿袭。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事先猜题，再选择几篇墨卷程文将它熟记，若试题猜中，只须在考场中将范文背写出来，往往高中，所以李贽说：“吾熟读烂时文百馀首，进场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转引自张岱《文苑列传总论》）流风所及，仿效之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束书不观，只读坊间所刻各种程文墨卷选本的不良风气，使八股文向士人灌输儒家正统思想的功能大为削弱。

为防止作弊，在不改变从《四书》、《五经》中出题的祖制的原则下，大约从宣德年间开始，乡、会试考官便割裂经文，或截上或截下，甚至截上句中片言只语，与下句、下节，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下章的词、句相连，构成所谓截搭题，用以难士。这样组合成的八股文题俗称为小题。这种随意割截经文出题的做法，固然让人摸不到出题规律，猜不中题，也无范文可供背诵，对防止猜题作弊有一定作用，还可训练提高作文者的思维能力，但它却将程朱精心构撰的理学体系破坏无遗，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权威性，为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思潮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是为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从成化到弘治，这是明代八股文全面成熟的阶段。

八股文的文体格式基本定型后，经历正统、景泰、天顺二三十年的写作实践，其标准格式已为士人所掌握，到成化年间，更是运用纯熟。士人行文，皆循题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倒置，号为铺叙，造就被后世仰慕之“化治之理”。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不齐，至成化、弘治则裁对整齐，机调圆熟。八股文的基本写作方法，至此时也已十分完备，为后人所沿用，并遵之为“成、弘法脉”。各种小题题型的文体模式也已定型，并被士人所熟练使用，号称“众体皆备”。故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弘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

在这个阶段，还产生了王鏊、钱福这样的八股文大师，文义谨守经书义理及朱熹传注，格式特别整齐，故其文被后世奉为时文正宗，其法被称为时文正脉。此外，这个时期八股文名家大批涌现，如吴宽、邵宝、唐寅、徐渭、王守仁等，其文皆明体达用，理足气

充,备受后世称赞。

从总体而言,在弘治以前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丘濬、吴宽、李东阳等人以其主持文衡的权力,推行明经合传的文风,及整个社会仍墨守程朱学说,尚未出现足以与程朱理学叫板挑战的哲学思想,此时八股文传输给士人的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是统治者将思想文化定于一尊的最有效武器。以“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选拔出来的官员,一般都能遵循正常的社会治理法则,故这时的吏治较为清明,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朝廷中尚未出现被后世称为大奸大恶之徒,从而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弘治时期,还成为有明一代的太平盛世。

然而,八股文却严重地阻碍了明代前期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因为八股文使得广大士人的思想受到儒家正统学说的有效控制,他们无不以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自然难以在认识领域里有新的创造。且“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杨慎:《丹铅总录》卷一〇),即便是儒学本身于其中也难以获益。这个时期,不仅没有产生诸如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颐、朱熹之类的大儒,连元代许衡、吴澄这样的儒学名流也没有出现过。

八股文所造成的思想定于一尊扼杀了人们的创新能力,使明代前期的学术领域变得萧条黯淡。

八股文还造成了明初百年诗文的衰微冷落。在八股文的影响下,内容陈腐平庸,充满道学气味,形式刻板呆滞的作品充斥文坛。

造成有明一代文学无大家,文学变衰微的原因,首先在于八股文塑造了士人的灵魂。

随着明代前期八股文文体的逐渐完善和成熟,功令的渐趋严密,士人在八股文写作过程中对《四书》、《五经》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思想受理学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既然文学创作的主体——明代士人的灵魂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塑造,当他们在从事创作活动时,必然会自觉地或下意识地以理学思想为指导。这样,随着八股文的逐渐成熟,士人的思想会愈益正统化,愈益不敢表达其真情

实感,其笔下的作品便会愈益道学化。明代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为明代第一,黄宗羲却指出,归有光的古文,“试除去其叙事之各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归有光的文章大多雅正严谨,却神气较少。黄宗羲指出这种特征是“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而造成的,故他便成不了大家。

造成明代前期文坛衰微冷落的原因,还在于经过长期八股文写作,八股文极端刻板的程式化的格式已深深地烙入了士人之心,使其思维模式化。士人们作为明代诗文创作的主体,在进行创作时,八股文文体程式所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便会产生作用,既“使人笔势拘繫,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吴宽:《匏翁家藏集》),又使作品带有八股时文的形式特点。

黄宗羲在论及明代诗文不能出现大家的原因时还指出:因明代“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馀以为古文,其不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黄宗羲:《明文案·序》)。张岱则说:“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张岱:《石匱书·科目志总论》)

八股文写作耗费了士人毕生精力,又使写作者的心思变得陈腐,眼界变得狭小,人品变得寒酸。这样的人去从事创作,又怎能写出好的作品!

隆庆进士、著名学者于慎行既精通八股文,又熟悉诗文写作,故洞悉八股文对诗文的影响,他指出:

“著作之文,由制举而敝,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籀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现,而平时所沉酣濡馘人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诗文》)

于慎行这番话,比较精确地揭示出明代诗文凋敝的原因,即因士人长期浸淫于八股文之中,其思想、程式“入骨已深”,当其功名已就,再去进行诗文创创作时,“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即已跳不出八股文的格调与程式,其作品必然带有浓重的时文痕迹,当然出不了优秀作品,也成就不了一个一流大家。

清代施补华在《与吴挚甫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说：

“少习时文，操之太熟，声律、对偶，把笔即来，如油渍衣，湔除不去。”

正德、嘉靖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

明代八股文在成化全面成熟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写作，至正德时已进入了极盛。传统的八股文写作理念在这时已十分完备，内容谨守传注又能时出新义，写作方法与技巧达到最高水平，八股格式的运用已十分纯熟。这时的八股文，大多理足气充，规模宏整，得题之神，简古而讲理法，于圆熟出苍坚，机法圆熟，排比声调，无不中规。

然而，恪守传注的传统，使八股文的语言陈陈相因，毫无新意；而苛严的八股比偶体式，更令士人苦感束缚，“一字不协，满幅俱差；片语不谐，全篇俱失”，“故后生小子，莘门圭窦，雪案萤窗，白首穷经，负笈教学，虽以真正英雄，屈首此道，满腹才学，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张岱：《石匱书·科日志总论》）。

明末清初学者魏禧对八股体式作过深入批判，他说：“八股之法，病在于排比有定式。夫一题之义理，有博衍数十端，然后足以尽之者；有举其一端，扼要而无遗者。今必勒为一排比，则是多端者不可尽而得，其一说而毕者，必将强为一说以对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语，斤斤然句栉字比而不敢或乱。以之而译圣经贤传，其陋可知矣。”

为了补救文体的不足，在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开始采用“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对八股文进行改造。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就是在时文写作中引入古文写作的理念与方法。因为古文与时文原本是相通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论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斤多合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俱有之。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这就将古文与时文的相通处一语道破。清代李扶九在《论化古文为时文》中说：“古文有两句破题者；有无破题如小讲起者；又有无小讲就题直入者。若中之畅发，后之馀波，要皆与中后比同。至法有对偶，乃

古文之变格，最近时文。”（《古文笔法百篇》）即便是古文正格，“固非时文之体，而其章法、段落、字句之间，无不可采取也”。且“古文非尽无比偶，而单行处多，时文非尽不单行，而比偶处多”，只要“于古文单行处学其单行，于其比偶处学其比偶，于其比偶而求单行处，学其比偶实单行”（高塘：《论文集钞》），便能以古文为时文，写出较有生气的文章来。清代著名古文和时文家方苞指出：“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具体而言，以古文为时文，在内容上，要吸收史籍和其他经典中的材料，熔经史为一炉，从而使题旨所蕴含的微言大义都能发掘出来，并使题旨的表达由过去的隐晦曲折变得明白畅达。在体式上，不能打破八股格式，但要脱去排比之迹，既要保留比偶的形态，要做到法比偶而实单行，从而使八股文化除那种呆滞、刻板、面目陈陈相因的状况，达到“抒胸中之所见是非不谬于古人，而又漱润于《十三经》、《二十一史》，行之以先秦、两汉，唐、宋八家之气韵，则清而不弱，真而不率，雅而不浮，正而不板”（谭鹏霄：《历科墨选质言定本·序》）之目的。

嘉靖年间，以古文为时文，于圆熟中出苍坚，增强了八股文的活力，改变了其呆滞的面貌。李乐在《续见闻杂记》中称赞说：“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淡雅，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后佳也。”特别是唐顺之和归有光这两位古文写作高手，在以古文为时文中取得很大成效而极受后世推崇。唐顺之的八股文，体气宏大，外浑厚而内坚凝，放而能收，散而能敛，一开一合，规矩出神明。归有光的八股文，取径于苏轼父子，肆之为恢宏，泽之以经史，融裁古人语，浑如己出，实大声宏，人们认为其水平还在唐顺之之上。

不过，应当指出，嘉靖时以古文为时文，并未改变恪遵传注的做法，其文体仍须遵循八股格式，没有大的突破。正如清代高塘在《论文集钞·杂条》中所说的，归有光虽以古文为时文，但“顾其制义，气则古文之气，法犹时文之法，较之守溪（王鏊）、荆川（唐顺之），源流一变，而于其法，曾不异也。且守溪、荆川于古文何如哉？今观其古文，纵横奥衍，不受羈勒，及为制义，则屏息怵志于法度，

不敢稍有逾越。彼非奇于古文,而不奇于今文也。顾以为时文,有语气,有方幅,如为人写照,一笔不肖,则全体无当,震川之于时文亦然”。这种不动根本,只触及皮肉的变革,时效十分短暂,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至嘉靖末年,时文冗滥,千篇一律”。这种状况呼唤着一场更为彻底的时文变革的到来。

隆庆、万历时的八股文,专讲机法,务为灵变,以奇求售,进入了由正而变的阶段。

由于嘉靖时以古文为时文的改革仅停留在“古文气息,时文法脉”的肤浅层面上,没有触动恪遵传注,体为比偶这两个八股文的根本,所以并未能适应反抗程朱理学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而隆庆、万历却是一个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破土而出的时代,商业行为与意识冲决了封建政治所能容许的范围而自行发展,都市时尚与各种奢华的举措风靡社会,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极大怀疑和冲击,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必不可免地出现了一股变革束缚人的八股文的浪潮。

隆庆、万历时的八股文的变革浪潮直指八股文的根本。在内容上,此时的八股文可以别出己意,不必恪遵传注,其激进者,甚至明弃师说,离经叛道;在形式上,不仅极少用八股、六股等传统格式,还化比偶为单行,仅按题面分为二截、三截来阐发题旨,有的干脆用散体。此时的时文与古文呈现出明显的合二为一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八股文传统的载道功能受到极大的破坏。

由于这场变革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下出现的,内蕴着张扬个性的积极因素,因而使八股文追随时代风尚,变化百出,出现了空前的多姿多彩,空前的纵横逞妍。这便是戴名世所说的,“至隆庆、万历间,而尽态极妍,无以复加矣”(《戴名世年谱》卷之五)。时代崇新尚奇,则八股文出现奇矫之风;时代喜好奢华,则士人力为华丽之文;时代流行心学禅宗,则语录佛经皆入于文;市民意识流行于世,则村言俚语也破禁入室……凡此种种,都使八股文脱离了传统的雅正简古之道,一味讲求机巧,“怪诞”、“凌驾”之风日益严重,“异端”之说充斥于文,专用以规范对题旨作全面深入阐

释而设的八股格式更是被士人抛诸脑后,以至顾炎武要惊呼“嘉靖之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年),主管乡、会试的礼部尚书沈鲤曾在疏文中对八股文奇变的情景作出过描述,他说:“自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以《左》、《国》为常论,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经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极矣。乃文体则耻循矩矱,喜创新格,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解。苟新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题不必合。断圣贤语脉以就己之铺叙,出自己意见以乱道之经常。及一一细与解明,则语语都无深识。白日青天之下,为杳冥魑魅之谈,此世间一怪异事也。”(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

到万历中期之后,八股文变化更加剧烈。此时文体格式之变,从阮葵生的一段话中可以知其大略:

“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无过三百字,不得浮词异说,篇末大结,各抒己见,任陈论国家时事。后因功令加严,忌讳日甚,但许言前代,不许及本朝,久之全删去。百馀年后,文渐冗长,凡千百馀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无不可套也;起语数十百言为寿星头,长而虚空也。其篇中例用存乎某,存乎某;谓之某,谓之某;此之谓,此之谓;浸假而,浸假而;有见乎,无见乎;或用卦名,受之以,受之以,谓之救命索。不问何题,篇篇相袭,文风安得不坏!文运安得不衰!”(阮葵生:《茶馀客话》)

所以后世人称八股文自万历中期之后,“芜靡已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八股文的这种状况,是当时思想界新生与陈腐,开放与禁锢,个性张扬与礼法相冲突,程朱理学、李贽学说、老庄禅说、市民意识相融合的必然结果,自有其进步的因素在内,并非卫道者所责骂的那样一无是处。

天启则是八股文的全面衰颓时期。此时由于魏忠贤当权,政

治极为黑暗，“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专制的摧残下已近凋零，士人对程朱理学的正确性产生了更大怀疑，人生困惑更形严重，对以承载灌输程朱理学为功用的八股文也更为反感。大多数人只把它当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有些人怕阐释正统儒家理念触犯阉党，不仅不恪遵题旨，还歪曲孔孟之意，以八股文为魏忠贤篡权乱政张目。故承继了万历末年所有病灶与溃疡的天启八股文或失于苦，或失于浮，更形衰败。只有少数正统人士仍顽强地固守八股文的传统理念。

崇祯朝为明王朝危急存亡之秋，八股文却一度出现了起衰振兴之势，在八股文史上留下了带有血色辉煌的一章。

崇祯时，明思宗虽平治了阉党之乱，却未能挽救朝政的混乱局面，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满族铁蹄不时入侵，农民军攻城略地，大明王朝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这种局面将国家与秩序的意义推到了首位，士人们在八股文的培训下树立的儒家正统思想，在严峻的形势刺激下被激活了，他们自觉地担当起了救亡的社会责任。思想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已失去其紧迫性而被搁置，可以挽救危亡的实用之学和可以重整朝纲的秩序之学成为他们的首选。从明中叶以来备受怀疑与曲解的程朱理学又重新抬上了神坛，奉为整合人心、挽救危机的利器。恢复八股文的雅正传统，使之重新担当起向人们灌输程朱理学的任务理所当然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于是，一场以恢复八股文的载道功能为目标的运动掀起了。其领军人物为复社的张溥、张采、周钟；畿社的陈子龙、夏允彝；号称“江西四子”的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艾南英及金声、黄淳耀等人。其中艾南英出力最多，贡献最大。他们意测经旨，欲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理精法备，务期克尽代圣贤立言之意。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罗载籍，雕刻物情，或为前辈所不及。万历末年以来的空疏、靡丽之风在他们笔下被一扫而空。他们不为八股格式所限，每能于言外逞其词锋，使时文与古文相融和。特别是江西四子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刻四人所作行于世，力移风气，开天启、崇祯两朝清刚警卓之风，而结有明三百年八股之局，世人称之为

豫章四家。其中陈际泰积健为雄，返虚入浑，其理题文多深微而简括，万流景仰，尤为绝出。艾南英则少负异才，倡其同志为四大家稿，名动海内，而朴质坚辣，三家皆不能及。

在复社、幾社和江西四子的努力下，崇祯八股文一度出现了起衰振兴的局面。追求题旨的细致、深入体悟，力为雅正之义，有感而发，借经义以道世事，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就题以发挥之，感愤激切，追求理实气真成为一时之尚。特别是当明朝灭亡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金声、黄淳耀、陈子龙、夏允彝、艾南英等，为抗清救国而慷慨捐躯，证明了八股文对士人灵魂塑造的巨大功用，也为八股文写就了苍凉而辉煌的一页。然而，这场以复兴儒家正统为目的的八股文振兴运动，客观上阻碍了明末思想解放思潮的发展，含有保守、倒退的因素。

还要看到，崇祯时不少士人仍“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八股文起衰振兴运动对他们无丝毫触动。他们的文章，技巧虽臻“无施不可”的境地，出语也面面可通，貌似曲折跌宕，实则空洞无物，似是而非。然而，正是这类八股时文，才代表了反对理学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不过，晚明这批铁肩担道义之士欲恢复八股文塑造士人灵魂的功能，以正士风，挽颓俗之努力，在明朝制度性腐败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农民军的厮杀声和八旗铁蹄冲击之下，大明王朝顿时土崩瓦解，连八股文也被清朝统治者全盘接收，成为巩固其政权的重要手段。这种背反现象充满了黑色幽默。

为了化解汉族士人夷夏之防的抗拒心理，高明的清朝统治者在征战频仍，全国未靖之际，于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即恢复了被战乱中断的八股取士制，且打破常规，仿效明太祖在洪武初年“令各行省连试三年”的举措，在顺治三年、四年，连开三科，扩大取士数量，以广揽人才，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然而，此时应试之士以及考官，绝大多数为只慕利禄却无气节之人，其八股时文无论是内容或形式，全盘沿袭了万历末年以



来之陋劣与病灶,用方苞的说法,即只“重文采,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方苞:《再与刘拙修书》),或失于苦,或失于浮,单讲机法,专事凌驾,务为奇特,剿腐庸弱,靡丽空疏。少数心怀故国之思,黍离麦秀之痛,被逼应试之士,更借经题抒心中感慨,大背新朝时宜。故被卫道士们斥为“文体芜秽,晦冥蒙翳”。

这一现象理所当然地触动了统治者敏感的神经,他们严令主司要以成化、弘治恪遵传注,谨守绳墨,简古浑融而讲理法的标准来衡文取士,在新朝改朝换代之力、摧枯拉朽之威面前,庸腐空疏等等在明朝久禁不止的弊端被铁血政策清扫殆尽。到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科,文风即已大变,被称为清代制义四大家之一的刘子壮、熊伯龙以及八股高手施闰章、王广心等于是科脱颖而出。刘子壮为该科状元,其文雄俊古博,纵横开合,收前代之终;熊伯龙宽博深厚,简老苍茂,开清代时文之始。若以骨采论,刘更坚苍;以针对言,熊较浑切。王广心则惊才艳发,瑰丽古艳,明末陈子龙幾社流风至其笔下已臻极致。其经义雕镂求工,峭刻奇拔,远于流俗。他酷嗜诸子之作,时文精峭处,纯是荀卿、韩非手段;有的洒脱逍遥,有如庄子之风。李来泰熟于六经而运以史识,故辟畦开径,微显幽闾,令读者惊魂盈魄,被称为作时文能以经为史,以史为经者。

其后几科又录取了魏裔介、范承谟、李之芳、李来泰、汤斌、汪琬、王士禛、熊赐履、陈廷敬、张玉书、马世俊等八股名家或名公巨卿,对清代文坛、政坛影响甚巨。

由于明朝遗民中一批忠贞之士尚存,他们心怀亡国之痛,民族情愫,对明代政治与文化进行严肃的回顾与反思,对八股文更是进行了拷问式的审视,对万历之后八股文中大量出现的造作异说、离经叛道,剿袭作伪,导致学风上的好发议论,空疏不学,虽不乏新颖深切之见,但大多为偏激、无稽之谈,有的甚至故发奇议以耸动人心或党同伐异等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许多人认为明亡亡于八股文。其中张岱、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戴震对八股文的批判尤为激烈。清初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颜元更是说:“八股行天下,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

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就顺治朝八股文本身而言，承“启、禎杂家馀习，至于国初，犹未能尽涤”（方苞：《进四书文选表》）。这些言论和现象必然会触动新朝统治者紧绷着的神经，引起他们对八股时文功用的疑忌。

正在此时，北京城有无名氏画八股图，中画八个瞎子，“或题诗，或作鉴赏古玩，或品评法书、名画与调琴、弈棋，言作八股犹此八瞽者无知妄作也”（《四勿斋随笔》）。此画掀起轩然大波，使新朝统治者疑忌大增，“朝论耻之，遂废八股，以论策取士”。时为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

不过，废禁转瞬即逝，康熙八年（1669年）礼部奉上谕于次年重用八股取士。这种改变不仅仅在于反对废八股的人多，还在于废弃八股等于阉割了科举考试的命根子。科举考试之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智力的高低。八股文限制苛严，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非聪明智巧之士难以写好。废弃八股文却又找不到更好的替代物，就无法淘汰庸劣之士，选拔出高智商的优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八股文才能“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废弃八股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不讲”，这将危及清朝政权的巩固。

康熙帝自小即喜读经史著作，重视学术，甚至对八股文也颇有研究，知其优劣。他深知程朱理学是关乎治罔平天下的学问。因为程朱理学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它所构建的伦理道德秩序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具有同构性。正是这种同构性造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士大夫阶层，并透过官僚政治体制，为国家的大一统提供巨大的维系力。故清初朝廷定理学为官学，使理学官化。而八股文既是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又是向士人灌输理学的最有效的工具，于是，康熙八年决定于次年恢复“用八股文考试”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与朱元璋停科举再兴科举时对创制八股文已有深思熟虑一样，康熙的废弃与重用八股考试，也虑及周详。既然无法另觅替代物，当然只能沿用众体皆备，诸法皆立，已发展到极致的明代八股文，但又要有选择地继承，须去其弊端，挹其精华，避免重蹈明代八股误国之覆辙。

乾隆皇帝就明白指出：“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俱可师法。”

具体而言，对明代成化、弘治以前之文，学其简朴，弃其直写传注及对比改换字句的初级形态；对正德、嘉靖之文，学其以古文为时文，简古浑融而讲理法的长处，弃其剽窃语录，肤廓平衍之风；对隆庆、万历之文，挹其机法圆熟，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之特长，去其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却无真理实气的佻巧空疏之习。对天启、崇祯那批以振兴八股文为己任的大师名家，清代统治者极为推崇，对其文章大力提倡。雍正时朝议欲推黄淳耀为时文正宗，刊示士子。乾隆皇帝也说：“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在八股文界，大力提倡学习晚明优秀八股文的警辟奇杰之气，借经题以道世事而避空疏；穷思毕精，包罗载籍，别开途径；学其光气腾跃之长，而禁杂家裂弃规矩以为新奇，剽窃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词气虽丰，却与圣经贤传相悖的做法。

总而言之，从康熙到乾隆中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和乾隆，以其湛深的汉族传统文化素养，对程朱理学和八股文的认识，大力提倡八股文要溯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以发明题旨；要贴合经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做到用词得当；要沉潜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而使文气浑融，笔法灵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清代被奉为时文宗师的熊伯龙和李光地，在担任学政和主持乡试时便大力提倡晚明八股文大师之文风。熊伯龙最欣赏艾南英论文主理，钱吉士论文主法，在主持浙江乡试及督学京师时，专取两人之文刊示士子，以之作为准绳衡文取士，一时天下文风大变。晚明江西四家及金声、黄淳耀成为八股文坛被人狂热追逐的明星，其文成为士人学习的样板。以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科会试为一分界线，前此时文陋劣，油滑相尚，可不能而学，此后时文清真古雅，言之有物，理真气充，历百年而文体不颓，称为清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仅康熙九年会试所取李光地、徐乾学、陆陇其、仇兆鳌、赵申乔、张伯行等十数人即成为光耀

清代文坛及政坛的著名角色。次科韩爌出,更使清代八股文运大兴。他与李光地名列清代八股文四大家之中。李光地为文学习成化、弘治正宗,且于五子书中搜抉融会,能祖述程朱而自在流出,去成弘文之枯萎,融入理学之心得,使圣贤未泯之蕴,儒先未启之局,如岭云山月,探之不穷,卓然自成一家。

韩爌号称清代制义第一人,他一变明末八股淡滑之习,使古文与时文合而为一,乾隆帝说他“种学绩文,湛深学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追谥他为“文懿”。因八股文而受朝廷如此赞颂,明清两代仅此一人。

清代著名古文家,八股高手方苞在评价这一时期的八股文时说:
“我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来之准绳而加以变化,探正、嘉作者之义蕴而挹其精华,取隆、万之灵巧,启、禛之恢奇而去其轻浮险谲,兼收众美,各名一家。”

晚清著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也在《变科举议》中说:

“国初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莽为之。”

平心而论,这些评述皆非溢美之词,这一时期八股名家众多,如康熙时的颜光敏、张英、彭定求、朱彝尊、尤侗、杨名时、陈鹏年、汪份、何焯、张照、戴名世、方舟、方苞、张廷玉、储在文、任兰枝等或谙经铸史,或气盛言宜,或根据理要而体裁自见弘整,都为一时之杰。雍正、乾隆前、中叶如王步青、张江、任启运、陈宏谋、胡天游、陈兆仑、杭世骏、于敏中、袁枚、吴鸿、翁方纲、朱珪、赵佑、管世铭、纪晓岚、邵晋涵、龚景瀚、吴锡麒、汪如洋、曹振鏞、阮元、周棫山等,皆足以先后媲美,自成一家。然而从总体而言,无论是理念还是作法,清代八股文实无法超越前明。八股文至明末,文体造其巅峰,已臻无施不可之境,特别是其技法之齐备高超,清人除摹仿之外,已无创新余地,只有望洋而兴叹之份。清代八股文惟一能超越前明的,在于义理的发明。因为顺、康、雍、乾百馀年间,重朴学、戒空疏、上求下应,称为盛时。文章有尽,而义理却能依学识之深浅、史料的多少、手段的异同而日出不穷。

从康熙到乾隆,统治者以刀锯鼎镬列于旁,文字狱屡兴;以富

贵利禄诱于前,录取名额屡增;以号召提倡系于上,康熙、乾隆皆亲览时文,时加评议,褒贬屡颁。如康熙三十九年因有人奏参顺天乡试情弊,康熙便亲自出题复试,“及阅各卷,俱能成文”,并颁上谕说:“朕弃时文已久,览今文体,较前稍变,诸生试卷,朕一一观其大略,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者,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圣祖仁皇帝实录》)头脑何其清醒。康熙六十年还下令禁用八股文体中之大结,以防人利用讥议朝政。乾隆多次下谕,引领八股文风。如乾隆二十四年说:“国朝人文蔚兴,前如熊伯龙,后如李光地辈,并根据理要,而体裁自见宏整。至若张照等之步趋李光地,亦知仿佛先民矩矱等因。”(《四勿斋随笔》)软硬兼施,数管齐下,士子避害趋利,都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苑,钻研经书成为学界风尚,演为考据之学,开启朴学之风,也使八股文成为考据学的一个领域。

以时文作考证,肇端于明代,而形成风气则在清朝。经学发展至清初,已开始向考据转向,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他主张经学即理学,否定束书不观,侈谈义理的空疏学风。戴震更明确将经学解释为考据学。至乾隆、嘉庆已形成从广阔视野,以广博资料,采取包围聚歼之方式,促成专意务博与不舍弃纤毫微末的学风。八股文从本质上说便是经学的载体。这种学风必然在八股文写作中得到体现。于是清代八股文便在义理的发明上力求精深。他们发挥搜剔,使圣贤未识之内蕴、先儒未启之思想尽行发出。其识力透到之处,往往足补程朱传注之不足,甚至纠其谬误,从而吸引试官之眼球,以获一第。雍正八股高手任启运,“虽小题亦必用考据之法行之”即是一例。

清代八股文第二个特征是以八股文作经典音义的考证。明代人读经师心自用,随意解经之风盛行,对经书音义往往不甚注意,连名家中之八股文错解题、误用事者比比皆是。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将其类似错误一一勾辑,编为一书,讥嘲他们作文却不识字,但求热闹,以吸引读者眼球而自娱。清代考据学风大盛,主张解经要致力于经文本义的求索,欲藉此以探求圣人之本心,发现经文

的原生状态。故主张解经要先识字,而识字必自识音始,特别是惠栋打开一条由训诂字词解释经义的途径,这与八股文发明义理之法相通,于是学人们纷纷致力于音韵学之研究。影响所及,清代八股文必字斟义酌,讲求精细准确,从字词训诂中发掘经文未识之内蕴,从而使清代八股屡出新义,其精审深细远出于明代八股文之上。

考据学讲究旁征博引,广泛占有资料,提倡无证不言的实证精神。而八股文拘泥于传注,久已陈陈相因。无证不言的实证精神被士子运用于八股文中,便形成了搜奇与博引的特点。他们不再为传注所拘束,一题到手,必广征博引,于正经正史之外,还从逸书、诸子之中旁搜远绍,连小学、校讎、金石、碑帖中之有用材料也广泛运用,以出前人未出之义,靠新奇制胜。

清代八股文的又一个特点是弃经而史,以史事为骨干来构文。以史为文在明末八股文中已可常见,但不似清代已成为风尚。陈用光说:“近人作时艺,每以包罗史事为长,而词句遂搀杂后世史实。”此法大行,扩展了八股文的话语权,使八股文能包罗万象,涵盖古今,信息量大大增加。且用史必证今,增强了八股文的现实感,可让作者显露经世才华,促使他们对经世致用实学的探求。

与明代一样,清代八股文也逃脱不了其周期衰变律。从乾隆末叶开始,历经百余年兴盛的八股文也与万历后期一样,渐趋巧薄而就衰,士人剽窃陈言,以幸取功名为目的,又走上了明末的老路。

清代八股文的衰颓,首先是时代所致。八股文具有特别明显的与时俱变性。如乾隆后期,社会浮华之风渐兴,受其影响,尤侗惊才绝艳体的八股文便开始盛行。士子争学其以艳词丽藻为文。少年聪颖之人,只需花数月之力,倾才情于此俗腔滥调,便可做到形似,足以耸动试官之眼球而获售。故乾隆之后,八股文浮华不实之风大炽,一改康乾盛世之清真风神。又如道光以后“且夫调”大为流行,即于提比之后,或于末比之前突用“且夫”二字以振其势,而无须关顾前后语脉,乡会试皆以此为秘诀,本不通已极却大受考官、士子尊奉,使文体陋劣至极。

更为严重的影响还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国的科学、文化大



量涌入,使士人们知道,这世上除了孔孟之道还有其他有用的思想,除了作八股走仕途还有其他事业可干。亡国亡种的威胁迫使一些士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开始接受新思想、新学问。于是,八股文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人们不再视其为神圣,轻藐的思想渐起,愿意皓首穷经、将全副心神倾注于八股之中的人渐渐少了,只把它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的人多了,八股文质量的降低也便是理所当然之事。

其次是考据学对八股文的瓦解。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正可以用来说明考据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考据学的兴起,考据方法的引入,给清代八股文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又对八股文体起了瓦解作用。考订周详的文献辨伪,纠正了经书中的错讹,也打破了程朱以传注精心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使经典和圣贤的权威受到巨大损害,人们开始知道,经典和圣贤也不一定正确。但这一来便严重地破坏了八股文体,因八股文的根本在于依程朱传注代圣贤立言,现在经文与传注都有谬误,又如何去代其立言,人们又怎会相信这种立言的正确性呢?旁征博引,无证不言的实证方法,使得八股文以弃经用史为长。这种把八股文当史论来写的做法,也在瓦解八股文体。既要代孔孟立言,就不能使用先秦以后之史事与语言。旁搜博征的结果,在八股文中引入大量后世史迹与语言,这就把儒家经典等同于一般史籍与史料,不仅贬低了经典的权威,也使代圣贤立言变为一句空话。八股文的根本宗旨就被考据学打破了。考据学越兴盛,对八股文的破坏力就越大。在考据学走向全盛的乾嘉之后,八股文走向衰落便是不可抗拒的必然。

剿袭雷同的死灰复燃是造成清代八股文衰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猜题、背诵旧文,入场抄誊便可中式是危害明代八股文的一个顽疾。入清后,清朝统治者挟改朝换代之铁血馀威方才把它禁止。清初时盛行明文选本,其他时文选本不准刊行。乾隆时坊刻开始出现,到乾隆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造成了控制力的削弱,各种坊刻选本多如牛毛,到同治后还石印火柴盒般大小的选本供挟带入场抄袭之用,连背诵猜题功夫都省却。科场之禁也大为松弛,于是

剿袭之风又大盛,文不须自动脑筋作而靠偷抄可成,其衰败是可想而知的了。

截搭题之广泛使用是造成清代八股文衰败的第四个原因。截搭题是明代为防止猜题而制。这种割裂经文,隔句隔章搭截出题的方式,将程朱思想体系破坏无遗,作者须牵强附会以完篇,其文之陋令人不齿。本来在明代就受到无穷抨击。但到清末,《四书》、《五经》中可出之题已不知出过几千几万次,为防猜题剿袭,只得大量出此类题,坊间冠名为“巧搭”之类的选本汗牛充栋即反映了这一点。截搭题的广泛使用势必造成清代八股文的衰陋。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清代乾隆之后的八股文如同万历末年之后一样,开始衰颓。嘉庆、道光、咸丰之后,八股文多无骨力,日见衰靡。嘉庆三年,乾隆去世,余本敦作《曾子曰慎终追远》一节题文,阴切时事,情文交至,其中一段居然是颂扬体裁,重蹈大启之辙,开启清代以八股文作逢迎窥伺之先河,八股文已堕落至如此地步,何得不败!其时以八股文名世者,仅英和、莫晋、陈钟麟、姚学塿、林则徐、汤鹏、路德等寥寥数人。

同治、光绪间,受时代影响,士人多不欲以制义得名,讲求时文之风,渐被研究古文经史时务之学所代替。但同治、光绪二三十年间崇实黜华,风气为之一变。许景澄、夏曾佑、樊增祥等人以工于八股闻名。至光绪末年,八股文已是因袭陈言,酸腐已极,所谓代圣贤立言,只不过是抄袭前人的现成词句而已。八股体式全被打破,以正眼视之的人已寥寥无几。八股文坛放纵以露才,渔猎以炫博,八股文已衰靡到极点。国势也日益不振,两者气运都已走至尽头。

八股文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控制士人思想,巩固其统治而精心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在有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它经历了逐渐完善、逐渐变化的过程,担负起向士人灌输儒家正统观念的任务,为明王朝培育、选拔出一大批具有一定政治、文化素养和治国才干的官员,维护了社会稳定,巩固了明王朝的大一统局面。尽管它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与缺陷,束缚士人思想过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越显,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更甚,但在十九世纪西方民

主、科学大量传入之前,优点依然突出,功用十分明显,是历史上任何一种科举文体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开以孔孟之道作为治国、培育人才的指导思想外,别无良策可施,而要让士人掌握孔孟之道,就只有借重八股文。所以尽管清朝统治者总结了明王朝覆亡的教训,却依然承袭了八股取士制。经过一番扬长去弊的改善,一度出现长达百余年之久的全盛时期,但仍未逃脱其演变的周期律。到清朝末年,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大量涌入,以八股文取士实在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已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虽然阻力重重,也不得不将其废止。

在辽阔的历史天空中,八股文是渐行渐远的一抹微云,即将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我们不必为其消亡而叹息,但也不能将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作用一笔抹去,而应从制度层面去审视其历史价值及其对后人的启示,仅凭八股文废弃后十年,清王朝便一朝覆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们去发掘两者之间的倚存关系所在。惟有作如是观,才是理性、科学的态度。剖析八股文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它对明、清两朝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影响的深重。我们研究明、清两朝历史,如不对八股文有一个真切的了解,不明了八股文对士人灵魂塑造的巨大作用,就不可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与把握。所以,对八股文的研究,特别是明代八股文发展、变化史的研究,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黄子澄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

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

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

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实无二上。

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

天开日明，万国仰一人之有庆。

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臣有穆皇之美也；

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非天下有道之时乎？

当斯时也，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

若礼若乐，国之大纲，则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

若征若伐，国之大纲，则以天子主之，而掌于司马。

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于以诸侯而变之也；

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于以大夫而擅之也。

皇灵丕振，而尧封之内，咸懍圣主之威严；王纲独握，而万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道哉。

【评析】现存最早的八股文，文涉歌颂，

体似宋元经义

黄子澄的这篇八股文为其取得洪武乙丑(1385年)科会元的

应试墨卷，也是明代实行科举制后留存于世最早的制艺时文，对研究洪武颁科举成式后的制义体式有重要作用。黄子澄就是靠这篇文章走入殿试，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而步入仕途，成为明初名臣的。

文章的题目出自《论语·季氏》。该章全文为：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个试题，系摘取第一句经文为之。

这篇文章有破题、承题、起讲。从起讲开始，已入口气“代古人语气为之”。正文部分，多用比偶，虽未分八股，与标准体式有所不同，然已具八股格式雏形。最后为收结。明代八股文的基本格式，在此文中已经粗具。全文流畅整洁，雍容揄扬；紧扣题旨，浑雅纯正。而收纵之机，浩荡之气，呵成一片，元气充盈。明初才子解缙十分赞赏，称誉该文“庄重典雅，台阁文字”。

不过，此作行文尚涉颂体，文中对偶尚不工整。正文直射题目下文的诸侯、大夫而不为侵下，作法似宋元经义。可知洪武时的制义格式宽大，规矩不严，八股格式尚未定型，功令尚不完备。

明代八股文的文体格式是何时定型的呢？据《百可漫志》说：

国朝开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条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试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只录姓名乡贯。试录定式，自二十一年始。

既然从洪武二十一年开始刻程文，定“试录定式”，则标志此时八股文已大体成型。因为程文及“试录定式”是用以公示文章格式的。

至永乐年间，八股文的格式便已基本定型。永乐七年己丑（1409年）科会试第二名杨慈的《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题闾墨和于谦的八股文名作《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体分八股，与标准体式基本一致即是明证。

明洪武、建文两朝，刘基、方孝孺、黄子澄、解缙等皆有制义流

传,但不多见,其因固由靖难之役,散毁者多所致,更因文体初设,风气质朴,体未定型,后世难以模仿所致。黄子澄此文只不过给后人了解当时制义之形态提供了研究的资料而已。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四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儀禮考
天子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 一节

◎杨 慈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惟圣人能继先业以成武功，故能得声誉之盛，而备诸福之隆也。夫前人之所为，后人之所当继也。

苟不能然，则名且不足，尚何诸福之有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有周之武王乎？

自今观之，太王肇荒作之基，王季勤王家之事，则周之王业，固始于此矣；

文王诞膺天命之隆，以抚方夏之众，则周之王业，已创于此矣。

然太王、王季虽为王业之始，而其功则未成也。所以继其业者，非武王乎？

文王虽有造周之名，而大勋则未集也。所以承厥志者，非武王乎？

武王于是因累世缔造之功而为一旦放伐之举。牧野之师方会，而前徒已倒戈。华阳之马既归，而天下遂大定。则前人之业于是而始成，而前人之心于是而始慰矣！

夫以武王伐纣宜若失其名也，然人皆知其为应天顺人之举，而无利天下之心，则武王之名于是而益显。

当是时也，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则天下之民，莫非其臣，其尊



又何如？

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则四海之地，莫非其有，其富又何如？

由是而祀乎其先，则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莫不以格而以享；

由是而传之于后，则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莫不是继而是承。

则声誉之盛，诸福之隆，武王一身萃之而有馀矣。虽然，自非其能继先业以成武功，又何以臻此哉！

夫武王能成燹伐之功，于天下未定之时；周公能制典礼之懿，于天下既定之后。武王以武，周公以文，其为继述则一而已。噫！莫为之先，后将何述？莫为之后，前将何传？夫以太王、王季、文王既有以作之，而武王、周公又有以述之，吾于是不惟有以赞武王能成之孝，而文王之所以无忧者，亦于是见矣！

【评析】标准八股文的“始基”之作

杨慈的这篇八股文在八股文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八股文的“始基”之作。

杨慈，福建莆田人，字惠叔，永乐七年己丑（1409年）科会试第二名，刚选为庶常即去世，年仅三十，生平事迹不详，有文集五卷。八股文传世者仅有一篇，即他参加会试时写的名为《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题闾墨。然而，仅此一篇就使他名垂八股文史，为后人所称述。

在明代前期的八股文作者中，杨慈是一个能尽心力去深入钻研经文的人。他揣摩语调，模仿口气，务期克尽代圣贤立言之义。故他的八股时文能较好地把握经文的奥旨，且处处体悟孔孟之心，往往能发他人所未发，言孔孟将言而未曾言，获得八股时文界的一致好评。

以《中庸》中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节作八股文题，无人不把它理解为三王纘绪未成，到周武王才了却太王、王季、文王之志，这样的文章简直是在说周家父子祖孙累世累代，个个都想夺天下当天子，这岂不是与圣贤之意大悖？他们不知道纘绪二字是说能修德行仁，不堕基业，到得天与人归，一着戎衣便能

获得天下，即便是以臣伐君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在明代八股文史上，只有杨慈看明白“壹戎衣”句不是结束上文，而是发起下文，而发掘出其中的微言大义，阐发出周武王是重壹戎衣，不重有天下的见地，发人所不能言，深领圣贤奥旨，这种深入探究儒家经典的做法和本领，很受后人推崇。

对于《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闾墨，明清两代八股文界评价极高，不少人都把它奉为“明文始基”，因为它已具标准的八股格式，提二比、中二比、后二比、束二小比俱齐备。不仅如此，缩入、收缴、反振、分承、束上等后为八股文写作所普遍使用的方法在此文中都已纯熟使用，成为后世仿效的模式。后人一提先辈范文必首推此文，且此文为现存八股文中时代最早者，其价值便更高。方苞曾评述此文说：

“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变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确有开国气象。”（引自《明文钞》中之方苞评点）

雍正进士，清代最有名的八股文学家王步青也说：

“此制义最初体，故已教人自为。”（引自《明文钞》中之王步青评点）

由此可知，早在永乐初年，八股格式即已出现，故可推想，八股格式当在永乐末期便已基本定格。

此文不仅奠定了明代八股文体式的根基，还以其文彩斑斓，神骨色泽无一不备而打破了那些讥刺明代前期八股文为“枯简”者的眼镜，可见杨慈八股文写作能力之强。



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于 谦

大夫明于治兵之法，则失职可及观矣。

夫官无旷职，国之法也。知士不待三，而大夫可以多失伍哉？

且国家之倚重者有二：遇战斗则用介冑之士，遇绥靖则用旬宣之臣。故兵法严，则士奋勇；吏法肃，则官效职。人君以驭兵之法驭臣，则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绥之义死职，则官职当矣。

大夫之失职久矣，孟子将其假士以寓讽乎？而彼亦曰不待三焉。

盖谓国家布号令以约三军，即耳目手足，不敢紊乱。夫士也而敢于乱行，则军正必曰当斩。

将军援枹鼓以励战士，即进退左右，不敢逾越。夫士也而敢于离局，则司寇必且行法。

一失伍，则执而论之有司，何至于再。

再失伍，则缚而戮之于社，何至于三。

盖有死无犯，军之善政也；信赏必罚，国之大经也。此大夫之所素明也。

今子莅官以来，所谓奉职循理者安在？其于怠事，不啻再矣，岂士以贱刑，官以贵贷耶？

由子旷官以来，所谓省愆讼过者安在？拟之以失伍，亦既多矣，岂士不至于再，官不惮其多耶？

然则齐王简大夫而致以万家之邑，无事则抚百姓而简军实，有事则统将帅而立矢石，非以官守为行伍者乎？

大夫受王命而统帅师之任，居一官则效一官之职，位一日则尽一日之事，非以称职为守伍者乎？

始而败官箴，犹曰约束之弗明也；再则国体殆矣，民瘼晰矣，犹然有所阙失。使朝廷执八法以课吏，说将安解？既而挂吏议，犹曰甲令之弗熟也；三则中令严矣，功令著矣，犹然无所畏惮。使有司操三尺而议后，罪将何辞？

吁，孰去孰不去，大夫请自裁之。

【评析】于谦和他那个性毕露的八股时文

《不待三然则予之失伍也亦多矣》是明代爱国名臣于谦一篇享誉千古的八股时文。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二十岁时中永乐辛丑（1421年）科进士。

实事求是地说，于谦在八股文史上的名声固然源于他那确有特色并中规中矩的作品，但更多的还是得益于他的高尚情操及有大功于社稷。我们与其去赞美他的八股文，还不如去称赞八股文写作对他的品格与灵魂的塑造。他是在自小即开始的八股文写作中接受了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力行实践的人。他青年时代写作的《石灰吟》即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爱国忧民的情怀：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种甘愿为社稷为人民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即体现在他的为官生涯与八股文作品中。

于谦历任山西、河南等地巡抚，为官清正廉明，不畏强暴，深得民心。“土木之役”，英宗被俘，蒙古也先部进逼北京，以英宗为人质进行要胁。在主虏寇狂、国势危殆之际，身为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朝廷南迁，并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惊惶混乱的局面改变成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挽狂澜于既倒，使大明王朝历险而未亡，终于转危

为安。于谦刚直强毅、干练智勇、允武允文的品格与能力，获得了军民的爱戴。

更为难得的是他能不避斧钺之灾，不顾身家性命，当虏寇以英宗为人质进行要挟时，他与其他主战大臣毅然拥戴郕王即帝位。每当也先派使者来言“送驾”议和，或朝中大臣提到迎还英宗时，于谦总是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他明知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但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打破也先以英宗为人质进行要挟的企图，他仍义无反顾，显示出八股文写作已将儒家思想深深地植入了他的灵魂。

英宗复辟后，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于谦处死。明代有人批评于谦不懂得“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是不能由臣子来说的，说了即是砍头之罪（见《谷山笔麈》卷之三）。然而这恰恰反映出八股文写作使于谦真正领悟了孟子这句话的精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而名垂青史，成为有明一代最受后人景仰的历史伟人，也使他成为八股文能成功塑造士人灵魂的一个范例。

于谦的八股文篇篇皆恪守八股文格式，表明永乐中期，八股格式已大体固定，故于谦已遵行不悖。

于谦的八股文最显著的特色，在于他能根据传注畅抒己见，从而充分显示出他的人格与个性。其八股文皆英风劲节飙发，酷肖其人，这证明其时功令尚疏，尚能容作者自由阐发，不似以后功令越来越密，越来越强调在八股格式之内阐释书旨而笔势大受拘束，不能畅所欲言。

于谦的古文列于《三异人集》，八股文独自成家。由于他被冤杀，后才平反，故其时文散佚者多，今所存仅四篇，或论相业，或谈兵事，或诛佞讨奸，每篇可当古文一则。

其《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有利哉》题文，题目四十九个字，出自《大学》。于谦根据题文意思，恪遵传注，抓住宰相有容于得人之重要性及如何才算有容进行阐发，仅用三百二十八个字，即将题旨的精义统统阐发无遗。其文句

句皆有斤两，议论确，风骨峻，结构严，气象大，所表现出的气之奇，才之横，法之密，都令八股文界人士叹服。

其正文部分有四股。前二股叙题目的前二句，递讲得法，语简而透：

“夫才不穷于草野穷于大臣，曰休休，盖无所吐者，如有茹也；才尽于登庸不尽于虚受，曰休休，盖无所拒者，如有纳也。”

后二比叙题中二段，以“容”字贯，跟上串下，妙语连珠：

“见为容者，其容不靡。若寸才尺艺，皆自身之效灵，则止成一已，而何者为容；自谓容者，其容不真。若推贤好德，苦中怀之莫喻，则惟有一好，而何者为容。”

如此的文章使后来者跌破眼镜，清代最有名的八股文学家王步青就称赞此文说：

“体大思精，光焰万丈。以此为制举业开宗，岂在班、马、韩、欧下！世之卑视八股者，亦可旋其面目矣！”（引自《明文钞》中该文评点）

于谦的另一篇八股名文即《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这篇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上，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此题取其中二句。

《四书章句集注》注解：“子之失伍，言其失职，犹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对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专为也。”文章就是根据朱熹的注解所规定的意旨进行阐发的。

此文充分体现作者刚毅有为的个性。其起讲云：

“且国家之倚重者有二：遇战斗则用介冑之士，遇绥靖则用旬宣之臣。故兵法严，则士奋勇；吏法肃，则官效职。人君以驭兵之法驭臣，则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绥之义死职，则官职当矣。”

起讲讲上下团结，题蕴已该。其八股部分分层次阐发题旨，一股雄毅肃杀之气从字里行间透出，英风劲节跃露楮间，辣手著文章，令天下逃将旷官，一齐胆破。于谦立德立言，允文允武，独抒伟

抱，心存开济，吐言天拔，欲平治天下的志气全从文章中传递出来，令人击节称赏。八股文与古文一样能发抒情感，表现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体格式上来说，破题、承题、起讲、原题及提比、中比、后比及束二小比、大结这些明代八股文的基本部件一样不少，入口气代圣贤立言与题酷肖，与成化时的标准格式相比，虽还存在一些差异，如文中转接段落比后来的多等等，但仍可算是一篇格式已趋标准化的明代八股文。



仪封人请见 一章

◎薛 瑄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封人未见圣而思之切，既见圣而叹之深。

夫天不丧道，二三子可无患矣，封人信之以天，所以一见而有木铎之叹也。

惟时孔子辙环至卫，适于仪。有隐君子者，溷迹于封疆之间，其姓与名不可得传矣，封人其官也。

彼其望圣人而若企，前从者而陈词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此其意笃而至，语恭而周。贤哉封人！其若弗克见之思，有足多者。

逮乎从者见之，而封人遂有慨乎其中也，乃出而叹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盖否而必泰者天也，往而必返者势也。况乎有其具不患，无其施而拙于藏，当必大于用。则今天下聋瞶，舍夫子其谁起？故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噫！夫子生不遇于时，如仪封人者，亦可为倾盖之交也。

【评析】大儒薛瑄及其有纯儒风度的八股文

《仪封人请见》一章题文，是篇集中了明代前期八股时文特点的名作，其作者是有“薛夫子”之称的明代大儒，受到海内推重的名德硕学薛瑄。

薛瑄，字德温，自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十八年庚子(1420年)科河南乡试解元，次年中进士，宣德中擢授御史。正统改元，出为山东提学佾事，后召为大理寺左少卿。景帝嗣位，起为大理寺丞，次年，推升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天顺八年(1464年)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

薛瑄与于谦为先后科进士，又同他一样，是个受到八股文所传播的理学思想浸染很深的人。

十二岁时，他到当教谕的父亲任上随侍，即受到了严格的八股文训练，接受了浸润于其中的理学思想，并拜当时的理学名师从学，究心于洛、闽渊源，至废寝忘食之地步。释褐为官后，仍潜心向学，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其学是纯儒之学，宗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曾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故他无论为官为人，处世待物，处处以理学的道德观、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德容温粹，言词质直，世人称为“薛夫子”。在他的身上，八股文又一次显示了它对塑造士人灵魂的巨大作用。

他无欲无求，为人淡泊，刚直不阿，终生恪守儒家行事准则。考中进士时，当朝三位阁臣想见他，他敬谢不往。正统时，宦官王振权倾朝野，他不与之交。在东阁议事，连阁臣都向王振趋拜，独他屹立不动。王振主动趋前向他作揖，他傲然不回礼，表现出凛然正气，然而也招致了王振对他的陷害，被下狱论死。系狱待决，他犹读《易》不止，后被释。他长期掌管大理寺，决狱一本公正，不纵不冤，不畏强权，很受世人称赞。英宗复辟，石亨等欲置于谦于极刑，薛瑄不避祸殃，力言于帝，获减一等。观其一生，行无瑕疵，是个真正的道学先生。

薛瑄从小即从其为教谕的父亲攻习八股文，二十八岁乡试第一，次年又中进士，其八股文的写作水平是相当高的。其文的主要特色是对题旨的把握极为准确，阐释义理，不偏不倚，不愠不火，寥寥数语，即见心明性，全然合乎程、朱的思想，被八股文界评为醇白无疵。这当然与他深究理学，被称为明朝理学第一人有极大关系。

然而，尽管其内容表达的是纯正的程朱理学，其风格却又清新闲逸，这就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这全出于其对程朱理学已了然于胸，能深入浅出。

他的传世名作《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紧紧扣住程颐“盖是四者，皆心之所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的注释，深入地阐发题旨，指出心之用有不察，故会失其正。起讲后，截本题为四段，每段作一股，在正文中共用四大股将题旨内蕴阐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方苞称它为“精细浑全，深心体认之作”（见《明文钞》三编）。

自洪武至天顺的百年中，八股文坛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士人们相题既真，用力不苟，学力富，识见确，思想精深，词锋犀利，写出的八股文皆朴实无华，明义理，切伦常，常带有注疏气。薛瑄作为明代一位理学大师，纯儒家，真君子，其八股文更是以发掘出题旨的精蕴，阐明义理为目的。他的八股文叙题面处多，发所以然者少，闲闲叙来，题意已显跃于题面之中。其上者只加钩略点缀便可达微言，或者只将经文疏通条达，便能叫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他修身已到炉火纯青之境地，德容温粹，言词质直，是真君子，其文也反映出他的性情为人：无不简要亲切，往往只直写传注数语，略加联缀，用淡语叙之，便使孔孟等圣贤之意跃然纸上。这种特色，是典型的明初风格。《仪封人请见》一章题文，便是明初八股时文惟以明理为主，讲究合题旨，得题神，明书义的代表作。

这篇八股文在内容上具有明初制义恪遵传注，敷衍书理，不求华采，但求平淡以自明题旨的特征。



《论语》集注中对“仪封人请见”一章经文的传注为：“言乱极当治，天必将使夫子得位设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见夫子，而遽以是称之，其所得于观感之间者深矣。”薛瑄在《仪封人请见》一章题文中就忠实地遵照书理和传注来阐述。

作者在阐述时也是依照题文先后着笔，先于起讲中介绍仪封人其人，然后摹写其见孔子前的神情言行，继而摹写他随孔子的学生见孔子后的慨叹。最后以称赞仪封人为孔夫子的倾盖之交而收结。全文仅二百五十一个字，其中却多处照引题中关键性文字：如“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全文就略用一些说明性的字句，将这些关键性文字联缀串合，使原书义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这便是明初八股文敷衍书理，以经注经的典型作法。

在体式上，该文除破题、承题、起讲和收结之外，正文部分未分股，而只依题的内容用两段分述仪封人见孔子前后的态度言行。这种结构，为明代洪武、永乐、宣德年间所常用。至成化、弘治后，这种格式才被八股所取代，不准再用。然而，在万历所掀起的八股文变革潮流推动下，古文与时文出现融和之趋势，这种古文式的散体结构又被重新拾起，广泛使用，以自由表达思想。那些从不研究八股文却望字生义的人，以为八股文必须有八股，此文便可让其跌破眼镜。

好的八股文不仅讲究词章格式，还非常重视其内在的神情气势，追求个人思想与性情的完美表达。受将八股文妖魔化和人云亦云的空疏学风之影响，人们以为八股文必定是一副呆滞、死板的面孔，这种观点是完全脱离八股文实际的。其实，八股文的艺术要求，对情感表达的真实生动程度，并不比古文差，甚至比古文要求还高。此文即是一例。

该文不急不缓，闲闲写来，仅用二百五十一个字，即把题义的原生态阐发殆尽，且风神跌宕，意致苍凉，笔墨洒落，表现出一种高古的意境。先生理学为明朝第一，其文字驾驭能力之高，行文古逸苍浑，真可上配司马迁和韩愈。薛瑄的八股文古逸清新，简淡闲雅，毫无理学家文章迂板沉晦之迹，此文便是明证。故著名八股文

学者王耘渠称赞该文说：“以其时则文体初开，以其人则道学称首，而风调流逸如是，孰谓文章之道可不以气韵为先乎？”（《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更为难得的是，全文仅二百五十一字，不仅叙次议论，将题目一一管到，且文中高峰叠起，叠嶂层峦，曲折有致，与成化、弘治以前的八股文那种粗豪之态相比，真有古今之别。

作为明代理学第一人，薛瑄能于八股文坛独树一帜，这充分表明，八股文与程朱理学确有血肉联系，自关各人之胸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商 辂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圣人陋霸臣之器，而两辟仲之者之说焉。

夫管仲以其君霸，天下尊之久矣。器小之论，独自圣人发之，宜或人之未喻也。

且夫子亦尝大管仲之功矣，今曰器小者，何哉？盖功之大者，才有馀于霸；器之小者，量不足于王也。

然夫子未尝尽言，而或者眩于名实。

因欲救而解之，谓俭则必固，器小其似也。仲之为人，得无俭乎？不知俭者德之共也，帝王以节道示天下惟此耳。三归之丽，家臣之冗，奢莫甚焉，曾是而可为俭哉？此夫子所以致斥也。

或者又谓器小而复不俭，或几于礼矣。仲之为人，殆知礼乎？不知礼者国之维也，帝王以中道防天下惟此耳。树门之塞，反爵之坫，僭莫甚焉，曾是而可为知礼哉？此夫子所以重斥也。

奢而犯礼，其无修身正心之学可知，斯言虽若为俭与知礼者辩，而器之所以小亦自可见矣。然则器大何如，君子而已。

【评析】商辂及其古质庄严的八股文

这篇八股文约写于宣德至正统十年(1445年)之间,是一篇具有明初古质庄严、简洁深刻的名作。它的题目出自《论语·八佾》,《四书章句集注》对其注解:

“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或人盖疑器小之为俭。”“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数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奢。”“或人又疑不俭为知礼。……管仲僭之,不知礼也。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

此文的作者商辂谨守上述传注,来阐发题旨,写作这篇名文。

在明代八股文史上,商辂是最负盛名的一个,因为他是有一代二百多年中惟一的一位得中“三元”的八股文名家。

商辂,字弘载,浙江淳安人。乡试中解元后,又潜心读书十年,参加正统十年乙丑(1445年)科会试中会元,参加殿试中状元,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商辂一人而已。

商辂也是一位从八股文的攻习中领悟了儒家思想中积极一面的人。释褐从政后,他处处以儒家正统理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以之作为为官从政的信条,是一个儒家思想的笃行者。“土木之变”后,郕王监国,商辂入阁,参预机务,他力斥南迁动议,于国危

民恐之际，既定大计，力挽狂澜，与于谦齐名。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明史·商辂传》），为世人所重。英宗复辟，于谦、王文被捕，命商辂起草复位诏书，政变的主要人物石亨暗中叮嘱他“敕文毋别具条款。辂曰：‘旧制也，不敢易。’”从而招致石亨的报复，差点被杀，后削为民。成化时方召至京，以故官入阁。他辨明夺门，昭雪于谦，请复景泰帝帝号，抑制宦官汪直，兴利除弊，多有善政。商辂生平，前有以安社稷，后有以格君心，不愧为大臣之称。《明史》赞他“侃侃守义，尽忠献纳，粹然一出于正”（《明史·赞》），绝不是溢美之词。

商辂的八股文存世者不多，但留存的每一篇都为八股文界所珍重。其文如其人，简朴至极，然理足、神足、气足，虽然也使用了明初以经释经的作法，却能于恪守传注中别开生面，读去但觉奇气纵横，高古跳脱，充分体现出其有学、有胆、有才的为人。

其出自《论语》的《管仲之器小哉》全章题，便表现了商辂八股文的特点。

在破题、承题之后，起讲直出首句，提出“功之大者才有馀于霸，器之小者量不足于王也”的论点，然后不用对偶分股，只用二节文章分叙，便将题旨全盘揭出。

第一节从管仲“三归之丽，家臣之冗，奢莫甚焉”而证明“仲之为人，得无俭乎，不知俭者德之宝”，管仲“无俭”即是“无德”，故孔子要斥其为器小。

第二节从管仲“树门之塞，反爵之玷莫甚焉”，说其“奢而犯礼”，是“器小而复不俭，或几于礼矣”，故虽“以其君霸，天下尊之久矣”，却受到孔子的斥责。紧接着指出管仲器小的根源是“其无修身正心之学”。

大结处以二句收缴题目首句，首尾呼应，章法严密，发表了只有君子才“器大”的儒家正统见解。

全文夹叙夹断，使题之层次曲折，无不清晰分明，章法完密，开后人无限义法，读之但觉奇气纵横，新意迭起。文章极为精练，全文仅二百八十四个字，却将题旨阐述得明白透彻，如崇冈峻岭，不可攀登之势已备，令人不得不目以为奇。



今夫天 一节

◎岳 正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鼃鼃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中庸》究天地生物之盛，所以明至诚无息之功用也。

夫天地之道，一诚而已矣，生物之功，宁不各极其盛哉！《中庸》即之以明无息之功用至此。

若曰：“论圣人，固全乎天道；观天地，则见乎圣人。”

何言乎！今夫天以其一处而言，则昭昭之多，天也。天其止于是乎？及其无穷，而日月星辰之悬象于上，万物之覆幬于下。天之生物，一何其盛耶！

今夫地以其一处而言，则撮土之多，地也。地其止于是乎？及其广厚，而华岳河海容之，不见其不足；万物载之，惟见其有馀。地之生物，一何其盛耶！

语天地间之磅礴而不可穷者，莫山若也。今夫山不过卷石之多耳，而岂足以尽夫山哉！及其广大，则草木生于斯，禽兽居于斯，

宝藏兴于斯。山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

语天地间之浩渺而不可极者，莫水若也。今夫水不过一勺之多耳，而岂足以尽夫水哉！及其不测，则鼉鼉蛟龙生于斯，鱼鳖生于斯，货财殖于斯。水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

是则天地功用之盛至于此，至诚无息之功用，所以配天地而无穷也，又何疑乎！

【评析】岳正和他貌似平淡，实则品位雅纯的八股文

这是一篇被人誉为“望之平平无奇，然极天下才子为之，终不能如此妥适”的佳作，其作者为岳正。

岳正，字季方，号蒙泉，顺天府灤县（今北京市通县）人。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戊辰（1448年）科会试第一名，殿试赐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与明代前期的八股名家一样，八股文的写作使他树立了牢固的儒家正统道德观和价值观。他忠君爱民，以天下为己任，勇于任事。天顺时以翰林院修撰之小官被召入阁。“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有规以信而后谏者，慨然曰：‘上顾我厚，惧无以报。’”（《明史·岳正传》）对权倾朝野的奸党如石亨等，他敢于面责其非，并欲以纵横之术去离散他们。出为兴化知府，他节省开支，兴修水利，灌溉良田数千顷，造福于民，颇有政声。种种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儒家思想的笃行者。

然而，岳正又是一个迂直、偏执的儒家之徒。他“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明史·岳正传》），“负气敢言”，却因不讲策略，往往遭人暗算。他主动请准去离间奸党石亨、曹吉祥，他效仿前人手段施用纵横之术，因太过偏执、率直，石、曹二人一下子便看出了破绽，反受其害，曾被“逮系诏狱，杖百，戍肃州”。在兴化任上，他兴利去弊，“欲有所兴革”（《明史·岳正传》），于乡大夫不利，又被他们“腾谤言”，五十岁便致仕归乡。五年后去世。性格即命运，迂直的个性使得岳正有才无处使，竟至于英年早逝。

岳正于书无所不读，曾说“天下事无不可为”。他多才多艺，诗

文高简峻拔,直追古人。字法精邃,大书尤为出色。旁及雕刻绘画,皆臻其妙。常泼墨戏画葡萄,皆称绝品。有《类博稿》十卷。

岳正既然高中会元,证明他的八股文造诣很高。其文简朴峻拔,看似平淡无奇,然其布局谋篇极为周详,文中各个部分安排均极妥适,其阐发微言大义时品格之高,法度之密,都达到很高的地步。清代八股文学家俞宁世称其文是“极天下之才子为之,终不能如此妥适”,评价很高。这与岳正豪迈、粗放的个性却不甚相符,可见文如其人也有例外。

其《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鼃鼃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文题,出自《中庸》第二十六章,题长达九十九字,内容庞杂,又与上文有牵连,十分难做。

岳正在认题时,以天地为主,因山水、草木、野兽、鱼龙之类俱由天地生发而来,这就把握住了题中之主次,文章就好作了。在把握题旨时,他又抓住至诚之功用同乎天地这一要义进行阐发。这样一来,这一复杂的题目就变得简洁明了,又义蕴尽在了。他以“《中庸》究天地生物之盛,所以明至诚无息之功也”二句作破题,将题旨中之精蕴破解出来。承题、起讲承接此意进行发挥。正文以四股阐发天地与山水草木、兽鸟鱼龙之关系,其间为转换关系,使用了缴归法、变换法、蝉联法、脱卸法,开后人无数变化参差作法之先河。最后以“是则天地功用之盛至于此,至诚无息之功用,所以配天地而无穷也,又何疑乎”作结。全文简朴而理足,体方而意圆,望之平淡,实则浑然天成。其品格之高,法度之密,都达很高水平。

值得八股文研究者注意的是,这篇制义具有典型的明代前期八股文的特点:它恪遵传注,体会语气;其文短小,格式简单;其词简朴,不过敷衍书理而已。研究它,即可把握明代前期八股文之形态。

岳正的八股文即以如此纯雅的品格,以及细密的法度,在明代八股文史上赢得一席之地。



乡人皆好之 一章

◎王 恕

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以好恶观人者，稽诸好恶之人可也。

夫好非善人，恶非不善人。其好恶本无足凭，而可取必于一乡哉！

尝谓乡人有好恶亦有善恶，故取人者不当以好恶之善恶为善恶，而当以善恶之好恶为好恶也。

乃子贡以乡人皆好为问，是求观于众好也，而不知以众好观人，将为群誉之所欺矣，未可也。

子贡又以乡人皆恶为问，是求观于众恶也，而不知以众恶信人，将为群毁之所激矣，未可也。

夫乡人皆好，固未可以观人矣，求其好之可以观人者，其莫如乡人之善者乎？

乡人皆恶，固未可以观人矣，求其恶之可以观人者，其莫如乡人之不善者乎？

盖善者好之，则正大之情，既以素孚于君子。

而恶者恶之，则孤介之行，又不苟同于小人。

自好人恶人者而言，好者好其所当好也，恶者恶其所当恶也。一好一恶分，而可否自见。



自见好见恶者而言，则以己之所当好而见好于善人也，以己之所不必恶而见恶于不善人也。一好一恶交，而人品始彰。

吾是以谓取人于乡人之皆好，不如取人于善人之好也。吾是以谓取人于乡人之皆恶，不如取人于不善人之恶也。观人者，其准诸此哉！

【评析】直声动天下的王恕及其济微细净之文

该文作者王恕是一个对八股文有着精深研究，且能恪守并践行八股文培育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名臣。

王恕，字宗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戊辰（1448年）科进士。为地方官时，时时以百姓利益放在心上，为之兴利除害，不遗余力。在扬州知府任上，“发粟振饥不待报，作资政书院以课士”。“以治行最，超迁江西右布政使，平赣州寇”（《明史·王恕传》）。巡抚云南、南畿，皆有政声，为民所敬爱。

在朝廷，则以“直声动天下”。成化时，他“侃侃论列无少避，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于是贵近皆侧目，帝亦颇厌苦之”（《明史·王恕传》）。后被强迫致仕。

明孝宗即位后，大臣交相举荐，王恕又被起用为吏部尚书，很受孝宗皇帝器重。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国事”。“先后以灾异条七事，以星变陈二十事，咸切时弊”（《明史·王恕传》）。他历官“中外五十餘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明史》赞他“砥砺风节……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谏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夔亮，有古大臣节概”。

王恕的八股文的主要特点是内容纯正，所阐发的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儒家正统观念。这恰似他的为人，是他一生恪守儒家信条

的外化,是文如其人的应有之义。他的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八股格式在他笔下已运用纯熟。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及《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等题文,皆为标准的八股格。王恕的八股文写作经历主要是在宣德和正统年间,故可以知道在这期间八股文格式已经定型,并在士人中普遍使用,否则王恕便不可能在写作中对八股格式运用得如此纯熟。王恕八股文的第三个特点是结构谨严,语言简练犀利。这些特点,在《乡人皆好之》一章题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乡人皆好之》一章题出自《论语·子路》。该章经文以孔子答子贡问的形式,表达了孔子对如何才能评判一个人的善恶的看法。王恕在《乡人皆好之》一章题文中,根据孔子认为不能以乡人的好恶来评判一个人的善恶的观点,在起讲中单刀直入,提出“取人者不当以好恶之善恶为善恶,而当以善恶之好恶为好恶”的主旨,在正文的起二股中,以孔子的口吻指出“子贡以乡人皆好为问,是求观于众好也,而不知以众好观人,将为群誉之所欺矣,未可也;子贡又以乡人皆恶为问,是求观于众恶也,而不知以众恶信人,将为群毁之所激矣,未可也”。寥寥数语,指出以众人之好恶去评判一个人的善恶之弊,为下文提出应由乡人之善者去喜欢他,乡里的坏人去厌恶他的观点铺平了道路。其后的三比对这一观点作了深入的多角度的阐发。最后以“吾是以谓取人于乡人之皆好,不如取人于善人之好也。吾是以谓取人于乡人之皆恶,不如取人于不善人之恶也。观人者,其准诸此哉”作结。全文结构紧凑,层次分明,起二比叙题之上二段,中二比递入末二句,后二比正叙末二句,束二比畅发末二句之意,在八股体式内将题旨阐发无遗,流水开合,为隆庆、万历诸位八股文大家作法开先河。语言犀利精练,却自然舒展,是一篇平实纯正,清微细净的优秀八股文,绝似成化、弘治八股文大家之手笔。



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丘 濬

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

夫人类所以不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苟非圣人起而任除害之责，则斯民何自而得其安哉？

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辩”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谓夫周公以元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成周之王业方兴，有殷之遗患未息。

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可也。

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躯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

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是以于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

于猛兽也，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

夷狄既兼，则夷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

猛兽既驱，则鸟兽之害人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于家室田畴之内，而无惊扰之忧。

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

【评析】有转移文运之功的丘濬和他的明体达用、雅正俊伟之文

这是明代一篇备受推崇的八股名作，作者为天顺、成化重臣丘濬。

丘濬，字仲深，琼山（今属海南省）人。乡试中解元，景泰五年甲戌（1454年）科中进士。

他幼孤家贫，却嗜书好学。无力置书，常走数百里去向人求借，必得方止。老年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加上他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故博通古今，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之才自负。成化初，两广用兵，他指陈形势，洋洋数千言，领兵者虽不尽用其策，丘濬却以此名重公卿间。

丘濬受到过八股文的长期浸染，是个儒家忠实信徒，是儒家思想的笃行者。他指事陈言，曾列时弊二十二事，上言朝廷，皆为忧盛危明之计。他“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乃博采群书补之”（《明史·丘濬传》），成《大学衍义补》，所补部分充满了儒家道德价值观。他为官廉介，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然“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修《英宗实录》时，有人说于谦之死，应当以不轨称之。丘濬却放胆陈言，认为于谦在“土木之变”时有大功于社稷，没有他，“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如此。

然而，他又算不上一个纯粹的理学之徒。他“在位，尝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明史·丘濬传》），他自己却性格偏激，常与朝中大臣闹不和，其中一些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个人修养极好，如王恕等。他“与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明史·丘濬传》），且有暗中指使人诬告王恕之嫌，“恕竟坐罢，人是以大不直濬”（《明史·丘濬传》）。由此看来，丘濬对理学的精神实质尚未真正把握，颇有几分政客味道。

作为明代前期的八股文名家，丘濬在明代八股文史上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己之力，扭转了八股文坛的风气，对明代八



股制艺的改进完善起了很大作用。

明代前期,在保证八股文向士人灌输正统的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的雅正传统,其词简朴,其文短小,无不古质庄严,被后人视为夏鼎商彝。然而这种传统到天顺以后受到了严重挑战。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为遏止科场中的剿袭现象,割裂经文而创制的各种小题不断出现,士人们为作好这种语意不连贯,被截成几节,甚至是上下节文意完全相反的文题,只有生拉硬扯,甚至违背经旨传注去瞎凑,这一来各种奇涩险怪的言论和见解都出现了,这于统治者欲以儒家思想来控制士人的意愿大为不利。

丘濬作为一个儒家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看出其中包蕴着厌古喜新、生心害政的苗头,在主持乡、会试时利用衡文的权利,对这种文风“皆痛抑之”(《明史·丘濬传》)。他“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对奇涩险怪之文统统不予取录。他主持的成化乙未(1475年)科会试,所取录的会元王鏊,以及由他选拔出来,殿试钦点为状元的谢迁,后来都成为明代八股文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国子监祭酒任上,他“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明史·丘濬传》)。

通过这些措施,使得成化、弘治年间的八股文文风回复简朴平易,“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

后人对丘濬的这些做法给予很高评价,“廖道南谓举止尔雅,自丘文庄知贡举始”(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梁章钜则认为他“能转移文运,又何减于欧阳永叔”。

作为一个八股文名家,丘濬的八股文也很有特色,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丘濬的八股文注重明经合传,文质得中。由于他学识渊博,尤熟国家典故,故他在八股文中往往能发题文中别人所未能发之奥旨,新人耳目。他在出于《孟子》的《父子有亲》五句题文中,把儒家

的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人的天性，并说人伦根于天性，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与仁、义、礼、智、信相搭配，说五伦均出于这五种天性。这种说法当然是合符统治阶级利益的，故极为王耘渠所欣赏，说“直可参入注疏”（见《明文钞》三编中王耘渠之评点），简直把他奉为程、朱一流的人物了。

丘濬八股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讲究文法，并使八股时文的作法规范化。

在《父子有亲》五句题文中，他以五个句子来分论五伦与仁、义、礼、智、信的关系，如以“是故相生也而为父子，有父子则有仁之性焉。有仁之性是以父而慈，为子而孝，油然亲爱之无间也”来诠释父子与仁之关系，五句中文法顺逆变化，又寓变化于整齐，这种方法，一直为后人所模仿。其讲亲义别序信，句句典切，开后人发挥字义的无限法门。

丘濬的八股文立意高远，骨力雄峻，故气象宏大，涵盖一时，这大概与他“议论好矫激”的个性有关。八股文能表现作者性情，于此可得一证。其名作《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即具有这种特点。

这是一篇程文，是丘濬在主持乡、会试时所作。为改变当时八股文坛出现的追求新奇险怪，追求华词丽藻风气，欲使背离明初雅正传统的八股时文，归文体于正，利用他主持乡、会试之权，写出来供当时的士子揣摩学习用的。这样的范文他写了不少，对规范八股文的作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故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称他有“转移文运之功”，其正文体，转移风气之作用不亚于欧阳修。此程文便是其中的一篇，它具有典型的明代前期八股文之特点，是一篇传诵数百年的八股时文。

此文从周公“兼夷狄”又“驱猛兽”来歌颂他“以世道为己任”的情怀。立意大，气象宏阔，具有明代前期八股文的雄峻骨力。

作者在起讲时用“周公以元圣之德为武王之相”及“成周之王业方兴，有殷之遗患未息”二语来提起全局，开局宏敞，有虚虚笼罩一切之气象，完全合乎起讲作法。

紧接着用提比反挾，先从反面透醒，出比和对比分讲夷狄之

害和猛兽之患，写时先反透百姓“不宁”，挟入一层，将治乱和兼、驱的含义包孕其中，笼罩冠冕，气势雄浑。

出题承上之王业方兴意，转入周公，气脉古厚，波澜潏回，用周公“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总括提比而开启中比。

因中比以前之文字已指明夷狄、猛兽为民之害和周公欲除之意，故中比和后比不再费词多说，而从正面阐述。每比都是前虚后实，有纲有目，条理明晰，文字极为简洁。

此文省略了后二小比，非八股文之正格，而丘濬是在主持乡、会试时以这篇文章作范文来规范士子的，可见在天顺、成化年间，八股正格也并非非用不可，六格之文也可公然进入乡、会试。

收结以寥寥数语总括全文，指出周公以兼夷狄、驱猛兽来相武王，功莫大焉，言简而意深。

全文立意宏大，气势雄浑，文字毫不雕琢，简洁明白，不乏阳刚之美，具有典型的明初体式，清代著名八股文学者王耘渠称赞此文说：“篇中三四着意处，如五岳四渎，尽天下之大观。故阅数百年精神焕发，光可照人，余亟录此以明制艺初体，固已奇伟若是。”著名八股文家方苞则说它“骨力雄峻，涵盖一时。此程与元墨并制科文之极盛也”。细读全文，知如此评价，均非谀词，而是实说。由此可知明初八股文无意求工，却古质庄严，醞若古文词，与其后相比，确有不可企及之处。



由尧舜至于汤 三节

◎李东阳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圣人之生有常期，或传其道于同时，或传其道于异世。

盖圣人之生，即道之所在也。非见之者之在当时，闻之者之在后世，则斯道孰从而传之哉？孟子于此而历叙之，意有在矣。

盖尝论之，道之在天下必待圣人而后传。然其生也不数，故率以五百年而一见。

尧舜者道之所由以传者也。

自尧舜以至于汤，以其年计之，则五百有馀也。当是时，见而知其道者，禹得之，于执中之命；皋陶得之，为典礼之谟；若汤之生也，则闻其道而知之焉。观于上帝降衷之言，则斯道之统在于汤矣！

自汤至于文王，以其年计之，亦五百有馀也。当是时，见而知其道者，伊尹得之，而为一德之辅；莱朱得之，而为建中之诰；若文王之生也，则闻其道而知之焉。观于缉熙敬止之诗，则斯道

之统在于文王矣！

自文王至于孔子，亦五百馀年，犹汤之于尧舜，文王之于汤也。当是时，见而知其道者，得之为丹书之戒，则有若太公望焉。得之为彝教之迪，则有若散宜生焉。若孔子之生也，则闻其道而知之。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无所不学即文王之道也。斯道之统不又在于孔子乎！

吁！世虽有先后也，而道无先后之殊。传虽有远近也，而道无远近之异。然则斯道之在天下，何尝一日而无哉！

【评析】力倡文法的李东阳和他巧法兼备的 八股文

在明代八股文史上，本文作者李东阳应该具有崇高的地位，但过去八股文界对此认识不足。大家赞不绝口的是王鏊，认为八股文之有王鏊，如诗之有杜甫，文之有韩愈，而实际上，李东阳对成化、弘治八股文之兴盛所做的贡献远比王鏊大。他是成、弘八股文盛世的开创者。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天顺八年甲申（1464年）科中进士，年仅十八岁。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李东阳童年、少年时期就对八股文有着较深的领悟。少年时他曾两次被召入皇宫为皇帝讲《尚书》大义，很受皇帝欣赏。

弘治年间入内阁，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正德初年，刘瑾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明史·李东阳传》）。刘瑾大肆迫害正直大臣，李东阳“潜移墨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明史·李东阳传》）。正德时，他又多次上书，谏劝皇帝勿嬉游荒政。

李东阳善诗文，领袖文坛多年。他胸襟开阔，能“奖成后学，推挽才俊，风流弘长，衣被海内，学士大夫出其门墙者，文章学术粲然有所成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成为“茶陵派”作家的核心。

李东阳对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做出过别人难以企及的贡献。

他利用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大力提倡文章要讲文法,讲声律,讲辨体,从而使明代八股文摆脱了正统以来受奇险生涩之风的束缚,为成化、弘治的八股文中兴奠定了基础。

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找到李东阳提倡八股文写作要讲文法、讲声律的直接证据,但从其文论中能寻觅出这种线索。

在明初,古文学家是不屑于谈写作方法与写作技巧的。而李东阳却脱离具体内容去谈文章的“操纵开阖”之准即文法,脱离文气去谈“高下长短之节”即声律。他论诗强调音调的轻重、缓急、清浊、高下,以及做诗用字的虚实,结构的起承转合。分析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李东阳的这些强调与八股文走向定型时的需要相一致。明代由无定式的经义发展为有规定格式,讲究声律对偶的八股文正是沿着文法和声律的方向前进的。这就折射出李东阳作为文坛领袖肯定会在八股文写作中提倡讲求文法与声律的信息。

李东阳大力提倡在写作中要讲求文法与声律,也是风气所趋,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种文体在定型后必然会走上关注写作方法与写作技巧之路。明代八股文的文体自永乐后期,至迟也不会超过宣德前期便已基本成型,历经几十年的写作实践,到正统、景泰时期已为广大士人所一致认同并已熟练地掌握。由于这种考试文体关系到士人们的前程,他们在熟悉这种文体后,必然会研究其写作方法与技巧,以便把文章写得更圆融一些,机调更圆熟一些。作为文坛领袖,李东阳自然会顺应这种潮流,大力提倡八股文写作要讲求篇法、句法、字法,探索要如何才能做到起承转合,以便把八股部分写得结构严谨无懈,而又气脉流转自如。以李东阳的政治地位和文坛的领袖身份,他登高一呼,必会云从响应。讲求文法的结果是使八股文摆脱正统以来的生涩险怪之风,写得圆融有法。讲求声律的结果,是使八股部分的对偶摆脱以前的那种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近于古却不工整的做法,使排比对偶整齐合乎韵律。这样裁对整齐、机调圆熟的八股文便成为举业的正法眼藏,八股文的成弘中兴的时代便到来了。

李东阳不仅利用其文坛领袖地位振臂高呼提倡写八股文要讲文法,讲声律,还利用几次担任乡、会试主考的机会,推行其讲文法、声律的主张,选拔出一批与之同气相求的八股文人才来。其中罗伦、章懋、林翰、吴宽、邵宝等,都成为成化、弘治时的八股文名家。他们与李东阳同心相印,探求八股文法,为成、弘之际八股文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林翰之文,谈理真实,吴宽春容大雅,皆法度井然。

作为一位自幼聪颖异常的文坛领袖,李东阳自己的八股文自然也是讲求文法,技巧纯熟而高超的。

例如他那篇文题出自《中庸》的八股文《知所以修身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是篇截搭题文。作截搭题非常难,特别是那种前后意思毫不相干的无情搭题更加难作,需要很高的技巧。该文的题目包含两层意思即修身与治国的关系及治国的方法(即“九经”)。写作时要设法将这两层意思紧紧地扭合起来才好下笔。李东阳抓住修身与施政的关系将两层意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中庸》论修身之理,于政之施无不该”破题,承题处加以发挥,便立起了全文的主脑并钩下,起讲重申“为政固在于修身”的道理,并引入正题,起了承上启下过渡的作用。在正文部分,李东阳以起承转合的结构,以八股的格式深入地阐发了修身与治国的关系以及治国方法。出题部分则照应破题、承题文意以挽上。这样,这个难作的题在李东阳精心结构、周密安排下,写得主旨鲜明,首尾相贯,如一气呵成,可见李东阳八股文写作技巧之高,其讲文法效果之好。由此也可证明,截搭题至迟在天顺时已创制,而非王夫之所说万历以前未见。

最能体现李东阳精心构撰、机心独运的还是这篇文题出自《孟子》的《由尧舜至于汤》三节题文。

构成这篇八股文文题的三节经文,是孟子悯圣道之不明于世,欲使道统归于己而历数世代而言之,中间饱含遇与不遇的深叹。李东阳的这篇文章就恪遵传注中的这个意旨,对文题进行了阐发。在内容上,它无多少新意,但在写法上却受尽后人之好评。

该文先指出道统开于尧舜，方有亲见其道而知者和只听见其道而知者。起讲处只提尧舜，后面方用三比分叙三节经文，且见者闻者各还证据。文中用三个“当是时”，贴合“见而知其道者”，用词何等简括。汤、文、孔子，各云道统在此，既结束本节，又开启下节，前提后来，中列三比，篇法、股法、句法、字法，各极其妙。破题、承题、起讲以及收束，中间均有内在关系，这等写作技巧是非常高明的。

应当指出，李东阳这篇八股制义中的“三比”与后来标准格式的八股文中的“比”的做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是在一段中设对偶句作“比”，而不是如同后来以段落两两相对来分“比”。可见在李东阳写作此文的时代，标准的八股体式仍未定格，从根本上说，这种八股文还是用的古文作法。

清代著名的八股文评选家方苞评点此文说：

“起处、提处、束处，高老浑重。中间平列三比，而语脉转侧之间无微不到。古文矩度，经籍光华，融化无迹，归于自然矣。”

这个评价对该文的写作方法推崇备至，且又切合实际，这表明李东阳不仅大力提倡八股文讲求文法，自己也在身体力行。以此程式海内，固宜文运中兴！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王 鏊

大贤论前圣欲集乎群圣而纘其旧服者，一忧勤惕厉之心也。

盖三王之事，皆事之善者也。周公欲以一身而兼体之，其忧勤惕厉何如哉？

孟子意谓，三王不可作矣。继三王而作，时则有若周公，其用心果何如哉！

景前圣之烈光，毅然欲以身而统其盛，旷百世而相感，固不限于分位之难齐。

瞻庭闱之遗矩，慨然欲以己而会其全，幸再传之未泯，时自责以心力所可继。

夏而王者禹也，商而王者汤也。公而如禹如汤亦可已矣，而尚不忘乎有贤父兄之乐远稽未满足其志，参之以近守焉。会众美而归之身，固所愿也。

始王周者文也，继王周者武也。公而如文如武亦可已矣，而犹不废乎古先哲王之求见知未厌其心，益之以闻知焉。集四圣而为大成，盖有期也。

是以抚往事而兴则效之思，将以行乎古者而行乎今，典则俱在，冀追践而不遗。

即往行而励进修之念，将以敷于前者而敷于后。漠烈相承，期作求而无教。

于禹而欲施其好善恶酒之事，于汤而欲施其执中立贤之事，成功未见于躬行，而奋发已形于意气，彼谓古今之不相及而画焉以自处者，岂公之志哉。

于文而欲施其爱民求道之事，于武而欲施其不泄不忘之事，大效未彰于践履，而感激已动于精神，彼谓君相之不同道而陋焉以自居者，岂公之心哉。

吁，公亦人耳，而所以厚待其身者，必备夫三王四事而后已。其忧勤惕厉至矣，此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而道统之传有由也欤？

【评析】被称为制义开山的王鏊及其 众法皆备的八股文

成化、弘治间最为著名的八股文大家要数王鏊，他以高妙的文品和高洁的人格受到了后世八股文写作者的推崇，称他为制义开山，《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他的代表作，亦为成弘时文经典。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时人尊称他为震泽先生。江苏吴县人。明宪宗成化十年甲午（1474年）科乡试第一，时年二十四岁。次年乙未（1475年）科会试又取第一，殿试第三，俗称中了探花，时年仅二十五岁。

王鏊自幼聪颖异常，从小八股文即写得很好。“年十六，随父读书国子监，诸生争传诵其文”（《明史·王鏊传》）。连当时有名的文士，侍郎叶盛和提学御史陈选都感到惊奇，把他称为“天下士”。

王鏊乡试中解元，会试中会元。会试考官谢一夔、郑环得其文大惊，认为是苏东坡再世。此言传出，王鏊声名大振。殿试对策也十分出色，本当取为第一，主考官商辂是明代唯一连中解元、会元、状元之人，大约是他不想今生今世，再见有一个连中“三元”者与他分享荣光，便有意抑之，以谢迁为第一，将他置为一甲第三，取为探花，授为编修。王鏊并不以为意，仍然“杜门读书，避远权势”。“时人嘲之曰：‘文让王鏊，貌让谢迁。’”（见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

他自小即受八股文的浸染，儒家正统思想在其头脑中已深深扎根，故处世待物，都以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要求他人。

弘治初年，他升任侍讲学士，充任讲官。宦官李广常带着孝宗

皇帝去游西苑。王鏊便在讲解《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一章书时，以文王不贪图享乐而勤政为民的事例，反复规劝，“帝为动容。讲罢，谓广曰：‘讲官指若曹耳！’”后来，李广奸情败露，朝中许多大臣都受到牵连，惟独王鏊一身清白。

不攀附权贵，为人正直，这是儒家道德观中的重要内容，王鏊终生都在实践这一原则。外戚寿宁侯张峦与王鏊家有亲故关系。张峦显贵之后，王鏊即与之不再交往。有人劝告王鏊不要把事做得太过分了。王鏊正容说：“过去万安攀附万贵妃，我曾为之不齿。今天我怎么能去攀附寿宁侯呢？”王鏊的正直为人，受到了大家的赞许。不久，“太子出阁，大臣请选正人为官僚”（《明史·王鏊传》），王鏊这个正直敢言之人，便成了最佳人选，被推以本官兼谕德，不久又转为少詹事，升吏部右侍郎。

八股文写作使王鏊的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训练，经过多年的行政工作，王鏊成为了能干的行政官员，他参与朝廷的决策，在许多问题上，都能提出真知灼见。当时，鞑靼小王子经常骚扰开原、甘州等地。明军屡战屡败。王鏊“尝奏陈边计，略言昨火筛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宁，而缘边诸将皆婴城守，无一人敢当其锋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窃谓今日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可畏也。比年边将失律，往往令戴罪杀贼。副总兵姚信拥兵不进，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气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奋乾刚，时召大臣，咨询边将勇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专主将之权。起致仕尚书秦紘为总制，节制诸边，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镇京营，遥为声援。厚恤沿边死事之家，召募边方骁勇之士，用间以携其部曲，分兵掩击，出奇制胜，寇必不敢长驱深入”（《明史·王鏊传》）。这些御敌之策，皆能切合实际，可以看出王鏊具有很强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故孝宗马上采纳，对防御敌寇入侵起到良好作用。

王鏊从小即擅长写作八股文，为官后曾几次主持乡试。然而，他对八股取士制中的弊端也看得较为明白，故上疏陈述补救之策，说：

“宜仿前代制科，如博学宏词之类，以收异材。六年一举，尤异

者授以清要之职，有官者加秩。数年之后，士类濯磨，必以通经学古为高，脱去谀闻之陋。”（《明史·王鏊传》）

这是很有见地之策，可纠正八股取士制中之弊病，但未被皇帝采纳。

王鏊与明代其他名臣一样，当宦官乱政时，敢于挺身而出与之斗争，想方设法消弭其损失。

正德年间，刘瑾等宦官当权乱政。户部尚书韩文请郎中李梦阳起草了一篇奏疏，王鏊等列名其中，“请诛刘瑾等八党”。结果不但未扳倒刘瑾等八个宦官，刘瑾还升任了司礼太监，正直能干的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被罢免，内阁中只剩下李东阳一人。刘瑾想把其党焦芳推入内阁，廷议却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只得让王鏊与焦芳同时入阁，王鏊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王鏊在内阁理事，处处遵循儒家伦理观和价值观，直谏敢言。景帝汪皇后去世，“疑其礼。鏊曰：‘妃废不以罪，宜复故号，葬以妃，祭以后。’”（《明史·王鏊传》）武宗果真采纳其意见，命辍朝，按旧制祭奠。宪宗废后吴氏去世，刘瑾“欲焚之以灭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从之”。尚宝卿崔璿等人因得罪刘瑾而被严刑拷打，几乎致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李东阳亦力救，崔璿等人方免一死而充军去戍边。

王鏊在朝，尽力拯救其他受刘瑾迫害的正直人士，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刘瑾恨户部尚书韩文，因为他曾发起请求皇帝诛杀刘瑾等“八党”，刘瑾专权后必欲杀之，还想借其他事端去加害刘健、谢迁。王鏊大力营救，方才得以平息祸端。杨一清很有才干，兵部尚书刘大夏曾保荐他为三边总制，几度立功。他想兴建西段长城，刚一开工就有人在刘瑾面前进谗言，说杨一清此举是靡费国家钱财。王鏊挺身而出，力争道：“杨一清为国修边墙，安得以功为罪。”刘瑾又诬陷杨一清贪污，将其投入大狱，王鏊与李东阳合力相救，才得以免死。刘大夏不仅不肯依附刘瑾，还参劾了刘瑾的几个亲信镇守中官，刘瑾便将刘大夏逮捕至京，欲以激土官岑氏叛变为



罪名致刘大夏于死地。王鏊又为之争辩说：“岑猛但迂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变？”（《明史·王鏊传》）在王鏊的尽力拯救下，刘大夏方保全性命。

当时中外大权尽归于刘瑾，开始王鏊尚能开诚布公地与之商议朝政，刘瑾间或能听纳一二。到后来刘瑾专横益甚，祸害殃及缙绅士大夫。王鏊力不能救，只得洁身以退。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他三次上疏，恳求退归林下。武宗皇帝见其去志已坚，便准其告老还乡。《明史》中称赞王鏊“持正不阿，奉身早退”。

王鏊居官清廉，家无厚蓄，有“天下穷阁老”之称。归乡后，他寄情于山水笔墨之间，虽有廷臣多次荐举起用，但都被他拒绝了。嘉靖皇帝即位，几次派人存问，未几病卒，享年七十五岁。被迫赠为太傅，赐谥号为文恪。

王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诗也写得清新流丽。晚年著有《性善论》一篇，王守仁读后说：

“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明史·王鏊传》）

八股文名家、大画家唐寅一生师事之，称他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还画过《王鏊出山图》以表敬意。

王鏊最擅长的还是写八股文，从小即以善制举义而闻名于世，长大后更成为后世尊崇的八股文大家，清代人对他更是推崇备至。

清代著名八股文选家，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年）科进士，工古文，制义亦能自成一家的俞长城说：

“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也。前此风气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盖千子、大力、维斗、吉士莫不奉为尸祝，而或讥其雕镂，疵其圆熟，则亦过高之论矣。运值天地之和，居得山川之秀，夹辅盛明，大有而不溺；遭逢疑贰，明夷而不伤。于理学为贤，于文章为圣，于经典为臣，于制义为祖，岂非一代之俊英，斯文之宗主欤？”（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序》）

王鏊被后人遵为制艺之祖，比作史家中之司马迁、诗人中的

杜甫、书法家中之王羲之。他对八股文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将八股文的格式与作法推向了完善、完备、完美的地步。清代人说自王鏊出，八股文“法式渐精，隐创时局”（见《明文钞》三编《化治文序》）。他也成为引领文风的宗师。

王鏊的八股文用的都是正格，极少使用变格。他截本题为两截，每截作四股，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井然有序。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王鏊截对整齐，音调和谐，机调圆熟，为时文的正法眼藏。所以说制义至王鏊而体大备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我们只须看看这篇题目取自《孟子》的《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的文章即可明白这一点。

王鏊最为重视八股文文体之正，从这篇文章即可看出他是何等注重文体格式。他将题文分为两截，“周公思兼三王”写成四比，二比分，二比合，二比虚，二比实，其中三王交互，笔意警动，令人咀嚼不尽。“施四事”也写成四比，俱为分说，二比虚，二比实，这便是八股正格。明代八股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这种八股正格的普遍使用，而王鏊的八股文文体又是最为标准的。

这篇八股文不仅与明代早期或对或散的作法不同，很注意对偶齐整，还讲究平仄相叶，故方苞称之为“音调颇与后来科举揣摩之体相近，而意脉自清”（见方苞《钦定四书文》中该文评语）。

该文的好处不仅于此，它“一气承接，法律森严，实讲处又字字精确正大，真不愧制艺之祖”（见《明文钞》三编中该文评语）。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王 鏊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盖先足其民乎？

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

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廩，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觐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饗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评析】理实气足的王鏊时文

王鏊的八股文承继了明初恪遵传注，体会语气的传统，注重对题旨的正确把握及深入开掘，以完整地阐明书理，故后人称之为“理至守溪而实”。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程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篇八股文的文题取自《论语》，其经文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对这段经文的注释说：“用，谓国用，公意盖欲加赋以足用也。”“彻，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什取其一，则为什而取二矣。”“二，即所谓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赋之意。”“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俞桐川评述王鏊之八股文说：“前此风气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从这篇程文中，我们便可看到这种评价的准确度。

首先是此文体现了“理至守溪而实”的评价。

王鏊对儒家经典烂熟于胸，且能融会贯通，故他的八股文是恪遵传注，并能窥圣人分际的。该文题中，有若针对鲁哀公想用增加赋税解决“用不足”的问题，阐述了“百姓足”方才能“君足”的道理。王鏊的这篇八股文根据朱熹的传注，发微烛幽，对有若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揭示百姓足内便有君足，却讲还他百姓足。百姓之足，由彻之使用而致。君足即以百姓为足，却讲还他君足。君之足，由于彻行而使百姓足才能达到。阐述这些关系时即宣扬了儒家“君民一体”的思想，言圣贤之所未言，真正做到了“代圣贤立

言”，完全称得上是“理至守溪而实”。

这篇八股文通局一气流注，而精神自贯输于其间，恰与题之神理相趁，真可称得上“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故清代八股文评论家王巳山称赞此文“非满腹精神，无此大手笔”（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王鏊对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无不了然于胸，运用纯熟，除对八股部分的写作一本成法，且排偶裁对整齐，机调圆熟外，还长于构局谋篇。此文在起讲之后，即开始阐发“百姓足”与“君足”的关系，起比先讲“百姓足”，中二比则讲“君足”，在“中二小比”及“后二比”中，民与君相对成文，读来层次分明。故方苞称赞它说：“层次洗发，由浅入深。题义既毕，篇法亦完。此先辈真实本领，后人虽开合照应，备极巧变，莫能继武也。”（见《明文钞》三编中该文后附之方苞评语）对王鏊八股文的写作技巧作了极高评价。

后人称王鏊的八股时文诸法皆备，此后数百年中，八股文之作法万万千，都源于他这儿，这话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王 鏊

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

夫天生圣人，所以为世道计也。周公拨乱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而有为者欤？

孟子答公都子之问而言及此，意谓天下大乱之后，必生圣人之才。商纣之世，民之困极矣，于是有周公出焉。武王既作之于上，周公则佐之于下。

彼其夷狄乱华，不有以兼之，吾知其披发而左衽矣。周公于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国，若飞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其害百姓者也。

鸟兽逼人，不有以驱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周公于是起而驱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驱。驱猛兽，驱其害百姓者也。

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

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

天冠地履，华夏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功。

上恬下熙，鸟兽之类咸若。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力。

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气化，拨乱世而兴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

虽然，此亦周公之不得已耳，岂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为不得已哉！盖禹与周公，不得已而有为，除天下之害者也。孔子卒，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后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后世，孰得而轻重之哉！

韩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

【评析】法备辞雄的王鏊时文

王鏊作八股文，讲求格局，专以遒劲为雄。为达此目的，除讲局法、篇法、气脉之外，对股法、句法、字法无不精心揣摩，各种八股文作法都在他笔下得到运用，且巧妙如同天成。他是明代八股时文技法的集大成者，后人称赞说：“法至守溪而备。”故写出的文章，必然会谨严雄博而又法足辞备，这些方面在《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一文中充分体现。

这篇八股文是王鏊的考试墨卷，其文题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这是孟子回答其弟子公都子问中的几句话。

王鏊的这篇文章匆匆写于科举试场之内，却法备辞雄，谨严雄博，受到后世许多八股名家的赞赏。

从此文可以看出，王鏊不仅讲局法、篇法、气脉，还特别讲求股法、句法、字法。在起讲部分，他使用了伏法、提法、补法。在起二比中，又使用了反透法、点缀法、伏法、上下融贯法、先透法、飞渡法。在中二比中又使用了直下法、先透法、直接法、咏叹法、下截挽合上截法。所以清代有人称之为“无一字一句不是法度，制艺中玉律金科也”（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明末八股文名家章大力则称赞它“谨严之极，可为法家”。王耘渠说此文“运之以神，密之以法，鸳鸯绣出，多少金针度与人矣”。这些话都是针对该文对八股文各种写作方法与技巧运用之纯熟巧妙而发的。由此可知“法至守溪而备”确非虚言。

这篇文章写得谨严雄博而实玲珑剔透，清代著名八股文评论家王巳山评价说：

“学者推先生制义开山，如此文意匠种种，自是方圆之至。息心观之，见为谨严；高声诵之，乃得其雄博。所谓濡染淋漓，亦于兹可想。”

这种评价之高还比不上方苞，他评述此文说：

“浑厚清和，法足辞备，墨义之工，三百年来无能抗者。”

方苞是清代最有权威的八股文选评家，亦是八股文写作高手，他对此文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自是有其道理的，这说明王鏊不愧为明代八股文的一位大师。

王鏊对明代八股文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利用主持乡试的机会，引导八股文向简朴、雅正之路前进。他曾几次担任乡试主考官，他精心写作程文，示考生以标准文体，被后人称为“程文魁一代”，数百年后仍被奉为经典之作。他“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经他的努力，“弘、正间，文体为一变”（《明史》卷一百八十一《王鏊传》）。

然而，王鏊等成化、弘治的八股文名家过分强调机调圆熟，强调气脉法度，为隆庆、万历年间八股文脱离内容去讲求写作方法的极端形式主义埋下了种子，这是当时造成八股文文体大变的重要原因，从而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如王夫之就批评说：

“论经义者以推王守溪为大家之宗。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二则）

王夫之的批评虽然有些偏激，但确有其道理。王鏊的八股文既标志着明代八股文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又昭示着八股文即将进入停滞、蜕变时期。因为任何事物一至成熟即会向其相反方向转化，这是一条铁律，八股文也不会例外。



春秋无义战 一章

◎钱 福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圣经不与诸侯之师，以其不知有王也。

夫所谓义战者，必其用天子之命者也。敌国相征，则无王矣。人之称斯师也，何义哉？此《春秋》尊王之意，而孟子述之以诏当世也。

盖曰，夫《春秋》何为者也？夫《春秋》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而反之正，如斯而已。

是故来战于郎，战于艾陵，战之终始也；郑人伐卫，楚公子申伐郑，伐之终始也。

然或讳不书败，或虽败不讳，其辞不同，要皆随事示讥而已，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谁欤？

或称人以贱之，或称师以讥之，所书不同，要皆因文见贬而已，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谁欤？

但就中而言，若召陵以义胜，而犹有借名之力；城濮以威胜，而不无假义之功，则固有彼善于此者，而要之皆非义战也。

是何也？天下有大分，上下是已。

天下有大权，征伐是已。

然其分也，不可得而犯也。

其权也，不可得而僭也。

故诸侯而有贼杀其亲则正之，所以正之者，天子之命也，而大司马不过掌其制而已矣。

诸侯而有放弑其君则残之，所以残之者，天子之命也，而方伯连帅不过修其职而已矣。

惟辟作威，而势无嫌于两大；大君有命，而柄不至于下移。是征也者，上伐下之谓也，未闻敌国而相征者也。敌国相征是无王也，无王是无义也；春秋之战，皆敌国而相征者也，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然则春秋之诸侯，不皆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之《春秋》，其容已于作耶？

【评析】时文大师钱福及其正大醇确的八股文

钱福在成化、弘治时也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八股文大师。王夫之说：“钱鹤滩与守溪齐名，谓之为钱王两大家。”（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三则）可见他在八股文史上地位之高。

钱福，字与谦，因其家居临近鹤滩，即以鹤滩为号（见《献征录》卷二十一）。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钱福少负异才，聪颖过人。八岁能属辞，且意境高远，作文从不起草，一挥而就，不用修改。

钱福于弘治三年庚戌（1490年）科参加会试，成为会元。殿试策问他文不属草，又不加点，一挥即洋洋三千言，且辞理精确，无一纰漏。弥封官因其卷中没有草稿欲责他违例，考官们却为他打抱不平，说：“考试属草，是为防人代作，今殿试，众目睽睽，有何作弊之嫌？”弥封官只得将其卷弥封送上阅审。

主考、文渊阁大学士刘健极为爱才，也是个八股文高手。他得钱福策问卷后，赞不绝口，请孝宗拔擢钱福为一甲第一名。钱福就这样当了状元，随即授翰林院编修，时年三十岁。但仅三年，他即告归，放情于山水间，饮酒无度，年仅四十四岁即辞世。

钱福多才多艺，诗文藻丽敏妙，且工书法，又是状元及第，故“远近以笺版乞题者无虚日”（《献征录》卷二十一）。

由于成化、弘治时八股文的裁对已要求整齐并讲究音律，故此时作联属对之风在文士们中间广为流行，一批批高手也应运而生。钱福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更是其中的顶尖人物。据文献记载，他少年时从私塾放学回家，路见一客在赏菊，客早知钱福少负异才，便出对要钱福答：

“赏菊客归，众手折残彭泽景。”

钱福想也不想，应声而答：

“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

那客人大为叹服。

钱福退隐归田后，一日应知县之邀去游君山。这个知县喜好诗书，一来想留下一幅钱福亲书的诗作，二来想考一考钱福，看他是否有异才，便选了“堤、脐、低、梯”几个冷僻的字要钱福以之为韵脚，作诗一首。酒过三巡，县官拿出这几个字，请钱福以亭为题作诗。钱福笑笑提笔即依韵题诗一首：

水势兼天山作堤，
渚云烟树望中齐。
直从巴峡才归壑，
许大乾坤此结脐。
胸次决开三极朗，
目光摇荡四垂低。
欲骑日月穷天外，
谁借先生万丈梯。

满座皆啧啧称奇。

钱福更为擅长，为他赢来更大名声的，还是他的八股文。

俞长城曾评述他说：

“钱鹤滩少负异才，科名鼎盛，文章衣被天下，为制义极则。世之所谓才者，倾倚偏驳，奔放纵横，其气外轶，其理内绌，虽足以惊世骇俗，然率不能久。鹤滩之文，发明义理，敷扬治道，正大醇确，典则深严，即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成名之故，岂偶然哉！”（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序》）

钱福的八股文也与王鏊一样，讲究看题炼局，讲究局势法脉，王鏊而外，他独树一帜，成就斐然，这从其名作《春秋无义战》一章题文即可看出。

这篇八股文的文题为《孟子·尽心》中之一章：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四书集注》中阐释这一章话时说：

“《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

钱福聪颖过人，受时风的影响，将儒家经典记诵得烂熟，行文做到了当时所崇尚的“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无论写作何种题目之八股文，他都能做到字斟句酌，“恪遵传注”，根据题文及朱熹的传注来阐发微言大义。作者看题炼局，不肯率易，此篇更运以高壮深严之气，如铁城汤池，凜不可犯。他用春秋时的许多战例来说明孔子、孟子对此时各国战争的看法，“九伐独举其二，以司马方伯分承，于文律亦疏，而规模骨格，守溪而外，惟作者峣然而秀出”（见方苞《钦定化治四书文》该文评语）。在写法上，作者只清题面，不旁杂闲意泛辞，而操纵断续之势毕备。故李光地称此文“局势法脉，无一字散漫，学文者须揣摩此等”（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王耘渠也给予此文很高评价，他说：“先辈看题至此，炼局至此，书家所谓十二种意外巧妙，更何以加。学者读此等文，不可一字忽过。”（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文章中“盖曰，夫《春秋》何为者”一段暗从孔子领出，直提《春秋》二字作顿，以唱起全题。提二比讲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二句仍缴入首句中，看题极清楚。“未闻敌国而相征”句从“上伐下”句带出，即转缴首句，理法兼到，而笔力更老横无敌。由此可见钱福八股文写作水平之高。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一节

◎钱 福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大贤于圣道之大，必先拟之而后质言之也。

夫道莫大于圣门也，游之斯知之矣。大贤拟之而后质言之，有以哉！

其意曰：孔子以天纵之资承群圣之统，道莫有大焉者也。

欲观圣人之道，胡不即登山者以观之乎？躐东山之巅，则鲁地之七百，一览无余。履泰山之岩，则禹服之五千，极目可得。何也？所处益高而视下益小耳。

夫登高既不足于下，视大必不足于小。欲观圣人之道，胡不即观海者以观之乎？鼓楫于北溟，则河济孟津之险，视若衣带。扬帆于东渤，则洞庭彭蠡之浩，渺若夸涔。何也，所见既大，则小者不足观耳。

圣人之门，妙道精义钟焉，犹地之有东山、泰山也，犹水之有沧海也。游圣人之门，见圣人之道，然后知其可放可卷，而天下莫能载；可行可藏，而天下莫能容。百家之说坐见其偏，诸子之论顿觉其弊，其与登山观海者何以异哉！

【评析】手法新奇又典则深严的钱福时文

钱福善于因题制格，长于文章的结构剪裁，且能发明义理，典则深严。这些特点，从《孔子登东山》一节题文中可见一斑。

八股文因题目的内容与句式不同，并不是每个题都能或都要写成八股格式的，这就要求作者不拘泥于八股正格，能因题制格，精心剪裁结构，方才能写出好文章来。此文即是一篇因题制格的佳作。

根据朱熹的传注，这个题目的经文是讲圣人之道大，非他道可能及。又说此节的上三句兴起下一句。钱福此文因题制格，题句上下截对，文章偏以单对复，留末句另讲，这种写法十分奇特，可见成化、弘治时的八股文并不谨守绳墨，尺寸不逾。高手在作法上时有破格创新，已开正德、嘉靖之后时文变革之先声。因孔子之道是集大成者，故单说孔子，以孔子二字作领起，后以题中之山、海对喻，而掣出末句重讲，以圣人结，使孔子与圣字门字首尾相应。文之因题制格，将登山观海三句，裁对作二比。正于天造地设之中，得五花八门之巧。文章直起直止，绝去枝蔓，变化剪裁，全从乎心，虽简约冲淡，全文仅二百八十六个字，而气象万千，确实笔力非凡。且文章对东山、泰山、观海之意作了考核阐释，使其比喻之意尽现，亦可见作者学力深厚，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非寻常之辈可比。

钱福少负异才，学识渊博，为文能发扬义理，考据精详。如以《论语·乡党》中之“非帷裳，必杀之”文作八股文题，最难下笔。若以上下分句作题，尚有躲闪挪移，借宾得主处。如将这六个字作为一个题目，不侧不溢，很少有人能将之写成文章。钱福却从考据下手，写成一篇令人啧啧称奇之文。特别是中二比对裳、帷的考据详该，更受人赞誉。其中幅云：

朝祭之裳责乎直方，故正幅如帷，虽费而不及奢也。
自此之外何所取义，于正幅而为是奢且僭耶？于是省为剝幅而以齐视要，上则杀乎其下矣。

如帷之幅要齐同广，故袞积就要，虽华而不及靡也。既用削幅何所设施，夫袞积而为是靡以混耶？于是旁无袞积而要有害缝，亦袞如其下齐矣。

杀其幅而不嫌于前后之联裂，昭其俭也，先王之制无之，不敢增也。

杀以缝而取给于前后之联属，贵其完也，先王之制有之，不敢缺也。

大意总重在别于公服，不专在省费，娓娓言之，后人自不能出其范围。

后世的八股文家认为论成化、弘治时八股文的规模骨格，王鏊之外，惟钱福独树一帜，故世称“钱王”。但也有人对其以八股文作考据文章，文中用典太多，及只清题面，不及其他的作法颇不以为然，有的还大加抨击。

王夫之便认为钱福无资格称大家，他痛加抨击说：

“以此称大家者，缘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笔，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矣。鹤滩自时文外，无他表见，唯传吴骚淫俗词曲数出，与梁伯龙、陈大声一流狹邪小人竞长。如此人者，可使引伸经传之微言乎？”（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三则）

王夫之的批评确有其正确之处，王鏊、钱福的八股文对隆庆、万历八股文文体的改变的确有很大的影响。但王夫之把钱福写作吴骚散曲也大加贬斥，就显得过于偏激，证明王夫之的封建正统观念比钱福更加浓重。

以八股文作考据文章，且“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序》），这是钱福之所长，也受到许多八股文家的赞誉。然而，钱福考据成癖，往往使文章出现考据烦琐、文章繁缚之病。清代学者、八股文名家梁章钜便批评他考据过细，使文害道，说：

“时文何必过求深，则视时文真为敲门砖，非为圣贤明经义，

自待亦不厚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

应当说,梁章钜的观点是对的。各种文体皆有其独特的功能,把八股文写成考据文章就改变了八股文所承负的功能,八股文便不成其为八股文了,但从文体必依时代而变的角度来看,钱福此事亦是顺时之举,无可厚非,清代人不就以八股文大作考据吗?钱福只不过开了先河而已。开风气之先者往往多受惩戒,这是一条规律。





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 一节

◎罗 伦

**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圣人于大夫之伐国，而历据理以斥其非也。

盖兵以义动，始无恶于伐也。颛臾封于鲁，国于鲁，臣于鲁，则季氏安得而伐之哉！

且吾闻之，无故而利人之有者不仁，无罪而伐人之国者不智。季氏之伐颛臾也，岂未闻颛臾之为国乎？

彼其分封不出于先王，是僭窃之君也，而伐之可以明王制。锡土不居于邦域，是争雄之国也，而伐之可以夷后患。名分不通于社稷，是跋扈之臣也，而伐之可以修臣纪。

今自其建国之初论之，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则一方之名山，将赖以承其祭。而有周以来，其国固与我鲁并矣，是岂可伐者乎？

而犹未也，以地则在邦域之中焉，密迩公室，必无悖逆之心。所谓不必伐者，此也。

以分则为社稷之臣焉，听命公朝，又为王家之佐。所谓不当伐者，此也。

为季氏者正宜远追建国之意，近守交邻之道可也，胡为乎谋动干戈，容心于分外之得，妄兴师旅，恣情于黩武之谋。

将以明王制与彼非僭窃之君也；将以夷后患与彼非争雄之国

也；将以修臣纪与彼非跋扈之臣也。而无名之举，何以服天下之心。

但恐不可伐而伐之，上得罪于先王也；不必伐而伐之，下得罪于境内也；不当伐而伐之，中得罪于公家也。而不义之师，只以稔一己之恶。

为季氏者，不知而伐之，是不智也；知而伐之，是不仁也。国未必得，而身已入于大恶矣。季氏何为哉！

为求者，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谋未必就，而身已入于大逆矣。求也何为哉！

【评析】开创了长题局法的罗伦八股文

这是成化年间的一篇八股名文，然而其结构却似隆庆、万历时之巧密，并有正德、嘉靖制义之气势，故很受后人重视，其作者罗伦也因此而名传千古。

罗伦，字彝正，号一峰，江西吉安府永丰人。

罗伦自小即遵从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五岁时跟母亲进入一家果园，果子坠落，大家争着去捡取，只有他非等主人赏赐才接受。因家中贫困，他去打柴时都要带着书，一有时间即诵读不辍。考取秀才后，更立志钻研，奉行圣贤之学，曾说：“举业非能坏人，人自坏耳。”（《明史·罗伦传》）知府张瑄很看重他的学行及志向并悯其贫，送粮食给他，他却辞谢不受。

成化二年他参加丙戌（1466年）会试选中。廷试时，他手不停挥，策问写了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都。其时谢一夔因程敏政的试卷字迹精美，拟列为第一。大学士李贤说：“论文不论书。”便将罗伦列为第一。罗伦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誊录策问试卷时，有人劝罗伦将抨击宦官、指责皇帝的言辞删去，他却坚持一字不易。

罗伦为官后，严格以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人约己。他中状元后两个月，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诏还朝。伦诣贤沮之，不听”，罗伦便不管李贤是识拔他的恩师，上疏极论李贤不守孝道，有违纲常风化，震动朝野。他也因此被降职调任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虽有多

名御史上疏救他，都没有用处。然而此后很少有大臣敢于应允夺情之事。直到李贤去世后，大学士商辂力言应复其原职，方召还改任南京。两年后，罗伦告病辞职还乡，遂不复出。

罗伦是一个由八股文培育出来的，牢固树立了儒家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典范。他“为人刚正，严于律己。义所在，毅然必为，于富贵名利泊如也”（《明史·罗伦传》）。他不视恶色，不听恶声，不耻恶衣、恶食。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居官者言民疾苦。他“衣食粗恶，或遗之衣，见道殍，解以覆之”。他家无隔夜之粮，晨留客饮，妻子去邻居家借得湿粟数升，旋炒旋脱壳，忙到中午才将之煮成熟饭，他也不以为意。晚年他筑室人迹不至的金牛山，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纷纷而至。人们都仰慕他的人品学问之高。《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七“赞”罗伦等人说：

“词臣以文学侍从为职，非有言责也。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谪而不悔，岂非皎然志节之士欤？夺情之典不始李贤，然自罗伦疏传诵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复为故事，于伦理所裨，岂浅鲜哉！”

罗伦的八股文与其为人一样，充满了凛然正气，义之所在，他必侃侃而言，申其精义，斥其背谬。其《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侃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章题文，对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又启时君杀伐之心的错误，按照朱熹传注之意，以“王者右社之制，为民建树，与国存亡，其意固深远哉”为中心，一层层阐发，将宰予之错误驳斥得体无完肤。文章以新警之文笔，义正词严，表现出清刚之风骨，可说是文如其人。王巳山评论此文说：“风骨遒警，词义都经百炼，而神气自宽然有馀，此后人所不能到。”（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方苞的评价更高，他说：“纯以炼胜，亦开倡风气之作。须识其风骨清峻，胎息左国之神，非可于局调间刻摹形似者。”（见《钦定四库全书》该文评语）平心而论，这皆非过誉之词。

罗伦最善于以磅礴的气势将文中的正气表达出来，以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来征服人。这篇《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一节题文，对季氏不顾颛臾是先

王封国，且在邦域之内，欲取以自益的不义行为，予以斥责，文章将凛然大义，曲折发挥，雄气奔放，被“昔人谓如吕梁之水，喷薄澎湃”（见《钦定化治四书文》该文评语）。如文中以“将以明王制与彼非僭窃之君也”与“但恐不可伐而伐之”两比来写题之“何以伐为”，其意义皆紧从题之上三句推勘出来，大气排宕，笔力横绝，开正德、嘉靖八股文讲究气势雄放之先河。方苞对此文极为赞许，他说：

“不独兼正、嘉作者气势之排宕，并包隆、万名家结构之巧密矣。故知先辈非不欲为正、嘉以后之文，乃风气未开，为之者尚少耳。”（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该文不仅气势奔放，结构上也很有特点，它全以末句驱驾上三句，深得运题之法。前伏后应，章法一线。在体式上，它并不像成化、弘治八股时文那样非用八股不可，全文只有六股，且相对两股对偶并不齐整，句子有散文化之倾向。特别是最后两股，以季氏冉求，分煞“何为”二字以作结，在八股文史上更为奇特少见。这些特征，与万历以后之八股文颇为相似，可视为隆、万八股文之先声。

罗伦的《三月无君》四节题文，词义端严，正气充沛，一如既往，而铸局之法，前提后束、中纽，三处相配成章法。六比中凡八层，次第分明，文气融贯，足为后学法程。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文为长题的写作提供了模式。方苞评点此文说：

“长题局法，此为开山，宜玩其游行自得，而体格谨严处。”

罗伦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嘉靖初，追赠为左春坊左谕德，谥文毅，学者称其为一峰先生。有《一峰集》十卷行世。

罗伦精通书法，尤擅长行、楷，师法文天祥，由此可知他的人格追求。



子在齐闻《韶》 一章

◎吴 宽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圣人寓邻国而听古乐，学之久而专称其美也。

至夫古乐，莫美于《韶》也。观圣人所以学之，与所以称之者，则圣乐之美，圣心之诚，皆可见矣。

昔乐有名《韶》者，乃帝舜之所作者也。后千馀年，列国惟齐能传其乐。孔子在齐适闻其音，想其慕舜之德，其心已极于平日。闻舜之乐，其身如在于当时。

故不徒听之以耳，而实契之于心。

于凡鸣球琴瑟之类，其声之依永者无不习，以至鼗鼓笙镛之属，其音之克谐者无不考，盖学之不厌也。至于三月之久，而好之甚专也。本乎一心之诚，故当食之际，虽肉味有不知其为美者。

何也？其心在于乐，则发愤至于忘食之勤；其志好乎古，则终日且有不食之笃。彼刍豢何物，果足以悦我口耶？

夫既学之而有所得，则称之自不能已。

盖谓舜之乐，昔尝识之于《书》，如后夔之所典者，以为犹夫乐也。今习其度数，不意若此其美，则其声之感召，真可致神人之协和也。

舜之乐，吾尝闻之于人，如季札之所言者，以为犹夫乐也。今考其节奏，不意若此其盛，则其德之广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载也。

其感叹之意，溢于言表如此。

然则《韶》非舜不能作，亦非孔子不能知。彼端冕而听古乐，惟恐卧者，可以语此也哉！

【评析】生性不喜时文却又以学者型八股文 鸣世的吴宽及其八股时文

吴宽自小即不喜欢八股文，可是偏偏乡试考第二，会试考第一，殿试取为一甲第一名，且成为明代八股文名家，在八股文史上也算一个奇特的人物。《子在齐闻〈韶〉》这一章题文更是传之千古的八股名作。

吴宽，字原博，号匏庵，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吴宽“年十一，入乡校习科举”（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一《旧文稿序》），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明史·吴宽传》）。但因鄙薄时文而喜好《文选》、《史记》、《汉书》及唐宋诸家集，“属意古作”，结果“既业为举子，势不得脱然弃去，坐是牵制，学皆不成，故累举于乡，即与有司意忤”（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一《旧文稿序》），不得中举。吴宽不以为意，反而下更大功夫去攻读古文，“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不久，逢大比之岁，提学宪臣知道他的才学，强行送他去参加乡试，结果中了第二名。四年后，参加成化八年壬辰（1472年）科会试，中会元，殿试又中状元，授翰林院编撰。

孝宗为太子时，吴宽侍读东宫。孝宗即位，升他为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

弘治八年乙卯（1495年），擢吏部右侍郎，因继母去世，离职服丧。服满还任，转为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时武宗为太子，吴宽侍读东宫。是时，宦官为控制太子，不想让他接近儒臣，多次找借口间断讲读。吴宽即率同僚上疏曰：

“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诵读。古人八岁就傅，即食宿于外，欲离近习，亲正人耳。

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

孝宗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其意见，从而打破了宦官的奸谋。

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年)进礼部尚书。当时词臣中声誉最重者为吴宽，其次为谢迁。但谢迁入阁十年，号称贤相，吴宽却无缘入阁。谢迁多次向首辅刘健推荐吴宽入阁，刘健始终不同意。谢迁引退，举宽自代，也没成功。吴宽虽“阻于仕路，而闻宠若惊，见辱不怒”，处之泰然。七十岁时，多次引疾辞官，被皇帝慰留，后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吴宽一生不喜八股文，他曾自述曰：

“宽年十一，入乡校习科举，业稍长，有知识，窃疑场屋之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笔势拘縻，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一《旧文稿序》)

然而，八股文对他的思想的塑造仍是成功的。他一生恪守孔孟的中庸之道，“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明史·吴宽传》)。遇朝廷大事，他每挺身而出，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去律己处事，见识往往超人一筹。孝肃太后崩，将祔庙，下礼官集议，时廷臣不能决。吴宽独请别官，得到皇帝的赞同。“孝宗之所以为孝，实由吴宽成全之。人臣之功莫大于成就君德，观公之议礼典核，斟酌人情，司马、欧阳亦当拱手避席。”(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这是后人对他所作所为的高度肯定。

吴宽自幼聪颖，于书无所不读，博学多才。为文不事雕琢，自然浑成，外若简淡而意蕴深长。诗则有典则，一洗近世纤新之迹。吴宽还工书法，风格与苏轼相近。

吴宽为官清廉。有田数顷，常用来周济亲朋故旧之中的贫困者。他重义讲情。同年好友贺恩病重，他接至家中给他诊治，晨夕看护。贺恩不幸去世后，吴宽又为他服丧一个月。他这种扶贫济困、救人于危难的精神反映出他得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吴宽虽不喜八股文，但自小即下过苦功钻研，并颇以其八股文为自傲。少年时他“与诸生一再试郡中，偶皆前列，辄自满曰：‘吾足以取科第矣。’”(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一《旧文稿序》)他又熟读《文选》、《史记》、《汉书》及唐宋各大家古文，“研究其立

言之意，修词之法”，在八股文写作中引入了古文笔意，故其八股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俞长城评论吴宽的八股文说：

“每诵吴匏庵稿，春容尔雅，不动声色，文以养胜者。”（转引自《制义丛话》卷之四）

俞长城以其对八股文深入研究之功力，对吴宽八股文特点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吴宽的八股文如其为人淡泊处世一样，简淡自然。

吴宽对儒家经典了然于胸，又领悟很深，所以无论何等难作之题到了他手中，他都能写得题切正旨又自然浑成，表现出很高的驾驭能力。如其《不幸而有宿焉》题文，本是一个极为难写的截搭题。而他以“大贤托疾以辞其君，而因委曲以望其臣焉”二句破题，将题之首尾绾定，恰好如题，表现出对经文高度的把握能力。由于对题从何处起，题从何处止，看得明，划得清，一笔挥写，便使文章波澜万丈，与那些拘泥于截搭题之“吊、渡、挽”者，真有云泥之隔。方苞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义意曲尽，骨脉甚紧，有如柳子厚所称昌黎之文，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者。虽隆、万间之灵雉，天、崇间之划刻，岂能过此。以肤浅直率为先辈者，可爽然自失矣。体制正大，不得题有割截而弃之。”（见方苞《明文钞》三编中该文评语）

《明文钞》的评点中也夸奖该文“自然天成中，巧不可阶，不图化治时有此”。

吴宽天分很高，且于书无所不读，故能将历代古文写作方法融贯于八股文中，春容尔雅，从容写出，不见雕琢痕迹。他的八股文名篇《子在齐闻〈韶〉》一章题文即是明证。

朱熹对《论语》中这节经文的注解说明：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

这个文题，意绪堆叠，只得走马单行。朱熹的注解，依照《史记》，补出“学之”二字，是关键所在。吴宽便从此着意，故话皆实际。题目为三句话组成，吴宽便以三段文章来阐发它。他在起讲处，即直入题之首句。从首句作提，故题前题后，无不涵盖。文章入题目的第二句，实疏证“学之三月”，落出“不知肉味”，这是一篇中最紧要处。文章后以二比发挥题之末句，极得孔子唱叹神情。结束处掉尾转抢首句，显得古宕有法。

全文步骤有法，曲折入情。寄托高远，又绝无浮游之态，虽是八股文，实则像一篇古文。

王巳山评点此文时将吴宽构思此文的用意尽行点出，值得一读：

“《史记》于‘三月’上有‘学之’二字，而朱子采之章句，盖非学则下面两层都渺无根据，徒尔心醉神游，亦复何关理要。文特于闾《韶》下实疏‘学之’，最是先辈读书深谨处。通体古淡而意味盎然，亦缘此会心独远也。”（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吴宽论诗论文，主“气充”、“理直”、“言达而畅”，反对雕琢，主张自然。他推崇唐诗，认为唐诗之所以动人，是“由于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十四《完庵诗集序》）。至于文，则自《史记》、《汉书》而下，至唐、宋及至明初宋濂，均有所取，尤其推崇韩愈、苏轼。他对于八股文有无评论，现未得而知，但他不喜欢八股文的“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曾欲放弃八股文却又不得不写，于是在写作八股文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写诗写古文的方法运用于其中。故其八股文也显现其诗文的特征，理直、气充、言达而畅，不拘守格式，自然浑成、春容尔雅，在明代八股文中独树一帜。

吴宽曾主典文重责。他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主张文章要平正通达，明体达用。这种做法，曾对成化、弘治文风归于正起了挽回作用，故他备受后世八股文坛尊崇，享有崇高地位。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顾清

圣人赞有虞之乐，文备而情亦备焉。

夫乐乃功德之形容也。大舜之乐，有以极情文之备如此，岂复有过之者哉！夫子称而赞之，所感深矣！

且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乐，羲黄以降，作者非一人矣，而舜之《韶》，何其盛乎！

盖其本蕴蓄于升闻绍位之初，而其制大备于治定功成之日。

笙簧琴瑟，有以极音律之和，而闻之者心融。

干戚羽旄，有以备物采之华，而观之者忘倦。

歌九德而间九功，雍雍乎凤鸟之和鸣也，而声孰尚之。

舞九韶而协九奏，跄跄乎百兽之率舞也，而容孰尚之。

谓之尽美，信乎其文之备，而无以复加矣。然其中又有尽善者存焉。

盖其声之美，不止于音律之和也，而咸宁之化，实洋溢于其中。

其容之美，不止乎物采之华也，而至德之光，实交畅于四表。

揄扬咏叹，依稀乎文明濬哲之风，音有尽而意无穷也。

俯仰周旋，想像乎揖逊雍容之状，心悦之而口不能言也。

谓之尽善，则美之中又有实焉，而非徒以其文矣。《韶》之为乐，其盛也一至于此哉！

【评析】顾清及其有“制义之极则”美称的八股文

顾清，字士廉，号东江，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弘治五年壬子

(1492年)科受主考官王鏊的识拔,举乡试第一。弘治六年癸丑(1493年)科受主考官李东阳的赏识,取为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凡在科第者,无不以受知于大贤为荣,顾清乡、会试的老师均为明代著名的阁臣,且都为有名文人,这是十分难得的一种荣耀。

八股文的写作使儒家正统观念在顾清的头脑中深深扎根,他讲求名节,与同科状元毛澄、探花罗钦顺以及汪俊相砥砺,洁已奉公、忠心为国。后升侍读。

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依附者转眼便可得高官厚禄,顾清与毛澄等同年进士对这些人极为鄙视,自己绝不与刘瑾及其同党来往,刘瑾恨之入骨。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刘瑾抓住《大明会典》中的小毛病,贬挫参与纂修的翰林,降顾清为编修,毛澄为侍读。又以诸翰林未谙政事为由,将他们赶出京城,担任地方官或任两京部属,顾清得南京兵部员外郎闲职,他恬淡乐道,不以为意。正好这时他父亲过世,他便丁忧回家守孝。

刘瑾被诛后,顾清召还任侍读,擢侍读学士掌院事,后进礼部右侍郎。这时的礼部尚书是毛澄,顾清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协助毛澄处理好部务,两人配合默契,一心为国效力。

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以征讨为名,帅六师巡边,幸宣府,抵大同,历山西至榆林。顾清屡屡上疏驰谏,请求罢巡幸,建储官,虽冒杀头风险也在所不惜。

正德十二年,顾清参与主持丁丑(1517年)科会试,选拔了舒芬、伦以训、崔桐、汪应轸、季本、张经等一批才学超群的正人君子,师弟渊源,极盛一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八股名家,可谓光前而裕后。顾清乡、会试受知于王鏊、李东阳这样的名师,自己又主持会试,识拔了一大批人才,人生得此一项即足以荣耀一世,何况一人而得兼,顾清在明代科举史上也算是个风云人物了。

顾清学端行谨,恬于进取,被当时人视为君子。他被人所劾,罢归居家,许多人都举荐他起复。后诏举老成堪用担任内阁大臣者,廷推中便有顾清,皇帝便任他担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他见嘉靖皇帝遣锦衣卫千户去扬州勘理争夺私财事务,在那里为非作歹,立即上疏,认为此类事务应付有关法司处理,今后再不得派锦衣

卫旂校去办理案件。嘉靖皇帝见他义正词严，只得应准。这说明顾清至老风骨依旧。

顾清因病屡屡上疏求退。去世后谥文僖。

文如其人，顾清“洁己奉公，恬淡乐道，故其文亦有高峻之风”（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序》），这是清初八股文选家俞长城对顾清八股文的评价。顾清的八股文还注重精神的贯注，一渡一束之作法，使文章萦纤跌宕，在成化、弘治名家中为自出新意者。这些风格在《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题文中得到完整体现。这个文题出自《论语·八佾》，此章全文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朱熹的注释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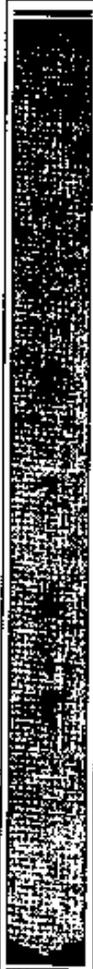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

顾清这篇八股文就根据朱熹的传注，在承题处明确指出“乐乃功德之形容”。然而作者在文中并不直写，不硬代孔子作分疏语，只将功德融化于美、善之中而虚浑还题，使文肖题而注解之义自显于言外，文章也显得浑全高峻。王耘渠说：“后来虽多名文，总未有能融化注义者。东江先生文，体之最初也，而体认精融至此，岂非制义之本旨，固应如是乎？”（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可见此文在明、清两代影响之大。

作者以阐发韶字扣题作起讲，矜贵庄严。前四比实写尽美，句句切舜，股股声容分比，一字不可移易。后四比浑写尽善，末二比更得叹想神情，题蕴尽出。全篇辉映其章，华彩其词，故美善兼尽。

顾清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全章题文，其起讲的领语简当

高浑，总提侧注，滌纤跌宕，在成化、弘治八股文名家中，这是自出新意者。故王耘渠称赞此文说：“正大安详之格，醇古淡泊之音，虽云初体，实制义之极则。”（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一章

◎唐 寅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大贤举先圣之心法，明道统之相承也。

夫圣人身任斯道之寄，则其心自有不能逸矣。由禹以至周公，何莫非是心耶？

孟子举之曰：道必有所托，而后行于世，圣人同其道也；然而天无二道，圣无二心，其忧勤惕厉一也。

尧舜尚矣，自尧舜而下得统者，有禹汤焉，有文武周公焉。

禹则致严于危微之辨，而闲之也切。旨酒则恶之，善言则好之，盖遏流祸于将然，而广忠益以自辅也。

汤则加谨于化理之原，而图之也至。中道则务执之，贤才则广收之，盖建皇极以经世，而集众思以熙绩也。

文之继汤也，则以德业未易全，而其心常操夫不足。民安矣，犹若阽于危也；道盛矣，犹若阻于岸也，盖必欲达于神化之域斯已矣。

武之继文也，则以治忽为可畏，而其心常厚于自防。故虑深隐微，而迩弗敢泄也；明烛无疆，而远弗敢忘也，盖必欲密其周



详之念斯已矣。

迨周公承其后，思欲兼三王以时措，举四事以立法。

故事有戾于时势之殊，必精思以求其通，虽夜而不皇于寐。

理有值夫变通之利，必果行以奏其效，待旦而不安于寝。

夫思之至则其神合，行之勇则其化流，禹汤文武之传，又在周公矣。即是而知数圣人所生之时虽不同，而心则一也。心一故道同，三代之治所以盛欤！

【评析】风流才子唐寅及其方严正洁的八股文

上面这篇八股名文是明代大画家、有名的风流才子唐寅所作。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苏州府吴县（今苏州市）人。

唐寅幼时极为聪颖，童髻即入学中秀才。但长大后，与同里狂生张灵纵酒放怀。祝允明说他“一意望古豪杰，殊不屑事场屋。其父广德贾业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延师教子畏，子畏不得违父旨。广德尝语人：‘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父歿，子畏犹落落。一日，余谓曰：‘子欲成先志，当且事时业。若必从己愿，便可褫襦，烧科策。今徒藉名伴庐，目不接其册子，则取舍奈何？’子畏曰：‘诺，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弗售，一掷之耳。’”（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此后闭户绝交往，也不找研习八股制义的人去研习，只顾埋头独自攻读。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年）科乡试，他中应天府解元。

主考官、洗马梁储非常欣赏他的文章，还朝后给幼有神童之称、才高八斗、中过探花的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也相与叹赏，便招唐寅往还门下。

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年）科会试，程敏政与李东阳同任主考。与唐寅同舍的一个江阴富人徐经贿赂程敏政的家人，得到了试题。考完第二场后，事情泄露，被徐经的仇人参劾于朝，由程敏政牵连到唐寅，被捕下狱，后被罚至浙江藩府为掾吏。唐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唐寅传》）。从此更加风流放达，玩世不恭，民间许多有关他的传说，都起于此时。

唐寅的书画艺术

他远游衡山祝融峰、庐山、天台山、武夷山，观海于东南，放舟于洞庭、鄱阳。他筑室于桃花坞，与客豪饮于其中。“尝缘故去其妻，自伤放废，无所建立，譬诸梧枝履霜，苟延何为？复感激曰：‘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尤侗：《明史拟稿》）

宁王朱宸濠慕其才名，厚帑将他聘入幕中。唐寅看出他有谋反之迹，便装疯使酒，做出种种丑态，宁王不能忍受，便放他回家。其大节凛然如此，可见他虽不喜制义时文，受时代的影响，放纵风流，然自幼既经八股文的训练，儒家正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在他头脑里扎下了根。由此也可见八股文在成熟阶段对士人影响之深，无论何等放任的文士，都逃脱不了。

唐寅对于应世文字与诗歌不甚看重。其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说“后人知我不在此，见我一斑就够了”。其奇气时发，便寄趣于画，下笔便能追及唐、宋的名家大师。来向他求画的人太多，他无论贫富贵贱，来者不拒，但大多未精心构制，只是寄兴而已。

唐寅临事果断，多全大节。王鏊对他知之最深，非常器重他。唐寅终生以师事之，在他面前无丝毫轻佻风流之态。

五十四岁时，唐寅因纵酒过度，伤及身体而逝。

在八股文史上，唐寅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士。他幼读经书，几岁时即能写文章，却不屑于科举时文。他纵酒放怀，诸生或讥笑他。他慨然曰：“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果真他关门用功一年即夺得应天乡试解元。这不能全归之于他的极度聪明，还在于他对八股文确有精深研究与体悟。

据其好友祝允明说，唐寅研习八股制义，有着与他人全然不同的方法。他“不觅时辈讲习，取前所治《毛诗》与所谓《四书》者，翻讨拟议，只求合时义”（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第二年即中乡试第一名。由此可以看出，唐寅非平常文士可比，他深悟八股时文的要害即是“合时义”，若与“时义”不合，则不可能中式，所以他“翻讨拟议”，“只求”与“时义”相合，故“取解首如反掌耳”。

正是由于唐寅深知八股时文要“合时义”的道理，所以他的八

股文“方严正洁，近于老师宿儒”（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序》），无丝毫放逸不羁之气。文务精思，气最峭厉。这种风格，从其《禹恶旨酒》一章题文即可看出。

构成这个题目的经文是讲述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人道统之承继关系的。题目长，文字多，涉及的人物不少，头绪颇为纷繁。唐寅以“大贤举先圣之心法，明道统之相承也”破题，可称得上“方严正洁”，可见他对经文及传注的把握完全切合“时义”，也极为准确精当。全文以破题二句为主题，一层层展开阐发，脉络井然，可见作者构思之精巧。全文炼格、炼意、炼句、炼字，无一不工整精致，可见作者确实做到了“文务精思”。全篇一气贯注，犹如行云流水，显示其道劲高昂之气势。方苞称此文“坚炼道净，一语不溢，题之义蕴毕涵”（见《钦定四书文》该文评语）。王已山评价更高，说此作“至大至精，增减一字不得。风流放达之人，有此卓然可传之作，宜其于大节自凛凛也”。由文论及人，所说无不精确。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王守仁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

夫志士仁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愧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为天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故言此以示之。

若曰：天下之事变无常，而死生之所系甚大，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决，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

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

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

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

是与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彼有所不屑也。

变故之偶值，固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然存非顺事，则吾生以全而吾仁以丧，是悖德之事，而彼有所不为也。

彼之所为者，惟以理欲无并立之机，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贞者，虽至死而靡憾。

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

当国家倾覆之余，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

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辞焉。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亡由之不计矣。

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贻没宁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慑,视之而如归焉。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

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

以存心为主,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覬覦于不死者,又何如哉?

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评析】文武双全的思想家王守仁和他体识高卓、 文质得中的八股时文

这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学者王守仁的一篇八股名文。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因筑室于故乡阳明洞,并在此讲学,世称阳明先生。

王阳明出生在一个八股世家,其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科状元,道德文章,均为世人尊崇。刘瑾专权时,朝中大臣纷纷趋附,王华独不往。刘瑾素慕王华为人,曾二次派人对王华说,他与王华有旧,王华若能去见一面,可立登相位。王华操守坚定,不予理睬。王守仁从小即受父亲道德文章的熏陶,无论人品、八股文风都与其父相近。

王守仁少年时即中举人,学问从此大进。他自小即好兵学,且善射。十五岁时访客居庸、山海关时即出塞观览山川形胜,经月才返。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年)科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西北边境紧张,他上条陈陈述守边八事,颇见军事才干,故调为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1506),刘瑾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抗章援救,刘瑾大怒。他恨王华不肯附己,现在其子又与自己作对,便廷杖四十,将守仁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在万山丛中,极为荒凉,苗瑶杂居,王守仁因俗化导,获得少数民族的好感,相率伐木盖屋给他住。刘瑾被诛除后,几经辗转,方回南京任刑部主事,累升至南京鸿胪寺卿。

当时赣南、福建盗贼蜂起,很不安宁,兵部尚书王琼很器重王守仁,特举荐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雄、赣南。他上任后不久,即扫平了当地的盗贼股匪,表现出王守仁具有很高的用兵制胜才能。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年)六月,奉命去福建平定叛军,行至丰城,宁王朱宸濠反。王守仁当机立断,返兵吉安,起兵征讨,从而赢得时间和主动。此时朱宸濠正围攻安庆,王守仁率兵攻破南昌。宁王返兵自救,两军相遇,经过三场血战,生擒了朱宸濠,为明朝建立了不世之功。然而朝廷中的奸邪之徒先与宁王暗通,怕王守仁见天子揭发其罪,便多方诬陷,想叫武宗相信王守仁会谋反,阻止武宗与王守仁相见。王守仁几经设法,方解武宗疑虑,知其忠心为国,才遣其还镇。“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明史·王守仁传》)

世宗皇帝即位后,召王守仁入朝,论功行赏,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但诸同事有功者,除个别人外,不但不升迁,反而暗中降职。王守仁气愤已极,上疏辞爵,请记录诸臣的功劳,但未获准。这时王华去世,王守仁便丁忧回家,服丧期满,也不召复。

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思恩、田州土酋反叛,原总督不能平定,方才诏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征讨。等到叛乱平定时,以归师袭八寨,扫平断藤峡的盗贼。而忌妒者诬王守仁讨平叛逆,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这时王守仁已病重,上疏请求退归,未等上命即返。行至南安,病卒,时年五十七岁。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

陷害者却奏王守仁擅离职守,世宗大怒,追夺王守仁的伯爵。隆庆初年,廷臣多称颂王守仁的功劳,皇帝方才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

王守仁以直节著称于世，且以书生屡屡带兵平息叛乱，清扫盗贼，“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明史·王守仁传》）。

王守仁又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天姿异敏，十七岁时，谒上饶娄谅，与之讨论朱子格物大旨。回家后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后筑室阳明洞中探求学问，数年无所得。谪居龙场驿后，因穷荒无书，日思旧闻，忽悟出格物致知之理：当自求于心，不当求诸事物。他认为“道在是矣”，便笃信奉行。他大开讲席，专授“致良知”，说宋朝周、程二子之后，惟陆九渊简易直捷，能承接孟子之传。而朱熹的《四书集注》之类，是中年未定之说，不足征信。明代学术，陈献章开其端，至王守仁方才大明。因为过去只是熟读先儒的成说，没有反身理会，推见其隐，只是这也称述朱熹之言，那也称述朱熹的话，全无自己主见。自王守仁指出良知之后，人人都能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都有成为圣贤之路。王守仁承继了古之学脉，使之不致断绝，所以学者翕然从之，形成了阳明之学，“衍于正、嘉而盛于隆、万”。（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

然而，王阳明的制义时文却未渗入其“致良知”之思想，因为“时文必宗考亭，考亭正宗也”（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序》）。他的八股时文恪守传注，谨严法度，阳儒阴释之语从未在文中出现，而以醇茂著称于世。其名作《志士仁人》一章题文，即显现出这些特点。

这篇八股文阐释志士仁人为国之忘我献身精神，批判“偷生者”之苟且。文章对志士精神把握得准，对仁人行为掌握得熟，故写来各尽分量，文中或分或合，或互处，处处变化有法。文章通过“偷生者”在国家危难之际“避难求全”、“侥幸而图存”与志士仁人在国有祸患时“捐躯赴难”、“灭身而无悔”的强烈对比，对志士仁人的高尚品质给予了热情的赞颂，其中所体现的，全是儒家的正统观念，立意正大，思想纯正，气势苍劲，文字俊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由于作者就是志士仁人型的人物，无论是刘瑾当权也好，宁王叛乱也好，盗贼蜂起也好，在国遇危难之时，他都能不顾个人生

王守仁

死，挺身而出，文章中所写的志士仁人其实就是他自己精神行为的写照。故文章体识高卓，“气盛辞坚”，“有豪杰气象”，充满了激情和正气，读后令人想见作者的世功和品格，理解其“知行合一”的学说，也开正德、嘉靖时盛行这种写作方法的门径。

从骨子里说，王守仁是个坚定的儒家正统观念的承继者，即便是创立良知学说，受到后世诟病，但求其初意，原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封建统治。他的这种理念，也深深地渗入了八股文中。他的八股文无论是内容或形式，无不恪遵雅正的传统，不肯移易，是标准的成化、弘治时文。他恪遵传注，阐发微言大义，代圣贤立言，而不参入良知学说。其体式无不采用标准格式，以求将题旨阐发无遗。这篇时文破题、承题中规中矩。起讲提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及“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二项，已逼醒“有”、“无”二字。此后用八股阐释题旨。提二股讲无求生句，以志士仁人分说。中二比接入有杀身句，虚浑笼起，将志士仁人合发。后二比实发有杀身句，以志士仁人分说。后二小比咏叹杀身句，将志士仁人互说，股末仍回顾无求生句，的是一节题之作法。通篇文章作法高妙，对志士仁人不分低昂，而两等人的身份各得。通过或分，或合，或互说，处处变化有法。至无求生句，轻发二比，接入下句，重发六比，入后仍回带上句，也是用种种合法，故后世八股文学者发出“于此服前辈文律之细”的感叹，表示对王氏时文的敬服。



子哱不得与人燕 二句

◎王守仁

子哱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哱。

今夫为天守器者，君也；为君守侯度者，臣也。

名义至重，僭差云乎哉。

故燕非子哱之燕，天子之燕也，召公之燕也。

象贤而世守之，以承燕祀，以扬休命，子哱责也，举哱而授之人，此何理哉？

恪恭而终臣之，以竭忠荃，以谨无将，子之分也，利燕而袭其位，罪亦甚矣。

尧、舜之传贤，利民之大者也，哱非尧、舜，安得而盗其名？

舜、禹之受禅，天人之从之也，之非舜、禹，安得而袭其位？

夫君子之于天下，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况授受之大乎？

于义或有所乖，虽一介不以与人也，况神器之重夫？

夫以燕之君臣而各负难绾之罪如此，有王者起，当伐之矣。

【评析】善于演绎推理的王守仁八股文

王守仁所作其他八股文大多与此文一样，是其人格精神的写照，读其《子哱不得与人燕》二句题文，可见其擒朱宸濠的手段，其文如法吏断狱，愈转愈严，也可见王守仁为人之精明，目光

之锐利，才干之超群。

这篇八股文与《志士仁人》一节题文一样，内容纯正，充满凛然正气，也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外化。读王守仁的八股文，应与他的为人相链接，这样才能读懂它，理解它。

这篇时文的文题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原文讲的是齐国大臣沈同问孟子燕国是否可伐，孟子回答说：“可，子哿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哿。”当时燕国的君主子哿将国家让给他的相子之，引起国内大乱。所以沈同问孟子可不可以讨伐燕国，孟子认为可以，因为燕国君臣将国家私相授受违背了传统的礼制。

《孟子集注》对这段话的注释为：

“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传之先君，私以与人，则与者受者皆有罪也。”

只要将王守仁的这篇文章与其题所在经文及传注进行比对，即可看出，王守仁基本上是遵循儒家正统思想来阐发行文的。他的文章都明体达用，思想雅正，文质得中，显现出一个思想家的风范。

王守仁的八股时文又严守八股体式，此文从破题起，至大结止，无一个基本构件不具备，虽因题而省去束二小股，却仍算得上是一篇标准的八股文。

此文最明显的亮点在于法备气雄。从文章结构来看，其逻辑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具有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三段式的特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的学者便认为八股文是中国的逻辑学，此说不无道理，因为八股文大都是论述式的，而演绎推理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模式，在写作中有意或下意识地使用它，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王守仁此文逻辑性之所以强，便在于作为杰出哲学家的他，具有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三段式的思维方式。由于文章逻辑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加上王守仁本人就具有很强的论辩能力，故此文气势排宕，笔力横绝，动人心弦，并包孕隆庆、万历名家结构之巧密。方苞对此评价很高，说此文“深得古文驳议之法，锋锷凌厉，极肖孟子语气”（见《明文钞》该文评语）。



管仲相桓公 四句

◎李梦阳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

圣人称大夫佐霸之功，被天下而及后世也。

甚矣，春秋不可无管仲也，匡一时而后之人且利赖焉，得非仁者之功乎？此夫子所以录其功也。

想其晓子贡之意，盖曰：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难。子疑仲之相桓为未仁也，抑熟知管仲以其君霸，而其所成者大乎？管仲之于齐也，被鲍叔之荐，而膺仲父之宠，夫固桓公之相也。齐居东海之国，未尝主盟于中夏，桓公得其国而君之，亦未敢必其称雄于列辟也；惟得管仲以为之相，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而人心景从，遂为诸侯之宗长焉。

一举葵丘，而臣不敢奸君，当其时，知有共主，而天下之大纲不至于陵夷者，仲任之也。

再盟召陵，而夷不敢谋夏，当其时，知有上国，而天下之大防不至于颠越者，仲匡之也。

然岂特终于仲之身而已哉？盖自其身没以来，勋名垂于奕世，于今尊奖之，而冠履之，然犹昭然耳目之公焉，其雄风之所贻者，诚未易斩矣。

声施沼于列国，于今翊戴之，而兵车之强，犹赫然会盟之间焉，其余威之所振者，诚未易熄矣。

夫以仲之功而人受其赐于不穷。迄今江汉之上，慨最盛之遗事，而颂管仲之功不衰。吾方幸齐桓得一相而天下定焉，后世赖焉，又安得以其相为疑也哉？信乎，管仲虽无仁人之德，而实有仁人之功。赐也，何可以过訾之也？

【评析】复古派文学健将李梦阳和他朴老 古淡之时文

李梦阳是成、弘时的八股文名家，是一个讲气节的人，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前七子的领袖。上面选录的《管仲相桓公》四句题文即是他的力作。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今属甘肃）人。家世寒微，祖父由“小贾”而发财。父亲则是个儒生，曾任周王府的教授，李梦阳自小即受到父亲的八股文写作教育。

弘治六年癸丑（1493年）科李梦阳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即考中进士。他恪守由八股文培育起来的儒家正统理念，为官清正刚直，敢于与不法的权贵、皇戚作对，虽屡屡被陷下狱，差点被杀头，也九死而不悔。任户部郎中时，“榷关，格势要，构下狱”（《明史·李梦阳传》）。后又“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其中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被张鹤龄构陷入锦衣卫狱，差点送了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鹤龄，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的两颗牙齿。由此可见李梦阳性格的刚烈和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的节操。

武宗时，代尚书韩文属草弹劾宦官刘瑾，遭祸下狱几死，以气节名世。刘瑾被诛后，李梦阳起复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他又为维护诸生的利益与尊严而得罪权贵，致被人构陷入狱。有万多诸生自发为其讼冤。李梦阳终被罢官归家闲住。

李梦阳归家闲住后，更负气放纵不羁，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朱宸濠谋反被诛，李梦阳因替他撰写过《阳春书院记》而被捕入狱。大学士杨廷和等力救，被削籍。不久即去世。

李梦阳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与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

并称为四大家,世人无不争效其体。他鄙视一切,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李东阳的茶陵诗派及台阁体,推崇民间真情流露、天然活泼的歌谣。虽然李梦阳力主的文学复古运动,意欲通过接续古代文学传统的轨道,寻回被程式化了的八股文所破坏了的生活情趣,从思想上隔断与理学的联系,然而从其追求“法”或“法式”来看,受八股文的影响仍然很深。他在与何景明论文时说:“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未必细,一实者必一虚。”(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再与何氏书》)这些写作方法虽称是古法,实际上即是成化、弘治时已经广泛使用的八股文技法。由此可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虽然有人表示不愿“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文徵明:《上守谿先生书》),然而八股文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渗入到了士人们的骨髓之中,要想彻底摆脱是不可能的。所以李梦阳虽力主文学复古,但仍成为八股文名家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李梦阳的八股文,以峭洁著称于世,这是他刚正个性的一种外化。我们从其代表作《管仲相桓公》四句题文中即可看出这种风格。

此文之文题出自《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欤?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题目用后四句,这是孔子答其弟子子贡的话。子贡认为管仲曾追随公子纠,齐桓公为了与公子纠争位而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仅不殉公子纠,反而做了齐桓公的相国,被尊称为“仲父”,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天下,成为春秋时的第一霸主,这是不仁者之所为。孔子却从管仲有功于国家、百姓对管仲作了肯定。李梦阳的这篇文章,就是恪遵孔子的言论来阐释题文中的微言大义的。

作者以犀利简洁的文字,一气排戛,在一匡句二比及于今句二比中,将管仲之功阐述无遗,笔力老峻,非常人可比。

作者作文最重视作法,于八股文也不例外。此文朴老古淡,运用了多种写作方法却又自然无迹。文章顿挫排宕,纯以神行。转折顿挫,纯以力胜。如在起讲部分,以“齐居东海之国,未尝主盟于中

夏，桓公得其国而君之，亦未敢必其称雄于列辟也”几句文字作题前顿挫，以为下文宣示管仲之功造势，用的是作势法。继又以“惟得管仲以为之相，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而人心景从”几句再醒一笔，使文势振耸。如此之类的篇法、句法，在文中多有运用，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

此文“入口气”代孔子立言也很见功力，从起讲开始到文章收束，都以孔子口吻行文，既切合孔子的身份、教养、性格，又言其所未言，可见作者对儒家经典是烂熟于胸，已融会贯通了。

王耘渠说：“此制义极胜之则，法如守溪、荆川，才如大力、陶庵，俱被牢笼。”（见《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此言绝非过誉。



子莫执中 一节

◎唐顺之

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时人欲矫异端之偏，而不知其自陷于偏也！

盖不偏之谓中，而用中者权也。

子莫欲矫杨墨之偏而不知权焉，则亦一偏而已！此孟子斥其弊以立吾道之准也。

且夫吾道理一而分殊，而为我之与兼爱，固皆去道甚远者也。吾道以一而贯万，而执其为我与执其兼爱者，固皆执一而不通者也。

于是有子莫者，知夫杨墨之弊，而参之于杨墨之间，以求执乎其中焉。盖曰：其子子然以绝物如杨子者，吾不忍为也，但不至于兼爱而已矣。其煦煦然以徇物如墨子者，吾不暇为也，但不至于为我而已矣。自其不为为我也，疑于逃杨而归仁。自其不为兼爱也，疑于逃墨而归义。子莫之于道，似为近也；然不知随时从道之谓权，以权应物之谓中；而杨墨之间，非所以求中也！

徒知夫绝物之不可，而不知称物以平施，则为我固不为也，而吾道之独善其身者，彼亦以为近于为我而莫之敢为矣！

徒知夫徇物之不可，而不能因物以付物，则兼爱固不为也，而吾道之兼善天下者，彼亦以为近于兼爱而莫之肯为矣！

虽曰将以逃杨也；然杨子有见于我，无见于人；而子莫有见于

固,无见于通;要之均为一曲之学而已!知周万变者果如是乎!

虽曰将以逃墨也;然墨子有见于人,无见于我;而子莫有见于迹,无见于化;要之均为一隅之蔽而已!泛应不穷者果如是乎!

夫为我,一也;兼爱,一也;故杨墨之为执一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无权,则中亦一也。故子莫之为执一难知也。非孟子辞而辟之,则人鲜不以子莫为能通乎道者矣!

【评析】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山祖师唐顺之及其 坚毅浑厚的八股文

以古文为时文,是明代嘉靖年间声势最为显赫的八股文流派,其开山祖师当属唐顺之。在八股时文中融入古文的写法,这在成化、弘治时已有人为之,但未成气候。至嘉靖初年,唐顺之将古文写作之理念、技法全面引入八股时文,使八股时文面目为之一新,方才为八股时文界所广泛接受,并形成一大流派。

在明代文坛,唐顺之可称之为名家,他既擅长古文写作,为“唐宋派”的主脑人物,又精研八股时文,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创者。更叫人称羡的是,他不仅是文坛健将,下笔千言,文不加点,还通算学,富韬略,善长用兵,曾统兵平剿过倭寇,属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武全才。

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江苏武进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曾为户科给事中,父亲唐宝,曾任湖广永州知府,颇有政声,遗爱一方。

唐顺之“生有异禀,稍长,洽贯群籍”(《明史·唐顺之传》),并潜心于八股时文写作,受到儒家经典的浸染。二十三岁时,便举嘉靖八年乙丑(1529年)科会试第一,改庶吉士。

其座主张璁为嘉靖权臣,在大议时因坚决支持世宗而深受世宗倚重。此时他将思想僵化保守的翰林院庶吉士全部赶出翰林院改任六部部曹,“独欲留顺之”(《明史·唐顺之传》),可见唐顺之的才学与人品都是受到张璁赏识的。但唐顺之受儒家正统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很深,把张璁等人支持世宗立其生父为皇考的行为视为

违背了程朱理学,因而不愿与张璁为伍,尽管他是张璁的门生弟子,他也不领老师之情,乃调兵部任主事。后因病告归,复官后调任吏部主事。

后诏选朝官为翰林,唐顺之改任翰林院编修,担任历朝皇帝实录的校对,校改工作将结束时,又因病欲告归。张璁不愿他退归林下,便将其上疏久压不发。有人去进谗言,说唐顺之为告病,实则欲疏远张璁。张璁闻言大怒,拟旨以吏部主事将他罢归,并永不复用。至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因要为东宫太子选僚属,才起用他以原官兼春坊右司谏。不久又因“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归”(《明史·唐顺之传》)。

此时正是人欲横流之时,满脑子儒家正统观念的唐顺之却卜居阳羨山中,读书十八年。

在这段潜居山间读书的日子里,朝野人士都没忘记他,不少人接连举荐,但都没有结果。直至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年),倭寇袭扰大江南北,抢掠烧杀,民不聊生,侍郎赵文华被派出京视师,上疏推荐唐顺之,唐顺之方才被恩准起用,任南京兵部主事。但因其父丧期未满,没有出山。等到服除,召为兵部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出核薊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因条上便宜九事”(《明史·唐顺之传》),事事皆切中时弊,显示唐顺之具有很强的军事才干。

不久,他被派至南京、浙江一带督师,协助总督胡宗宪围剿倭寇。唐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明史·唐顺之传》)。他亲自率兵下海,从江阴抵达蛟门的大洋之中,一昼夜行六七百里,随从者皆惊恐呕吐不已,唐顺之却破风斩浪,意气自如。

倭寇停泊在崇门、三沙。唐顺之“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明史·唐顺之传》)。论功行赏,唐顺之升太仆寺少卿。胡宗宪上疏言唐顺之权轻,又加右通政。

后唐顺之闻倭寇进犯江北,急忙调兵遣将,在姚家荡大破贼兵。倭寇退至巢湾据守。唐顺之带兵追杀,并以火炮轰击其营,没有奏效。这时倭寇又进攻三沙,唐顺之急率兵驰援,督兵进攻,又

失利。唐顺之气愤异常，便亲自出马布阵。但倭寇见唐顺之军容整齐，便坚壁不出。手下人请求退师，唐顺之不准，自己持刀直前，离倭寇军营仅百步之遥。其手下的总兵、副总兵怕再次失利，坚决要求唐顺之还营。唐顺之在海船上住了两个多月，这时正逢盛暑，人也生了病，便返回太仓。不久，唐顺之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是时，唐顺之的蛊胀旧病已经很严重了，因为兵事紧急，故不敢辞。淮、扬一带大饥，唐顺之便条陈海防善后事九件。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年)汛期至，正是倭寇蠢动之时，唐顺之“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讣闻，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赐祭，顺之以劳得赐葬云”(《明史·唐顺之传》)。

唐顺之博学多才，“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明史·唐顺之传》)。

然而，最受世人称道的，还是他的古文写作。《明史》中称他“沈洋纤折有大家风”。他与王慎中、陈束、李开先、赵时春等号称“嘉靖八才子”。当时文坛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为首的“秦汉派”盛行，主张为“文以秦汉”为模式，滞古不化。唐顺之受风气影响，亦“始尊秦汉”，效法李梦阳。及遇王慎中，受他影响，尽变旧说，共同倡导学习唐、宋古文，力矫李、何之弊，形成了“唐宋派”，并与王慎中同为其领袖人物。两派同是师古，但“秦汉派”只是学习古代的词汇、句法，取貌遗神。而“唐宋派”则学习古文的写作方法，学得较为灵活，所以“唐宋派”的文字较为委婉畅顺。不过，唐顺之名义上是唐、宋并尊，实际上独宗宋学。他“生平苦节自励”(《明史·唐顺之传》)，尊奉的都是儒家正统学说，所谓宗宋，说到底就是宗奉宋代的理学。他说：他“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与王遵岩参政》)。唐顺之真正推崇的，是宋代的理学而不是文学，因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便在宋人中间，文学气味也是最为淡薄，而道学之气却是浓郁难化的。所以唐顺之虽在评说诗文，其评价的标准却是道学。

唐顺之论文,都是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重弹宋儒以来“文道合一”的老调,叫嚷“文与道非二也”(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六《寄黄士尚》),从根本上认为文学本身是有害于道的东西而加以贬斥,如他曾说诗文是“枝叶无用之词”(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与蔡白石郎中》),其黜文的目的是崇道,故他又说,“程朱诸先生之书”“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六《与王尧衢书》)。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唐顺之才会以古文为时文,即以古文的写作理念与方法来改善时文,使这个最好的载道工具更具活力。

嘉靖年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封建伦理道德陷入深刻危机。在封建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却又无法变革的环境中,一部分士大夫颓唐放纵,以风流自命,行为每出于礼法之外,造就一代求新尚奇的情趣。一部分士人则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要求进行变革。而另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真正崇奉儒家学说之人则希图去弊起衰,挽狂澜于既倒。唐顺之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他还宗尚王阳明心学,“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明史·唐顺之传》)。他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主要表现一是削平倭寇,使天下归于久安,其次便是以古文为时文,改变八股文的面貌,使之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更好地担当起载道的重任。

受时代的影响和八股文自身弊端的制约,至嘉靖初期以后,八股文的衰败之相已经显露,特别是它作为承载程朱理学之道的工具,更受到一些要求变革者的质疑。程朱理学本来是一种脱离人们生活实践,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的理论体系,充满着虚伪的道德说教。这样的理论一旦成为士人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其虚伪的本质就更加暴露无遗。但若改变了八股文用以灌输程朱理学的功能,则八股文就会名存实亡,进而会危及明朝政权的巩固。故以天下为己任的唐顺之在“惊叹天下事鱼烂极矣”(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六《与胡柏泉参政》)之余,决心要做“真正英雄”,拯救时局。大约在他宦游京师,与王慎中相交之后,四十岁之前便在思考、从事以古文为时文来挽救八股时文命运之事了。从他与

蔡可泉的一封信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这段心路历程：

“兄书中有‘发明性真，开示来学’之说，仆又非其人也。且所以发性真而示来学，固绝不在言语文字间，行已多缺而强饰之于言语文字，此性真所以益凿，而先辈之所以误后学而昧其目者也。仆自三十时，读程氏书有云：自古学文，鲜有能至于道者。心一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则已愕然有省，欲自割而未能。年近四十，觉身心之卤莽，而精力之日短，则慨然自悔，捐书烧笔，于静坐中求之，稍稍见古人途辙可循处，庶几补过桑榆，不尽枉过。”（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蔡可泉》）

唐顺之是个坚定的道学派，既然在他四十岁之时已明白文学鲜能“至于道”，他便转而接受王阳明心学，“捐书烧笔，于静坐中求之”了，所以只有在此之前，才能致力于挽救八股文这个专门用以载道的工具。将古文的写作理念和方法输入八股文以增强其活力，使之更有效地为载输程朱理学服务，这也成为他救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康济斯世者康济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段用之惩忿窒欲，克己复礼之间，此古之所谓真正英雄也。”（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六《与胡柏泉参政》）唐顺之便是要做个“真正英雄”，以拯救八股文来拯救时局。

唐顺之是以古文为时文的首创者，由于他既精通古文，又是八股时文的写作高手，熟知两者之利弊，能融两者之所长。故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即是在不改变八股文的文体格式及代圣贤立言的根本宗旨下，引进古文的写作理念与方法，拓宽准入八股文的内容，融经液史，使八股文的内容及话语权为程朱理学所独占的状况有所改变，使八股文由“一宗朱氏为功令”（何乔远《儒林传》）变而为“学者多肆其胸臆”（黄佐《翰林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程朱理学对作者的束缚，改变了自永乐后期以来拒绝其他思想、语言、写作方法进入八股文的封闭状况所带来的语言呆板，思想陈旧，面目僵滞的状况，使八股时文的面貌为之一新。所以乾隆时高梅亭说“明文以正嘉为极盛。前则沕穆初开，后则雕琢日盛。此于发越充满之中存浑朴敦庞之气”。方苞也指出：正德、嘉

靖时的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意蕴隐显曲畅，是为明文之极盛时期。

唐顺之是个坚定的道学派，他写作八股文首先着眼的是如何把握并深入揭示经文与程朱传注的真谛，故他十分重视相题、认题、如题、依题作文。他对题之宾主轻重，前按后断的关系把握得十分准确，所以下笔即能切题。如《昔者太王居邠》合下二节题文，属对之巧，制局之奇，细细琢磨，确实不可移易，恰到好处，之所以能达此水平是他对题之主宾轻重的天然部位有准确把握之所致。题本分前断后按，文便前整后疏，且笔力圆劲，故读之可开拓心胸。

唐顺之作八股文时，总要先仔细认题，并把古文处理文题的方法运用于时文相题，从而将题中应有的意义一一搜剔而出。认题既真，故纵笔所及，无不合节。虽未尝务为新奇，其拾掇题目，皆本古文法脉，所以别人自不能比。

唐顺之善于依题立格，其《牛山之木尝美矣》二节题文便是这样，该文融题入化，裁对处融炼自然，有行云流水之趣。

唐顺之对欧阳修、曾巩的古文研究很深，对他们的作法运用纯熟，在作八股时文时能自然地将古文作法融入而不露痕迹，使时文增色不少。所以他有资格也有能力在时文界力倡手眼别出，我行我法，以古文为时文，于熟圆出苍坚。他的出自《孟子》的《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一节题文是明代八股文中之名作，体现了他我行我法，以古文为时文的特点。

唐顺之的八股文师宗王鏊而又自成一格。此文认题真，将题中蕴含的意义一一认明白，虽未尝务为高奇，而其文内坚凝而外浑厚，如一笔书成，曲折相生，反正相顾，平舒叠幻，如山川之出云，达到古文中之老境，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唐顺之精于制义时文，他曾作诗云：“文入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这是他自道其所得。熟极生巧，唐顺之有极巧之文，其实不过是极熟。如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两节题文，叠下两比喻，一反一正，文气流走不齐。唐顺之在制作两扇时，使之齐中有两语递过。通篇读来，又只似流水不齐文法，这便是所谓的熟能生

巧。两扇中作一纽遥对，便自唐顺之开始。其文为：

且夫两物相形而高下异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尝不兼本末而较之也。故寸木之与岑楼，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复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齐，是寸木固可使之高于岑楼矣。

今论礼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礼食亲迎而已；论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饥死与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于礼矣。任人之说，似亦无足怪者。

虽然，此特自其一偏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两物相形轻重异焉，所以辨其轻重者，未尝不等其轻重而较之也。故金之与羽，其轻重易知也。今以钩金之寡，而较一与羽之多，而谓足以概金羽之轻重也，岂理也哉？

今论理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礼食亲迎而已；论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饥死与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谓足以较礼与食之轻重，又岂理也哉？任人之论，其不可也，明矣。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六句

◎唐顺之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大夫之心裕而公，忠于谋者也。

夫裕则齐得失，公则平物我，而子文可以为忠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张之意若曰：今夫天下之人，谋其身也过周，而谋其国也过略。夫惟其过周也，则少不如意者，未尝不为戚焉；夫惟其过略也，则苟无预于己者，未尝屑为之谋焉。此无怪乎幸进之多，而善治之寡也。

子文曾有是乎？

方其三仕为令尹，继而三已之也，吾知满其欲得之志，不能不喜于利见之初；而拂其患失之心，不能不愠于播弃之后。况夫勉于其暂，不能勉于其久者，人之情也。矫于其顺，而不能安于其逆者，理之常也。子文则谓穷达命而已矣，贵贱时而已矣。运之所隆，则其仕我者，其道亨也，不色喜也；势之所去，则其已我者，其道穷也，不色愠也。安其常，而不摇于身外之感；顺其适，而不迁于事变之交。其有已也，犹其在夫仕也；其在三也，犹其在夫初也。我于是知其心之裕矣。

及其将去，而新令尹以代也，吾知忌心生于新故之变，则必幸其败事以形吾之善；愠心起于去位之日，则必不谋其政而任其人

之为。况夫功成者退，则旧政虽善，未必其我德也；责有所归，则新政虽不善，亦未必其我咎也。子文则知有国而已矣，知有君而已矣。惧其未识乎治体也，而孰所当因，孰所当革，尽其说而道之焉。惧其未识乎民宜也，而孰为便民，孰为不便于民，举其国而听之焉。大其心，而不计其形迹之嫌；忘其私，而求善夫身后之治。使其政之行于我者，犹其得行于彼也；而政之行于彼者，犹其得行于我也。吾于是而知其心之公矣。

吁！子文其春秋之良哉。

【评析】善于融经液史的唐顺之八股文

从源流上说，唐顺之的八股文师承王鏊。由于唐顺之对古文和八股文皆有精深之揣摩，作法极为纯熟，故能神明王鏊之矩矱以自出变化。大抵制义时文，体气至王鏊而正，规模至唐顺之乃大，因他善于将时文作法与古文相融合。唐顺之作八股文，除师承王鏊外，尚转益多师，尤其注重从《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古文中汲取营养，学其聚势炼气，学其写作技巧，故其文纵放如苏东坡，拗峭似王安石，放而能收，散而能敛，一开一合，汪洋曲折。如其名作《三仕为令尹》六句题文即可看出这些特点。

此文用的是两扇作一纽遥对的方法，以上下两大股来阐释文题。全文以文臣立论，身国对勘，反正相形，全是古文笔法，而令尹子文的精神风貌已全现。但用的仍是题中子张发问时的口吻，于题位分寸不溢。文中出股从修身养性方面着眼，赞扬子文在穷达、贵贱面前所持的态度。对股则歌颂了子文在国事上的公而忘私。作者用子文三仕三已之史事，宣扬儒家的为臣要忠与仁的观点。文中两大股句法大体相似，字数大体相等，有化比偶为散句的倾向，这也是引入古文笔法的结果。方苞在评价唐顺之的八股文时说：“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见《钦定正嘉四书文》该文之方苞评点）并指出这是因为他“一深透于史事，一兼达于经义也”（见《钦定正嘉四书文》该文之方苞评点）。从这篇文章来看，这些特点都有较为鲜明的体现。



武王纘太王 二节

◎唐顺之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中庸》详二圣之事，有得征伐之时者，有得制作之时者。

盖道以得时为中也，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一以时而已矣。

夫岂无忌惮者哉。《中庸》引孔子之言，明费隐之义至此谓也。夫武王、周公之作也，以事观之，则为非常之变，以道观之，则为庸行之常。

何则？征伐，天子之大柄也。然武王之时，殷且亡，周且昌，使区区守此，则三后之业，自我而隳；万方之罪，自我而任。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从事于征伐焉。载旆秉钺，而天讨以行；吊民伐罪，而独夫以诛；应天顺人，而显名以遂。是上帝宠之，使尊惟一人而右序莫加，富有四海而万物毕献。有商之命已革也，皇天眷之，使享有七庙，而宗祧绵长；祚垂百世，而本支盘固，祚周之命已成也。是则武王之征伐以时，如此岂非《中庸》之道乎？

制作，天子之大权也。然周公之时，武王崩，成王幼，使区区守此，则二后之德，自我而斩；一代之治，自我而陋。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有所事于制作焉。追王之礼，及于古公；上祀之礼，及于后稷；义起之礼，及于天下。以为从死而不从生，夏商葬祭之礼未善

也。必其丧从死者，祭从生者，使父葬于子，不论子爵而论父；子祭其父，不论父爵而论子，则礼无或僭，而情无不通矣。降亲而不降贵，夏商丧服之礼未善也，必其亲不敌贵，贵不敌亲。使期年之丧，自庶人而达于大夫；三年之丧，自庶人而达乎天子，则贵有降杀，而贱不加隆矣。是则周公之制作以时，如此独非《中庸》之道乎？

吁！因时之可为而大有所为，此武周所以同一道欤？

【评析】化比偶为单行，有散文文化倾向的 荆川八股文

正如唐顺之的古文对清代桐城派有很大影响一样，他的八股文对后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末的八股文大师艾南英对唐顺之就十分推崇，他曾说唐顺之的《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二节题文最脍炙人口，这便是上录之文。

这个文题属于所谓的正大光明之类的大题，在唐顺之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写过，如永乐年间的杨慈即以此题所作之八股文而鸣世，再写很难出新意。唐顺之因博学多识，又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对经史均能融贯，且能在相题上下工夫，此题虽称难作，他却能挥洒自如，游刃有馀。他抓住“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做文章，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全文才思豪荡，气魄磊落，在明代八股文中别树一格。因其相题真切，故纵笔所致，无不合节。文中采用古文法脉，如以两大股来阐释题旨，前股讲武王征伐，后股释周公制作。而每股不强求对偶，有散文化的趋势。这是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贯彻其化比偶为单行的理念所致。文中“运以坚劲之骨，雄锐之气，读之可开拓心胸，增长知识”（见《钦定正嘉四书文》中方苞该文评语）。且放而能收，散而能敛，开合中出神明。

由于唐顺之尊崇程朱理学，故他对八股文这个载道的工具十分重视。在他未中进士之前，他当然会尽全部心力去钻研八股文，如在教学里中时便写有“教学文”。中了进士之后，一般人便会把它当作敲门砖而丢弃，他却仍在不停地写作，在吏部时有“吏部文”，为中丞时有“中丞文”，至老不倦，故其八股文写得好，得以流

传也是必然之事了。他在中进士时，年纪很轻，“主司见其文坚老，疑为宿儒”（见《制义丛话》卷之五），可见他天分很高，年轻时即对八股文有精深之研究，写出的文章非同寻常。

因唐顺之的八股文写得好，后世常把他与王鏊、钱福、瞿景淳并称时文四大家。归有光成名之后，又去掉瞿景淳，加入归有光，号称“王、钱、唐、归”四大家。八股文名家茅坤最推崇唐顺之，认为他的八股文在明代当数第一。不过也有不少八股文名家认为唐顺之不如归有光，因唐顺之的八股文虽冲淡纯粹却骨力稍松，气势稍薄；归有光则精理浩气，古厚雄博，高不可攀。这种看法当然有其道理。但唐顺之的八股文“兼利初学，归则专资成材。如二公之先后辉映，颀颀上下，盖均足笼罩百家，奉为不祧之祖焉”（《明文钞》三编，双桐书屋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茅 坤

圣人饮于乡而必严夫老老之节焉。

盖乡党莫如齿也，圣人侍饮于杖者之侧，而必时其出以为节焉，斯其所以尊高年也乎！

且夫乡人之饮酒，所以合比闾族党之众，而为岁时宴飧之会者也。时则乡人之所贵也以年，而礼之所先也以让。其有杖而饮者，一乡之人所共父事之，而不敢以筋力之礼相施报者也；则亦一乡之人所共齿尊之，而不敢以聚散之常相后先也。

杖者未出，而我或先之，君子以为亢矣。

杖者既出，而我或后之，君子以为命矣。

唯孔子则不然，不敢群少长相为宴言而已也，必也周旋于俎豆之间，时其起居而不离。

亦不敢唯酒食相为征逐而已也，必也俯仰于几席之际，时其动静而不违。

方杖者之献酬为欢而未出也，惟见其与之伛偻也，与之左右也，为酒无算，益不敢乘之以跛倚之私，而孑然而先矣。

及长者之宴卒成礼而既出也，惟见其与之盘辟也，与之携持也，举足不忘，亦不敢任之以流湔之情，而蹢然而后矣。

始之旅而进也，固曰：长者位上，少者位下，所以习齿让于始也。

继之旅而退也，亦曰：长者在后，少者在前，所以谨齿让于终也。

要之其侍食也，曰：父党在则礼然，而不敢不敬共矣；其辞而去也，亦曰：父党在则礼然，而不敢不肩随矣。吁！圣人之尊高年也如此夫！

【评析】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家茅坤与其 古雅温醇的八股文

茅坤在明代八股文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他是以古文为时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是八股文名家,还在于他曾对八股文的写作有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留下了不少的论述,对后世八股文的写作有较大影响。

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年)科进士。曾任过青阳、丹徒两县的知县。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回家。服除,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明史·茅坤传》)。以后累升至广西兵备僉事,辖府江道。

茅坤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既在文坛上有建树,又能统兵作战、立有战功的文人。他平时即喜欢钻研军事,雅好谈兵。在广西任上,正遭瑶民起事,“据鬼子诸寨,杀阳朔令,朝议大征”(《明史·茅坤传》)。总督以此事问茅坤,茅坤却说:“大征非兵十万不可,餉称之,今猝不能集,而贼已据险为备。计莫若雕剿。倏入歼其魁,他部必袭,谋自全,此便计也。”

总督认为他讲得有理,便把进袭的兵事全都委任于他。茅坤以奇兵进袭,连破十七寨。战后论功行赏,茅坤晋秩二等。当地百姓为他立祠祭祀。

其后升至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廷,却被忌妒者暗算,削职归田。

当时东南一带倭寇猖狂侵扰,总督胡宗宪将他请至幕中,参筹兵事。胡宗宪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奏请授他为福建兵备副使,却因吏部作梗,只好作罢。

此后,其家人横行乡里,被巡按所劾,被削籍为民。

茅坤也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当了平民百姓之后,便用心去经营产业,结果家中变得十分富裕。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茅坤去世,时年九十岁。

茅坤善古文,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同为唐宋派的

代表人物。

茅坤贯通经籍，悟性极高，善于抉取古人之奥旨。他的八股时文，笔法师法司马迁，并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为友。在明代则师法王阳明，然后再吸取唐顺之八股文的长处，经过消化融合，终于形成了古雅清空的风格。

茅坤的八股文在当代师法王阳明与唐顺之，不仅是他们的文章确有可以学习之处，还在于他与这两个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与品性。王阳明平定宁王之叛，生擒朱宸濠；唐顺之大破倭寇，威震东南，都是以文武全才享誉当世。而茅坤在广西与大名平乱，兵法精妙，出奇制胜，也有王、唐二公之风。可以看出，茅坤师法王阳明和唐顺之，不仅仅是文词而已，还有他们的才干与为人。所以茅坤又称得上是一个善于师法古今的人。

茅坤的八股文笔情逸宕，方苞评其文“一气旋转，轻清流逸，但少沉实坚峭处，后学者难于摹拟”（见《钦定正嘉四书文》该文评语）。这种特点，从这篇《乡人饮酒》一节题文中即可看出。

茅坤与唐顺之一样，是个“文道合一”论者。他坚定地尊奉程朱理学，认为“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茅坤：《茅鹿门先生集》卷十四《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主张“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假若“文不本之六籍，以求圣人之道，而顾沾沾焉，浅心浮气，竟为拮据其间，譬之剪彩而花，其所炫耀炅者，若或目眩而心掉，而要之于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驰矣”（茅坤：《茅鹿门先生集》卷四《谢陈五岳序文刻书》）。

正因为他与唐顺之同心相印，故“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明史·茅坤传》）

这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八家为宗，以唐、宋为派，不仅内容皆合于儒家正统观念，建立起由八家而上窥西汉作者，由西汉而上窥孔门文学之科的文统说，还“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茅坤：《茅鹿门先生集》卷十四《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在写

作方法上为学文者指示途径，于当时及以后均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给以古文为时文提供了一本指点门径的工具书，使嘉靖时对八股文的改进有了依据，从而推动了以古文为时文的普及。

茅坤既是“唐宋派”的主将，亦是以古文为时文的骨干，他的八股文由于有精湛的古文基础，故形成了独立的风格，自成一家。晚明的八股文大家艾南英论八股文首推归有光，后来又改变这一看法，以茅坤为上，二说虽相持未定，但可看出茅坤在嘉靖八股文坛地位之重要。从总体而言，归有光的八股文固然涵盖一世，但论古雅温醇，茅坤与之不相上下。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这个文题出自《论语》，《四书章句集注》对这一节文的注解是：“杖者，老人也。六十杖于乡，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后。”茅坤这篇文章，既遵照传注之意，进行阐发，又能发明题中未尽之旨，对传注进行了补充，且所补都为题中所包蕴而传注没说到的。全文清空流利，首尾一气而少实义，充分体现了茅坤八股文的特点。茅坤总结出古文的种种写作方法与风格，但他自己写作八股文时，惟取古文中疏逸洒然这一路笔法，这也是他以古文为时文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

茅坤对明代八股文的贡献还在于他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八股文的写作理念与方法，而这些理念与方法又融入了他自己从事古文写作的理念与方法在内，故显得别具一格，如他的《论文四则》便很受当时与后世的重视。现引其文于下：

一曰认题。

题中精神血脉处，学者须先认得明白，了了悉之心中，方可下笔，然后句句字字洞中骨理。

予尝论举子业，浅视之则世所剿袭帖括亦可掇一第。苟于中得其深处，谓之传圣贤之神可也。孔孟学问宗旨虽同，其间浅深、大小亦自迥别。学者苟以孟子论学之言搀入孔子，便隔一层矣。予故论为文须首认题。今之学者于题类多鹘突，焉能入解？他如问答题、议论题、序事题，其间千条万窍难以备述，其总要专以摹写虚字眼处，譬如掉百尺之帆，特在篷眼上转脚，悬千钧之弩，特在弩

机上覷的。

二曰布势。

势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将提百万之兵以合战，其要只在得势。得势者百战百胜。学者为文亦然。

予尝读《史记》，至项羽之救钜鹿，引军渡河，破灶沉舟，持三日粮，示士卒无生还意。已而人皆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诸侯旁观者十馀壁，人人惶恐。卒之覆秦而霸诸侯者，羽能呼吸三军之气以驰骤之，其势也。他如光武昆阳之战，周瑜赤壁之战，谢康乐淝水之战皆然。大略善将兵者操百万之兵如左右手，善为文者累数千百言如探喉而出，举业亦然。得其势则相题、言情如风之掣云，象之出峡。苏文忠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

不得其势，则语意窘涩，扣之不成声矣。

三曰炼格。

格者，犹言品局也。后世论古文，首先秦、西京者，以其去古未远，神理浑融也。薄晋、宋以下者，以其世既衰薄而神理不振也。唐三百年仅得韩昌黎、柳柳州一二人，宋三百年仅得欧、苏、曾、王五六人。何者，诸君子能窥测理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是以其格独高耳，馀则否。即如举子业亦然。世之名家，往往能深于六经，故其胸中所见既超卓，铿之为声响，布之为风藻，与人各别，不然终不免为卑品下局矣。

予尝过世家，往往阅其图书重器，便欣然神往。间过富人，纵横绮满堂，不觉羞涩。嗟乎，观此可以论文矣。

四曰中毅。

毅者，式也。世所称中式也。以上三条，予所自喜独得其解者。然世之有司，往往操其耳目所向，绳墨所习以求士，而吾不能赴之，韩昌黎之所以三试礼部而不中者也。予故不得已特别为中毅二字以悬之于心。其规模大较，虽不出于前三者，而于三者之中，故令典则浅近，令人

览吾认题处不必渊深而大旨了然；览吾布势处不必宏远而脉络分明；览吾炼格处不必高古而风韵可掬。斯则世之宗工大匠当属赏心，即如肉眼亦不我遗矣。（见《分课小题续编》，乾隆五十年令德堂刊本）

茅坤的《论文四则》虽只短短千余言，却将八股文写作的重要事项俱包揽在内，为八股文写作指出了门径。

他把认题列为第一，因为八股文讲究法从理生，理从题出。茅坤认为认题之关键在于摹写虚字眼处，因这是题情之所在。题之情不得，则题之理不真，所讲求之法也是死法。茅坤写作八股文，之所以特别重视认题、相题，其因盖出于此。

布势、炼局，本是古文写作的基本方法，茅坤明确提出要把它们运用到八股文写作中去。在他眼中，八股文只有做到理足气盛，品格高古，脉络分明，于博大中见整饬，方才是好文章。而要做到这些，又须在平日下苦功夫，只有那些“深于六经”，“大旨了然”，识见“超卓”者才能做到。这些见解，把茅坤这个遵奉理学的卫道士之观点显露出来。

茅坤还强调八股文要“中榷”，即合乎主试者规定的八股格式。后来揣摩之说盛行，即是由他的见解开始的。归有光说：“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七《与沈敬甫》）所以，只有把八股文作得“中榷”，方才在考场中有“撞着”的可能。这是茅坤根据科举考试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为操举业者指出通向功名利禄的门径。茅坤本人的八股文大多是中规中矩的，不像唐顺之，经常把八股文写成两大股，开八股文两扇中作一纽遥对之先河。

从笔者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茅坤是明代第一个较为系统地对八股文写作进行理论研究的人，这为万历及后世大讲八股文的写作方法奠定了基础，也是茅坤对八股文发展所作的贡献。



天子一位 两节

◎归有光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大贤详周室班爵之制，内外各有其等也。

夫爵者，先王所以列贵贱也，内外异等，而天下之势成矣。

且夫有天下者不以自私，而选贤与能以与天下共焉。兹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也，而制尽于成周矣！

自其通于天下者言之：盖无所不统谓之天子；天子无爵也，而爵之所尊也；六合之内，无以加矣！于是乎天子端冕于内，六服承辟于外，锡之命而重藩翰之寄，胙之土而同带砺之盟。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也，名异而等不同也；子也，男也，同一位也，名异而等不异也，合之凡五等矣。要之先王非私天下而相与为赐也；顾寰宇之广，亿兆之众，苟非闻见之所及，则智虑有所不周，而天下之情，必有壅而不通者矣！故为之众建诸侯，而使之错壤以居以大弼成之义；而内外相统，远近相维，则运臂使指之势以成，而五服之长，外薄四海矣！然则有天子，必有诸侯，有诸侯，必有公侯伯子男者，势也。此先王所以联属天下而尽其大者也。

自其施于国中者言之：盖自天子至于子男，皆谓之君；君诏爵者也，而爵之所先也；域中之大，无以加矣！于是乎各君其国，则各

统其臣，论官材而俾之咸熙庶绩，亮天工而俾之弼予一人。卿也，大夫也，各一位也，官异而秩亦异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各一位也，士同而品不同也，合之凡六等矣。要之先王非侈名号而相与为荣也；顾委寄之重，几务之丛，苟非耳目之所寄，则聪明有所不及，而天下之事，必有偏而不举者矣！故为之广置官属，而使之分职以治以尽协恭之义；而上下相承，体统相系，则丝联绳牵之势以成，而九牧之长，阜成兆民矣！然则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卿大夫士者，亦势也。此先王所以经理一国而尽其细者也。

是知合六等以治五等之国，合五等以一天下之势，周室班爵之制，有如此者。

【评析】时文大师归有光及其使制义一术 百世不湮之八股文

在明代八股文坛，归有光与唐顺之都是在以古文为时文运动中涌现的主帅，两人并称，甚至还有人认为唐不如归，故将归置于唐之前，号为“归唐”。不管这种说法有不有理，归有光在八股文坛之地位都是崇高的。这里所选的《天子一位》两节题文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号震川，学者称之为震川先生。因其家在昆山项脊泾住过，所以也自称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

归有光八九岁时就能读书作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明史·归有光传》）。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二十岁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赴南京乡试，不中。直到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年）科才举应天府乡试第二名，声名大震，时年三十五岁，有成百的举子来跟他学习。以他的制义水平和声望，举进士应易如反掌，却偏偏“八上春官不第”（《明史·归有光传》）。许多考官和举人都为他鸣不平，甚至说：“归生不第，何名为公车？”然而时也运也，实在是无可奈何。这种遭遇使归有光到中年以后，对八股取士制持批判态度。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年）科他终于考上了进士，此时他

已年达六十,还只名列三甲,不能授馆职,只能外放至荒僻的长兴县当知县。

长兴长期没有知县,由胥吏把持县政。豪门大户则勾结官府,将粮役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牢房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归有光不愧是个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他到任后,“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讞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倖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明史·归有光传》)。

归有光仕途虽受挫,但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其一心为民兴利除害、不畏强权的高尚品格,证明他确实不负所学,言行一致,是个儒家的忠实信徒。

隆庆四年庚午(1570年),归有光被大学士高拱、赵贞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归有光把这视为是多读内阁所藏秘本珍籍和表现文才的好机会,故抱病工作,不幸于次年病死于任上。

归有光虽蹭蹬仕途,却博览群书,而不像一般士子只知攻读宋儒经注,研习八股文。他著作等身,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而让他享大名,为当时及后世所尊奉者,是其古文写作。

归有光也是明中期“唐宋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由于他科场不利,出仕较晚,在文坛的影响比唐顺之等人要迟。不过归有光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比唐顺之所处的嘉靖早期更为复杂尖锐,理学所受冲击更甚,故尽管他也主张为文要根据六经,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却与唐顺之等人的同类主张有所不同。他所主张的道,是传统的儒家之道,与宋代理学并无太多关系。他宗奉“龙门家法”,为文学习司马迁,但也不排斥宋、元诸大家。他为文重视抒情,认为“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归有光:《震川先生全集》卷之二《沈次谷先生诗序》)。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归有光的古文朴素简洁,讲究剪裁结构,读书作文,自出机杼,不惑于群言,不慑于权势,反对浮饰之风,雕琢之习,上继司马迁及唐宋八大家的传统,下开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古文的先河。然而,“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他大量

的文章还是充满了儒家道德的说教气息。

归有光是继唐顺之之后的又一个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制义大家。他的时文即具有其古文之风格。

归有光之古文，源出于《史记》、《汉书》以及欧阳修，其八股制义则取径于苏轼、苏辙，肆之以恢宏，实能以欧阳修、苏辙、苏轼文章之气势，来表达程颐、朱熹的道理，且又能吻合于孔、孟当年的语意，气大声宏，凌驾于唐顺之且出于其上。徐存庵称其“振正、嘉之衰，开隆、万之盛，谓之文字中兴，非过也”。不过，“顾其制义，气则古文之气，法犹时文之法，较之守溪、荆川，源流一变，而于其法，曾不异也”（高塘：《论文集钞·杂条》）。如出自《孟子》的《天子一位》两节题文便显现出这种特点。

此文高视阔步，置身题外以写题中，见识超卓，议论风发，气势磅礴，是明代八股名文。方苞说“自有归震川之文，制义一术可以百世不湮”，即是针对此文而发的感慨。

归有光这篇文章与后面所录瞿景淳的《天子一位》六节题文有所不同，此题只有两节经文，只谈周朝制定的官爵制度，且归有光处于嘉靖末年，其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比唐顺之的又有了改进，故其写法与瞿景淳也有较大区别。

从内容上说，该文从周朝制定官爵制是为了确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社会秩序来阐发题旨，理正气足，合乎儒家伦理观。在写法上，该文以“有天下者不以自私，而选贤与能以与天下共焉”为论点，层层发出实义，气色高华，阐发出了题中精义。

该文结构上具有明显特点，正文只用两股来分叙题中两节之内容。出股列举了五等爵位之设，指出是为了有效地治理天下，对股列举了六级官阶之设，指出是为了分职以管理国家，两股即将两节题义阐发殆尽。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两股而是两段，因为其对偶不严，多为散文化句子，这种结构法盛行于万历之后，与嘉靖前期的结构法相比有了大的突破，故说归氏开隆、万之盛并非虚誉。



宋轻将之楚 一章

◎归有光

宋轻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大贤闻时人有以利说君者，因遏其欲而扩之以理也。

夫拔本塞源圣贤教世之心也，观其于时人问答之闻可概见矣。

昔宋轻将为适楚之行，孟子遇于石丘之地。邂逅之际，见此大贤，可谓遭逢之幸矣。

孟子未知其所往，故问其所之，而欲得其说也。轻则曰：“吾闻秦楚交恶，兵民重遭其困。吾将入楚则说楚，入秦则说秦，庶几失此在于得彼，二王期于一遇也。兵民于此获休息乎！”轻之志如此。

孟子欲攻其所蔽，故不求其详，愿知其指也。轻则曰：“吾闻秦楚构祸，彼此兼失其利。秦固为失，楚亦未为得。使知不利之为非，将谓利之是从也。吾言舍是无馀策矣。”轻之号如此。

孟子于是揭诸古圣贤之道，人心天理之不可泯灭者告之曰：天下纷纷于争，而先生从而欲息其争，志则大也。

人心滔滔于利，而先生从而和之以利，号则不可也。

且义利之辨严矣！先生以利说乎二王，上悦而下从之，由是国之有臣，家之有子弟，争以利心事其君亲，天理亡而人欲肆，不夺不厌，其亡也忽焉。天下自此多事矣！

先生以仁义说乎二王，则上倡而下从之，由是臣之于君，子弟之于父兄，莫不以仁义激于中，人欲泯而天理明，不后不遗，其兴也勃焉。天下自此太平矣。

先生何必以大志而用乎小，舍仁义而求之于利哉！是则误其说，则其害甚大。扩以理则其效甚速，解纷息争，莫有要于此者。先生行矣，其以吾言告诸秦楚，吾将拭目而望太平之有日也。

【评析】具有清醇淡泊之致的归氏八股时文

归有光的时文既无王慎中、茅坤等人的那种气势，也无唐顺之文章之洒脱，但他有二类文章高不可攀，一则醇古疏宕，运《史记》、欧阳修、曾巩之义法而与题节相合。一则通达事务，朴素发挥，明白纯粹如道家常事，人人通晓。题目出自《孟子》的《孰不为

事》一节题文,《尧舜之道》二句题文及《宋轻将之楚》一章题文都是其代表之作。

《宋轻将之楚》一章题文具清醇淡宕之致,是八股文中最上乘的文字,被历来八股文选家推为至极之作。题目长达二百八十餘字,归有光下笔时就扼定孟子反对言利,主张以仁义来化解两国干戈这一要旨,用“大贤闻时人有以利说君者,因遏其欲而扩之以理者”二句话即将题目破开,然后在承题、起讲中,以古文笔法,层层递进,并不重复前面说过的意思,在正文部分以六股便层层深入地将言利之有害与言仁义之有益阐释得详尽明白。

全文明白纯粹,繁简得体,具有平淡朴实之格调,显现出归有光古文的风格。由此可知,到归有光手中,古文与时文已有合二而一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归有光开启了万历变革派八股文之先河也是有道理的。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归有光

圣人约《诗》之为教，不外乎使心得其正而已。

夫《诗》所以感人而入于正也，正之言虽约，而《诗》之为教，无有出于此者矣。

且夫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观书者之恒病也。以其一定之言而驱率之，汗漫无所归极之地，而垂教者之深意，于是而晦矣。

是故采诗以垂训，包括旁罗，斯无遗矣；而贯通伦类，必有所以为《诗》之旨。

涉猎旁博，宜不废也；而纲维蕴奥，必有所以为说《诗》之本。

吾尝反复于三百篇之中，而得其一言之要，《鲁颂》所谓“思无邪”是也。盖天命之真，人心之本，全具于中而不失，是性情之所以正也。而形生之类，气禀之偏，必待涵养长育而全，是《诗》之所以为教也。

彼其所以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比物连类，其旨不可一而概之也。然而观者得于哦吟上下之际，所以会其意而一之者，要以触发其本真而使之约于中耳。

其所以自然于音响节族而不能已者，宣志达情，其意不可泥而拘之也。然而观者得于咏歌慨叹之间，所以迎其意而通之者，要以和平其心意而俾之离于僻耳。

《诗》之有善，非徒《诗》之善也，是劝之而归于无邪也。

《诗》之有恶，非徒《诗》之恶也，是惩之而归于无邪也。

以吾之天，而触彼之天，则事前而机动，不独盛世遗音可以宣化，而治乱贤否所感之不同，而其归同矣。

以彼之天，而契我之天，则世隔而心通，不独朝庙歌声可以平心，而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其致一矣。

是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情之理也。惟思无邪，而后性情得其正。故曰《诗》以道性情，夫子所以示天下学《诗》之准。噫！其尽之矣。

【评析】湛深经术、淳古高逸的归氏时文

清代学者梁章钜说：“有光制举业，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归有光虽是儒家正统思想的尊奉者，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他对程朱理学也不完全遵从。不过他“湛深经术”，精通史籍，又能融会贯通，故在突破程朱传注的范围时，往往能言人所不能言，别出新意。其题目取自《论语》的《〈诗〉三百》一节题文中的一些见解，就冲破了理学家的传注所匡定的思想范畴，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探求。

孔子以“思无邪”来说明诗歌的内容特征。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谈到《诗经》时也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归有光的这篇八股文，认为《诗》的作用“不外使心得其正而已”，这一认识，与孔子和朱熹的认识并无二致。但他深于经史，且能融汇贯通，常有心得，他的著作如《易经渊旨》、《尚书别解》、《读史纂言》、《两汉诏令》、《三吴水利录》、《诸子汇函》、《道德南华经评注》等，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且皆有创见。故他在写作八股文时，深入咀嚼圣人立言之意，汇众虑而为言，每能于题文与传注之外，别出新解。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诗歌“比物连类，其旨不可一而概之”，是“自然于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的产物，便突破了程朱传注画定的框框。在这一点上，归有光与同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唐顺之是不同的。唐顺之对程朱传注的尊奉比归有光要严格得多。

嘉靖时以古文为时文，八股文的文体格式没有大的突破，但既要引入古文写作的理念与方法，就必然会在语言的运用上冲破八股文实行的排偶体，化严格的对偶为单行散句。这样一来，便使

八股文的语言回复了宋代经义的面貌。在写法上,归有光还能置身题外以写题中,绝去时文束缚之苦。凡直起直落,承题不复破题,起讲不复承题,如此古文佳境,惟有归有光能做到。《〈诗〉三百》一节题文就体现了归氏八股文的这些特点。其起讲不重复承题的内容,在语言运用上,相对两股用了不少“词异而意同”的字句,两股内容也有些雷同,且对偶也不严格。这都是以古文为时文而导致的时文的变化。方苞把它归结为“风气初开,文律未细”(见《钦定四书文》该文评语),是没认识到这是八股文引入古文写法的必然结果。

全文淳古淡泊,风格高逸,不愧是八股名文。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一节

◎山有光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所以至于道者，亦惟渐以至之也。

夫道无终穷，虽圣人亦有待于学也。学之则不容无渐矣，此其理之固然，而岂圣人过为卑论以就天下也哉。

自夫天下待圣人过高，以为有绝德于天下，而不知夫圣人之为孜孜而不已者，固吾人之事也。何则？人之心与理一也。人之为学，求至于心与理一也。然学之不可以骤而化之，不可以助长也，久矣。

故自十五之时，始有志于圣贤之道，而从事于钻研之功。尝以为志之勿立，则无以负荷乎天之所与者，将不免于小人之归。是以始之以立志，而是非之介，取舍之极，盖有所定而不能移也。

迨于三十之年，始有得于矜持之力，而取验于德性之定。尝以为守之勿固，则无以凝聚乎性之所钟者，将不免于君子之弃。是以继之以定守，而纷华之变，盛丽之陈，盖有所持而不可挠也。

自十五而三十，积以十五年之功，而意味固已不同矣，然犹不敢自息。

而至于四十也，则随事见理，而研旨趣于万殊，参酌于无端无纪之中，而有得于灿然之妙。物之所以各足其天者，吾固已见之

明,而知万殊之各正。视向之立者,不免犹胶于固也。

又至于五十也,则以理视物,而探渊源于一本,究极于大本大原之中,而有得于浑然之妙。天之所以流通于物者,吾固已见之一,而知谛则之必察,视向之不惑者,不免犹在于物也。

自三十而四十,而五十,体验于十年之间而意味又各不同矣。然犹人也,非天也。君子之学求至于天而可已乎?

故六十以达耳顺之机也,理妙于中,而有以通乎外之所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感之者以天也,听之者以天也。顺于耳而耳不得而与焉。

七十以妙从心之用也,理运于外,而有以出于中之所豫。化而裁之,存乎其变。从之者以天也,不逾之者以天也。从于心而心不得而知焉。

夫以六十七十之所自得者如此,夫岂以年弥高而德弥劭哉。亦以道久而后熟,故日有所不同耳。是知志者志此理也,立者立此理也,不惑而知之者亦此理也。至于耳顺从心,而理与心一焉,君子之学求至于是而已也。

【评析】善熔古文时文于一炉的归氏八股文

归有光制义时文写作的优势在于他博览群书,学识超人。他精研经史,每能跳出程朱理学的框框,咀嚼出孔孟立言的真意,积之深厚,故能融经液史,攀唐跻宋,纵笔所致,能熔古今、经史、古文、时文于一炉。既能发尽八股文题中所蕴含的真谛,别出新见,又能明白自然地将其表达,人人通晓,故其八股文达到了明代的最高水平。其题目出自《论语》的《吾十有五》一节题文最能体现这些特点。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节题文,分析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却必经历三十、四十、五十、六十这样的渐进过程,方才能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原因,是“以道久而后熟,故日有所不同”,且“知志者知此理也,立者立此理也,不惑而知之者亦此理也。至于耳顺从心,而理与心一焉,君子之学求至于是而已也”。归

有光的这些见解,来自于他对经史的融会贯通,故比别人要高明通达得多。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起讲中说“夫天下人待圣人过高,以为有绝德于天下,而不知夫圣人之所以为孜孜而不已者,固吾人之事也”,这就打破了视孔孟为圣灵的神话,比起程朱把孔孟抬为神圣的见识不知要高超多少。程颐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节经文的传注中便美化孔子说:“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把明明是讲孔子进德的过程解释成并非孔子在自叙其经历,而只是为学者立法,这就显得多么的可笑。归有光出经入史,恢复孔子既是圣人,又是凡人的真实面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非常可贵的。

这篇文章,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代表作,能以韩愈、欧阳修的气魄来表现程颐、朱熹之思想,且代孔子立言时又能吻合当年之语意。文章纵横起伏,层层递进,平易自然,后来所有作此文题的人,没有能够比得上归有光的。

正是因为归有光博学多才,能融经液史,故特别善于使用六经的语句来阐释题旨。这种做法在成化、弘治之前许多八股文名家便经常使用。但归有光湛深经术,尤通史籍,故能运用经语如同己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且精神之流通,气象之高远,都远出于前人之上。他的《大学之道》一节题文,历用“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惟皇建极,惟民归极”;“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各语,皆取自《书经》等书,然用在文章之中,都如其意之欲出于此,自然贴切,为文章增添了生气与精神。像《诗经》中的语句,汉魏人用之即是汉魏人气息;汉魏乐府古诗,六朝人用之便是六朝人的音节一样,归有光在自己的文章中用经语,也达到同样的效果。

归有光是有明一代最著名的八股文大家之一。当时人把他与唐顺之并称,且置名于唐氏之前,号为“归唐”。嘉靖、隆庆之际,胡友信博通经史,声名鹊起,与归有光齐名,又号称“归胡”。

明末八股文大家艾南英对归有光评价很高,他“于文首推归震川”,曾说:

“每读先生文，便觉古气磅礴，如在喉间。”

清代八股文名家方苞对归有光推崇备至，不仅在他奉旨选编的《钦定四书文》中归有光的文章入选数目居第一，评价也最高。他称归有光的八股文“雄浑健雅”；“朴实淳厚，光辉日新”；“淳古淡泊，风格最高”；“古气磅礴，光焰万丈”；“古厚之气，直接先秦汉初”；“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严词伟议，屹然如山”；“沉潜先儒训义，积之深醇而出自显易”；“精理明辨，如万斛源泉，随地腾涌”……

他还说：“文之疏达者，不能道厚，矜重者不能优闲，惟作者（归氏）兼而有之。”“其议论则引星辰而上也，其气势则决江河而下也，其本则稽经而诤史也，故自有归震川之制义一术，可以百世不湮。”

清代著名学者，对历代八股文均有极深研究的梁章钜对归有光也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

“有光制举业，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

他还说：

“熙甫年六十成进士，振正、嘉之衰，开隆、万之盛，谓之文字中兴，非过也。然其功名蹇滞，抑郁不快，文字中实征此象。学者究心性命之业，必得熙甫之全体，方为大雅学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

归有光能获如此多文人学者的高度评价，决非浪得虚名，而是他的确具有别的名家穷思毕精也不能达到的水平。



天子一位 六节

◎瞿景淳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周室辨爵祿之制，皆以次而降焉者也。

夫爵祿之班，先王公天下之心，而等級之明，所以严天下之防也。此制定而周家有道之长其基于此矣。

孟子告北宮錡，蓋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此固公天下之大端也。所以秩其分而平其施者，亦有不可喻焉者矣。

試以其略言之：天下之所共宗者，一天子也。天子之一位，其尊尚矣。自是則有公、有侯、有伯、有子、有男，而各一其位焉。以一人而抚万邦，以万邦而戴一人，五等之施于天下者，所以大一統而示天下之有王也。

國中之所共宗者，一君也。君之一位，其尊至矣。自是則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而各一其位焉。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六等之施于國中者，所以辨上下而示國家之有君也。

此其班爵之制也，而祿之班則又視其爵矣。

在天子則有方千里之國焉，在公、侯、伯、子、男則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焉，又有不能五十里之附庸焉。是君非獨半也，王章也，所以固天下之本也。臣非獨薄也，侯度也，所以立天下之准也。此其通于天下者也。

祿之班于王畿也，卿之受地視夫侯矣。大夫所受亦不失伯之地焉。元士所受亦不失子、男之地焉。是重內臣者所以尊王室也。比外封者所以制祿人也，而千里之畿，又將以之共官，天子不欲專之以自私矣。

祿之班于侯服也，大國君、卿之祿蓋已厚矣。次國殺其一，而大夫以下不為之殺焉。小國又殺其一，而大夫以下不為之殺焉。是儉于君、卿者，義之裁也优于大夫。士者，仁之施也，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又將以之待下，諸侯亦不敢專之以自奉矣。

夫其爵之班也，而貴賤之相承有以严天下之分焉。

祿之班也，而大小之各足有以公天下之利焉。

吾是以知周室班爵祿之制，法天而不私也。

【评析】名列明代八股文四大家的瞿景淳及其 理醇法圆、平易气厚的八股文

瞿景淳是明代中期最有名的八股文大家，与王鏊、钱福、唐顺之齐名，世称“王钱唐瞿”，后浙江人去钱福而易以薛应旂，他仍是四大家之一，号称“王唐瞿薛”，可见其在八股文界地位之高。

瞿景淳，字师道，号昆湖，江苏常熟人。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年）科进士第二名，即俗称的榜眼。

瞿景淳自幼聪颖异常，据说出生仅十个月即能读《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八岁时即能写文章。但家中贫困，且时运不济，久困诸生，以教私塾为生。但他毫不气馁，刻苦攻读，终于在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科考中举人，次年会试得第一，俗称中会元；殿试为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改太常卿。又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升吏部右侍郎。隆庆初年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侍经筵，总校《永乐大典》，修纂《世宗实录》。

瞿景淳八股文写得好，他对从八股文写作中浸染到的儒家思想也真心信奉。在嘉靖那样一个人欲横流、贪污腐败成风的时代，仍能信守儒家伦理道德，洁身自好。他与恭顺侯吴继爵奉敕册封郑王之子为世子。临别时世子赠以重金，吴继爵笑纳，瞿景淳却坚拒不受，吴继爵见了，十分惭愧，连忙将所收重金退还。

瞿景淳在礼部专典制诰。权势熏天的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怙宠骄横，请册封其第四妾，叫瞿景淳草拟制诰。瞿景淳认为这不合礼制，不肯答应。陆炳便请当时的权相严嵩为其说情。严嵩当时在朝廷一手遮天，许多高官唯恐巴结他不上，却在瞿景淳面前碰了个钉子。陆炳无法，便送去黄金作酬金，但瞿景淳长笑却之，说：“我只依礼办事，不为重金所动。”陆炳恨得咬牙切齿，却无法可施。

瞿景淳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刚正不阿，与皇亲国戚、权臣显官论事，必据理而言，寸步不让。他曾两任武举主考，一任乡试主考，一秉公正、公平取士，很受称赞。

瞿景淳以制义名驰天下，其文理淳气厚，体度冲夷，格律宏

整。因为他学养深厚，故能将深奥之理以平易的语句说出，颇近自然。所以他能与王鏊、唐顺之并称，决非偶然。他的名作，文题取自《孟子·万章下》的《天子一位》六节题文就能充分体现其为文之特点。

《天子一位》六节题之题目长达二百多个字，分六节来叙述周朝制定的官爵和俸禄等级制度，字数多，内容繁，要写好它实不容易。但瞿景淳熟于经史，又深有心得，他以周王制定爵禄是为了“公天下之心”，“严天下之防”，是“法天而不私”来立论，这就把握住了这六节经文的核心。文章依题之六节，一层层分用八股来阐释周朝爵禄制度及制定的必要性，言论皆合乎儒家正统思想，使这篇八股制义议论极正大，又极精细，是深悟了经书之妙旨；叙述极简洁，又极富变化，是运用了史书的笔法。文章炼格炼意，却不着一词以障其间，所以格整而意自圆，文密而气愈浑。全文格律宏整，结构严谨，八股皆全，谨守成化、弘治时的体式，确能反映瞿景淳八股文之特色。

若将此文与前面所选的归有光同题文相比较，既可看出两人写作风格的不同，也能领悟到八股文的写作方法。



事君敬事而后其食

◎瞿景淳

圣人论人臣之义，惟务自尽而不求其利也。

夫为禄而仕，非所以事君也；事求自尽，而禄有不计焉。夫子之言，所以立人臣之防也。

盖曰：君之使臣也，固以厚下为深仁；而臣之事君也，则惟以奉公为大节。人惟不明乎分义，而臣节始微矣。以予观之，臣之事君，自一命而上。

孰不有事之当为者乎？是事也，所以熙帝之载也，存乎臣者也。

亦孰不有食之当得者乎？是食也，所以恤臣之私也，存乎君者也。

是必明乎内外之分，而可贞之守，每定于立庙之初。

严乎义利之辨，而匪躬之节，恒励于策名之日。

小而为服采之臣也，其事虽小，亦必有难尽者，是必思任使之未称而精白以承之，翼翼焉，惟惧事之或忝而已矣。

大而为服休之臣也，其事愈大，尤必有难尽者，则必思付托之未效而严格以图之，兢兢焉，惟恐事之或旷而已矣。

上之求不负于吾君也，而非求以自利也，虽曰君之诏禄，因吾事以上下，然吾惧食浮于人，而不惧人之浮于食，则亦靖共尔位可矣，而他人又何知焉。

下之求不负所学也，而非求以肥家也，虽曰君之制食，视吾事之繁简，然吾方以素食为耻，而不以得禄为荣，亦无旷庶官足矣，而他又何计焉。

使事之不敬，而惟食之急焉，则其事君也，亦怀利以事之而已

矣，臣道几何而不亡也？吁，夫子言此，所以励天下之臣节者，亦严矣哉！

【评析】机巧圆融的瞿氏八股文

瞿景淳的八股文过分讲求机巧，讲求圆美，十分成熟，以会元为风气之归，使人揣摩起来很便利，因而学习他的人很不少，便成为一个流派。不过到万历年间，学习其圆美的人，未得其实质，只袭其外表，故流入了卑靡，于圆熟中益之以芜秽之词，庸靡之调，颇受后人诟病。有人把此罪算至瞿景淳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当然，他刻意追求构思机巧，为万历年间专讲机法开了先河，这也是不争之事。他这篇题目出自《论语》的名篇《事君敬事而后食》的墨卷便可证明这一点。

这个文题依朱熹的解释是：“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禄之心。”

瞿景淳的八股文仍遵循恪遵传注的老传统，但在构思上却求新求巧。这个文题他就根据传注的意思，抓住事君之臣，“皆以敬吾之事而已”及“不可先有求禄之心”这两个关键点进行构思，对前一点，他以“事君敬事”来阐发；对后一点，他从反面着眼，以“自利肥家”之不该着手来阐发，似淡而实浓，似轻而实重，文章既未离朱熹的传注，又显得机巧，圆融，很受人称赞，成为他的八股文代表作。

方苞评述此文时说：“未离化治矩矱，而易方为圆，渐为谈机法者导夫先路矣。然于揣摩科举文中较短絮长，则其功候已到。”（见方苞《钦定四书文》中该文的评述）

应当说，方苞的评说的确抓住了本文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特别是他指出该文“易方为圆”的做法，逐渐为人所揣摩，模仿，并形成一股风尚，为“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开了先河，更是知文之谈。瞿景淳能成为明代八股文四大名家之一，就因为其文章风格的确影响了一代人，对明代晚期八股文的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且此文为考场中之墨卷，能在紧张、局促的气氛下写出如此佳文，足见瞿景淳确实不愧为八股文高手。



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 一章

◎薛应旂

“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圣人因贤者未知为学之本，必发其机而明以告之也。

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博而寡要者，意何所得哉？夫子所以发子贡欲达之机，而示以一贯之道也。子贡之在圣门，博物洽闻之功居多，而探本穷源之力未竟，故夫子问以发之。

若曰，人不学不知道，学而不知所本犹弗学也。赐也其谓我何？

彼天下之杂物撰德，粲然示人博矣。多闻而从之，吾固尝有是也。子其以我之为学专在多闻，而勉力以求之，将参伍以尽其变乎？

天下之殊事异文，泛然示人广矣。多见而识之，吾亦尝有是也。子其以我之为不专在多见，而殚心以图之，将错综以极其数乎？

夫子之言若是，盖探其所得以为施教之地也。子贡乃应之曰：天下之事物无穷，不多学而识之，则扞格不胜，而理必有遗矣，夫子之言其殆然与？一人之闻见有限，必事事物物而学之，则勤苦难成，而日亦不足矣，夫子之意抑或非与？是其疑信之间，有将达之机，而积学功至，可与语上矣。

夫子遂告之曰：天下之事同一理，天下之理同一原，予非多学而识之也，一以贯之耳。

盖学惟同一理也，吾则以一贯万，而化裁以达变，推行以尽通，尽性有以得天下之理，而凡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微显举不能违



矣，是我之有所知也。盖贞夫一者也，曷尝多闻以为知乎？

理惟同一原也，吾则会万于一，而极深以研几，疑议以成化，成性有以为道义之门，而凡古今之往来，事变之纷沓举莫能外矣，是我之有所知也。盖协于一者也，曷尝多见以为知乎？

由是观之，则圣人之蕴可悉得而闻，而其教人也，亦未尝诬其所未至也。

【评析】著名学者薛应旂及其学理精醇的八股文

薛应旂是嘉靖年间最著名的八股文大家，又是著名学者、文学家，在当时及后世均深受文坛尊崇。

薛应旂，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年）科进士，原拟取为第一，因故未成，眼睁睁看着一顶状元帽子落到了别人头上。但后世论文者，必以他为首，因他无论文章道德，都受人敬佩。

他累官升至南京考功郎中，因忤奸相严嵩被谪建昌（今四川西昌）通判，后任浙江提学副使，遇大计罢归。

在浙江提学副使任上，他释疑解惑，精心作育人才，待人严而有礼，被称为“薛夫子”。著名作家、画家徐渭即是他识拔的。徐渭为诸生时，有狂生之名，薛应旂却将他拔置为第一。他还三次主持乡试，甄别士类，慧眼识人，声名藉甚。

薛应旂博学多识，是明代中期有名的学者，梁章钜说他“贯通六经，发而为文，如金出冶，如玉离璞，光芒焕然。又精于史学，《宋元通鉴》、《昭代宪章》，皆有功当世”（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

他的八股文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号为“王唐瞿薛”，有时文四大家之称。

薛应旂是明代中期一个著名的作家。他贯通六经，又精于史学，除著有《宋元通鉴》、《昭代宪章》之外，还著有《考亭渊源录》、《甲子会纪》、《四书人物考》、《高士传》、《薛子庸录》、《方山文录》等经史著作多种，《考亭渊源录》对朱熹的学说渊源作了精细的考

证,说明他对程朱理学造诣很深。

正因为薛应旂是个学者,其八股文虽运用了古文笔法理念,但有着浓厚的学术特色,属于学者型的八股文。

他的八股文,对题目的内蕴及精义都有准确的把握。他强调认题。由于学识渊深,几乎所有文章都能做到题貌恰得,题情恰称,既符合程朱传注,经文原旨,又有所发明,时出新意。如《上如揖,下如授》文题,不过是述孔夫子动容周旋中礼而已,如果开口便说郊禘名分,礼乐征伐,不惟立论过大,还会牵扯出许多无端闲话。薛应旂作此题,因认题准,故文章能切中要害,把题情、题貌都完全阐释出来,且为文典雅,立论高逸,又能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达,成为一篇名文。

他的另一篇《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一章题文说理深入透彻,也是其学者型八股文的范例。

对于这个出自《论语》的文题,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子贡之学,多而能识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问以发之。”薛应旂以其对经史的深湛功力,抓住文题中孔夫子为学“一以贯之”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将题情全盘揭示,是一篇典型的学者型八股文。

文章以“天下之事同一理,天下之理同一原”来阐释孔子“一以贯之”的“一”,显现出作者学养之深厚,下笔便能抓住关键所在。文中的“理”与“原”指的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称其为学“一以贯之”就是指他能以自己的学说始终一致地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纷繁事物。由于文章对孔子为学“一以贯之”的思想阐释得深刻、全面、准确,故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可见薛应旂学力之深湛。

薛应旂的学者型八股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用经语确切,词语醇雅,文中无一闲文,无一冗字,很见学力。如取自《大学》之《君子贤其》二句题文即是这样。

薛应旂的《追王太王、王季》二句题文,以德、以功、以世次、以法、以统、以庙食,分疏精确,即晚明八股文大师艾南英所谓的“八字经”。后来人作这个文题,再也无法超出这个范围,可见他对题旨把握的准确与全面,充分显示了他的学者风格。



天下大悦 咸以正无缺

◎王世贞

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大贤赞元圣大顺之治，而必征诸《书》焉。

盖文武之谟烈盛矣，而实周公成之也，此天下所以悦其治与？

昔孟子释公都子好辨之疑及此，若曰：世之治也，有启运之君，必有翼运之臣。吾尝观于有周，而知周公一代之治功矣。盖文武嗣兴，虽足以对天下之心，而害有未除，民之望治犹未已也。周公相武王，而悉殄其害焉。

夫是以民安于拨乱，而万邦仰莫丽之休。

物阜于胜残，而群生蒙煦育之利。

有夏固已攸同矣，兹则太和洋溢，而民悦益为之无疆。

四方固已攸同矣，兹则至治浹洽，而民心益为之胥庆。

此固周公辅相之功，有以光照于前，而乘裕于后者也。《书》不云乎：“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盖丕显以开厥后，文谋固无度也，而实周公勤施于上下，俾通骏之声，愈显于无穷，而谟之尽善者，为可传焉。

丕承以贻孙谋，武烈固无竟也，而实周公翼赞于先后，俾绪绪之业，愈承于不替，而烈之尽美者，为可久焉。

以覲文王之耿光，子道尽而父道益著。

一

二

三

以扬武王之大烈，臣道尽而君道益隆。

此所以致天下之悦，而唐虞之盛，复见于成周也。然则领文武之德者，讵可忘周公之功，而一代之治，允有以纘禹之绩欤？

【评析】文学家王世贞及其清真健拔的八股文

王世贞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八股文高手。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他生有异禀，书过目即终生不忘。十九岁时，举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科进士，授刑部主事。

王世贞爱好诗与古文，到京师为官后，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等的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相倡和，史称“后七子”。于诗文，他推崇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歿，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

王世贞恪守儒家伦理道德。在刑部时，有奸人犯法，躲入权相严嵩党羽锦衣卫都督陆炳家。王世贞从他家中搜得。陆炳请严嵩为之求情，尽管严嵩当时权势熏天，王世贞也不买账，坚持依法办事，这就得罪了严嵩。杨继盛上疏劾严嵩十大罪，被下诏狱受酷刑，王世贞不时为之送汤药医伤。杨妻为夫伏阙上书申冤，其状纸为王世贞代草。杨继盛被冤死后，他又为之棺殓。严嵩对他恨之入骨。吏部曾两次拟用王世贞为提学使都被严嵩否决，后把他派往青州任兵备副使。

严嵩没能对王世贞进行报复，便借王父在滦河失事之机构陷，将王父论死系狱。王世贞立即弃官为父奔走营救，甚至在严嵩门前整日跪伏，“涕泣求贷”，又与其弟跪在路旁，拦着贵人轿子，叩头乞救。但其父终于被严嵩阴陷杀害。王世贞“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明史·王世贞传》）。

张居正当权时，因与王世贞是同榜进士，有意提拔他，他却谨守儒家道德规范，不仅不肯去依附，反而借故讥讽张居正。张居正

的妻弟侮辱江陵县令，王世贞论奏不留半点情面。事情多了，张居正不堪忍受，借机将他罢官。这些事情无不表明王世贞头脑中的儒家正统思想是何等深厚，这种思想也必然会体现在他的诗文及八股制义中。

后七子中数王世贞的才学最高。晚明著名文学家袁宏道称他“才亦高，学亦博”是完全合乎事实的。他的诗文虽有嗜古之病，充满道德说教，但仍不乏优秀之作。他十分重视艺术形式，把它视为文学成败的关键。这些特点在他的八股文中也得到体现。

王世贞的八股时文清真健拔，绝无矜张之气。他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故其八股文既能准确把握题旨，长于说理，遣词用字极为准确贴切，又能以清新的文字，深入浅出，明白易晓地将题之精义阐释发挥无遗。他还讲究文章作法，也引入了一些古文的写作方法，极善剪裁，使其八股文自然浑成，音节和畅，气格高逸。其题目取自《中庸》的《待其人而后行》题文，便参用了王鏊、唐顺之的写作方法，于转折处极自然和谐，层层递进，虚实相参，不凌驾而局自紧，不矜器而气自高，极文章之能事。

他的《天下大悦 咸以正无缺》程文，题目出自《孟子》，更是一篇受到当时和后世推崇的名作。

这篇程文是写出来供士子们作范文的，其思想雅正，文体格式完整，八股齐备，对偶整齐，音节和妙，其格调之高，气度之雅逸，词语之清真在八股文中是非常突出的，明代有人说它“在制义已造其巅矣”（见《明文钞》五编该文之评语，双桐书屋乾隆五十一年刊），并非虚言。

文章题目原是说周公引《书》，而王世贞在文章中却只说文王与武王的功绩，在文法上自然要求斡补。由于作者写作水平很高，在文中将斡补之处处理得天衣无缝，不见斡补的痕迹，使文章自然浑成，这一点是后之作者无法达到的。

王世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节题文，题目出自《易经》，其中的“道”与“器”、“变”与“通”的概念极难说清。由于王世贞是个大学问家，对儒家经典及史籍均烂熟于胸，故他

在这篇八股文中，抓住“道”与“器”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以明白通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将题中精义阐释无遗，既合乎传注，又有创见，显示出其学问功底之深。



生财有大道 一节

◎张居正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

盖务本节用，生财之道也。果能此道矣，国孰与不足乎？

且夫聚人曰财，国而无财，非其国矣；理财曰义，财而不义，非其财矣。

是以君子之生财也有道焉，固不必损下以益上，而经制得宜，自有以裕于国也。

其于道也又甚人焉，固不必损上以益下，而公私两利，亦有以裕于民也。

然则何如？盖天地本有自然之利，而国家本有惟正之供。惟其力之不勤而用之无节，故恒见其不足耳。

诚能驱天下之民而归诸农，其生之也既无遗利矣，又且汰冗员，裁冗费，不使有浮食焉。

尽三时之勤以服乎耕，其为之也既无遗力矣，又且量所入，为所出，不使有侈用焉。

斯则勤以务本，而财之入也无穷。

俭以制用，而财之出也有限。

以无穷之财，供有限之用，是以下常给而上常馀。虽国有大事，而内府外府之储，自将取之而不匮矣。



百姓足而君亦足,虽年或大侵,而三年九年之蓄,自可恃之以无恐矣。

谓之大道,信乎其为谋国经久之计,而非一切权宜之术可比也。然则有国家者岂必外本内末,而后其财可聚也哉!

【评析】以豪杰自许的张居正及其政治家型八股文

如果说薛应旂的八股文是学者型的,那么张居正的八股文便是政治家型的。他的八股文都显现出政论的风格。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张居正少时聪颖绝伦,十五岁中秀才。巡抚顾璘读了他的八股文感到惊奇,说:“国器也!”不久,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科中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明史·张居正传》)。他当上内阁首辅后,利用手中权力,雷厉风行地在嘉靖、隆庆以后推行改革措施,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具有鲜明的改革思想,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十一《杂著》)。他讲求实效,凡事务实。为纠正嘉靖、隆庆时政局的混乱,他大力整顿吏治,铲除腐败;他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整顿财政田赋,推行一条鞭法,对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次改良活动。嘉、隆时期,明朝的财政年年亏空,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整顿后,变得库有盈馀。在军事上,张居正当政前“虏患日深,边事久废”的局面也大为改观。从这些方面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有成效的,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由于张居正在世时对明神宗事事牵制而引起他内心强烈的反感,张居正去世才几个月,他即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官秩,接着又查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大多被取消。从此,明王朝的

政治日益腐败，一天天走向衰亡。

张居正不刻意为文，而其制作，“庄雅冲夷，真醇正大。无奇谲之态，无藻缋之色，无柔曼之容，无豪宕之气。读其文而得其所以为文，见宏邃之养焉，见精明之识焉，刳割之才焉，见笃实之学焉”（吕坤：《张太岳集·序》）。吕坤对张居正诗古文词的评价，亦包括了其八股时文的特点。

文如其人，这一点在张居正的八股文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具有宏邃的学养，又具有精明的见识，一生相业，最以综核见长，这些于《生财有大道》一节程文中即可见其大概。

这篇文章，是张居正当主考官时写作的程文，给考生作范文用的，写得中规中矩，质实简严。

文中所阐述的理财的重要性，理财的原则与方法，凝聚着作者多年的经验与思考，俱是他的真知灼见。他当上首辅后所施行的理财理念与方法，正与此相同。所以顾开雍在评述这篇文章时说：“一生服炼，借题吐出，精光奕奕，如对其人。”真是知人知文之言。

全文理足气弘，是作者“以豪杰自许”的雄豪心态的直抒，故有笼罩一世之气概。文如其人，这就是绝好的证明。

张居正的另一篇名作《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一章题文，也是一篇程文，是他主持隆庆五年辛未（1571年）科会试时所作。文章阐释孔子论礼乐崇尚质朴的道理，写得真醇正大，文中“无奇谲之态，无藻缋之色，无柔曼之容”，却一气贯注，让人读后可见张居正学问之深，识见之明，以及求真务实精神之强。文章深入浅出，明白易懂，针对性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这个文题与《生财有大道》一节题，归有光在他之前都写过，且都是传诵一时之名作，其文高古深厚，叹为观止，再作者无人可及，只有张居正这二篇程文可以与之比肩。自明朝至清朝的二百多年里，八股文坛都把归、张这二篇文章等列齐观，奉为神品，其他人写作这二个文题的名作都被降一格视之！由此可见张居正不

仅以大政治家闻名于世,对其文也应作如是观,应称之以写作高手,八股大师。

张居正对明代八股文的一个贡献,是与他推行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对当时芜靡已极的八股文也进行了改造。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怪诞的试题和空疏的文风,仿效嘉靖革新中的做法,予以整顿,以倡导实学之风。他要求:“试题必明白正大,无或离析章句以为奇异,无或避忌趋好以长谀佞。抡文必崇尚雅正,无或眩华遗实,以滋浮靡。有能综览古今,直写胸臆者,虽质弗弃;非是者,虽工弗录。”(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七)此举在万历前期一度使八股文风归之于正,受到后世八股文界的推崇。





夫子为卫君 一章

◎许孚远

“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圣人之不为卫君，于其尚论古人而可知也。

盖古今是非，可以例见也。夫子深与夷、齐之让国，而肯为卫君乎？

昔者卫宁之薨，卫人奉辄而拒蒯聩，而托嫡孙当立之说以辞，于诸侯人伦之薄恶，莫有甚于此者也。是时夫子适在卫，而冉有子贡之徒存焉，想正名之论，夫子尚无因而发，而处卫之意，诸贤亦莫测其微，故冉有疑之而问于子贡曰：“夫子为卫君乎？”求非以私心窥圣人也，正欲以国之大故，而取裁于圣人也。子贡应之曰：“诺。吾将问之。”赐非智不足以知圣人也，不敢以无征之言，而遽释乎同列也。

然时事犹难于显言，而比类或可以相发。

古有夷、齐，固知其为逊国人也，倘非中道，能无不概于圣心者乎？而不知其清风高节，师表百世，贤人之名，夫子不得而泯之矣。

兄弟逊国，夫子称之为贤人似也，倘存矫激，其中岂能无怨悔乎？而不知其求仁得仁，甘心穷饿，无怨之志，夫子尤深谅之矣。

由是言之，夷、齐之逊国也，以求仁也；其无怨也，以得乎仁也。

假令夷也违父命，而齐也悖无伦，虽窃国为诸侯，不可一日安于臣民之上。

夫惟伯遂其为子，而叔遂其为弟，故弃国如敝屣，可以浩然存乎天地之间。

然则仁不仁之间，乃古人之所以审处，而父子兄弟之际正仁不仁之所存也。以今观于卫辄之事，仁耶，非耶？其于夷、齐，贤不肖何如也？故子贡出而语冉有曰：“夫子不为也。”然后诸侯之疑释，而国之是非定矣。

【评析】文武全才的许孚远及其理熟而词快的八股文

许孚远，字孟中，德清（今属浙江）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年）科中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明史·许孚远传》），随即调至北京。许孚远笃信王阳明良知学说，并兴众讲学，为吏部尚书杨博所厌恶，欲借大计京朝官之机修理他，他便“移疾去”。至隆庆初年，才由高拱荐举起用为考功主事，又外放广东佾事，“招大盗李茂、许俊美擒倭党七十馀辈以降，录功，赉银币，旋移福建”（《明史·许孚远传》）。

万历时，张居正欲打击高拱，驱逐其同伙，有人诬陷许孚远是高拱一党的人，许孚远便被谪为两淮盐运司判官。历兵部郎中，后出任建昌府知府，闲暇时召集诸生讲学。许孚远十分爱惜人才，在建昌府时引贡士邓元锡、刘元卿为友。后擢升陕西提学副使，更是极力培养人才。他移书当路，力荐邓元锡、刘元卿及陕西贡士王之士，后三人并得征用。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擢升右佾都御史，巡抚福建，在这儿，他又一次显示出其文武全才，治国安天下之本领。他曾上疏请敕谕日本斩平吉秀，以打击其攻陷朝鲜之气势，可惜未得应从。福州有民掠官府，许孚远抓了为首者，使祸乱平息。他又在福建及沿海诸岛募民开垦荒地，筑城建营舍，聚兵以守，使海防大大加强。后累迁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又改左侍郎，调往北京。走到半道上，

“被论。乞休，疏屡上，乃许。又数年，卒于家，赠南京工部尚书”（《明史·许孚远传》）。

许孚远笃信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认为“致良知”与孔孟之说无异，但反对“援良知以入佛者”，故与泰州学派的后学罗汝芳及其门人杨起元、周汝登等人有学术上的论争，说明许孚远的思想仍是遵奉儒家正统学说的。这种思想亦反映在他的八股文上，表明他仍是恪遵传统的传统派。

许孚远的八股文清切纯懿，中边俱彻，所谓理熟而词快，是嘉靖盛时的风格。但未失宋人经义的原貌，这在嘉靖末年是为极为罕见的，起到了纠正文风的作用，影响很大，故世人以时文中兴者目之。其题目取自《论语》的《夫子为卫君》一章题文，即是许孚远的一篇代表作。

许孚远是有精深学问的著名学者，经史均烂熟于胸，能信手拈来；他又是一个文武全才，能统兵打仗，考虑问题特别细致周到。这些特点，在《夫子为卫君乎》这篇八股文中都有充分体现。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极强，仅用四百六十九个字，即把孔子不为卫君的原由及子贡、冉有请问时的心态一一叙述出来，准确全面，纤悉不遗，且娓娓道来，文气极安闲，极恬静，故方苞称后来此题的名作均不能及，评价很高。

许孚远的八股文很讲究结构布局，每文必精心构撰，其题目取自《论语》的《故君子名之必》一节题文，以题文为通章结穴，文章能切中事理，不用斡补而题绪清晰，章脉贯通，坚重缜密，大有嘉靖盛时风格，很受人称道。

昔人说作八股制义须十年读书，十年钻研，这是有道理的。许孚远因学识渊博，于经史有极深领悟，故于题旨总能准确切实把握。如取自《中庸》之《肫肫其仁》一题，因题境象深微，极难下笔，而许孚远作此题时，其仁实从经纶中指出，将极难之题写得清雅纯正，里外俱彻，所谓理精则文自高，学识不深之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知止而后有定 一节

◎王锡爵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圣经推止至善之由，不外于真知而得之也。

夫学知所止，天下之真知也，而定静安虑因之，此至善之所由得与？则亦求端于知而已矣。

今大明德止于至善，然后为天德之全，新民止于至善，然后为王道之备，入《大学》而求得乎此也，其亦先明诸心矣乎！

诚能功深于研极之久，而德业之会归者，有以洞晰而无遗。

理得于深造之馀，而人已之诣极者，有以周知而不眩。

是天下之理，本至是而极。而吾之所知，亦与之而俱至矣。

由是知之所在，志亦趋焉。以精而择者，将以一而守也，而定固因于知矣。

志之所至，心与俱焉。有生而虚者，将无欲而静也，而静又因于定矣。

静则安从生焉，私累而道心自裕，其万感俱寂者，即其万境不迁者也。

安则虑从生焉，泰宇宁而天光自发，其百遇皆顺者，即其百物皆通者也。

学至于此，则始也造其理妙契乎体用之原，终也履其事通极于神化之域，反之身心性情之微，而明德之至善，于是而得止也。

推之家国天下之广，而新民之至善，于是乎得止也。则知止之功，其大人止至善之务乎？使不先于知止，则疑似乱其中，而私得以汨之，感应拂于外，而事得以眩之，安望止于至善也哉！

【评析】首辅王锡爵及其融贯经史、 精理明辨的八股文

王锡爵是一个靠八股文写得好而得以致身内阁首辅的幸运儿。而他从政时的行为与表现也证明，他的确在身体力行通过八股文灌输给他的儒家正统观念。

王锡爵，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自幼聪颖异常。乡试名列第四。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年）科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名列第二，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国子监祭酒，以一贯谨慎行事著称。

王锡爵为官后，事事按儒家伦理道德观来办，不畏权势。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王锡爵以詹事掌管翰林院，此时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之父去世，张居正“夺情”任职，这是有违儒家伦理观的，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吴中行、赵用贤等首先上疏力谏，张居正大怒，“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锡爵要同馆十余人诣居正求解，居正不纳。锡爵独造丧次切言之，居正径入不顾。中行等既受杖，锡爵持之大恸。明年进礼部右侍郎。居正甫归治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已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明史·王锡爵传》）。

然而，当张居正去世，受到反对派的肆意攻击，神宗也下令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并抄没其家，将家属发配充军，朝臣都以反对张居正为自己脸上贴金时，王锡爵却挺身而出，上书当权者，指出张居正为相时为国干了很多有益之事，于国有功，不应一棍子打死。

当神宗有废长立幼的打算时，已当了内阁辅臣的王锡爵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力谏神宗早立太子，以定国本。他见神宗不纳忠言，便以母亲患病为名，请假回乡不归，消极对抗。

他任首辅时，还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制造，减免云

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为国为民办了好事。

王锡爵从不恋栈高官厚禄，因政见不同，他曾辞去首辅之位，回乡养老。此后神宗几次召他回任，他仍婉辞。

纵观王锡爵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个恪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人。

王锡爵好学，家中富藏书，自己擅长书画。其小楷清整秀劲，大可径寸，骨重脉和，尤深唐碑。

王锡爵是嘉靖后期的八股文名家，他从事八股文写作的时间基本上在嘉靖后期。此时受时代的影响，明代八股文文风大变，绝大多数人的八股文已偏离了成化、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的传统，芜靡之风大炽。而王锡爵基本上保持了正德、嘉靖初盛时的文风。

他的文章无不遵照传注来阐发题旨，义综其深，典举其大，说理透彻，且能融贯经史，运训诂之理于语气中，指示朗然而不露圭角，虽古厚之气不如前人，然意味雅密，尽题之能事，保持了嘉靖盛时雅醇正大之风格。

他与正德、嘉靖初年的士人一样，遵从八股文格式，但又引入了古文的笔法，运古文气势于时文中，构意遣词，天然合度；开阖顿宕，从容自然，于平淡中求变化，文章较有生气。其《知止而后有定》一节题文，题目取自《大学》，是当时名作，颇能代表其风格。

王锡爵这篇八股文，沿用了成化、弘治、正德时的笔法，而又有古文气脉，全文一气贯注，自然浑成。用词简洁精练，一语不溢，一字不浮，精理明辨。每句义理相承，不创奇格，体用六股，层层阐发，循题写去，题旨毕陈，不愧为一篇名作，为后世传刊揣摩。

王锡爵出身于八股文世家，其子王衡在万历年间亦以八股文名世。王衡乡试中过解元，会试与其父一样，中过榜眼。



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胡友信

圣人不显其敬，而天下化成焉。

盖敬者天德王道之本，不显其敬而敬纯矣，天下有不化成者哉？此子思自下学立心之始而究其极也。

意谓，道有至极，学有全功。吾尝咏不显其德百辟其刑之诗，而得君子为己之极矣。

彼其奏假无言，犹存敬信之心。民劝民威，犹有化民之迹，而君子为己之心，未已也。

是故君子自内省之诚，积而入于神明之域，驯敬信之念，退而藏于渊默之衷。

惕厉固所不存而斋戒亦所不事；矜持固所不作而兢业亦所不知。

天命人心，浑为一机，而无思无为者，忘于己；若启若翼者，忘于天；修身立命之原，诚有鬼神不得而析其机者矣。

天德王道，融为一源，而冲漠无朕者，不为无日；出万几者，不为有敬；天勤民之本，盖有造化不得而泄其秘者矣。

由是神之所存，化必达焉，而天下咸囿于不言之信。

德之所及，举必究焉，而天下默成其不戒之孚。

陶熔于礼乐之中，而其相揖让也非为名分，相歌咏也非为性情，熙熙然各通于圣人之性而莫之知也。

渐靡于刑政之外，而其为善良也非出于感悟，无颇僻也不待于激昂，陶陶然相遇于圣人之天而莫之识也。

君无可称之迹，民无可归之功，朝无颂圣之臣，野无歌德之

俗,此之谓中和,此之谓位育。

至此则无几之可知,而君子为己之能事毕矣。

【评析】与归有光齐名的胡友信及其 理真义精的八股文

嘉靖末年,归有光继唐顺之等人之后,以古文为时文,高视阔步,实大声宏,驾顺之而出其上,名震宇内,之后能与之并驾齐驱者,只有胡友信,举世并称“归胡”。《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便是他的一篇代表作。

胡友信,字成之,号思泉。德清(今属浙江)人。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科进士。授顺德知县。

胡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底,从小即浸淫于八股文之中,故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立身处世,皆以儒家道德价值观规范自己,为人正直,为官勤政爱民。

他任顺德知县时,“岁赋率奸胥揽输,稍以所入啗长吏,谓之月钱”(《明史·胡友信传》)。他一上任,即革除此项弊政,“与民约,岁为三限,多寡皆自输,不取赢,闾里无妄费,而公赋以充”(《明史·胡友信传》),表现出他廉洁自爱的品格和很强的行政能力。

顺德临海,时有海寇侵扰,官兵去清剿,则会骚扰民间。胡友信便采取抓捕海寇内线,捕诛境内海寇头目,不兴师动众的办法,使海寇瓦解。为防备外来大股海寇入侵,他在乡间成立四应社,“一乡有警,三乡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贼,贼不敢发”。

他刚上任时,见法纪松弛,便从严用法,“后令行禁止,更为宽大,或旬日不笞一人”。

《明史》说他“治县如家,弊修堕举,学校城池,咸为更新。督课邑子弟,教化兴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祭”(《明史·胡友信传》)。

胡友信在释褐前一心攻读《四书》、《五经》,专习八股时文,刚中进士即任一县之令,在任上政绩斐然,显示出很强的行政管理水平,获得百姓如此尊崇,不能不说长期的八股文写作对他确实起到了培育作用。

胡友信能于青史留名,《明史》将其列入《文苑》人物列传之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八股文能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为官功绩只是八股文写作对他长期陶铸的结果。

胡友信博通经史,其文沛然出之,雄深博大,虽无长篇大论,局敛而气自开拓,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卓然自立,很受八股文界的推崇。其文被选入各种选本,有无数士人揣摩学习。《明史》中说:“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归有光)、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明史·胡友信传》)

胡友信的八股文具有理真义精的特点,虽然受时代风尚的影响,胡友信不再恪遵传注,对经文的理解也参入己意,但从大旨而言,并未背离儒家正统观念。这种特色的形成固然与其处于嘉靖、隆庆之际,反程朱理学的思潮尚未大炽有关,也与胡友信学识广博,对经史皆能领悟其精要不无关系。正因为其文内容可归入雅正之列,所以明清两朝统治者都把它们当作范文供天下士人学习观赏。其《臣事君以忠》题文,题目出自《论语》,文章只体味尽己以洗发“忠”字,便亲切入理,无血性粗浮。惟其理真,故全文一气贯注,结构谨严。

胡友信的八股文理真义精的特点,表现之一是其文无不肖题。作八股文,要讲题理、题神。此外各题都有其形貌,所作之文必与之相称,而后才能肖题。胡友信的《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题文是其代表作之一,方苞称赞此文非徒入理深厚,并与题之形貌相称,是八股文肖题的典范,以之作例,可备一体。

朱熹在其传注中说:“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胡友信在文中阐释笃恭是内省敬信之所积而自致者,就如驯己正南面,是敬德之容一样。朱熹在《中庸》第三十三章的总注中说:“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可见“笃恭”也是效验,胡友信在文中不用力作转语,故文与题之形貌相合,否则便会使文章变成阐述“笃恭而驯致乎天下平”,就有失题旨了!可见胡友信思理精细,得题之神,气力深厚,文必肖题,笔墨已至化境。所以王巴山称赞此文为“思泉集中神到之作,但觉元气淋漓,不复见为苦心烹炼”。方苞称赞此

文“刻摯之思，雄古之氣，非獨入理深厚，並與題之形貌亦稱”。細讀此文，知這些評述並非虛譽，確實概括出該文的特點，也即胡友信八股文之一個特點。

卷之二





书同文,行同伦

◎胡友信

天下之宗周,于文与礼见之也。

夫文也礼也,皆周天子考之议之以统一臣民者也,而今皆无不同焉,可以观为下之不陪矣。

且夫制作有一定之权,上下有相安之分,在古帝王之世,罔不皆然。今稽周道,尤其灿然者矣。

彼五方之声音不相通矣,列国之纪载不相袭矣,宜乎文有不同也。而不知是文也,乃周文武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考之,以建数百年人文之极,天固纵之以奕世无穷者也。今何时也,而敢有不同乎?是故天子为先世守谟训,诸侯为天子守图籍,卿大夫以下为诸侯守天子之典章。点画形象不同,而所以效法者无不同也。轻清重浊不同,而所谐声者无不同也。虽鲁有《春秋》,晋有《乘》,楚有《檮杌》,莫非左右史之馀编。至于杞有夏时,宋有坤乾,亦无复《禹谟》、《汤诰》之可言矣。盖周家开斯文之统,则天下属斯文之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固天之道也,世之纪也,而敢有不同者哉!

五方之风气异齐矣,民生其间异俗矣,宜乎礼有不同也。殊不知是礼也,乃周文武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议之,以开数百年人道之端,天固启之以垂范无已者也。今何时也,而敢有不同乎?是故君臣莫不同敬,父子莫不同亲,夫妇、昆弟、朋友莫不同序别信。小而周旋,裼裘之仪无不同也。微而进退,出入之度无不同也。虽鲁之尚亲,齐之尚贤,魏之尚俭,莫非大司徒之遗教。至于杞有典则,宋有风愆,亦无复夏忠商质之可言矣。盖周家为皇极之主,

则万世为皇极之中。循之则治，失之则乱，此固天之道也，世之纪也，而敢有不同者哉！

【评析】雄浑典雅、理足气充的大师八股

胡友信的八股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布局宏阔，大气磅礴，精神一气贯注，使其文章具有浑浩流转之势。题目出自《中庸》的《书同文行同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书同文，行同伦”二句，按照《四书集注》中的传注，是“言天下一统也”。该文抓住“同”字，阐释周天子以德一统天下之气象，全文大气盘旋，精神充实，黄钟大吕，雄浑典雅，被王耘渠称之为“典制题之极则”，说“自来以思泉先生配震川，以集中有此巨制耳”。江若度则夸它“精微广大，真是文章巨观。此在先生集中，是最上乘文字”。马君常则感叹说：“高文大篇，不读此不知先辈开辟手也。”（以上引文，均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只要认真读一下该文，便会感到有一股浑浩之气贯串全文，称得上是理足气充，故知上述评语并非虚誉。

该文结构上也有特点，以两大股分别阐释“书同文”与“行同伦”两句，这种结构方式已具有隆庆、万历时文的特征。由于周文武是应运而兴，所以有议礼考文之事。文武便是德，应运便是时，应运而兴便是位，以此而议礼考文，为臣下者哪能有陪上之理，这些都是本题真正的脉理。故出股的股头以“是文也”三句，抉出所以同之故；以“天子为先世守谟训”三句横写同字，“点画形象”四句竖写同字，“虽鲁有《春秋》”七句应证同字，“周家开斯文之统”至末，又归结到周文武应运而兴以作收局。每股中环环相生环环相扣，逻辑关系极为严密，将“书同文”之精义揭示无遗。

受时代的影响，胡友信也融液经史，以古文为时文，所以他与其他人一样，十分重视移植古文的写作方法，对传统的八股体式也有所突破，其八股文往往写得机巧工整，非常人所能及。如其《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一章题文，构思巧妙，结构谨严，篇法、股法俱求精雅，“清机洒脱，使阅者心且一开”（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



语)。其《天下有道》一章题文，被方苞誉为“气清法老，古意盎然，几可继唐（唐顺之）、归（归有光）之武。”（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

由于胡友信的八股文具有以上特色，故被人称为八股文大家，并将之与归有光并称。然而胡友信为文过分追求技巧，常有雕琢之痕，不若唐顺之、归有光之文“出之若不经意”。其文虽体大思精，理真法老，但由于在古文与八股文的融合上尚未达炉火纯青之境界，故古文疏宕之气，先正清新之韵在其文中就难找到，这也是作者所以不及归有光、唐顺之的地方。

不过，胡友信的八股时文追求理足气充，且大体不违传注，又机巧工整，容易为后学者仿效，故其文在万历以后的八股文坛，流传摹写，仍享有很高声誉。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邓以赞

即刑罚所以失中，知礼乐不可废也。

盖刑罚系民甚重也，以礼乐废而不中，君子能不求其端哉！

夫子意曰：政有相因，敝有必至。名之不正也，其渐之敝，可一二道哉。

礼乐所以饬治，刑罚所以惩奸，皆政之大也。然唯极辨之朝钦恤于五用，亦唯大顺之世尽心于一成，两者相反而相为用也。

今以名之不正，至于礼乐不兴也。

是品式之等差，所为取象于高卑者，皆坏而不饬。

声气之流动，所以幽赞于刚柔者，悉敝而不修。

夫礼，序也。序之反为紊，即无所不紊，而刑罚之用，亦颠倒而失其平。

乐，和也。和之反为乖，即无所不乖，而刑罚之施，亦暴戾而失其理。

非有以整齐其型范而几民之兴行不能也。既蹈于无知，又以恣肆之身临之，将不严天威，不敬民命，唯凭其意周内之而已矣，安望其中伦而悉无偏倚乎？

非有以荡涤其邪秽而希民之向方不能也。既扞于文网，又以惨刻之心绳之，将疾痛不相关，死生不相恤，唯任其意文致之而已矣，安望其中则而果无低昂乎？

狱之为条烦而难稽，刑之属数千，罚之属亦数千，非娴于节文而平于好恶，必不能有伦有要，而详其丽于法之中，不详其丽，不中也。

狱之为情变而难尽，或上刑则适轻，或下刑则适重，非观于会通而融于拘挛，必不能惟齐非齐，而权其比于法之外，不权其比，不中也。

出乎礼即入乎律，降典与布刑非二物也。故礼之坏也，其究即刑之滥也。

喜之中节为和，怒之中节亦为和，用乐与用刑皆此心也。故乐之崩也，其究即刑之淫也。

吁！由此而正名之宜先，岂不深切著明哉！

【评析】邓以赞及其恪守雅正传统的八股文

在隆庆、万历时文趋新逐异，文风大变之际，邓以赞是一个坚持雅正传统，能“综览古今，直写胸臆”的异数。

邓以赞，字汝德，新建（今属江西）人。从小即聪颖异常，又好读书。他幼时，见父亲与人论学，便牵着父亲的衣服尾随而去，间或答几句话，竟像是有学养的老儒之言。

邓以赞也是一个追求新潮流的人，未第时曾从王阳明的高足王畿游，接受了良知学说。然而，在为人处事上，他仍遵奉儒家的伦理价值观，“笃于孝行，躬行实践”，“品端志洁”（《明史·邓以赞传》）。他的八股文写得理正气足，颇有嘉靖以前之文风，“无流入禅寂之弊”。

隆庆五年辛未（1571年）科会试，由辅臣张居正出任主考，他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根基出发，要矫正“嘉靖末年芜靡极矣”的八股文风，下令“试题必明白正大，无或离析章句以为奇异，无或避忌趋好以长谀佞。抡文必崇尚雅正，无或眩华遗实以滋浮靡。有能综览古今，直写胸臆者，虽质弗弃。非是者，虽工弗录。”（《张太岳集》卷之七《辛未会试录序》）邓以赞刚好参加了这届会试，他的文章既雅正又风逸，便与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一起被张居正取中。邓以赞“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而元忭以廷试第一，授修撰”（《明史·邓以赞传》）。他们的墨卷还被张居正下令刊刻，颁示天下，以作范文供天下士人揣摩学习。

然而，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八股文发展至隆庆、万历，变革之举，势在必行。尽管张居正以其无上的权力力倡文归雅正，他在世时也一度起过一定作用，等他一死，八股时文的变革狂潮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且涉及内容、文体、语言等等各个方面，这是张居正始料所未及的。连邓以赞、黄洪宪、张元忭这些被张居正树为样板的传统派八股文名家也难免受到影响，其文也在与时俱变。邓以赞且对张居正这位恩师一些不合儒家正统观念的行为“时有匡谏”，令张居正大为不悦，他本人也只得称病退隐田园，这也是令张居正所始料未及的。

邓以赞受八股文所灌输的儒家观念浸染太深，居官每以直言。他曾几起几退，先后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皆因事不久即力辞而去。《明史》说：“以赞登第二十馀年，在官仅满一考。居母忧，不胜丧而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洁。”

邓以赞作为传统派八股文的代表，其文之特点，首先表现在其内容的雅正上。他深明书理，且认题细，文皆切合题旨，自然会符合雅正的原则。

邓以赞文在内容上的特点与嘉靖以前那些八股文名家相比，尽管在对经文的理解上也时出己意，并非恪遵传注，但并没有多少突破。他之所以能在隆庆、万历时卓然自立，自成一家，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追随时代的步伐，在文章的作法上追求完美与完备，使其文具有很高的技巧而又巧妙无痕，古文与时文的融合在其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深受时人的推崇并成为揣摩的对象。这一点在其《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一文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篇八股文的题目出自《论语》，朱熹对这一节经文的传注中说：“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

邓以赞在文章中根据传注来阐发礼乐与刑罚的关系，从礼乐不兴内讲出刑罚不中的原因，揭示礼乐不兴则刑罚必会出现种种弊端。因作者洞悉个中原委，后比从刑罚中想出礼乐精蕴，剖析精详，其理则融会六经，又切中时弊，无一句书生气，也无一字宦稿气，称得上深厚尔雅。作者还有独到之处，其后二比从礼乐说到刑

罚用顺递，股头说无礼乐所以用刑罚，补义精密，这层意思以前无人见到，为作者独到之解，足以补传注之不足。由此可知邓以赞虽然在内容上遵循儒家经典，但由于学识广博，文中又时有精当之己见。

这篇文章虽理境精深，却在文章体式、用语及作法上均突破了传统。为了将礼乐与刑罚的关系阐释详尽，作者用的不是八股而是十股；因明代锦衣卫等滥用刑罚之现象十分突出，为了针砭时弊，作者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对传统有所突破，使用了一些先秦之后的语言，如“文网”等等。至于其作法，则与古文没有区别。方苞称此文“其气则浸淫《史》、《汉》，其法则无所不备”（见《明文钞》五编该文之评语），这是有其道理的。这篇文章的“篇法、股法，有前后，有深浅，有虚实，有顺逆，有平侧，有分合，百法俱备，无美不臻”（见《明文钞》五编该文之评语），使一篇八股文如同一篇论述性古文一样，可见邓以赞受时代影响之深。



女有餘布

◎汤显祖

有无售之女功者，弊在不通功也。

夫女而餘布，无复用之矣，不通功弊至此乎！

且天地物力，不可独不足，不可独有餘，如子说，特农有餘粟乎！

女之有布，岂徒使之自有餘，固将持杼袖之劳，以佐时之急，因而收尺寸之利，以补己之闕耳。

乃今功不通矣，女功其何售焉，事不易矣，内事将安鬻之？

所谓女之用，不过一丝一缕可以卒岁，而卒岁之外，竟不得而贸易之也，遂将为长物乎？

所谓布之用，不过一裘一葛以备裳服，而裳服之外，不可裂而别用之也，得毋有虚积乎？

蚕而縲之，苧而织之，女非少怠也，而用不加广，沉积而莫货，徒以其物填笥筐耳。

寸而累之，尺而成之，布且日多也，而货不益贵，壅滞而难售，卒亦朽紕而不可用耳。

夫耕问农而织问女，各有司也。一人织而数人衣，互济也。

女餘于布，于女得矣，如不织布而衣者何，必有因而受其寒者，是无布者病也。

布自有餘，于布足矣，奈出于布之外者何，且有因而怠若事者，是有布者亦病也。

况天下之功，不止一女，而无用之积，尽如此布，然后知通功易事之不可已也夫！

【评析】才子型的八股名家汤显祖及其 清纯生动的八股文

在高手如云的隆庆、万历八股文坛，汤显祖是一个出类拔萃者。当时有“江西四雋，缺一不可”之说，这四个人即邹泗山、万国钦、汤显祖、叶修。他们同是江西人，同为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科进士，且同是隆庆、万历年间八股文名家。邹泗山以文风冲夷，万国钦以简古，汤显祖以名雋，叶修以理解精醇、机法绵密著称于世，故又有“四雋一榜并列”的说法。到清代，赵吉士则把他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归有光、胡友信、杨起元等并列为明代“举业八大家”（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七），特别推崇他的八股文。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只讲汤显祖的文学成就、戏剧作品，却只字不提对其一生思想和文风有重大影响的八股文，因而对汤显祖的认识和研究就只能处于一个浮浅的层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海若、海若士，自署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所居书斋自名为玉茗堂、清远楼。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为中国明代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他的传奇作品“临川四梦”，以横溢的才华和遒劲的笔墨塑造出生动而又丰满的艺术形象，同时也融会了晚明进步社会思潮的精华，使其登上了时代思想文化的顶峰。

汤显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四代皆有文名。祖父汤懋昭，幼年即补了弟子生员，地方上的读书人推他为“词坛上将”。其父汤尚贤，少年时即为廪生，知识渊博，作文古奥，是位举行端方的儒者。汤显祖生于这样的家庭，自小即受八股文和诗文写作的训练，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因八股文讲求排偶，他从小即学会作对子。五岁时以善于作对子而闻名于乡。十三岁时，县学训导主持考试，要汤显祖回答所谓“形而上”这一难题。汤显祖指着课桌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县学教官无不惊叹称奇。次年，他即考中秀才。二十一岁时中举，声名大著。

从小即开始的八股文写作,使儒家正统思想在其头脑中深深扎根。他中举后进京会试,这时首辅张居正为网罗海内名人,以壮大子侄声势,特邀汤显祖与其子交游。汤显祖为人刚正,认为这与圣贤之道不合,毅然拒绝。结果,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科、八年庚辰(1580年)科两次会试,张居正的两子嗣修、懋修分别中了探花、状元,而才华横溢的汤显祖却名落孙山。直到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即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二年,汤显祖才考中进士。次年,被授以南京太常寺博士之职,后任南京礼部主事。

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天下灾异相连,三月又逢星变,汤显祖忧国忧民之情大涨,便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误国,字里行间对神宗皇帝也予以讥刺。为此,他被贬为徐闻县(今属广东)典史。两年后,迁任遂昌县(今属浙江)知县。

汤显祖在遂昌任职五年,显示出很强的行政才干,他为民兴利除弊,政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的事迹,在遂昌百姓中代代口耳相传,直至道光年间,其《听说迎春歌》犹在当地传唱。然而,此时已是一个不要理想,不讲人格,只认金钱的时代,汤显祖所奉行的儒家道德观和价值观已不合时宜,虽然汤显祖在遂昌深受百姓爱戴,可是由于他对朝廷的腐败政治始终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所以受到朝廷当权者的排斥。汤显祖开始察觉到这个社会与自己的理想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决计投劾还乡。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首辅沈一贯等人借察政之机,以“浮躁”的罪名将他罢职“闲住”。从此之后,汤显祖在临川过着隐居著述的生活,直至病死。

纵观汤显祖的生平,可以看出在他任遂昌知县之前的岁月里,虽屡经挫折,还保持着一种极力探求社会和人生出路的积极态度。此后,他因无路可走,奋斗终究归于失败而看破红尘,陷入了“厌逢人世懒生天”(《汤显祖诗文集》卷一四《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诗,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深沉悲哀之中。他的所有文字,包括其文学作品和八股文,也以此为分界线,大致呈现出比较昂扬或比较低沉的格调。

早年,儒家正统观念在汤显祖的头脑里占据统治地位。虽然

他在少年时期即拜王阳明学说的分支泰州学派著名学者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为师,但直到他中进士之前,泰州学派的思想并未对他造成大的影响。他的诗文,特别是他的八股文中所表现出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即便是到了汤显祖被追论削籍,回乡闲住,在指点那些慕名而登门求教八股文的弟子,如中进士后当过达州、遵义知府,官至福建盐运使的黄太次;号称临川“后四才子”的晚明八股文大家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等人时,他仍授之以正统的儒家观念。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四人在天启、崇祯年间能掀起一场八股文回归传统的运动,与汤显祖的教诲不无关系。

汤显祖的八股文一般都思想纯正,然而针对性强,言之有物,无当时的空疏之风,且讲究写作技巧,这从他十四岁考中秀才的《女有餘布》题文中即可看出。

这是汤显祖十四岁考秀才时的试卷。试官读后大为惊喜,说:“一尺布作九州被,真奇才也。”(见《小题初集·启蒙》该文评语)立即将其取为生员。

此文虽是考场中的急就篇,且汤显祖当时还是个少年,故显得有些稚嫩,但能因小见大,理精气足,故令试官一见即感到惊奇。文章须阐释女所织之布不通功必致有餘,一有餘不但积压无用,且会带来种种弊端。这些意思须一层层推出,题目却不能混拈,因为这个题目之上文为:“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輿,皆得食于子。于此有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輿,而轻为仁义者哉。”如混拈,便易与题之上文相连,犯连上之病。汤显祖却分拈“女”字和“布”字,两层一线,次第相生,脱卸承接之法运用自如,即便是老手也不能超过他,从而使得篇法极为谨严,极为明了,加之内容又合乎传注,并一气贯串,故成为一篇佳构,令试官一见称奇,在八股文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我未见好仁者 一章

◎汤显祖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圣人慨成德者之难，因言弃德者之众焉。

夫好仁恶不仁非绝德也，特自弃者不用其力耳，圣人所以重有慨与。

想其意曰：君子之学也，以为仁也；君子之成仁，以其能自力也。有仁焉而无力以成之，吾能无慨然于今乎？

于今观之，仁可好也，而好仁者我未见也；不仁可恶也，而恶不仁者我未见也。

好仁者之名，夫人乐得之，而吾以为未见者，以好非感发之好，乃无以尚之之好也；

恶不仁之名，夫人乐得之，而吾以为未见者，以恶非愤激之恶，乃不使加身之恶也。

惟其如是，是以难也，虽然，未尝难也。

有人焉奋然而起，深明乎仁不仁之分；

惕然而思，实用乎好恶之力。

吾知有弗好，好则仁必从之，盖无以尚之之好，亦起于一念之好也，我未见好仁者，亦何尝见好焉，而力不足者乎？

有弗恶，恶则不仁必去之，盖不使加身之恶，亦起于一念之恶

也,我未见恶不仁者,亦何尝见恶焉,而力不足者乎?

盖天之生人不齐,人之受质非一,则力不足于用者,或有其人。

而有志于仁者恒少,无志于仁者恒多,则吾之于斯人也,实未之见。

夫力之足不足也,以用而见也,未有以用之,胡为而遽罪乎力?

仁之成不成也,以力而决也,未有以力之,胡为而绝望于仁?

然则吾之所见者,非天有所限,彼自限之而已矣,非仁远于人,人自远之而已矣。安得实用其力者,一起焉而副吾之望哉?

【评析】才子笔下的八股文具有文学色彩

汤显祖是以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来写八股文,故其八股文无论是语言或格调,都带有文学的色彩,其文有明显的古文化趋向。明末文士陈名夏在《汤海若先生制艺序》中说,汤显祖的“古文词及诸制艺,巧心俊发,鲜采动人,魏晋诸名士不足多也。为魏晋者有真有伪,学既荒塞,取资偶丽,貌既狞恶,而粉饰盛容,此有识者之所过而羞也。若先生文有其质,言有其则,镂刻万物之形,巧夺前人之义,虽未纯乎大雅,岂不卓然领袖于英华之苑哉”。这种说法切中汤显祖时文的特征,其题目出自《论语》的《我未见好仁者》一章题文墨卷即是明证。

这个题目之全文为:“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朱熹《四书集注》对这个题文的注释为:“夫子自言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故其所以为仁者,必能绝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难得而见之也。”

汤显祖这篇八股文,谨守朱熹传注,将题旨归纳为孔子“慨成德之难,因言弃德者之众”这样一个主旨,以八股格式,层层深入地将这个主旨全面地阐释出来,显示出汤显祖对儒家经典

把握之准确、深入。

汤显祖是个文学家，其行文主张“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汤显祖：《合奇序》）。这种观点，在其八股文中也得到体现。这篇文章就语言平易，条理清晰，不引经据典，不使用晦涩古奥的词句，却使孔子的思想“神气毕出”。

汤显祖是个杰出的戏剧家，最善于塑造人物形象，他的这种艺术才能在其八股文中也有所显现。他的八股文最擅长入口气代圣贤立言。由于他学识渊博，能发题旨之精义，又有艺术才华，能将这此微言奥旨以圣贤的口气生动传神地表达出来，故使其八股文显得深刻、生动。本文摹仿孔子语气代其立言，由于汤显祖从题文中牢牢把握住了孔子说此话时的心理与思想精义，在行文上大量使用问句，恰当地使用了语气词，便让人觉得真的是孔子在娓娓而谈，使此文具有了其他八股文所难以具有的吸引力。所以方苞将此文选入《钦定隆万四书文》，并称赞它说：

“无事钩章棘句而题之层析神气毕出。其文情闲逸，顾盼作态，固作者所擅场。”

方苞的看法是非常准确的，将汤显祖的八股文为文学家的八股文这一特点揭示得十分准确。



其君子实 四句

◎汤显祖

**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箠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商人备物以迎周师，亦可以慨世矣。

夫周无君子小人，皆商有也。去之已可慨矣，况至以商迎周耶？

且帝王代兴，当揖逊之时，天下已相迎也；当革命之时，天下犹相迎也。南河之讴，北狄之怨，有由来矣，商、周新故之际亦然。

武王之次商郊也，犹昔观兵之意也。使纣也虽无同好，有与同恶，则若林之众，犹未得前歌后舞而入也，事乃有不然者。

商之君子非士大夫耶？周师入，君子怒，可也。何乃筐厥玄黄，迎周之君子也。父师奴，少师剖，币聘之风斩然。彼虽君子，诚不若生于周者，得以贤其贤而亲其亲也。今而后喜可知矣。得同君而臣之矣，不以拾矢为贄，而以好币相先，何温然堂户之交宾也，岂其中无一忠臣哉？天命之矣，不亿之亲犹将往焉，而又何论于今日之君子也。盖望周之将相来久矣。

商之小人非故百姓耶？周师入，小人戚，可也。何又箠食壶浆，迎周之小人也。老人刑，姐已笑，仇饷之思荡然。吾侪小人，诚不若生于周者，得以乐其乐而利其利也。今而后喜可知矣。得同君而氓之矣，不以饱己之师而迎人之师，何藹然田野之相饷也，岂其间无一义士哉？天命之矣，有二之众皆先往焉，又何论于今日之小人也。盖望周之卒旅来久矣。

由是得意于群臣百姓，因而为王者新主也。得罪于群臣百姓，不可复赦者旧君也。今日之为君子小人者，此商人也。他日之为多士多方者，亦此商人也。由商周而后，人情向背，又可胜道哉！

【评析】非真才子无此穷极工巧之作

汤显祖是个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其为文又具有才子的特点：文章讲究技巧，富有文采，其《其君子实》四句题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的题目，按朱熹的传注，其意思为“言商人闻周师之来，各以其类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民者诛之，而不为暴虐耳。君子，谓在位之人。小人，谓细民也。”本文就围绕商朝百姓喜迎周武王伐纣之师的情景，对题旨进行深入全面的阐释。隆庆、万历时八股文坛专讲机法，汤显祖也不例外。文中作者施展才情，使用唤法、转法、应法、宕法，先揭示商人相迎周师之原由，后写相迎之场面。虽用巧法，然大雅天成，而不伤于纤佻，因为其书卷味浓，而笔姿有若天授。文章打破八股体式，只用两大比，或就上下两君子、小人生情，或就迎字生情，或就玄黄簞食壶浆生情，或在题前，或在题后，顿挫跌宕，一步一曲，如游武夷山，步步引人入胜。其对仗的工巧，还是馀事。作者熟悉典籍，融液经史得心应手。文中写君子怒用《诗经》，写小人戚用《左传》，都恰到好处。

汤显祖才华横溢，故此文写得文采斐然。储同人称作者“笔授天花，胸罗万卷，一气写去，穷工极妍”。方苞说此文“局势通博，一句一字，穷极工巧”。王巳山说此文“近照救民水火，远注举首而望，欲以为君妙于题中四其字两两对照，运掉清妍，顿挫微婉，致有深意。但以绝妙好辞相赏，犹不免辜负渠侬”（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吴蔚若称它为“绝世奇文”。如此等等，可见八股文界对其评价之高，推誉之盛。而汤显祖以其生花妙笔写时文，当然会被人视为“人巧极、天工错，这便是才子手段”（见《明文钞》五编中之《民之归仁也》一文之评语）。



春省耕而补不足 为诸侯度

◎董其昌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先王游观为民，而民咏之也。

甚矣，先王之虑民周也。游观补助而皆颂之，真夏后氏之风哉！

晏子意曰：急民情者，莫急于赈穷；孚主德者，莫孚于巷议。古者天子诸侯一游观而民赖民歌也，何哉？

吾尝按其岁时，考其方略，见其春而耕则省之，秋而敛则省之。省耕敛而有不足不给之民，则补且助之。

斯时也，躬巡览者不闻有清尘警蹕之娱，独目击民艰，而议施议贷之条无岁不下。

执耒耜者不闻有供马赋车之役，维时邀主泽，而春作秋成之务靡室不宁。

美哉治也！非古盛王之世，何睹此乎？吾观夏谚为天子旬巡而作也。

彼不徒病一人之游豫，而若以不游不豫为己悲。

彼不徒幸方内之恬豫，而又以贞度式侯为万方庆。

夫田间氓庶非能巧饰于声歌也，故其称说朝廷为最质藉。其时耕敛乏资，春秋失望，安能以郁郁无聊之思，强为欢笑耶？

里巷歌谣非欲求媚于天子也，故其发抒性情为最真藉。其时

不足莫补,不给莫助,宁肯以显显太平之颂,谬为扬厉耶?

是知志游观者,惠行于陇亩阡陌之间,乃非慢游。

希哲王者,德入于闾阎传宣之口,乃称至治。

吾君欲比先王乎,则夏谚具在,毋令独蒙美声焉。

【评析】书法大家董其昌及其工巧流丽的八股文

在万历年间,董其昌不仅以其八股文,更以其对八股文的写法作过系统的研究,总结出“九字诀”而闻名于八股文坛。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举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科进士,授庶吉士。

董其昌重情义,礼部尚书、八股文名家“田一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明史·董其昌传》),博得世人称赞。回来后授编修。皇长子出阁,他充任讲官。后“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明史·董其昌传》)。

天启时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后擢升本寺卿,兼侍读学士。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拜南京礼部尚书,以魏忠贤等阉党柄政,屡上疏乞休,后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八十三岁时卒。

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以善书“名闻外国”。其书风率易中得秀色,章法秀逸疏宕,为一代大家。又擅山水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明史·董其昌传》)。论画标榜文人气息,以佛教宗派喻画史各家为“南北宗”,推崇南宗为文人画之正脉,影响波及至今。他还“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其性格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们把他比之为米芾、赵孟頫等大师。

董其昌还是万历时一个有名的八股文高手,只不过其文名被其书画名所遮掩,不被后人所知。

董其昌的八股文亦属才子型,为文潇洒,讲究韵致,讲究词藻,讲求工巧。出于其才子的不羁个性及受时代的影响,其文无论

是在形式或内容上,都对传统的格局有所突破。在内容上,他虽然不敢公然离经叛道,却不株守程朱传注,时有己意参入。在形式上,他亦不株守八股程式,时常别出心裁,颇见工巧。这些特点,从其八股文代表作《春省耕而补不足 为诸侯度》一文中可见一斑。

这篇八股文文题出自《孟子》,《四书集注》中朱熹对题目的传注说:

“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补助之,故夏谚以为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诸侯皆取法焉,不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也。”

董其昌这篇文章其内容大体上遵循了朱熹的传注,但他却抓住百姓感戴之“情”这个理学家们禁言之词大加铺叙,便与理学家们拉开了距离。他在起比中摹写题之上半截,将下半截情事涵括在内。后二比从夏谚生情,即紧抢上半截,揭示百姓因受惠而感激,故其情真意切。正因作者不拘泥于题面,“全以叹想传情,畜君意已奕奕生动。上含下抱,神理绵密,韵致殆不减玉茗(指汤显祖)”(见《明文钞》五编该文顾备九之评语)。

这篇文章,以晏子的口气代言,由于作者才情横溢,将晏子的心理琢磨得很透,且以其丹青高手之笔,将其言刻画得细致生动,使晏子的形象跃然纸上,非一般八股文高手所能比肩,这就是才子手笔的魅力。

隆庆、万历是个推重机法的时代,研究古文和八股文的作法蔚然成风。董其昌是个对理论很有兴趣的人,他善书即有书法论;他会画画,即有画论。同样的,对八股文,他也有精到论述,这集中体现在其论八股文的“九字诀”中,因资料难觅,特抄录于下,以供有兴趣者揣摩,也为研究董其昌的人提供一段难觅的资料。

华亭九字诀

董其昌

一曰宾。

昔洞山禅立四宾主,主中主,宾中宾,宾中主,主中宾。故曰:“我向主位中来,尔向宾位中接。”又曰:“忌十

化，作文谓以变合正。古文耸动人精神者，莫如《国策》。策士游说，不曰不如此不利，而曰不如此必有害。其所以敲骨打髓，令人主陡然变色者，专用此法也。韩昌黎说周公好士，正言已尽，却又一反云向使周公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无圣人之才，而非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宁止吐哺握发之勤而已哉。得此一反，并吐哺握发，精神奇警。时文有全篇用反者，如君子三戒，戒之在色，戒斗、戒得，只应痛说色、斗之为害，而戒字意自明。若随题讲云若何以戒之，则俗格矣。癸酉，南京江文明《修身则道立》墨卷，讲完修身，则道立，云：“不然，天下虽有观刑之心，而君极未立，其何以近天子之光哉。”得此一反，则则字精神遂露，便有责望哀公意，不止说效矣。又如癸未《孟子》程文讲“孔子有见行可之仕”句云：“不然东周之志，三代之思，将托之空言矣。”皆是淡中设色。

四曰斡。

李长吉云：“笔补造化天无功。”此斡之所自始也。以时文论，虽圣贤语，岂无待作者斡旋处？如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既平世矣，何为却须三过其门不入？程文则云：“盖洪水艰食，天下虽若犹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则天下有所赖以平也。”出人意表。故凡题中有缺漏处，须用意斡旋。

五曰代。

代者，谓以我讲题，只是自说，故又代当时作者之口，代写他意中事，乃为注于不涸之源。且如《庄子·逍遥篇》说鸢鷖笑大鹏，须代他说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说鸢鷖笑之，不足矣。又如太史称燕将得鲁连书云，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齐人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此非代乎？时文如邵北虞桃应问曰：“文云居舜之地，谅舜之心，必将曰在朝廷则情为重，法为尤重。而时穷于不

可夺。在海滨，则天下为轻，亲为重，而法泯于无。”所加是代也。凡作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非执定死煞者也。

六曰翻。

刘勰曰：“词微实而难巧，意翻空而易奇。”夫翻者翻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虽一成之案，能翻驳之。文章家得之则光景日新。且如马嵬驿诗凡万首，皆刺明皇宠贵妃，只词有工拙耳。最后一人乃云：“尚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翻尽从前窠臼。曹操有疑冢七十二，古人有云：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已自翻矣。后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虑及于是，七十二冢必无真骨。此又翻也。昔齐鬼说善解结，邻国以必不可解之结致齐王。齐王令鬼说解之。鬼说曰：“此结不可解，臣乃以不解解之也。”此非翻乎？又如法眼和尚曾问徒弟曰：“猛虎项下金铃是谁解得？”人多不能对。其后有一僧出曰：“系者解得。”此非翻乎？时文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来曰：“有尧舜为之祖父，则难有朱均之不肖，而无改于唐虞之令名。有幽厉为之祖父，则虽以宣平之中兴，而无补于二君之逆德。”又云：“不然，则暴其民者得一贤子孙足矣，何足惧哉。”此善翻案者也。唐荆川《匹夫而天下》文云：“舜不遇尧，一耕稼之夫而已矣；禹不遇舜，崇伯之子而已矣。”俱是翻格。

七曰脱。

脱者，脱卸之意。凡山水融结，必于脱卸之后，谓分支劈脉，一起一伏。于散乱节脉中直脱至平夷藏聚处，乃是绝佳风水。故青鸟家专重脱卸。所谓急脉缓受，缓脉急受。文章亦然。势缓处须急做，不令扯长冷淡。势急处须缓做，务令纡徐曲折，勿得埋头，勿得直脚。

八曰擒。

杜子美曰：擒贼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种子，擒得真种子，则所谓口口咬着。又所谓点点滴滴雨都落在学士

眼里。且如王文恪、邵北虞皆有《五就汤五就桀》文字。若以纵横逸宕论，邵作似胜。但文恪小讲云：“择君而事者，智士之所以定其交也。委心不变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则有不必然者。”便高出邵公几等。何则？此题真种子要在何必同，而邵却单做伊尹五就。虽词章挥霍，已离于宗，故不得为大家。己卯石昆《王舜亦以命禹》墨卷，承即云：“道至于中，则不宜有所异也。”以后云：“中之上本无所加，而圣人又何所加于此中之上乎？”此是题中真种，擒得此，不必照顾亦字，而未尝非亦字矣。萧会元《如有王者》，破云：“无近功者也。”一篇主张，不出此三字。魏昆溟破云：“志其盛也。”便自走作。此全在有识。

九曰离。

文字最忌排行，贵在错综其势。散能合之，合能散之。离者，散也。左氏《晋语》云：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早谕教，选左右，是两事也。贾谊《政事疏》却云：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此是早谕教。下云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此是选左右。以此二事离作两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后，皆画段为文，少此气味矣。时文《如出门，如见大宾四句》，主敬行恕，后来印板也。陶石簪作此题，先将出门使民二句相对，却用一过文另做“己所不欲”二句，破板为活，深得离之趣。

董其昌以其广博的知识，精湛的学力和八股名家的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九字诀”，被世人视为“后学津梁”，流传甚广，使董其昌在书、画之外，又获一赫赫声名。不过，他对“离”字的解说不甚得当。张侗初有云：“题本如此，文却如彼，离而不出乎宗，所谓意与题相生，不与题相迫，解此方知离字妙用。”（见《分课小题续编·发凡》）张侗初的批评是确当的。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赵南星

圣人戒谄而及于妄祭者焉。

夫谄而用于祭，侥幸之极思也。此夫子举之以示戒欤。

且夫古之君子，不回遁于势利，是以上交不谄。天下之有谄也，则世道人心之邪也，而孰知其无所不谄哉？昔者圣王之制祀典也，比之以其类，凡所祭者，皆出于心之不容己；秩之以其分，凡所祭者，皆出于礼之不可废。

若乃非其类也，非其分也，则是非其鬼也而祭之，何也？

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斯人非独可惑也，夫亦求福之心胜，而用是以行其佞谀之计耳；

通于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虚无。斯人非独可罔也，夫亦窥利之志殷，而藉是以售其媚悦之术耳。

凡好谄者，见其常然，则不以为感，而恒于其不意，即以此揣鬼之情，古典之所不载，一旦而胪于俚豆，岂以将明信哉？

凡挚谄者，修其常式，则不以为敬，而恒于其非道，即以此窥鬼之微，淫祀之所宜禁，一旦而畛之祝词，岂以尽仁孝哉？

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贵人者，亦既尊而奉之矣，而富贵之未至，意者其乏冥助耶？是故为之祭以祈之，而逢迎之态，何所不备；

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祛，意者其有阴祸耶？是故为之祭以禳之，而颠蹶之请，岂所忍闻。

自下而干上，是之谓僭。僭之所不敢避，乃足以明虔，冀所祭者之亮之而据之也；

有废而私举，是之谓乱。乱之所不敢辞，乃足以效诚，冀所祭

者之哀之而庇之也。

藉灵宠于有位,既以谄鬼者而谄人,求凭依于无形,又以谄人者而谄鬼,吾不意世道之竞谄,一至于此也。

【评析】东林党人赵南星及其针砭时事的八股文

在隆庆、万历八股文坛上,赵南星是一个能以文见性,以文刺世的八股文高手,因此,他在八股文坛上便独树一帜。

赵南星,字梦白,号济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甲戌(1574年)科进士。“除汝宁推官,治行廉平,稍迁户部主事”(《明史·赵南星传》),历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考功司郎中、太常卿、吏部尚书等职。

赵南星是一个恪守儒家理念的政治家,为人刚正廉直,忧国忧民,为东林党中重要人物,与邹元标、顾宪成号为“三君”。张居正当权时,便对张居正的一些举动进行过抵制,“张居正寝疾,朝士群祷,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戒弗往”(《明史·赵南星传》),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他立朝一贯不畏权贵,凡属不合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事和人,他都敢上疏弹劾,坚决与之斗争。对于正人君子,他尽力扶持,使得“众正盈朝”。

他当吏部尚书前,“人务奔竞,苞苴恣行,言路横尤甚。每文选郎出,则邀之半道,为人求官,不得则加以恶声,或逐之去。选郎即公正无如何,尚书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有给事为费郎求盐运司,即注费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明史·赵南星传》)

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黑暗,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之斗争。“忠贤及其党恶南星甚,每矫敕谕,必目为元凶”。各级官吏,凡属“为南星摈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赵南星就这样被这些重新登台的贪官污吏所诬陷,而谪戍代州,并罪及全家,十分悲惨,终至卒于戍所。崇祯初,赠太子太

保，溢忠毅。

后人对赵南星等人推崇备至，《明史》“赞曰：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

赵南星博学多才，是明代有名的散曲家。其笑话集《笑赞》，多有讽世之作。著有《赵忠毅集》、《味檠斋文集》、《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等。

赵南星是隆庆、万历时的八股文名家。作为一个恪遵孔孟之道，持名检，励风节之人，他的八股文自然会遵循程朱传注，不过因其才高学博，对经文每有己见，可补传注之不足。如其《用下敬上》一节题文，题目取自《孟子》，文章十分注意融括通章意旨，细意推寻其中的微言大义，将上应如何礼贤下士，士应如何尊奉君上的关系阐释得深刻全面，一起一结，尤可见其见识之高卓。

赵南星八股文的最大特色，使他能独树一帜的，是他在八股文中表现出其超出等伦的高风亮节。俞长城曾说：

“赵高邑赋性刚介，不能容物，悲时悯俗，恶佞嫉邪之旨，尽发于文。”（转引自《制义丛话》卷之五）

他漠视张居正之权势，急攻魏忠贤的死党崔呈秀，不在淫威之下改变其操守，不因阉党势焰熏天而违背原则。丹心再剖，听如充耳；削官未已，加以谪戍；著书明道，至死不回。这些精神，在其文中都得到体现。俞长城说：“先生登第时，主司梦大鹤飞下，乃得公卷，故号济鹤。今观其文行，可不谓鸡群鹤立者欤？”俞长城是清初最著名的八股文选评家，称赵南星的八股文为鹤立鸡群，可见其推崇之至。

赵南星八股文的这一特点在其大多数文章中都有所体现，现只举其名作《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来略加评析。

朱熹对文题经文的传注云：“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谄，求媚也。”

作为题目的这句话，是孔子目睹三桓谄事齐、晋，强臣凌压其君，而季氏旅泰山，立炀宫，又用邪媚求助于鬼神帮助驱逐其君的种种行为而发的。赵南星的这篇文章，根据传注之意，抓住“非其鬼”与“谄”而大发议论。他指出，对那些不当祭之鬼要去祭拜，是

谄媚。而谄媚的目的是想“求福”、“窥利”。在中二比和后二比,作者用对偶排句,将谄媚者之心态、行为摹画入神,毫末毕现,淋漓尽致,似于题外别生枝节,其实正是作者学力高深,嫉邪恶佞,刚正严明个性的表现。这些话将孔子意中有,而题文中却没有明说的微言奥旨发掘了出来,并用以针砭时事,感时伤世,读后令人浮想联翩。

清代朱梅崖指出,此文是刺张居正病时,“朝士并走群望”(转引自《制义丛话》卷之五)之举动。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张居正当时权倾朝野,可一言定人富贵,故他一生病,“朝士群祷”,他们看中的便是张居正可以给他们富贵金钱。而“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戒弗往”(《明史·赵南星传》),他们认为张居正手握致人于富贵的大权是一种僭越,是侵夺了皇帝的权威,朝士为之“群祷”,是“非其鬼而祭之”。赵南星的大多数八股文都在针砭时事,其锋芒所指,由此可见一斑。

赵南星的八股文大多能反映其个性,如《齐景公有马千驷》一章文,将其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思想情怀表现无遗。文中将“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与“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今称之”作比较发挥,谴责了“景公之以贼臣为德”,实则针砭世事,悲天悯人,语气十分沉痛。文中云:“天道神而莫测,昏庸者富厚,仁贤者饿死;民心愚而至公,富厚者与草木同朽,饿死者与日月争光。有志之士,将何从焉?”朱梅崖说:“似此慷慨激昂,不减屈原《天问》。”(转引自《制义丛话》卷之五)评价虽高,确如其分。韩求仲则说“此文于凭吊感慨外,则有寸铁杀人手段”(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是就其针砭时弊之深刻而言,也很精当。

春秋以前,强臣专政者有之,鄙夫横恣者尚少,秦汉以下乃有祸人家国者,至明朝末年此祸尤烈。赵南星抚心蒿目已久,不吐不快,故于《鄙夫可与事君》题文中言之,至为深痛,其文云:

夫人之所患在此,则其所悉智力图之者必在此。未得而患得,则彼一匹夫耳,擯而不用已耳,亦何能为者。苟其既得而患失,则内怀无穷之欲,而外乘得肆之权,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九

乘以致寇，众所不能容也。而得之自我者，必不肯失之自我，则于事何所不为？折足而覆餗，上未必弗觉也，而受之于君者，必不肯归之于君，则于人孰不可忍。不攻之，恐为国家之蠹；必攻之，则为善类之殃。缓去之，恐滋蔓于方来；骤去之，则祸成于一旦。盖至是而斯夫也，非向之所云鄙夫也，乃天下之大奸大恶。无论他人不意其至是，而斯人之初心亦未料其至是也。然患失则未有不至是者，夫鄙夫而可与事君者，则天下有不患失之鄙夫耶？以人事君者奈何忽诸？

赵南星借孔子“鄙夫可与事君”一题，来讥斥明末那些因患得患失而行大奸大恶，残民祸国者，既入骨三分，又沉痛至极，充分显示出赵南星的性格与情怀。梁章钜说：“鄙失之患，至明季而烈，古以杜诗为诗史，此可当时文史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

赵南星虽恪守儒家观念，却并非守旧不化者，其时文也紧随时代潮流而变，他也成为以古文为时文的高手。且因其学识渊博，又是个文学家，故其八股文叙事生动传神，得司马迁《史记》之精髓；议论深刻精到，得韩愈之丰神。方苞评论其《齐景公有马千驷》二段题文时说：“乍视之奇奇怪怪，反复讽咏，其立局措语，无一非题中神理。欧阳修《五代史》‘论’、‘赞’，深得史迁神髓，斯文其接武者欤？”其《齐人有一妻一妾》一节题文，打破八股格式，分两半阐释文题。前半部分叙述齐人与其妻妾之故事，一波一折，历历如缕，将齐人之虚伪，妻、妾之精细，见其夫偷食祭坛之酒肉后的羞耻写得生动传神；后半部分议论，都与下节神脉相注射，精确独到。清人乔君求称此文“貌太史公毛发，而得其生动处”。文韵评说此文：“只将本题略点数言，便为颊上三毫。”顾备九说“是题文无有过于此者”（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都是称赞赵南星写作技巧之高，文章写得生动传神。



敢问交际何心也 一章

◎顾完成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孺。’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

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大贤论交际，始终以为不可却也。

夫君子未尝一日忘情于天下也，如是而欲绝诸侯之交际者，过矣，是故圣人不为也。

且圣贤处世，甚无乐为已甚之行也。已甚则天下欲有所以交于我，而疑于我之不能容我，欲有所以用于天下，而阻于天下之不敢近。道之不行，夫岂独人之过哉！

孟子当战国而受诸侯之赐，凡委曲以为行道计耳，胡万章之未谅乎！

夫所谓交际者，何从而起也，起于心之恭也，以辞却之。君子病其峻，以心却之。君子病其伪，无一可者也。吾以为其交也，协诸道焉，虽以生民未有之圣，亦不得不为道而受。其接也，协诸礼焉，虽以大成时中之圣，亦不得不为礼而受。其不受者，必御人于国门之外者也。移此心以待诸侯，是御人之盗，王者不教而诛之。取民之诸侯，王者亦不教而诛之矣。孰知充之以义，则天下无可交之人；通之以权，则天下皆可仍之俗。故鲁人猎较，孔子亦从而猎较也。非狗也，始也以道革人，而有簿书之正。终也以道洁己，而无三年之淹。圣人之行权以济天下，类如此也。

吾因是知圣人有三仕焉，其上则行可之仕矣。其次则际可之仕矣。又其次则公养之仕矣。可以仕桓子，而亦可以仕灵公，非区

区之仪文，果足以縻圣人，而圣人自不忍示天下以亢也。谓夫人之所以礼貌我者，其犹近于恭也。可以仕灵公，而亦可以仕孝公，非区区之馈养，果足以羁圣人，而圣人自不忍待天下以刻也。谓夫人之所以礼遇我者，其犹近于恭也。

使必夷诸侯于御人之盗而却天下之交际焉，天下虽有好贤好士之君，将何因而得通于君子之侧。君子虽有护君行道之念，将何因而得进于人君之前。吾见鲁、卫之庭，必无孔子之迹也，可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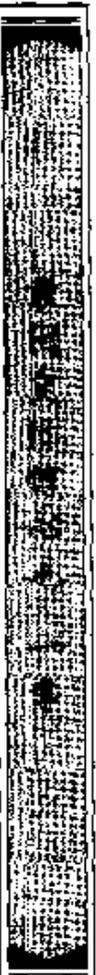
【评析】东林领袖顾宪成及其题理纯正， 写法新潮的八股时文

顾宪成在明代八股文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于万历中后期曾奋起倡导八股文回归传统，开了天启、崇祯年间艾南英等江西派八股文振兴运动之先声。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年丙子（1576年）科举乡试第一名。万历八年庚辰（1580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转吏部。后谪桂阳州判官，历任处州、泉州推官、吏部考功主事、员外郎、文选司郎中。后因议论“三王并封”及廷推阁臣，“忤帝意，削籍归”（《明史·顾宪成传》）。“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辞不就。四十年卒于家。天启初，赠太常卿。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追论之，遂削夺。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

自小即开始的八股文写作使顾宪成牢固地树立起了儒家正统观念。他立朝讲求节操，“举公廉第一”（《明史·顾宪成传》），与赵南星、邹元标被称为“三君”。在朝廷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因上书指责执政者处事不公而被谪贬，回朝后又上疏反对神宗三王并封事。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京察，他协助赵南星等人“秉公澄汰”（《明史·赵南星传》），“尽黜执政私人”。任文选司郎中时，“所推举率与执政相抵牾”，廷推阁臣又忤帝意，被罢官归里。

出于儒家正统观念，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出发，顾宪成对隆庆、万历年间的八股文变革是极不认同的。在他看来，这种变革，



使得程朱传注被歪曲甚至是背弃,让各种社会思潮甚至是异端邪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八股文。万历十年壬午(1582年)前八股文尚有正大和平之余气,至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之后则全为幽深奇诡之文。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之后,文之陋俗,亘古未有,浮滑、枝蔓,工揣摩者,率尚富丽。喜奇峭者,争尚凌驾,插入诙谐恶套,补衬烂熟《国策》、《史记》套语,全章数节,稍加点窜,即成一篇文字。在这样的文风影响下士人的思想必然不纯,以这样的八股文选拔出来的官员队伍整体素质必然下降,官场道德沦丧之人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作为掌管天下官员任用大权的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对这一点的认识比谁都真切,故立志矫正八股文之流弊,开始了他欲使八股文重归传统雅正之路的努力。所以在他罢官归乡之后,便在宋儒杨时书院旧址创建东林书院,欲以杨时师事二程、精研孔孟绝学为榜样,倡导师朱正统学脉来拨乱反正,清除“衍于正、嘉而盛于隆、万”(见《制义丛话》卷之四)的王阳明心学影响,对抗李贽风靡天下的异端学说。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承负“载道”与“代圣贤立言”,塑造士人灵魂的八股文归于雅正,进而达到重整道德,提高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澄清吏治的目的,以挽救乱象已成之时局。

而要拨世事之乱,反思想之正,就不能不论及当时八股文无序变革时出现的种种弊端,就不能不触及时事,触及朝政。东林书院大门上那副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反映出顾宪成等人所素有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所以《明史》中说顾宪成“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途相应和”(《明史·顾宪成传》)。樊树志先生在其《晚明史》中根据康熙、雍正、光绪刊行的三种《东林书院志》上的记载,便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只是讲说《四书》,他与高攀龙的讲义,“绝无‘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的内容”(见樊树志《晚明史》第六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又根据神宗欲重新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少卿”,顾“力辞不就”,自称早已不问政治,“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忽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引自《晚明史》第六章)的说法,而推断顾宪成的东

林讲学与政治无关,都是不对的。

樊先生这种说法表明他没有弄清万历时期八股文的状况以及书院讲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明代隆庆、万历时所结文社与所建书院没有不与八股文写作相关联的。八股文是士人获得荣华富贵的工具,东林书院讲学,若不和指导八股文写作相结合,只讲恢复程朱理学正脉,会出现“每年一次大会与每月一次小会,届时吴越及其他各地士子纷纷而来”的盛况吗?要知道,在万历中后期,正是士子对李贽之学如醉如狂的时期,会有那么多士子单为听讲程朱之学便从四处赶来,以致东林书院的讲堂都容纳不下吗?当时背弃程朱理学的言论主要就出现在八股文中,樊树志先生引用了顾宪成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其中有“尊经”一条,实际就是针对八股文的变革而来。他历数不尊经的种种表现说:“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要知道,这些现象,都表现在万历中后期的八股文中,这从当时许多正统派人士对八股文的批评言论中可以得知。因为八股文的功用便是载程朱理学的,而万历时期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八股文中对程朱传注或穿凿,或矫诬,或凌驾,使得程朱理学已经荒腔走板了。顾宪成在讲学中既要涉及八股文,欲矫正时风,使其回归雅正传统,他能不对当时八股文背离程朱理学的现状提出批评吗?而造成万历时期八股文背离程朱理学之风,又与当时朝廷手握乡、会试衡文选士大权的官员的提倡有关,顾宪成欲矫正八股文的弊端,能不指斥这些人物吗?在明代,程朱理学及八股文与政治有着很深的关系,很大的影响,谈程朱理学,谈八股文就必涉及政治,这是一种常识。所以说顾宪成东林讲学不涉及政治的讲法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次,认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之余绝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说法也不符合顾宪成的个性、为人及思想学养。

顾宪成自小即浸淫于八股时文之中,“幼即有志圣学”(《明史·顾宪成传》),长大后处处以儒家道德伦理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所以,他为人刚介正直,“举公廉第一”,“议论风节,

在万历士大夫中，若面之有眉”（徐存庵语，见《制义丛话》卷之五）。所以，他能不顾身家性命，敢于上疏直言，屡屡得罪执政者与皇帝，被人目为“三君”之一。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在削籍归里之后，面对着世风日下，统治危机日益加剧，统治机体日益瘫痪的现实，他突然会变得缄口不言了吗？他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若丢失了这种品格，还会有人仰慕他，出现“完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的现象吗？而此时，他的好友，“三君”中的赵南星尚在朝廷与邪恶势力苦斗，他并无杀身之祸相威胁，又无荣华富贵、乌纱官袍怕丧失，怎会突然间就与赵南星等分道扬镳，金盆洗手，变得胆小怕事了呢？既然有如此前后判若二人的巨变，那又怎么解释他手书的那副“声声入耳”、“事事关心”的对联呢？难道这是假的吗？事实上顾完成并未忘情政治，他要恢复程朱理学正脉，“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明史·顾完成传》），就在切入政治。在讲学期间，东林党人，最具才干的“淮抚李三才被论，完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引得“攻三才者大哗”，这就证明他仍在介入政治，樊树志说他东林讲学绝不谈及政治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其三，樊树志仅凭康熙年以后的三种《东林书院志》上的记载，即将自明末以来世人所公认顾完成等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说法推翻，是轻率的。因为清朝刊刻的《东林书院志》并非是与顾完成同于东林讲学，并受顾之嘱托编纂了《东林志》的刘元珍的原作，而是清代人在《东林志》的基础上重新编纂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三种书能反映顾完成等东林讲学的真貌吗？康熙，特别是雍正时文化专制措施十分严厉。清代又吸取明亡之教训，不准结社，故清代八股文无社稿。对有关东林书院结聚党人，抨击时政的内容，这三种书中敢不加以删削吗？东林书院讲学，是在万历中后期朝政日趋黑暗，纲纪法度败坏之时，顾完成等富有正义感，而见忤于神宗及群小，退居林下的官员以此方式于暗中结成一股政治力量，与朝中赵南星等正直人士相互呼应来与奸邪斗争的手段，故顾完成甘于讲学，对起用为南京光禄少卿这种闲职力辞不就。至于他在辞谢疏文中所说的自己已“置安危理

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的话，明显带有一股牢骚，并非真实思想。况且，他不愿放弃以东林讲学与朝中斗争相配合的办法去安就闲职，也只能说自己已对政治无兴趣，难道还会在疏文中说自己对国家的“安危理乱”很重视，又不出山效力吗？要知道这种说法在当时是要被视为欺君的。

总之，顾宪成是采用兴办东林书院讲学的方式来阐扬程朱正学，切入时事，欲正时弊，使在无序变革中的八股时文重归雅正的传统，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

基于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顾宪成的八股文的最主要特点表现在其内容的纯正上。他的文章，无不理路清晰，入口气，代圣贤立言无不切合孔、孟等人的身份、思想。由于他对儒家经典钻研深透，故无论题目内容如何繁杂，无一节可脱略，他都能馥繁以简，毫发无遗，出以自然。其《诚者自成也》一章题文，阐释“诚”与“人道”之关系，破题即抓住诚字，再转到“道”字，归于本心之上，直提“性”字，已得主旨，全文的原委便都贯通。然后再阐释诚之为贵，诚与仁、智的关系，最后用“以诚为贵矣，不然，其不流于无物几希”作归结，点出全文言人道之旨。全文理路极清，文境极熟，故运重如轻，举难若易，将儒家深奥之道理阐释得准确清楚。韩求仲说此文“开合极大，针线极密，神情极暇，题理一分不乱，总不见其融合之烦，已入化境”（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细读全文，可知此言并非虚誉。

顾宪成写八股文虽坚持内容的纯正，平正通达，不尚诡异，卓然儒者之言，但在写法上他却接受以古文为时文的观念，其文融液经史，讲求技巧，水平并不亚于时艺的革新派。他的名作《敢问交际何心也》全章题文，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长题，出自《孟子》，它的字数达三百七十五个，内容纷繁杂乱，要将题旨阐释清楚，没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和很高的文字驾驭水平是不行的。

顾宪成由于对儒家经典钻研深透，认题真，对题旨把握准，故能将题目的内容分别轻重，挈题之领，以交际为主，打通事道，将全章经文的各节分详略来阐述。因题成文，不立闲架，而题之腠理

曲折,无不操纵如化,使纷乱之题写出浑成一片,题目节节俱见的好文章来。写作技巧之高,令人叹服。所以王耘渠称赞此文说:

“于题之轻重详略,字字体贴入细,而以文之疾徐伸缩应之,极变化,正是极自然。故涇阳先生之文,视前辈已为巧极,而迥不得以万历间机法目之,惟其得于自然者至矣。”(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

陈百史则认为“长题当以此为式”。

更值得一提的是,顾宪成虽倡导万历时的八股文的内容要恢复雅正的传统,但他对八股文的体式却不墨守陈规,敢于突破,这表明他对以古文为时文已游刃有余,且已到了能将时文与古文融合无痕的地步。这篇八股文的体式就与古文没有了区别。除破题、承题、起讲及大结之外,正文已不分股,而是分为二段,将题目的各节内容分别于前后两段阐释之,这已完全是古文的结构了。由此可知万历时八股文变革潮流影响之大,连顾宪成这样的正统派也在所不免。



惟仁者能以大事小 一节

◎顾宪成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大贤论交邻之道，而征之古焉。

盖以大事小为仁，以小事大为智，古之道也。明乎此，而于交邻何有？

孟子曰：所贵乎交邻者无他，势在我则忘之而已矣，势在人则顺之而已矣。王欲闻其道乎？臣试言其概，而王择焉。夫天下之人国多矣，有以大国而邻我者焉，有以小国而邻我者焉。

大奚以交于小也？其道则仁者得之。仁者曰：吾于小国邻而忿焉与小国较，将以树威结怨则可矣，若欲昭德而怀贰，则计之左者也。是故其事之也，以为宁使天下议我以怯，而有不恭之加，毋宁使天下议我以暴，而有不靖之患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汤也事葛矣，文王也事昆夷矣。彼诚仁者也，所以忘其势而不忍较也。不然以四海僭苏之后，而下于一蕞尔之邦，则近乎耻也。以三分有二之主，而下于一蛮夷之长，则近乎辱也。耻不可即，辱不可居，汤、文曷为而为之哉？

小奚以交于大也？其道则智者得之。智者曰：吾与大国邻而狡焉与大国竞，将以挑衅速祸则可矣，若欲保社而息民，则计之左者

也。是故其事之也，以为与其犯彼之怒，而为箪食壶浆之迎，不若徇彼之欲，而为牺牲玉帛之献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太王也事獯鬻矣，句践也事吴矣。彼诚智者也，所以顺其事而不敢竞也。不然则赂以皮币，赂以犬马，天下之厚利也。身请为臣，妻请为妾，天下之恶名也。利不可弃，恶不可取，太王、句践曷为而为之哉？

今王之邻，谁为葛伯耶？昆夷耶？则有仁者事小之道在；谁为獯鬻耶？吴耶？则有智者事大之道在，尚其鉴于四王可也。

【评析】内容庄雅有度，体式不循常格的 万历传统派八股文

这是顾宪成的另一篇名作《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一节题文，也是一篇思想纯正、文字典雅、写作技巧很高的八股文。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这一节题目经文的注解为：“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废。”

细读顾宪成此文，可以看出它是依据朱熹的注释而加以阐发的，且循题之脉络窍会，为文之起落转接，能以无厚入有间。

全文根据题中“征之古”之四事，代孟子立言。由于认题真切，故口吻毕肖，说理深入。作者以两大段文字，从正反两方面来阐释仁者交邻应有之道，讲得正大典切。其文字简练准确，表现作者驾驭文字能力之强。

此文在体式上亦不循常格，正文不用八股而以两大段来阐释题旨，这两段虽也应用排偶，但不严守其法，虽法比偶而实单行，这也是万历年间八股文变革时常见之体式。

艾南英说此文“庄雅有度”；方苞说它“极平淡中清越疏古之气，足以惬人心目”（见《钦定四书文》中该文评语），平心而论，都是知文之言。



子问公叔文子 全章

◎陶望龄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时人之拟大夫皆过，圣人终于不信也。

夫不言不笑不取，非人情也，而如贾之所称，则又过矣，夫子安得而信之。

且夫论人于春秋之世，或可以几廉静，而未可以语时中；可以邀世俗之虚称，而未可以逃圣人之藻鉴。

公叔文子，卫之良也。吾观其大概，盖沉静廉洁士哉，何世之人迹其沉静，而遂以为不言不笑也；迹其廉洁，而遂以为不取也。

夫子以为过而问之公明贾。公明贾亦已知告者之过。而其言之过也，乃弥甚。

人曰不言。贾则曰：夫子时然后言，而人不厌其言。视不言，抑又难矣。人曰不笑。贾则曰：乐然后笑，而人不厌其笑。视不笑，抑又难矣。人曰不取。贾则曰：义然后取，而人不厌其取。视不取，又难之难矣。

夫言笑辞受之间，人情皆不能无。文子而人乎？吾固知其不免也。

言笑辞受之节，非圣人皆不能中，文子而犹乎人乎？吾又知其不尽然也。

充积未盛者，难与随时，故谈时中于曲谨之士，则大而无当。

发见未时者，易以起厌，故称不厌于清修之士，则诬而失真。

夫子心知其过也，乃曰：“其然，岂其然乎？”盖溢美之言，不敢辄信，而为善之文子，又未敢轻訾而直议之也。

此以知天下惟时措为最难。论人者，未可以易而许人，学道者，不可以难而自阻。

【评析】引领时代潮流的陶望龄及其奇矫之文

在隆庆、万历年间，陶望龄是一个受时代新思潮影响很深，对八股文的变革起过带头作用的人。其文独具一格，追随者众，在明代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簒，晚号歇庵居士，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陶望龄出生在一个宦宦之家。他的父亲陶承学当过南京礼部尚书，其叔父陶大临嘉靖时中过榜眼。他自小即开始接受八股文写作教育。

陶望龄少有文名，极为聪明，于八股文所必学的对偶颇为擅长。五岁时，有人出一上联“中举中进士”来考他，那人话未落音，他即脱口而答：“希贤希圣人。”这个下联全出自《四书》，可见他小小年纪，不仅思维敏捷，且对《四书》已烂熟于胸。

七岁时，其父任职河南，全家随行。走到半路，其母因事要返乡。母亲问他：“从父耶？从母耶？”陶望龄拱手而答：“男子固宜从父。”可见封建伦理已早早地植入了他的头脑。九岁时，他常与其兄“匡坐终日”，相互问答，所说“皆世外语”。十七岁时，考中诸生。浙江督学林景庸十分欣赏其文章，评价极高，又升其为廪生。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年）科乡试，陶望龄考中第二名，时年二十三岁。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科会试，他夺得会元，殿试时取为第三名及第，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正史纂修官（《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三）、国子监祭酒。

受时代的影响，陶望龄对王阳明良知说和李贽的学说深感兴趣。在担任正史纂修官时，他即与李贽的好友、著名学者、与他同榜的状元焦竑，著名文学家、公安派创始人袁宗道等人共同研讨性理之学，尤其痴迷王阳明学说。在焦竑的介绍下，他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结识了李贽，对他更是钦佩不已。他在《奉刘晋川先生》中追述他对李贽的仰慕说：

“望龄在京师时，从焦弱侯游，得闻卓吾先生之风，继得其书毕习之，未尝不心开目明，尝恨不能操巾拂其侧。”（陶望龄：《歇庵集》卷十一）

陶望龄对李贽以师视之，在《与刘晋川》中，表示咨请的愿望，说“生襄事后，庶亦可遂咨请之愿也”。

凡此种种，无不表现他对李贽尊慕之情，溢于言表。

而李贽对陶望龄也十分器重，与之时有书信往来，品评人物，研讨学问。李贽生活中的困难，也在信中向陶望龄倾诉，如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他在给陶望龄的信中就说：

“生因质弱，故尽一生气力与之敌斗，虽犯众怒，被讪谤，不知正是益我他山之石。”（李贽：《续焚书》卷一《复陶石簑》）

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李贽于狱中自杀，陶望龄闻讯极为悲痛，并与友人在信中分析李贽的死因：

“此间（指北京）旧有学会，赵太常、黄官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继至，颇称济济，而旁观者指目为异学，深见忌嫉。然不虞其祸乃发于卓吾也。七十六岁衰病之身，重罹逮系，烦冤自决，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尚，莫如程、朱二先生。而今所谓正宗者，即当时所攻为伪学者也。古今谈学者众矣，其谁不伪之？然则贪名逐利败度圯族者，乃称真乎？”（陶望龄：《歇庵集》卷十一《与周海门先生》）

正是由于这种密切的关系，使陶望龄了解了李贽的学说，受到了李贽思想的深刻影响，成为了隆庆、万历时八股文变革的领头人。

陶望龄不仅酷爱王阳明、李贽学说，还对佛教禅宗深有研究。在北京时常与袁宗道等人在一起聚谈禅学，影响很大。据万

历时沈德符说：

“己亥、庚子(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间,楚玉蟠太史(宗道)同弟中郎(宏道),与皖上吴本如、蜀中黄慎轩(辉),最后则浙江陶石簪(望龄)以起家继至,相与聚谈禅学,旬月必有会。高明士翕然从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

陶望龄是万历时有名的文人,所有这些思想,必然会在其写作中有所体现。

他为诸生时,即致力于古文辞,到万历后,更“搜讨百氏,力追先秦,广涉各书”,并力学苏轼兄弟。他工诗善文,早年“诗格清越,超然似神仙中人”。到万历中年之后,受王阳明、李贽、禅宗思想的影响,“讲学逃禅”,风格大变。特别是与袁宏道相识后,受公安派的影响更深。为文力主创新,接受了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及不师古人“机格与字句”之主张,其诗文追求新奇,以致一些守旧之人讥评他如“白沙在泥,与人俱黑”,由一个儒家正统之士变成了一个追求新潮的异端之士。

其实,陶望龄在思想上追求新潮,在为人处事上却依然遵奉儒家伦理道德观。当首辅沈一贯欲借“妖书”一事,来陷害“博通经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归之”(《明史·郭正域传》)却不肯依附权贵的郭正域时,陶望龄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与状元唐文献、同僚杨道宾等去拜见沈一贯,他以正言厉色责以大义,并愿弃官与郭正域同死,郭正域之案情才得以缓解。

让陶望龄声名大著的,还在于他的八股文。陶望龄的八股文写作,与他的诗文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遵循传统到变革创新的变化过程。

受家庭教育的影响,陶望龄早期的八股文走的是嘉靖以前先正们的老路,追求内容的雅正和体式的完备。到了后来,受到王阳明学说的影响,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开始偏离程朱传注。这时,王世贞对其文的评价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在隆庆及万历前期,王世贞以其名望在文坛有一言九鼎的作用,许多文士一经他品评抬举,便身价顿隆。陶望龄也怀着“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愿望,将自己最得意的七篇八股文送去请他指点,王世贞读后给了个“七作

平常”之评。心高气傲且悟性很高的陶望龄怎能咽得下这口气！他经过一番思考，终于走上了大胆变革之路，开始尝试力为奇矫之文，立即得到世人认可，不仅于乡试取得第二名，在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科还以其文之奇矫一举夺得会元。墨卷刊行后，天下士人无不争相摹仿。至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科，又有人以奇矫之文取中会元。

明代有所谓元脉、元灯之说，即世人认为能中状元、会元、解元者，其文皆有一定相承之脉络。现在写奇矫之文能连中二科会元，士子们更相信元脉之说，于是争习奇矫之文的风潮席卷天下。其高者能将文章写得新奇灵绝，又不逆经传之理，而其下者就只能任意武断，以凌驾来解题，将文章写得诡异纤佻，邪态百出。后人将这一时期八股文的特征概括为：“兼讲机法，专事凌驾，轻剽促隘，务为灵便，虽巧密有加，而气体颓然矣”，许多人认为这种八股文是“芜靡极矣”。故陶望龄大胆变革八股时文，虽是顺应文体变化之规律，在顺题成局，相沿已久，人心生厌之后所采取的正确行动，却招致许多正统派人士的骂詈，认为他是败坏八股文的罪魁祸首，致使他这个属于公安派的作家很少有人提及，后世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

实事求是地说，陶望龄的八股文无论是与隆庆、万历，还是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时的名家高手相比，都毫不逊色，且能独树一帜，比许多名家还要高出一筹。其融合古文与时文已达无痕的程度。

其文虽力为奇矫，无论炼格谋篇，句法股法都力求出巧出奇，然而其文气博大，故文虽巧而无纤佻诡谲之气。他于题旨的探求上，虽力求去旧图新，不沿袭陈言而时出己见，但他基本上能以经传之理为主，能抉题之精蕴，顺逆正变期于恰适肖题，理精词卓，故虽求变而不失其正。平心而论，他还是属于维护八股文载道功能之传统派，只是所用手法不同而已。

由于他对文题体认亲切，故其文能达“明辨哲也，纯粹精也”的境界。这些特点，从其《子问公叔文子》全章题文可略见一斑。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论语》。朱熹《四书集注》对这一章文的

孔子公明贾之言

注释云：

“厌者，苦其多而恶之之辞。事适其可，则人不厌，而不觉其有是矣。是以称之或过，而以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礼义充溢于中，得时措之宜者不能。文子虽贤，疑未及此。但君子与人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岂其然乎？’盖疑之也。”

这是陶望龄未中会元之前力为奇矫的一篇名文，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将陶望龄的八股文与朱熹的注释两相比较，即可看出陶文对题旨的阐发，基本上是遵循了程朱传注的。但陶望龄学识渊博，于题旨奥窍洞彻深知，知道要从何处发挥才能出新。他深受当时正在冲击着传统价值观的市民意识，以及王阳明、李贽思想的影响，承认欲望与私念的合理性。所以，他便抓住孔子不相信公叔文子非人情之举，放言论述“言笑辞受”是“人情皆不能无”，这就突破了程朱理学的樊篱，借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而论述了私欲的合理性，在内容上就出奇创新，虽有凌驾题旨之嫌，但他是紧贴孔子之言与朱熹之注作发挥，且又不留凌驾之迹，可见其思虑之周密，手法之巧妙。

此文奇矫之特点，更主要的表现在其写法力求出奇出新，技巧高超之上。这篇文章题目较长，但作者显示出高度概括力，破题的上句将人言和公明贾之言包含在内，下句则将题中有关孔子的两层意思概括其中，十分精练。起讲浑讲大意，为下面发挥留下余地，却又面面俱到。进入正文，并不用八股体式，而是用散文段落，第一段入手便就公叔文子先立断案。随即“夫子以为过而问之公明贾”三句，从孔子问入公明贾言，敏快老辣，用了运题法。第三段“人曰不言”云云叙题中公明贾之言，以人言陪出，用了驾题之法。八股文中以整段文字重复题目，这是极为少见的，这也是陶望龄的八股文与众不同之处。其后之二比承上段重述的公明贾之言，一宾一主，落出末二句，机活局紧。后二小比阐发题之末二句，极为精确独到。最后一段“夫子心知其过也”云云，带定“过”字作前后关键，以“盖溢美之言，不敢辄信”，补点“信”字。最后的收结是正意又是余波，虽笔力崭然，却给人无限回思，足见作者写作水平

之高。

全篇以过字作线，文势如生铁铸成。作者对长题的把握手法极高。此题中有数人说话，作者却只以孔子之言为主，以驱驾公明贾及时人之言，所以文章便能前呼后应，一气旋转，这就是所谓的炼格，也是作长题和段落题的重要方法。所以清人王耘渠评论此文说：

“炼格诚奇矣，乃其用笔之圆捷浑脱，尤可想见其烹炼之功，下视他人，直是草草耳。”（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

方苞对此文评价很高，他说：

“点化题句，手法灵绝，更有峭劲之气，游荡其间。”（见《钦定四书文》该文评点）



出门如见 四句

◎陶望龄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圣人与贤者论仁，惟存其心而推之也。

夫敬以存心，恕以推心，合之则仁也。故知为仁在事心矣。

夫子告仲弓若曰：人惟一心，不可令一息不在我，又不可令一念知有我，惟以吾心与天下相操持，而以天下与吾心相流通，则仁矣。

何也？恒情处之以非常，即怠者皆能自饬，及常行而习见，鲜不易虑焉。

投之以非愿，即愚者皆知自谋，及物交而私隔，鲜不易施焉。

夫仁者纯心而可以敬肆，人已二之耶？

故见大宾，至肃也。起居晏闲，最心志所不及检，而俨然玉帛在陈，介绍在列，置一身于礼法森严之中，而惟恐失坠者，则不以一出门而失祗肃之常也。

承大祭，至严也。临馭号令，尤耳目之所易玩，而恍然神明临之，祝史相之，措一身于陟降昭格之地，而惟惧渝教者，则不以一使民而忘精严之体也。

至欲恶施受，本无两心，则合宇宙之分愿，酌之于我，而推一人之意欲，偏置之于人，又不愿即勿施焉。盖形骸渐彻，而元气旁通，斯又所称强恕之术也。

心本内敛，必戒其外驰，合大小而一于敬者，所以防此心之出人，而联其无间之真纯。

心本外通，心怯其内蔽，合施受而行以恕者，所以平此心之感应，而融其有间之物累。

皆以事心，皆以成仁也，雍也勉之。

【评析】开奇矫文风先河的会元墨卷

《出门如见》四句题文，是陶望龄会试中会元的墨卷，也是开奇矫文风先河之作，对万历后八股文风的影响甚巨，在八股文史上有重要地位，不可不说。

这个文题是《论语》中孔子回答仲弓问仁中的四句话。在《四书集注》中，程颐对这段话注释说：“孔子言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唯谨独，便是守之之法。”朱熹则说：“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深浅，于此可见。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亦将无己之可克矣。”

此文即按程朱传注来阐释题旨。作者抓住朱熹所说的“敬”“恕”二字而分两对，这是从传注来立格，而不完全遵照题目之本文，便是陶望龄的别出心裁，是对八股文文题的一种改革。题中“出门”二句，语本平对，文章即以平对还之。“己所不欲”二句，语本单行，陶望龄即以单行还之，并非仅是化两为三。起、结仍用“敬”“恕”作提纲归结。因《四书集注》中原本是大纲分说，则说到底文章又是遵从了传注，并未背离经旨，作者构思之妙，不细细体味便看不出其奇矫之处。全文最精警之处在一起二结比，独擅胜场，使作者能一举而夺会元。

文章又精警又明快，一字一珠，体现出大家气度。其篇法、股法、句法，皆巧而齐备，气局皆灵。汪武曹称赞此文说：“前后照注，以‘敬’、‘恕’对，中间依题，仍作三段，最为得法。语更简练，后股内外，有间无间等语，一句一击节，开讲亦精。”（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从这些话中，可看出陶望龄确系一个八股文高手。



许子冠乎

◎王思任

以冠诘异端，诘其必用者也。

盖冠非农夫事，而必为农夫用。当以此问许子耳。

孟子曰：天下有天下之体统，一人有一人之体统。天下之体统在君臣，一人之体统在冠屨。此皆必不可废者。吾由许子之衣，而又疑及许子之冠矣。

凡人莫不冠，而吾何独疑许子之不冠。冠则贵贱分，而许子之说并耕也。冠从黄帝制，而许子之教神农也。许子尊神农以上之教，则未必冠。许子系黄帝以后之人，则未必不冠。

解衣而作，茁发而游，是畎亩泥涂，耦耕者皆无猜之野人，而冠诚可省。然而窃料许子力田之时少，治家之日多也。顾影自思，而肩目何以不愧，则亦将冠乎？

戟手相语，脱巾相呼，是草路蓝缕，往来者无责礼之君子，而冠不必施。然而窃料许子居乡之时少，入市之日多也。众咻难避，而椎结不能自安，则亦将冠乎？

即如踵门而来，滕公以轩冕遇之。为许子者，岂其被褐蒙首，无簪无纓，而对人君亦箕踞无赖乎？吾谓不齿之服，犹设玄冠，而或者不自暴至此。

即如受廛之后，数十人以屨席供之。为许子者，岂其朝饔夕殮，不栉不沐，而率弟子尽蓬垢一堂乎？吾谓楚囚相对，犹有南冠，而或者不太古至此。

醮宾命父之典，必见以为烦。但岸然无容，一如枝鹿之野。彼或有其情，而未必肯有其貌也。

三加百拜之仪，必且以为伪。但髡然自放，一如病狂之流。彼其心则然，而其状未必然也。

服虽奇，不得弃元首。人虽奇，不得逃世法。而许子冠乎？

【评析】为人谑浪却为文高洁的王思任 及其清雅之文

这是一篇流传久远的八股名文，其作者叫王思任。说起来，从明末到民国年间，王思任在越中地区都算得上是个声名赫赫的人物。他那句怒斥晚明权奸马士英的名言“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曾激励过多少越中士人。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又号谑庵，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明万历三年（1575年）生于北京，清顺治三年（1646年）逝于绍兴。

和当时所有的世家子弟一样，王思任自小即研读儒家经典，攻习八股时文。他天才英发，又幸运万分，在科举这条崎岖小道的攀登上异常顺利。他五岁即遍读《四书》、《五经》，十岁即开始作八股文，十九岁中举，二十岁即成进士，少年科第，风光无限。

不过，当他释褐步入官场，即运交华盖，坎坷异常。

由于他恪守儒家正统的伦理价值观，为人正直而又有骨气，初任县令，便为民请命，意轻五斗，三仕三黜，偃蹇宦途。他不肯党附东林，又不愿依归阉党，故两头受击，通籍五十年，三为县令，一为推官，一为教授，两为臬幕，三为主政，一为兵备使者，一直沉沦下僚。直至明亡，鲁王监国，始任宫詹，晋少宗伯，但没几天鲁王就被打败，他便逃回家乡。他曾总结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的原因说：他“不曾投刺东林、魏党，乞食播间，沽名井上。所以然者，脚底有文，脚心有骨”。应该说，这些话送到了点子上，其骨气确为他带来了厄运。

王思任不愧为儒家思想的忠实执行者。清兵南下，占据绍兴，有人邀他投诚。他闭门大书不降。他誓不朝见，不剃发，不入城，仅携书一卷，棋一枰遁入山中。当他听说有人向清朝诸王举荐他时，

他写信给其表弟说：“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耳。时下尚有旧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果真，他偶患小病即绝食僵卧，待新谷登场时他已绝食而亡。临终时书“忠孝文章”四字令人悬于中堂，然后大呼“高皇帝”三声才瞑目。王思任以其悲壮的举动，为后人留下一个供万世景仰，能舍生取义的忠烈形象。

王思任十岁能文，古文、词、诗歌及书法、绘画皆名重一时，然而令他文名显赫的，还在于他的八股时文。他不仅选编过《庆历小选题选》、《明文珠玑选》等八股文选本和大受欢迎的自己的时文集《小題怡贈》，还因在八股时文界的名声大地位高，而为许多友人或慕名而求的士人撰写过不少时文集序言。在这些序言中，王思任阐述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针对万历八股文变革时不遵经文，率自抒发胸臆，自作评论，不顾题目的作法，总结出一套既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又不动摇时文宗旨的新相题法则，他说：“孔孟语言，无有小处。大題小做，小題大做；題外生文，題中归命；一部缩入一章，一章缩入一句，知是者吾与之论文矣。”这种相题法在当时和清代，都被八股文坛视为时文正宗。他特别重视破题的作用，说：“抡文如选色，其面在破，其颈在承，其肩胸在起，其腰肢在股段，其足在结束，其大体在长短纤肥，神态艳媚，若远若近，是耶非耶之间。而总之以面为主，面不佳，百佳费解也。岂有不能破而能文者乎？”所以当时科场中，“原以破题定甲乙”，“看其破题，元必高于魁，魁必高于诸进士”。他还总结出“大題可以逃败，乡愿居之；小題可以见才，狂狷居之”的规律，这就把八股文的风格与各人的个性、才情结合起来，有助于人们对八股时文的认识。

令王思任驰名于明清两代文坛的还要属其八股文。其友张岱说他十三岁就读于万历八股文名家黄洪宪家中，他“落笔灵异，葵阳大喜而斧藻之”，传授他八股文技法，他“学业日进”。他中举成进士，“房书出，一时洛阳纸贵。士林学究，以致村塾顽童，无不口诵先生之文。其幼小題，直与钱鹤滩（福）、汤海若（显祖）争坐位焉。”（张岱：《王谿庵先生传》）汤显祖曾把他与归有光、诸燮、胡天一称之为“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而王思任的八股文因“能为古文词诗歌，故多风人之致，光色犹若可异焉”。认为

“其为文字也，高广其心神，亮冽其音节，精华甚充，颜色甚悦眇焉”。其小题文字能于放纵之中谐趣横生。特别是那些说物说事单句题，“与义无与，亦无所碍”，他能“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验宕心灵”，很受王夫之称赞，将他与汤显祖、赵南星、刘侗称之为善作此类题之高手。《许子冠乎》即为其小题名作。

这个题目来自《孟子·滕文公》，原是孟子为揭穿许行抹煞劳心与劳力者分工不同之虚伪性时所说大段话中的一句。这句话的上下经文为：

“孟子曰：‘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素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

王思任博学多才，精通儒家经典，又坚守相题必遵循孔孟真义的原则，在作《许子冠乎》时，精心揣摩题旨，对孟子驳斥许行言行时的心理、语气把握十分准确。他遵循孟子语意，以许行“未必冠”与“未必不冠”两条线来进行阐发，烛幽照微，层层剥茧，从而将许行言论的虚伪性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正达到了代圣贤立言之目的。由此可见作者学力之深，领悟力之高。

破题兜头一句：“以冠诘异端，诘其必用者也”，便点明孟子把许行视为异端，也指出孟子问“许子冠乎”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以许行必用之冠来发问，易于揭露许行虚伪的面目。

承题则将破出的题意承接并加以说明，指出制冠不是农夫事，但必为农夫所用，孟子必会以此去诘问许行，这便为后文作了辅垫。

起讲则对孟子为何要以“冠乎”来问许行一事对破题、承题作进一步的补充、发挥，指出“冠”关系到一个人之“体统”，故由许子之衣问到他的冠，从而点明了本文的主旨所在。

起讲之后，说“冠则贵贱分”，“冠从黄帝制”，先将冠字提起，此下都是发所以然之故。作者在入题及提二比中以“未必冠”，“未必不冠”将题面的意义在夹叙夹议中表达出来。说“尊神农以上之教”，“皆无猜之野人”，“无责礼之君子”等句，都是说“未必冠”之

原故。“系黄帝以后之人”，“治家之日多”，“入市之日多”。及中比的不容“箕踞无赖”，“尽蓬垢一堂”，与后比的不肯“一如枝鹿之野”，“一如病狂之流”等语，皆是说明许行“未必不冠”的原因。就在这六股中，王思任以诙谐的语调，娓娓道来，反反复复、层层深入，从罗列许行“未必冠”或“未必不冠”的诸多原因中，将其虚伪的真面目揭示无遗，从而完满深入地阐释了题旨。

作者以文学家雅洁、流丽的语言，摹声摹神，叙写人物，只将“未必冠”“未必不冠”两意反反复复勘驳到底，一步步将孟子说“冠乎”的“乎”字时那种轻蔑的语调全盘托出，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乎”字神情，活跳纸上。王思任的文章大都有放纵而谐趣横生的风格，这种风格与其通脱自放，不事名检的谑浪个性有关。个性所致，他常以诙谐为文，喜欢使用戏谑的言语。本文是为了揭露许行之伪，故笔下颇带讥讽之词，使文章显得生动、通俗，没有一般八股文的那种僵硬气味。然而其吐属皆雅，了无芜秽语，这是为其学识素养所决定的。

王思任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坚持八股文要恪遵经旨的功令，但他决不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八股文的格式及相题的方法上他绝不墨守成规，敢于突破那些不顾阐述题之义理的需要，只求合乎格式与规定而不惜削足适履的做法。本文就根据行文之需要只采用六股，且其对股的字数又不摹其出股之语，斤斤然句栉字比，而是敢于使用散文句式，化比偶为单行，从而使这篇八股文具有了古文的色彩。八股文旧有的相题之法规定，在作本题时，其内容不得牵涉上下文，不得使用上下文中的词句。但王思任为了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深入地开掘题旨，他就大胆地打破这一陈规。如后比的出股中出现的“烦”字，即映题之下文中的“何许子之不惮烦”的“烦”字。后比的对股中的“伪”字，即映下文的“国中无伪”及“相率而为伪者也”等句子中的“伪”字。这些地方都是明露下文字面，是严重违规的，所以清代一些八股文名家对此惊叹说：“前辈之无忌讳如此。”这些做法表明明代万历年间以后八股文的写法在变革的潮流中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亲切一些了，变得人性化一些了。



人莫知其子之恶

◎王思任

谚有讥人父者，偏爱之一证已。

夫人之爱一偏，而最近之子，遂不知其恶，用情也而可忽诸？

传者谓齐家必本修身，而家之中，莫亲于父子，亦莫疏于父子。非父之疏其子也，亲极反更疏耳。谚有云：“人莫知其子之恶。”

人有不可解之情，凡在人者，俱胜己，独及其子，则己胜人。人又有不可解之情，凡言人之子俱不美，独言及其子，则无不美。

是故人无不知，而其子反不知也。人之恶即无不知，而其子之恶竟不知也。

本愚也，而以为诚笃；本狂也，而以为高明；本不才也，亦且初恨之而终原之。总之，一事之偶长，即可以盖终身之万短，甚至于宗绪败谋，箕裘将坠，而其父方为之坐视而保奸。夫谁发之，而谁知之。

誉言至，则惟恐其不详；毁言至，则惟恐其太尽。即正言至，亦且阳感之而阴忌之。总之，千百人之万言，不若其子之一诉，甚至于明师益友，药石成仇，而其子反为之居间而排难。夫谁省之，而谁知之。

缙绅之族，不少淫嗣；田舍之翁，亦有骄子。彼盖离里在旁，朝亲夕爱，而无所动其觉察也。

虽有忍亲，骨肉难割；虽有严父，责善不行。彼盖容隐姑息，日久月长，而不忍用其提撕也。

夫义方有同心，岂真愿子之恶，而无奈其苦于不知。

知子莫若父，岂真不知其子，而无奈其苦于知而不知。

其所谓好而不知恶者欤？谚可谓善言人父者矣。

【评析】洁净中含静光远致的晚明小题文

这是王思任的另一篇八股名作。

这篇八股名文的题目出自《大学》，其所在的那章经文为：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朱熹对这节的经文注释说：“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是则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

在晚明以放浪著称的文士中，王思任是一个通脱自放，却又能在大原则上遵守儒家正统观念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性好诙谐，好以诙谐为文，无人不知，但他为人有原则，决不背离他自小攻习八股文而养育起来的儒家伦理观。他处事待人既有圆，又有方，平生喜谑，却又正气凛然，明亡后能舍生取义即是明证。正因为如此，他的八股文在万历后那个反叛传统，各行其是，纷纷背离朱熹传注，冲破八股格式樊篱的变革时代，仍能不违矩矱，遵守功令，是万历时典型的正统派八股文。《人莫知其子之恶》就具有当时正统派八股文的三大特点。

在内容上，该文能遵经依注去发掘题中包蕴的微言大义，且使隐晦曲折的题旨变得明白畅达，让人易于知晓。

按照八股文写作的传统功令，对题旨的把握及发挥都必须依据朱熹等人的传注，严格在他们规定的思想框架内进行。这种规定极大地束缚了士人的思想，到了万历这个要求个性大解放的时代，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凿朴散淳，离经叛道已成为时代风尚。在内容上，此时的八股文可以别出己意，不必遵经按传，其激进者，更是明弃师说，离经叛道，恣为诞妄，刻意求新。“苟新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题不必合。断圣贤语脉以就已之铺叙，出自己意见以乱道之经常。”这就是万历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对当时求

新求变的八股文坛的一种斥责,却也反映出万历时的八股文的真实面目。由于这种变化破坏了八股文的载道功能,使之丧失了向士人灌输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功用,因而受到了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指斥,力主恢复明代前期雅正的传统,这些人便是当时的正统派。受教养所囿,王思任在八股文的写作上是个正统派,主张依经按注行文,《人莫知其子之恶》便很好地做到了这点。

王思任的这篇时文,根据经文中的“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及朱熹注释中的“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的思想,对“人莫知其子之恶”进行了深入的阐发。王思任是个熟知世情的人,深知造成“人莫知其子之恶”的原因在于溺爱。溺爱二字世人皆知,但很少有人能说出其中的所以然。他便在文中将世上常见的父母溺爱其子的种种情状一一罗列,使溺爱所造成的遗害暴露无余,从而警醒天下父母,不再溺爱子女,这就收到了代圣贤立言之目的。

为使认识到的题旨能透彻发挥,王思任在写作时使用了“加一倍法”。八股文写作特别重视审题,用其行话来讲就是“相题”。相题有法,规定首先要认清题之本面,再理出题之对面。“人莫知其子之恶”的本面是其子,对面即其父。题又有正面和侧面之分。此题的“莫知”是正面,“他人知之者”是侧面。在相题时,要发掘出本面的各个层面的意思,才能将题意写透。王思任的笔下,“莫知”分二层,一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是因其父不智,是真的不知。一是故意不知,故意不知是因为用心不诚,是假装不知,这就是朱熹在注释中所说的“溺爱者不明”故“偏之为害”。

王思任作此文是以提比和中比的侧面对正面,后比和束比则以对面对本面。八股中股股相生,无非就不知不觉,故意不知两意变化言之,不仅使题之正面和本面阐发透彻,又切中人情,洞合世事,使俗谚成为千秋龟鉴,完整地阐发出孔子与朱熹的思想。

本文第二个特点是八股体式完备。八股体式是为了保证题旨得以准确、全面、深入阐发而设置的。由于这种体式使得士人在写作过程中对程朱理学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思想束缚越来越严,故万历年间的八股文的变革之风便直指这一根本问题。八股体式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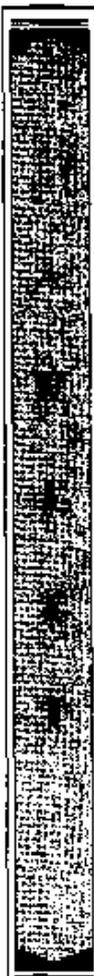


乎被人丢在脑后,不仅不用八股,连六股也极少使用,绝大多数的时文仅用四股、二股,有的还化比偶为单行,仅按题面分两截、三截来阐发题旨,有的干脆用散体,呈现出明显的古文与时文合二为一的趋势。这种做法,使八股文传统的载道功能受到极大破坏,以至于顾炎武要惊呼时人“不知八股为何物矣”。只有少数正统派人士还坚持传统,在写作八股文时用六股,但八股标准体式运用也不经常。王思任这篇时文却使用了标准的八股格式。不仅破题、承题、起讲、提二比、中二比、后二比、后二小比、收结无不齐全,连原题、入题都一项不少,这在当时是殊为少见的。八股部分股股相生,胪列情状从四面八方写来,层层捋剥,而溺爱不明之弊,全盘显出,从而警醒世人。且每比前用挑剔引其端,后用咏叹足其意,无一字作含糊语,说个尽,发得透,便足以使人动色相戒。

当然,王思任身处万历那个挑战传统的时代,他又不是一个道学家,他的八股文也不会恪守八股体式,也会依照行文需要而加以改变的。例如,此文的破题就犯有连上之病。《人莫知其子之恶》是个截上题,它截去了上半句“故谚有曰”。按规定,截上题不能从已截去的字面说起,可是王思任在作破题时竟说:“谚有讥人父者”,亮出了被截去的“谚”字,这就属连上,违背了八股功令。八股作法特别强调,若所截去的上半句中有“曰”、“诗云”、“书云”、“子曰”、“孟子曰”等字者,都不能从题字上说起,王思任偏偏要从“谚”字说起,便是有意在挑战功令,表明他并不是个墨守成规者。

此文的第三个特点是突显出了作者的个性。

当代许多人一谈起八股文,便认为它死板,是一种文字游戏,束缚了个性,显现不出作者的性格与气质。其实,这是不懂八股文之所致,优秀的八股文如同好的古文一般,能尽显作者的学识与才情,表现出其独特个性,只是这类文章在八股文的初创阶段为数不多,因为其时特别强调恪守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不过敷衍书义而已,且当时管制极严,人们不敢,也无法表现其才情、个性。到正德、嘉靖之后,唐顺之、归有光之徒,以古文大家气魄,运之时文,八股文的格局为之一新。特别是到万历之后,八股文大变,人们或讲机局,或尚才情,或喜词藻,日新月异,



八股文就成了人们发表崇论宏议的平台,表现个性的工具。议论纵横,气势雄浑之文有之;体气宏大,表露性情之文有之;拟声摹神,生动活跳之文有之,故不能一律将其视为死板。

例如徐文长为人狂放、尖刻,他的八股文就表现了这种性格。其《今之矜也忿戾》文云:“其视己也常过高,而身心性情之际,每怀不平;其视人也常过卑,而亲疏远近之间,鲜能当意。义利之辨未尝不明,但其所见者自以为义,而谓天下则皆利也;是非之故亦未尝不悉,但其所执者自以为是,而谓天下则皆非也。此非直浑厚博大之体无所望也,好胜不已,而其势必至于争矣。”言为心声,古今诗文往往能自肖其人,八股文则言之尤畅。此文刻画矜字、忿戾字入骨,直肖徐文长其人,八股文之可以表达人之性情于此可见一斑。

王思任的八股文也常表达出他的个性,《人莫知其子之恶》即是明证。

王思任聪明绝世,伶牙俐齿,为人谐谑,风趣尖刻,举世无双。他自称“兴还高,人不腐。舌如风,笑一肚。要读书,恨愚鲁。半通今,半博古”,便是这种个性的自我描述。这种个性,不仅在其诗文中得以反映,在其八股文中也有表现,使它们带有明显的王氏印记。

如作者在概释父子关系时说:“而家之中,莫亲于父子,亦莫疏于父子。非父之疏其子也,亲极反更疏耳。”这番话一语道破父子亲疏相互倚存的辩证关系,读了便让人明白父子间过分亲爱便是自我疏离,从而领悟到溺爱之极便是害子之极。寥寥数言,句句存作者尖刻之性,出其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之情。

文中多讥讽之语,如在描写父母偏爱时说:“凡言人之子俱不美,独言及其子则无不美”;“本愚也,而以为诚笃;本狂也,而以为高明”;“誉言至则惟恐其不详,毁言至则惟恐其太尽”。这些话描述出父母溺爱子女的种种情状,语带戏谑,内含讽刺,无不是王思任性好谑浪的反映。

用八股文表达性情源起于正德、嘉靖以古文为时文之际,盛行于万历之后。王思任此文是一篇议论纵横、妙趣横生又说理透彻的好文章,它充分展现了王思任的个性,可视为万历时用八股文表达人之性情的代表作。



孔子曰诺

◎钟 惺

已去之时，圣人不讳言之也。

夫时之既去，圣人不能挽，亦何必讳哉？为孔子者，有诺而已。

今夫时者智力之所不得争，而老者圣贤之所莫能辞也。从古英豪，不免为既去之时，降心短气，而权奸之徒，亦时时挟此以摧抑天下士，若阳货之于孔子是矣。

然使货口已逝，孔子必曰未逝。货曰不我与，孔子必曰吾与。欲与货争乎？抑与时争乎？而孔子政不必尔也，漫听而漫应之，曰：有是哉，大夫警我以已逝之日，而惜我以难得之年也。虽然，丘非敢忘也。

去日苦多，来日苦少，非惟大夫知之也，予亦已念之矣。

往不可追，来不可必，非惟大夫命之也，予亦已深忧之矣。

谓不知老之将至者丘也，岂遂至耄而忘年！夫丘不尝曰吾衰已久乎？三年期月之思，正为此有尽之时悲也，感慨唏嘘，亦自有不可奈何者，即如大夫教云尔。

谓优游以卒岁者丘也，岂遂至乐而忘死！夫丘不尝曰假我数年乎？凤鸟河图之叹，正为此有穷之日忧也，俯仰悲怀，亦自有计无所出者，诚如大夫言云尔。

盖尝思去鲁，去卫，去齐，去楚，去陈蔡，栖栖皇皇，不知身之既老，而由今日以前一追思之，乃知此魁然七尺之躯，弹指于风尘辙迹之下，而逝者遂如斯也。往日之惜，何必他日代为我计乎？

又尝赞《易》，删《书》，定《礼》，修《春秋》，矻矻孳孳，不知岁之几更，而由今日以后一逆数之，乃知此茫茫然百年之期，转盼

于几席丹铅之间，而人寿复几何也。时命之衰，何必当途者过为我虑乎？

子夫夫往矣，吾知所自处矣。吾将仕矣，勿更为我忧矣。

【评析】钟惺及其古文与时文相融合之八股文

钟惺是万历时独树一帜的八股文名家，又与谭元春同为竟陵派的领袖，有共同的文学思想，且同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高手。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

他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科考中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稍迁工部主事。后改任南京礼部主事、郎中。天启初年，擢福建提学佾事，在任上要讲授《四书》、《五经》，评阅岁、科试的八股文试卷，及写作八股文程文。后以父逝丁忧回乡，卒于家。

《明史》本传中说钟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明史·钟惺传》）。他的这种性格对其文风有一定影响。

钟惺“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明史·钟惺传》）。

钟惺擅长古文。他为文既不愿剿袭前后七子，“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又不愿学公安派“戏谑嘲笑，间杂俚语”，“思别出手眼，以求绝出于时俗”（《列朝诗集小传》），终于形成与其个性相契合的“奇情孤习”（《周问孔诗序》），“深幽孤峭”（《明史·钟惺传》），及简约精警，别出心裁的为文风格。

陆云龙在《皇明十六家小品·钟伯敬小品序》中说：“至其为文，类曰：‘宁选而后作，无作而后选’，则其锤炼、推敲，皆备良工之苦心者。”又说他“苦于锻局”，“苦于修词”，“宁简无繁，宁新无袭，宁厚无佻，宁灵无痴，工苦之后，还于自然”。钟惺古文写作的特点，同样表现在其八股时文之中。

钟惺是一个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名家，他把自己古文写作

的方法都运用到了八股时文的写作当中去,故他的时文最像其古文,是万历时将古文与时文相融合的代表人物,除开文体格式还大体保持八股文的部分要素外,其谋篇、炼局、推敲、修词,所追求的文风,都酷似其古文,可以说,其时文是竟陵派时文,具有与其他人的时文不同的特点,这从其代表作《孔子曰诺》中可见其一斑。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论语》,它所在的这一章经文为: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论语》中的这节经文,论叙的是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的情节。看起来孔子似乎有些狡黠,两人不巧相遇于途,又颇具戏剧性。阳货其人,为季氏家臣,他把季桓子囚禁起来,自己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并想请孔子出来做其助手,对这样的人,孔子是不可能与之合作的。阳货也很聪明,利用孔子一贯讲求“仁”与“知”来讥刺孔子。而孔子认为,与阳货合作,不能算“仁”,接受阳货给予的出仕机会,是违背了“知”,所以孔子便敷衍他说:“诺。”从这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孔子不为富贵、贫贱所动,坚持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的人格特征。故《四书集注》中说:“货语皆讥孔子,而讽使速仕。孔子固未尝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货耳。故直据礼答之,不复与辩,若不喻其意者。阳货之欲见孔子,虽其善意,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者,义也。其往拜者,礼也。必时其亡而往者,欲其称也。遇诸涂而不避者,不终绝也。随问而对者,理之直也。对而不辩者,言之孙而亦无所诘也。”

钟惺这篇八股文,扼住孔子为何要说“诺,吾将仕矣”来代圣人代言,阐述孔子既不愿助阳货,又要说“诺”的道理。钟惺文中发掘出孔子说“诺”,非阳是而阴非,文中以孔子之语气,说出许多证据证明,恰好他自己的生平行迹,与阳货的话相合,便可显示孔子之言并非虚假。

钟惺此文,是借用了八股文的躯壳来作说明文。他以流畅生

动的文笔描述题面，既阐释了“诺”之神，又风流蕴藉，表现了作者“冷眼颖心”的古文构思特点。

该文的每股文字束兜住“诺”字，或用虚笔，或用实笔，或用反笔，各极变化，而神味稳合，充分显示出钟惺的八股文也在极力避免“繁芜熟烂”，在内容上以自己的“僻见”为师，表现自己的“幽情单绪”，在手法上追求奇险，以表现出深幽孤峭之风格，这也是其古文之特色。



象日以杀舜为事

◎钟 惺

舜之不幸，观其弟所有事者而已。

夫杀非仁人所忍言也，而日以为事，况施之于兄乎？舜亦不幸而有此弟矣。

且从古必无之人，必有一时有之；人生必无之事，必有一人为之，此固造物之戾气，生人之奇遭也。

所谓必无之人者何也？欲杀其兄之弟是也，其人未之前闻也。所谓必无之事者何也，弟欲杀其兄而日以为事者是也。其事吾尤未之前闻也，其惟舜之有象乎？

不易有者，日也。象之生，非此似无以为日。

不能无者，事也。象之日，非此似无以为事。

人之日营营，而有事者在，圣贤以此养亲、悦亲。象则曰，吾杀舜而牛羊父母矣，仓廩父母矣。所以养亲、悦亲之道，事有捷于此者乎？虽欲不日营营而不可得也，亦若舜之耕稼陶渔而已矣。

人之日劳劳，而有事者在，庸众以此自奉、自适。象则曰，吾杀舜而干戈朕、琴朕、弧朕矣，二嫂使治朕栖矣。所以自奉、自适之术，事有急于此者乎？虽欲不日劳劳而不可得也，亦若民之饮食作息而已矣。

未杀之先，曰谟谟者，始事者也，是象焦劳之日也，心思手足之所毕赴也。

已杀之后，曰绩绩者，终事者也，是象受享之日也，身家子孙之所攸赖也。

夫象不足道也，舜岂堪一日有此弟哉！



【评析】独抒己见，追求深幽孤峭风格的 钟惺八股文

钟惺的八股文在内容上独抒己见，在手法上追求奇险，以表现自己为文追求深幽孤峭风格的理念，在这篇名传千古的《象日以杀舜为事》题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这个文题出自《孟子》，它所在那节的上下文为：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若按八股文的传统作法，就本题，或本节至多融合本章之旨来阐释该题之意蕴，则极难着笔，故从来没有人就这个题目写出佳作来。因该题之上下文皆虚，本章内容更与题目无关，特苦深文无据。文贵肖题，题中既有“日以杀舜为事”，便须紧贴“日”、“为事”来作文章，要就此尽力形容，极情尽致。而欲达此目的，非另辟蹊径不可。

正如钟惺敢于对古文进行革新一样，他在写作这个文题时打破了八股文写作的陈规，别出心裁，敢于出奇，不怕犯险，将上章的内容直接摘来用于此文之内，因为这些内容正好是讲述象数次杀兄，乃至日以为事的，这些经文是：“父母使舜完廩，捐阶，瞽瞍焚廩。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栖。”

作者即将上章谟盖数语分明摘用于文，中比和后比便凭这些话来描述，将题句虚情实做，笔翻波澜，竟似凿凿真言，写得独出心裁，别开生面，简约精警，完全不同于八股文的传统作法，可又是一篇基本遵循了八股体式的八股妙文，令人叹为观止。

陆文龙在评论钟惺的古文时曾说，其“格局皆超，不经意语中俱伏深情奥旨”，这些评语，移用至其八股时文上也是适用的。钟惺本人就是一个具有较强革新思想的文人，在万历年间的八股文变革浪潮中，他便是积极推行古文与时文相融合，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人。他的时文大量运用了古文的写作理念和方法。比别人高

明之处在于他既敢于冲破八股时文的陈旧框套，独出心裁，又能大体上坚持八股文的体式，故他的制义既能获得官方的认可，又能获得革新者的广泛认同，而且没有沾上当时的各种流行的庸腐弊病，这是很不容易的。





小 子

◎周延儒

大贤有意于门人，而呼之使自觉也。

夫小子则有小子之身矣，呼之而有不悚然者哉！

在昔夫子以一贯之统传曾氏也，有所以呼之者曰参乎。迨曾子以守身之法，语门弟子，而亦有以呼之曰小子，此正曾子言下之提撕，小子当身之指示也。其情迫，其指切，吾试揣而拟之。

若谓而今而后，吾始信吾之能免也，而今而后。

吾尤觉小子之不能忘情也。

启予之足者，小子耶？启予之手者，小子耶？而小子亦还自念其手足耶？

鉴予之如临者，小子耶？鉴予之如履者，小子耶？而小子亦自还凛其临履耶？

孰有身而非百年必尽之身，孰有身而非即千载不朽之身。小子思之，其所以必尽者谓何，而其所以不朽者亦谓何，则小子之无歉于小子者，固自有在而能不为之惻然也。

孰是身而可不为一息千古之身，孰是身而又可不为一日三省之身。小子念之，其所谓千古者何若，而其所为三省者又何若，则小子之无忽于小子者，尤自有在而能不为之惕然也。

盖予之日短，小子之日长，借予去日之冰渊，正可迫小子来日之勤励，小子断无容自宽。

予之责轻，小子之责重，证予已竟之成局，正可惕小子未至之前途，小子断无容自贷。

已焉哉！吾何以语小子哉！小子不必问吾，小子问小子而已。

已焉哉，吾何以谕小子哉，就予今呼而能觉之，小子即异日受而全归之小子矣！小子！

【评析】大奸周延儒及其意益万千、 飘逸秀雅的八股文

周延儒虽为明代八股文名家，但他在崇祯时二任首辅，明朝灭亡与他不无关系。为揭示八股文也培育出了奸人的这一面，姑且将其时文录入加以解析，以便让人对明代八股文作面面观。

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南直隶宜兴（今属江苏）人。

他幼时有“神童”之称。一次，因犯错被塾师罚其顶盛水石砚而跪。这时，恰好其师友人雷一声来访，见此情景，便劝其师放他一马，并责令周延儒作诗一首来补过。周延儒请命题。雷一声指其头顶石砚说：“即以顶砚为题吧。”周延儒略加沉吟，即脱口而出：

一片石头一勺水，
压住龙头难摆尾。
今朝幸遇一声雷，
扶摇直上九万里。

雷一声对此捷才赞不绝口，说：“此乃大贵之才！”其师却说他“贵则贵矣，却是奸人身”。因为周延儒赋的是乌龙，不是人龙，乌龙乃贼龙。这虽是一则传闻，但周延儒自幼聪颖是确实的。

他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年）科“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馀……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寻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明史·周延儒传》）。崇祯时，召为礼部右侍郎。

周延儒性格警敏，极会揣摩明思宗的心意。这种本事可能是从小练习八股文时造就的，因八股文专讲揣摩圣贤口气，代圣贤立言。“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求经久之策。’帝颌之，降旨责群臣。”（《明史·周延儒传》）

他知道思宗生性多疑，便在他单独召见自己寻求对策时说：“兵哗必有隐情，怕只怕骄兵悍将在煽动士兵闹事，以胁迫袁崇焕。”“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明史·周延儒传》），从此便宠信周延儒了。

不久，会推一名大学士，本来钱谦益以其才干名望是最合适的人选，周延儒名望、资历太轻无人提及。思宗最提防臣下结党，对这个候选名单心存疑虑。周延儒又号准了崇祯的脉，助奸人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结果钱谦益被黜，廷臣会推的名单也作了废。

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十二月，思宗不顾御史对周延儒“生平秽行”的弹劾，特旨拜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又当上了首辅。

以周延儒的才识和机敏，当上首辅，若能走正路，当可为国为民干些大事好事。可是，他为人贪婪，一心向思宗献宠固位，并提拔任用亲戚故旧，在朝中结党营私，对朝纲起到瓦解作用。

就在他入阁不久，另一个大奸臣温体仁也入了阁。温体仁为人极端阴险狡猾，他“阳曲谨延儒，阴欲夺其位”，可机警异常的周延儒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毫无防备。可见温体仁心机之深，手段之高。

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周延儒结党营私引起朝野的不满。加上其子弟在家乡胡作非为，激起民愤，乡人烧了他家的房，挖了他祖宗的坟，此事成了大家攻击他的导火线。许多大臣都上疏弹劾他，温体仁又在暗中煽风点火算计他。周延儒站不住脚，只得称疾归乡。

周延儒里居时，曾与东林党人交游，尤与八股文高手姚希孟等关系密切。他主持会试时，所取录的张溥、马世奇等人，既是八股文名家，又是东林重要党人。但由于参与陷害钱谦益，便与东林党人结了仇。这次失势归乡，良心有所发现，内心感到惭愧。

周延儒归乡，温体仁升为首辅，他比周延儒更为骄横，五年后终于被思宗察觉而放逐，但朝政益发不可收拾。

张溥等复社人士心急如焚，认为周延儒有才干，如果他能痛改前非，让他出掌朝政，可以收拾残局。于是去劝说周延儒：“公若

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明史·周延儒传》）周延儒深以为然。在张溥、吴昌时等人的帮助下，周延儒被重新起用，并二次入阁。

这次周延儒倒是力求有所作为。“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诿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明史·周延儒传》）他还提议提拔一批东林人士和追赠文震孟、姚希孟等，思宗无不欣然从之。一时间，朝政为之一新，朝野交相称赞。思宗也更器重周延儒，“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

然而，天下已大乱，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改变，周延儒也无挽狂澜于既倒的才能，况时间一长，周延儒贪婪的本性复发，又重新结党营私，天下事益发不可收拾。

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清兵劫掠山东后北还，抵近北京，朝野震惊。周延儒不得已自请去督师，却驻兵通州不敢迎战。每天只知与幕僚们饮酒作乐，却连连飞报奏捷。思宗信以为真，特赐书嘉奖。清兵自动退军后，他又谎称是他将清兵击败，凯旋还朝。思宗极为高兴，特加赏赐，并加封太师。几天后，其谎言被锦衣卫揭穿，以后又陆续得知其他罪行，思宗怒极，下旨赐死，籍没家产。据说，在抄家前，周延儒举火将家中楼阁尽数烧毁。因楼上满贮其掠来之珠宝，故冲天火焰，均呈五色云彩。宣读赐死的圣旨时，历数其种种罪行，在读“姑念”二字时，宣旨宦官有意停顿了一下，周延儒以为还有生机，连连叩头谢恩。等他叩完了头，宣旨者才读出令其自尽之类的话。周延儒当即魂飞魄散。思宗尚未将其赐死时，与阁臣谈及周延儒，说：“朕恨其太使乖。”这话传到周延儒耳中，他说：“事奉如此英明的主上，不得不使乖啊！”从这几桩事中，可以看出周延儒的人品及个性，也可以明了，八股文并不只培育出具有儒家正统思想的人才来。

作为连中会元、状元之人，周延儒的八股文的确有特色，不愧八股名家。作为一个在万历年间成长起来的八股文高手，其八股

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八股文不再恪守传注，而是自出己意。他特别注重机法，讲究写作方法与技巧，以古文为时文。由于他学识广博，又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故其文能发掘题目言后之旨，得题目言外之神，显得意蕴无穷，秀雅飘逸。其《小子》题文即是如此。

这是一篇既遵循了万历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八股格式，又写得生动活泼的八股时文，这样的时文在明代八股文史上是不多见的。特别是该文摹拟孔子的口吻，代圣贤立言，真个是惟妙惟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叫人拍案称绝。写八股文犹如带着镣铐跳舞，螺蛳壳里做道场，十分不易，如像此文把舞跳得如此活泼美妙，把道场做得如此风光热闹，不能不让人叹服。由此可知周延儒才气之高，连中会元、状元就不足为奇了。

更叫人称赞的是，本文能于言外传神，余味无穷，这是一般八股文名家都难以做到的，周延儒却做到了。

写八股文，凡题语未完，题意也未尽者，必须得其言后之旨；若题语已完，而题意尚未尽者，又必须得其言外之神，方才算得上是佳作名篇。

《小子》这个文题出自《论语》，这个题目所在的全章文为：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该篇文题，取自最后一句，题后再没有一字，但曾子将死前为保全受之父母的身体，免受毁伤，故最后又叫一声“小子”，“以致反复叮咛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见《论语集注·泰伯第八》该章朱熹注），曾子的无限深情，都寄托在小子身上。作者正是推想出当日口呼“小子”的情景，曾子会有多少唏嘘叹息之声，故于文中千呼百唤，语语惊心，出人意表处，无不动人情魄。清代臧括斋评此文说：“此题后更无一字，而深情微旨，正复缭绕不穷，文于言外传神，故称独绝”（见《明文小标题薪》该文评语），这番话正道出了此文的特点。



微服而过宋

◎周延儒

圣人之过宋，圣人亦有道焉。

夫不过宋，乌能全身，不微服，乌能过宋？

昔孔子尝畏于匡，困于蒲，厄于陈蔡矣。然犹然弹剑相和，援琴晤歌。远引斯文未丧，而高谈道大莫容。所谓祸至不惧者非耶？乃遭宋桓司马，而遂微服过者，何哉？是盖有道焉。匡之围，疑阳虎耳，故曲三终而围解。蒲之围，阻人卫耳，故要盟成而围解。陈蔡之围，忌用楚耳，故昭王兵迎而围亦解。若桓魋则凶人也，非可以化也。且妄人也，不足与校也。

吾第少施神圣之变化，而已能挫折宵人之锋芒。

吾且暂蹈凤德之羽仪，而已足远离奸雄之憎缴。

于是乎冠去其章甫，衣变其缝掖；长人而饰齐民之貌，怀玉而行被褐之权。方且错处于熙熙攘攘之俦，方且杂伍于毂击肩摩之众，方且追逐于担夫贩竖，骈趋妇市之余。

彼桓子者，摩厉以须，政盱衡一峨冠博带之孔丘而割之刃，而孔丘则已过宋矣。

噫！圣人不微服，则圣人必死。圣人不死，命也。圣人微服，圣人之修身立命也，素患难行乎患难也。

圣人不过宋，则圣人必屈。圣人不屈，礼也，义也。圣人微服过宋，圣人之秉礼守义也，造次于是，颠沛于是也。

若谓是乃圣人之妙用，则又不识圣人矣。

【评析】构思精巧、生动活泼的权奸小论文

周延儒擅长小论文写作。由于生性趋时，又成长于晚明之世，大受文求通俗时风影响，其八股文大多明白通晓。即便是割裂经文，“截头缩脚”（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四十九则），题意不完整，最难下笔的小论文，他也善于就文句求语气，脱卸吸引，写得清新工巧，颇见功力。其《微服而过宋》题文，题目出自《孟子·万章》中之一节。该节经文是：“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微服而过宋”是其中一句，要将这样的题目写好，殊为不易，而周延儒却将它写得明白晓畅，义理尽出，令人叹服。

《孟子》多论事之文，作此类题必须擒住主脑，其余琐碎之事，不妨任我斟酌去取。不过，这个定主脑，酌去取的过程，颇要功力。孔子曾“畏于匡，困于蒲，厄于陈蔡”，都能“祸至不惧”，从容相对，而这次“遭宋桓司马”，却要改变服装以避人耳目逃离宋国，这是为什么呢？汉儒宋儒有种种不同看法，而周延儒却从中看出了孔子立命修身，“秉礼守义”的变通之才，文章以此为主脑，舍弃其余情节，展开阐发议论，这等识力目光，超出常人之上。最妙的在中间一段，说桓子这个凶徒“摩厉以须，政盱衡一峨冠博带之孔丘而刺之刃”，孔子却已平安过宋，以此一衬，孔子的才能即更加突出。虽然运用的只是尔我相生的写作方法，却“正恐他人数日想不到也”（见《明文小传薪》该文评语）。

该文写得生动活泼。描述孔子改换装束时“冠去其章甫，衣变其缝掖；长人而饰齐民之貌，怀玉而行被褐之权”，及混迹于市民之中潜行的情景都运用了诗赋手法，栩栩如生，这是对八股文写作的一种突破。

周延儒这种以精巧的构思，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小论文写得生动活泼却又能不失题旨之真的本领，丰富了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本应在八股文史上大书一笔，但是，由于其奸佞的人品，误国祸民的罪过，使其文名大为逊色，一些八股文论者称之为软媚俗

冗,可见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始终是八股文坛衡文的标准。其中,以王夫之对周延儒的批判最为苛严。他说:

“妖孽作而妖言兴,周延儒是已。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如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伸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憚如此。伏法以后,闺门狼藉不足道,乃令神州陆沉而不可挽,悲夫!”

王夫之因周之为人而对其八股文,特别是对其最为擅长,且最有特色的小题文全盘予以否定,从道义层面上说完全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事理。明朝灭亡,亡在明代最高统治者手中,周延儒不过一个小帮凶而已。周延儒的小题文是对明代八股文较为成功的一种改进。王夫之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得出了明朝亡于各种新兴学说,特别是王阳明学说对儒家正统伦理学说的破坏,因而将周延儒在万历时期对八股文改革中的贡献一笔抹杀,是一种偏激之见,应予以澄清。



天下有道 四节

◎章世纯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欲王者致其德，而天可得而用矣！

夫德则得天，文王是已，欲为政天下，舍此能得志乎？

且知天之说者，则王事可成。天之道主于扶德而已，随其世之有道无道，展转属之，未有易也已。是故有时而行正道，有时而行权道。行正道则专属于贤德，行权道则若附于强大。

夫天亦岂畏强大者哉？其能为强大者，必其少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无大德大贤，则小德小贤亦能成其强大。天意亦徘徊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

齐之景公，吴之阖闾是已。景公自能显而力行于泗上诸侯。阖闾能用其民，胜于景公。而力并能行之齐，此皆贤德之倡而中稍有胜劣焉，则天意亦稍有低昂焉。此亦所谓展转属之者矣。

然则大国遂可师乎？非也。天之属意大国，特其权也。小国而仅师大国，则又为大国之细，其德未有以相胜而力必不可以相敌。

当今时，欲遂为政天下者，莫若审于天道之正而因而用之，而自处于大德大贤以邀夫天道之所必归，夫然后藉于德以令于天，藉于天以令于天下。文王之事可继，成周之业可再。随其强弱大小而或迟或速，皆可为政于诸侯也。

此其事若逆天，逆天之数易其向也。而其理则顺天，顺天之道投其好也。一夫有大德，而天下既已成其为有道之天下。有大德而得天，而天亦成其为治命之天，而人亦无所归责焉，则岂非天所欲得者哉！

【评析】雄踞于天启八股文坛的章世纯及其 以善于融会旨趣，发挥理奥而著称 的八股文

在普遍不尊经依注的天启八股文坛，章世纯是精究理学、沉酣子史，以擅长融会题旨，发挥妙义而著称的特立独行者。

章世纯，字大力，江西临川人。自幼聪颖，博闻强记，精通经史。

他从小即开始八股文的写作训练，以文名远近，却到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科才考中举人，时年已近五十。后因屡赴会试不售，便以举人出仕。崇祯年间，累官至柳州知府，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翁了。

章世纯是晚明的八股文高手，与金声、陈际泰、罗万藻齐名，被称为“制义四大家”。后又与同郡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以振兴八股文为己任，被世人尊称为“章、罗、陈、艾”时文四大家。

章世纯意欲使已衰颓了的八股文起衰去弊，首先必会从其内容入手，使八股文回归到尊经依注的传统道路上去。由于章世纯自小即研经味道，精心理解，博雅淹通，又以振兴八股文为己任，故其文能尊经依注，理足气充，足以发挥妙义，开先圣之窍奥，惠后学以梯航。

他的八股文都能切题阐发。八股制义必先有题然后有文。从万历末年至天启，士人于题全不体认，漫衍浮夸，掩卷读之，不知所云。作八股文若不瞄的放矢，依题阐发，只求灵巧，虽文章工整，也不能称好。没有学问根底而去追求华丽的文采，即便能炫人耳目，也是左道旁门。章世纯为了正文风，他自己就特别注意体味题旨，切题阐发，故其文认题最为真切。如“譬之官墙”一句经文中的

官是官，墙是墙，不是一码事。子贡的话只侧卸到墙字，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与“室家之好”，都在官里分别，与墙无关。只是因为官的等级不同，所以墙才有高卑之异。而后来的人却没有体味到这一点，将官、墙混合，一如墙之尺寸，即关系到圣贤的分量，这么做就是谬误。只有章世纯因能深味题旨，认题真切，能分辨出官、墙之别，他在《譬之官墙》题文中说：

“人畜美以自实，而有馀不足之数相与差也，此官之说也；亦标形以接物，而可测不可测之间亦相与差也，此墙之说也。求之于官，而赐与夫子有馀不足之实，可相方而得之；求之于墙，而赐与夫子可测不可测之情，亦可相方而得之。”

像章世纯认题如此真切是未曾有的，故足以羽翼经传，为程文法式。

正因为章世纯能精研经注，认题真切，故其八股制义能阐发出深刻的道理，发前人所未能发，言前人所未能言。作《君娶于吴为同姓》二句题极难下笔，若非参透天人之秘蕴，且具有制作之精心者，不可能道其只字。而章世纯作此题文却如驰骋无缰之马，文词奔放而出，又句句切中题字，阐发出其包蕴的深刻道理，其文云：

且先王于合之甚者，皆求有以别之。别之而为合，故其合也，固而能久，异而后事同，睽而后志通，此其义乎？然而为义不止于此，天地阴阳之气，皆以异类相求，异气相益，而至以一本之亲通其情昵，则有美尽之忧；人道礼义之治，常使疏不至离，亲不至渎，而至以燕褻之私讲于骨肉，则有道苦之害。其在太古之时者，其取义精，盖智足以辨微，故所详者专于阴阳之际，同德者为同气，同气者同姓，异德者为异气，异气者异姓。同姓虽远不通婚姻，异姓虽近不避婚姻。故同为皇帝之子而著姓之殊，所以然者，纪异德以别所生之气也，古道然也。其中古而后者，其据义显，盖其智不足以及微，故所辨者专于礼义之严，为正姓以统远，远者行饮食，为庶姓以统近，近者议服数，男子则称氏以别贵贱，女子则称姓以别婚姻，故

有买妾不知姓则卜之文，所以然者，本所从以厚男女之别也，周道然也。

系子于吴，是夺吴宗也。以鲁之故而使吴不有其姓，非吴之所受也。且系子于吴，是又夺宋宗也，以鲁之故而使宋不得正其姓，非宋之所受也。于其存而称之曰孟子，讳君恶也；于其没而书之亦曰孟子，讳国恶也。曲为君讳，曲为国讳，于臣子之义得，而为其所讳者，其谓之何哉。

这篇文章，已突破了八股格式，系以前后两截来分别阐释题之前后两部分，可见即便是以恪守儒家正统观念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能不与时俱进，思想行为均有所变化。

此文于题前衍出前半截题文，议论翻空出奇，申述周公制礼以前同姓不得通婚之禁，补充阐发出一番大道理，以免那些越礼者能从那里找到借口。作者学识之广博，认题之真切，阐释道理之深刻，都是自有此题制义以来所未曾见过的。

文之后半截则从正面阐释题面之旨，论述“君娶于吴为同姓”之不合于礼制。作者才华如万斛涌泉，不择地而出，搜索上下千古，以各种史实来阐释道理，所以理足气充，深刻全面。他又能出入题中以穷究其情，故理更贴切。

章世纯性格豪宕而锲刻，其文也幽深雄奇，文笔犀利峭刻，很具特色。其瘦硬通神之力，英伟绝世之气，虽尚不能与金声相比肩，而其他八股文坛中人，却难望其项背。《天下有道》四节题文，即是其一篇代表性名作。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孟子·离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这四节经文的注释为：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称其德之大小。天下无道，人不修德，则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势之当然也。”

章世纯在这篇文章中，依据传注，又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对传注做了新的发挥。他扼定德字四节，看作一片，正侧向背，无不如意。在后世功利者眼中，只有小役大，弱役强，信那有道之天不过。从那些腐儒眼中看来，只有小德小贤役大贤大德，不信无道时亦天也之说不过。在作者看来，天岂肯去做无道者？是人自无道。人若有道，

则天自转无道为有道。全文扼定此旨而阐释，故理深而气雄，可使功利者和腐儒们胸胆、眼孔皆为之一开。可知文章到理透时，真能推排豪杰，展拓万古。

此文打破八股格式，搦定主旨，一本古文，夹叙夹议，笔阵纵横出没，于一意旋折中却有如数百万兵车铁马并驾齐驱。其机阵之灵变，骨力之苍雄，又使文章更加添几分奇丽。

清代著名八股文选评家吴兰陔评此文说：

“瘦硬通神之力，英伟绝世之气，渠意中尚不欲把臂正希（指金声），馀子琐琐，亦无能为役矣。窃谓时文中原有真古文，可以编入《唐文粹》、《宋文鉴》而不愧者，有此等鸿篇，使人不敢目时文为小道。”（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

吴兰陔把这篇时文看成是一篇绝好的古文，是没有看走眼的。章世纯的八股时文已与古文有合二为一的趋势，从此文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其时文的一个显著特点。章世纯的八股时文得力于先秦诸子，兼仿柳宗元。其雄快不及陈际泰，而论隽杰、廉悍，陈际泰却不如章世纯。俞长城说：“大力文幽深沉鸷，一溪一壑皆藏蛟龙，不崇朝而云雨及天下，故沈何山、韩求仲、张受先皆重之。”（引自《制义丛话》卷之六）

章世纯不仅在为文上尊重传统，表现出他是一个儒家正统思想的遵循者，在日常生活及为人处世上，他也处处以儒家伦理观念作为规范。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消息传至他耳中，他悲愤不已，不久便忧愤去世即是明证。



德行：颜渊 一节

◎金 声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追论陈、蔡相从之人，其人才之盛有可观者焉。

甚矣，陈蔡之围也，区区数千师，而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若四人俱坐困其中焉，岂独一大圣人哉？

尝观古今人才，唐虞而后，于周为盛，越数百年而遂有孔氏之门，后先奔走，心悦诚服，则忠臣义士之效，不必在朝廷也；患难生死，与聚与共，则风云龙虎之从，不必其在得时也。陈、蔡之厄为已事矣，而夫子回思相从之士，忽忽其不乐。呜呼，彼一时依依相从者，伊何人哉？迄今纪之师师济济，犹在目前，念我夫子，如之何其弗思也矣。

尚德不倦，躬行不息，所愿望难见也，时则有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出言有章，吐辞为经，旷代逸才也，时则有若宰我、子贡。

至若经世之略，为富为强，政事有寄也，而冉有、季路其人在焉；道德之华，弦歌博雅，文学千古也，而子游、子夏其人在焉。

道大莫能容，所欲杀者夫子，而于诸贤无忌也。设诸贤非从夫子游，挟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博取人间富贵，与一切功名才望，固自易易，何困厄若斯也？而诸贤不愿也。

圣人无厄地，所自信者天命，而人心则不敢必也。设诸贤但以从夫子之故，奉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投凶暴之一炬，而师弟朋友，无一存者，固事势之常，亦无可如何也，而诸贤不惧也。

不可以德感,不可以说动,不可以力格,不可以学化。平昔之能事,当此上下无交之日,亦何所施,而君子固穷,则凄凉之奇况,惟同心可以其尝。

修德不获报,尚口乃致穷,果艺无长策,文采不庇身。特出之英华,当此病莫能兴之日,於邑无色,而大节在三,则无位之依归,其愚处正不可及。

迄今日而或以夭折、或以疾亡,或以难死九原之下,既不可作;其存者或以仕、或以故游于四方,归其故里,杏坛之上,无复陈、蔡一人。子独何心,能不悲哉?

嗟夫!患难之侣,安乐弗见,虽庸夫俗子尚难忘情,而况此奇杰之士欤?

【评析】被后世称为“文章最高,忠义最烈”的

天启八股大师金声及其悲凉雄奇、 理深情真之作

在晚明八股文坛上,金声是文章与品格均冠绝一世的高手,受到当时及后世的推崇。

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好学,工举子业,名倾一时。”(《明史·金声传》)在进行八股文写作的训练过程中,金声自小就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牢固地树立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并以此作为其为文、为人的准则。

他于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科中进士,授庶吉士。此时正为明王朝内外交困之际。第二年十一月,清兵即大举入关,进逼北京。在此紧急危亡之秋,“声慷慨乞面陈急务,帝即召对平台。退具疏言:‘臣书生,素矢忠义,遭遇圣明,日夜为陛下忧念天下事。今兵逼畿,不得不急为君父用。’”(《明史·金声传》)疏文献计献策,表现出高度的忠义之情。后屡上疏言国事,慷慨论列,但都不见用,“遂屡疏乞归”。刚退居林下,群臣便交荐,都恳辞不赴。至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时“廷臣交荐,即命召用,促入都陛见,未赴

而京师陷”(《明史·金声传》)。金声面对国破帝亡的惨痛局面,脑中的儒家理念促使他一改退隐不出的做法,而踏上了抗清的不归路。

福王在南京称帝,超擢金声为左金都御史,他坚辞不就。南京被清兵攻陷,“列郡望风迎降”,金声却集士民,率义兵拒守安徽各地城池。唐王授他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诸道军”(《明史·金声传》)。他率义兵分守关隘,抗拒清军,各地纷纷响应,收复了江西、安徽大片失地。后因人叛变,在绩溪兵败被俘,被押送至南京。降臣洪承畴亲自劝降,被他严词拒绝并对洪承畴多方嘲讽。清兵只得将他处死。临刑时,他对追随他抗清而一起被俘的学生江天一说:“子有老母,不可死。”江天一回答说:“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两人便慷慨赴刑场就义。师生二人的民族大义,备受后世景仰。

死后,唐王追赠金声为礼部尚书,谥文毅。江天一只是歙县的一个秀才,没有封赠。

金声为明末的八股文高手,与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一起被称为“时文四大家”,许多人甚至认为他的水平应高于其他三人。清初俞长城曾评论说:

“怀宗初服,国是渐非,文亦不振。金正希崛起为雄,力追古初,为文幽深矫拔,为启、祜之冠。”(引自《制义丛话》卷之六)

金声以一个满腔忠义之士为时文,又以振兴制义为己任,故其文皆力矫当时空疏无用之风气,无不贴近时事,有感而发,慷慨激昂,言之有物,且合符儒家理念。其题出自《论语》的《德行颜渊》一节题文,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是一篇在明清八股文坛流传不已、脍炙人口的名作。

该题若平平地顺说,则无法使其惊悚世人心目。作者在中二比里,将题下二节之政事、文学科目拈来阐述,妙在反复痛快。虽然文中以四科名目作铺陈,固属无味,然其指事类情,悲时悯俗,可以感发人心,扶植世教,又有何不可。且作者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科目八个实字忽翻得嵌空玲珑,尤能使无情处都有情,足以见作者手法之高。

全文以悲凉雄奇之气贯串，令人作惊雷怒涛之思，不作凄风苦雨之想，是作者为文的一贯性。八股文至万历末年以后，特别是到天启年间，真气索然。金声、陈际泰等数家聚经史之精英，穷事物之情变而灌注于八股制义之中，所阐发的题义皆为其心得，言必己出，不袭陈词滥调，气必悲壮雄奇，或沉郁苍凉，为天启、崇祯之际沉靡的八股文注入了生气。故此文立意虽粗，然生气郁勃，可以涤俗士之鄙情，开初学之思路。吴兰陔说此文“滴泪迸血，制义中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的确是中肯之言。



言不顺，则事不成

◎金 声

事不可以逆成，正名之义切矣。

夫言以行事，不得于言而求诸事，不亦左乎？

若曰：子迂吾说，将谓拘于理，而不达于事也，而不知吾说，诚计事之深者也。以为吾欲为政，则必以兴事为期，有如为之而无成，此其君无乐乎有国，而其相亦无贵乎当国；且吾业为政，则无自操事之体，亦惟是申命以行之，岂徒惟其言而莫予面违，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顺矣。

顺逆之故，初不必验于言后；

而成败之机，吾早已见于事前。

将有事于国中，则明诏大号，百姓于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义有所错，要必始于父子，而今大义先蔑如矣，则而象之，其又何诛乎？虽令之不听，虽呼之不应，吾见废焉而反耳。

将有事于境外，则尺简寸牋，四方于是乎观辞命焉，朝聘会盟，继好息民，则又必称我先君，而今紊然于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其又何称乎？或诘我而无辞，既欲盖而弥彰，吾见其动辄得咎耳。

盖勋业之在天壤，未有可独立而就，天与人归，即帝王尚烦其拟议，故谟必讣而后定命，犹必远而后辰告，岂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侥幸之图？

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辞窘，虽英雄无所用其智力，彼作誓而尚有叛，作诰而尚有疑，况乎绝裂典则，而漫以行其矫诬之意？

由斯以观，不顺于言，而求成于事，必不得之数矣，而其弊皆



自名始，子谓为政而不期成事则可，不然安得迂吾言乎？

【评析】借题以抒胸中积郁，寄托感时伤世情怀的 金声八股文

金声以其广博的学识及不羁之才气，在天启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往往借题以摅胸中之郁积，其文便会冲出题目之外去发议论，寄托作者忧国忧民、感时伤世之情怀，这便成为金声八股文的一大特色。其《言不顺》二句题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满纸沉郁悲壮之气，寄托了作者悲时伤世的无限情感。

八股文本是用来阐发圣贤之微言大义的，但到了天启年间，一来受时文与古文相融合趋势的影响，二来在阉党横行，“威福日甚，鹰犬日众，四方孔道，民无敢偶语”的环境中，正直的士人只有借八股文来道世事，抒胸中之奇。故他们的八股文常充满了郁勃古气，多凌古铄今之作，而八股文的文体及功令往往被突破。这篇时文便是这样。

作为尊奉儒家思想的志士，金声在八股文写作中当然会遵循题中的义理，并以孔子的口气代圣贤立言，这从本文的破题、起讲中便可以看出。但作者要以此文来发摅胸臆，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深切忧虑。在中二比中，作者说“将有事于国中，则明诏大号……而今大义先蔑如矣，则而象之，其又何诛乎？虽令之不听，虽呼之不应，吾见废焉而反耳”，这些议论，不正写出阉党专政时的政治状况吗？至于后二比中的“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辞窘，虽英雄无所用其智力”等话，则更是作者在进行情感的渲泄，其沉郁的心情都表现无遗。

然而，作者既要原先专用以载孔孟之道的八股文作为表达感时伤世情感的工具，就必然会冲破八股文束缚过严的种种功令。如本文即冲破“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文题内容的限制，而将其阐释范围扩展到题文之上下文，这样做是违反八股文写作规定的，有侵上犯下之嫌，但由于全文法密意精，只是从题目内破空而出，故足以弹压一切，自然也成了一篇传世之佳作。



天下之民举安

◎金 声

大贤图安天下,其所望于王者大矣。

夫去则去耳,以天下安危之所托,安能浩然哉!

若曰:予非齐人,于齐乎何私,于齐王乎何恋。予之来齐,实为天下计。予初一见王,而即为天下生民喜也。不幸时会不遇,大业未就,乃至齐境之人,亦得藉口为笑,而岂如一旦用予之后,虽区区安齐,尚非予事哉!

天祐下民,君臣相得。藏天下于予怀,尚属夙昔;运天下于掌上,审在斯时。

辟地朝强,莅夏抚夷,王不过以求天下之大欲,而予则因而藉以行安天下之大事。盖合天下只为一齐,若近乎私,要之中原鼎沸,民莫适从,使天下摄于齐而不二,即齐所以置天下于不顾,予与王可坐而定之。

兴兵危士,构怨结祸,王即未有安天下之深略,而予可节而取其安天下之仁心。盖一国之才,与天下之才,虽若有异,要之干戈不息,蹙靡有骋,本怀安天下之心以完一齐,即可推此安一齐之心以被天下,予与王直举而措之。

当斯时也,举天下之民,皆登名世之衽席,相率而归其功于王,而王不任受也。王不得予,其去世主无几耳,谁与成厥功?

举天下之民,将脱暴君之水火,相率而归其德于予,而予弗任受也。予不得王,终邹鲁一布衣耳,谁与布厥德?

无已则举天下之民,仰而归其功,若德于天。盖用其学以安天下,予所能自必也;用其资以安天下,予所能必于王也。使王为天

下而必得予，予为天下而必得王，则非予与王之所能必也，此天下亿万生民之命也，而予能无望乎？

呜呼！大丈夫盱衡今古，俯仰天地，远则且虞万世之虑，近亦时存天下之心，尚不屑图一国之勋，而或以为来十一世之泽者，岂不悲哉！

【评析】朴质老辣，用法无痕的大师八股文

金声之文，讲究写作方法与技巧。但他修养很高，能做到篇法之妙，不见股法；股法之妙，不见句法；句法之妙，不见字法。用法而不见痕迹，浑脱浏离，神光离合，达到很高的境界。其《天下之民举安》题文即是其代表作。

这篇时文的题目，出自《孟子》，原是孟子回答一个叫尹士的齐人批评他去见齐王，而又离开齐王的原因时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及其上下文为：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金声作此文题，不从安天下去铺排，若那样做，便是买椟还珠，去之千里。他精研经文，且有感天启时有才有德之士不得重用的现实，将全文的主脑放在论述孟子与齐王的关系上，把安天下与齐王是否用孟子联系起来。在金声看来，安天下之术，不出安齐，安齐之功，须得王用，齐王用之与否，又在天命。文章逐步缩归实地，不作一句敷张而作者感时伤世之心意即呈露无遗。

这篇文章在代圣贤立言这方面做得很好，通篇用孟子的口气，极切合孟子的性格与心理。但作者并未按八股文必须谨守题字行文的规定行事，而是将题之上下文都融合在文章之中。题中的一个“举”字，是从上文的“由足用”生根，从“如用予”发源，从“则岂徒”领脉，紧紧回抱，直注下“予日望之”，这样，“举”字的真精神便出来了。具体而言，正文的前二股发挥“安天下”，层层回抱上文，使“举”字精神显突。正文的后二股即上承“如用予”，下注

“日望之”，作者感伤时事的一片热肠，都在此一句中滚滚流出。故王巳山在评论此文时，说它“面实神虚，气愈王而情愈怆”（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金声极善于扼定本题字面，透发上下文之神理，这种做法完全是吸取了古文写作的精髓，而形成了金声时文与古文相融合的特色。

该文还显示出金声时文的另一个特点：用法而不见痕迹。此文沉郁悲怆，以情致取胜，以至于法截而脉通，又绝不见勾勒贯注之痕迹。后二段“王”与“予”互说，尚是绕上之常法，至补出“天”字一层，为下文“望”字张本，则就不是寻常手段了。故吴兰陔称其为“沧海横流，鸿文无范，卓乎大观”。还有评家称其为“淋漓感慨，古气郁勃，真凌古铄今之文”。这都是对金声写作技巧的高度赞赏。

晚明八股文大师艾南英是金声的知音，曾对金声的制义时文作过一番综合评述，指出其文的特点在于“洁”。他认为无论是古文、时文，“文必洁而后浮气敛，昏气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驰骤迭宕，呜咽悲慨，倏忽变化，皆洁而后致者也”（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载《明文海》）。“天下方习尚浮腐，徇经语、子语，以日趋于腐败，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正希之文，浮气敛而昏气除，惟其洁而已矣。”（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载《明文海》）金声的“学问深浅，虽与年俱进，然大约以朴为高，以深为老，则未尝有今昔之异也”。

艾南英还指出：

“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不能以古文为时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夸大而剽猎浮华以为古，其弊亦归于庸腐。”（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载《明文海》）

艾南英与金声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对金声时文的评价是知人知文之言。他告诉我们，金声的时文是沿袭了嘉靖时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并与古文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他的时文不沾染万历末年和天启时的弊端，文词洁净，不尚浮华，无浮夸及昏庸之气，以朴质为高，以说理深刻为老辣，生气郁勃，可以洗涤俗士之鄙情，给人以昂扬的力量。故其文以幽深苍凉而独立于天启、崇祯，备受后人的钦敬。



其争也君子

◎项煜

想君子于争，究成其为君子者也。

夫观君子于争，则其争自不犹人之争也。

争乎，亦有君子存乎？且自无争之名美，而无争义为争之捷径。然而借羲黄以文末俗，仍还其末俗而已矣。何也，持世不论争不争，但论君子非君子耳。非君子则无争亦愈非君子也；诚君子，不必无争而始见君子也。

盖定争于世人，则当究所争。所争者，介一争于性情之内者也。

定争于君子，则当据其争。其争者，寓性情于一争之内者也。

故观于射而其争宛然矣，正不必以让而蒙争。

观于射之争，而君子悠然矣，亦未始以争而蒙君子。

夫万物之器也，镇之以无争反不定，镇之以其争必定也。令君子必欲讳争，则争永为凌轧之徒所据。而争不灵，孰知一射也，而风期栩栩存乎？争固巧传君子之风期也。

夫性命之伤也，不难以无争砥天下之争，正难以其争砥天下之让也。令争中竟无君子，则君子反为悠悠之辈所托，而君子不灵，孰知一射也，而神味油油露乎？争固曲流君子之神味也。

然则弧矢之利，盖先生所以陶君子矣。学问可以处争而后有用，故厠之征诛之运，而自开礼乐之统者，其人回渊乎可思也。夫淡漠之境，有君子矣，角逐之境，更有君子耶？然则短长之觭，又天下所以砺君子矣。经济可以用争而后不穷，故参之智力之会，而弥鬯道德之灵者，其神洵穆乎自远也。夫冲夷之中，或无君子矣；雄锐之中，转有君子耶？

非君子之化争于让也，直君子化争于争也，还以其争焉可。

吾性中不留一君子之争也，世道中乃留一能争之君子也，还以君子焉可。

其争也君子，而君子岂为争掩哉？故曰无争。

【评析】只用八股文操练嘴巴及文笔的 项煜及其刻意求新之作

在明代八股文史上，项煜是少有的一位文品高却人品低的八股文名家。

项煜，字仲昭，号水心，苏州府吴县人。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科中举人，次年即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科连捷中进士，由庶吉士累官少詹事兼翰林侍读。

甲申（1644年）巨变，李自成攻陷北京，不久称帝。项煜投顺新朝，授官太常寺丞。李自成失败后，他逃至南京，以失节降敌下狱。后因捐出大笔银子助饷得以出狱。

清兵南下，亡命至浙江慈溪，被乡民所杀（见《小腆纪传》卷一九），在八股文史上留下一个臭名。

项煜早岁丧父，家中贫穷不能自给，但能发愤攻读儒家经典及八股时文。每天独坐一小楼读书，彻夜不眠。其祖父心痛他，禁止他如此苦读。他便将窗用布遮住，默诵达旦。

夏天蚊虫满屋，哼声如雷，便找来两只瓦瓮，将双足置于其中，他仍啾唔自若。

家里穷，无钱买书，他便带少许银钱到书坊去作押金，选好一种书后，与书铺主人约定，先拿回去读一读，若合适才买。他记忆力过人，回来后将书一晚读完，“尽记其书不忘，翌日持去，托言不佳，更易一书，归阅如初。其笃学苦志如此”（项亦奎：《项太史全稿·附记》）。

万历末年，吴中“朱孝介先生文望甚炽，以乡进士家居教授，户外之屦恒满”（汪琬：《项太史全稿·序》）。项煜即投于其门下，为其高足之一。

朱孝介极善识文，“每科试之岁，诸生以私课奉教于朱先生。先生辄决之曰：某当售，某当速售，某某决不售。及秋榜既发，无不验者”（汪琬：《项太史全稿·序》）。他特别喜爱项煜所作，以为绝伦。每一篇出来，他必会传示诸生，供他们学习揣摩。他自己则吟赏不已。不久，项煜的岁试和科试均考了第一，便联取科名以去。从此项煜的“文名大噪，残膏剩馥，沾溉遍于海内，而朱先生知文之名益大著”。

项煜的文名虽高，其品行却不好，这并非仅指他于甲申巨变时投降了李自成，依照今天的观点，归顺农民军，不叫起义也要弄个投诚的名目，是光荣之举，并无什么羞耻可言。说其人品不好，是指他一贯的品行不端。崇祯甲戌（1634年）科会试，他参与阅卷，艾南英的卷子分到他房中。放榜后艾南英领取落卷一看，其首篇制义仅读了四行就没有再看，致使文名传遍天下的艾南英落榜。艾南英气愤难平，便将其七篇制义刊刻出来到处散发，并说“士子三年之困，不远数千里走京师，而房官止点四行，弃置不顾，此岂有人心者乎？”（引自《制义丛话》卷之六）项煜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引起了公愤，其名声大损。但他不仅不自省，反而极度记恨艾南英。

崇祯癸未（1643年）科会试，项煜资阶已深，不应该当房官分房阅卷。为了雪甲戌之耻，他千方百计去活动，终于违例入帘。他为了整艾南英，便“阴授名士关节，荐之榜首”，谁知这年艾南英没有入试，整人未达目的。这种不顾国家抡才大典公正性的卑劣行径，充分暴露了项煜品德之坏。

从项煜流传很广的《谈文随笔》也可看出他的品格。因资料难寻，特抄录于下。

谈文随笔

项煜

场中作文七篇，原只一篇。平日用功如炼丹，然到此直须化去。所重惟在前三义，尤重在首篇，须苦心烹炼为得。虽有熟文字，切不可径写，至经则不妨耳。

场中阅卷,及具眼人决利钝,先看气局紧与不紧。凡气候到将中时,自然紧拍,有了上句,便有了下句,恰有水到渠成之趣。

少时作文,最爱可惊可喜之句,若读三四行不使人踊跃称快者,辄再删改。凡平时博选,毋论先辈时流,虽遇一二语惊奇,亦自摘出揣摩。

作文不必拘定三、六、九,当检阅之暇,忽然有触,辄命笔作一篇文字,必有大得意处。

场前用功,只须贯穿,以静养为佳,临场尤不可耗散精神。

场前作文,神要聚,机要活。聚则活矣。精团气聚者,法必售;神闲意暇者,法必售。

场中阅卷不论高位,只论生熟。故临场作文,虽粗豪亦不妨,只须络绎奔会,淋漓尽致而止,则售矣。

场前看文,只看临场艺火候已足。看墨卷,只看前茅之佳者,必有几段精警处动得主司。若平时须纵观房稿,发其聪明。至临场只是读墨卷以中于律度。且墨卷自然骨肉停匀,堪为法式。

不可将此道看作制举业,直须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方得出头。

这篇《谈文随笔》虽说是研究晚明科场考试心理与做法的难得资料,但也告诉人们:项煜品格不高。他并未遵循儒家正统思想,也没有按照明朝科举考试的规则,凭着对儒家经典的钻研与领悟去应对考试,而是在千方百计揣摩考官们的心理,进

而迎合他们，以求高中。凡此种种，都不是一个正派儒生所应做的。而项煜不仅做了，还洋洋自得地津津乐道，这就反映出其人品之差。后来他之所以投顺李自成，与这种靠逢迎去博取荣华富贵的一贯做法不无关系。

虽然许多人因为其为人而鄙薄其文，但项煜的八股时文确有其独到之处。他的八股文主要的特点是新奇。有不少人在评论其文时都说它怪怪奇奇，甚至把他比为诗中之李贺，文中之樊宗师，与众不同。不过，他学问有渊源，词语有根底，这些都得之于先辈中的八股文大家，不是那些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后生晚学可比。

项煜为文刻意求新，一个字都不肯与别人雷同。但其文都是从血脉缝隙里透出灵思，而又佐以经史之精华，先辈大家之格律，故虽幽奇险峻，光怪百出，却又爽利有馀，卒归于正。这也是他一时文名大噪，试无不冠一军的原因。不过，比起金声这些大家来，他还是要瞠乎其后，只是以之鏖战名场，可称得上万人敌，因为他善于揣摩考官的心理。

项煜为文刻意求新，首先表现在其命意必新，加之出笔必锐，用法必紧，制局必灵，炼字必老，所以每个题目到手，必能自运灵机，别成花色。加上他的揣摩工夫至精至熟，所以特别适合于应付各种考试，他的《其争也君子》题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的文题出自《论语》，该章的经文为：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四书集注》中对这一章的注释为：

“揖让而升者，大射之礼，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下而饮，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觶立饮也。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

《论语》中的这章经文，章首以“君子无所争”一句断煞，最后“其争也君子”一句文从射内转出另一番境界，语意极浑成，极淡远，极精微，非高手难以显出文题之妙。项煜此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阐释了本“无所争”的君子又要争的道理，婉婉曲曲，别出心

裁，绝得题神。而文之秀美，笔法之老辣，见解之新奇，人自可见，这只有高手才能达此境界。

文中将“其”字一粘，“也”字一顿，君子的神态便活现于笔端。作者又处处从“必也”着墨，“其争”之意便越坐得实，“无争”之意便越缴得醒，妙在与此章之首句“君子无所争”神回气合。

此文也是有寄托的，“令君子必欲诤争，则争永为凌轧之徒所据”便将作者当时的心情暴露无遗。当时党争激烈，看来项煜是站在“君子”一边，主张与“小人”之党抗争的。正由于项煜的八股文中有这些感时伤世的内容，尽管他人品不好，当时及清代，爱读其文的人仍然不少。

文中多处引用佛经、子书字句，如“直君子化争于争也”，便是老子精言，蒙庄妙笔。援佛经、《道藏》及诸子百家之语入八股文，这是明末之风气。正由于项煜能随俗从众，适应大多数士子的口味，其文方才获得千万人的喜爱。

项煜的老师朱德升即前面说的朱孝介先生十分看好此文，极为喜欢，曾在此作后批曰：

“婉婉曲曲，绝得题神，而一种秀色，千人亦见。”



禽兽逼人 则近于禽兽

◎项煜

靖物害者，当念人心之害矣。

夫人非禽兽伍也，逼人已可忧矣，况复自近之耶？

且人之不得并禽兽也，犹大人之不得并小人也。贱并贵，其象为逼。贵并贱，其机为近。均之于人不利焉。

唐虞之大人，有尧有舜，又有益有禹有稷，凡皆护此人者也。

人必先与禽兽近也，而禽兽乃有所乘而入，兹逼人之蹄迹，岂人实自召之耶？曰：洪水致然。然则是天之忧尧，而纵此禽兽也；然则是天之开舜，而命此禽兽也；然则是天之水行既厌，火德将兴，而弃此禽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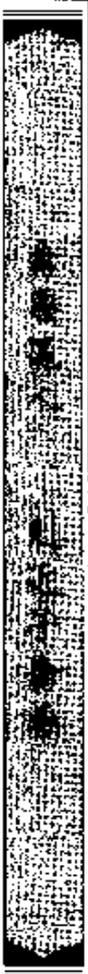
火之得毋酷乎？曰：否。人则不可无教也，禽兽则不待教而诛者也。且苟禽兽不匿，禹安所施疏濬决排之力，安所告八年三过之成，而稷虽善稼，其以育禽兽乎哉！

惟天下有人之事，有禽兽之事。禽兽之事，山惟恐不深，林惟恐不密，逼人非其事也。人之事，食有所以食，衣有所以衣，近禽兽亦非其事也。而当其逼，犹然人也，当其近，直非人矣。

禽兽之禽兽，德水而仇火；人心之禽兽，避劳而就逸。夫向所蒿目以忧，枚卜以使者谓何，而忍令之出禽兽而入禽兽哉！此尧舜所为重忧其心也。

【评析】技法高妙的截搭题文

项煜的八股文十分注重写作方法，其篇法、股法、句法、炼气



取势都臻很高境界。这从《禽兽逼人 则近于禽兽》这一截搭题文可以看出。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孟子·滕文公》，由于是截搭题，其文出自其中相连的两节：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四书集注》对这两节的注释为：“天下犹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圣人迭兴，渐次除治，至此尚未尽平也。”“言水土平，然后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最为难作的截搭题，虽然是有情搭，因题目内容繁多，头绪纷纭，要想作好是极为困难的。但项煜身处最讲求八股文作法的晚明时期，他的揣摩功夫又极精极熟，他精研经史，对唐宋古文及前辈八股文大师的写作方法已揣摩透彻，加上他天分高，又加以三伐九洗之功，故无论何种难题到手，他都能别出心裁，以巧妙的构思，高超的技巧，老到的笔墨，将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这篇文章便笔力雄奇，脉缕致密，议论精警，令题之竅会自然奔赴，真是极截搭题之能事，不得以寻常的“吊、渡、挽”之法求之。

作者将题目所在经文的内容涵括在破题与起讲之中，借映本旨，恰扣起讫。然后打破八股体式，用古文的方法将全文分为上、中、下三截，把两节经文的句子融合在自己的见解中加以阐述。

文章以上节经文的首句至“益烈山泽而焚之”为上截，总提“人”字贯串首尾，以经文的末句翻首句而趁势带出尧、舜。看其伏

下之绝陡处，手法老到。文章又以阐述从“禽兽逃匿”到“民人育”的内容为中截。文中以“苟禽兽不匿，禹安所施疏浚决排之力”为中间眼目，点出经文以贯首尾，并带出禹及稷。文章以经文中之末四句为下截，紧扣题尾，步步绾带前文，笔法奇矫。最后一笔双绾，使全文气脉贯通。

全文奇思警句，横笔陡势，手法高超，令人百想不到，非深于古文者不能为。故徐九一评述此文说：

“笔笔苍，笔笔隽，入韩柳集中亦复何辨。”（见《项太史全稿》该文评语）

吴兰陔评述此文说：

“篇法则山断云连，笔势如兔起鹘落。隆、万人有此灵巧，无此奇横。我思古人，其在孙樵、刘蛻之间乎？”（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

这些评述虽说得有些玄乎，但的确反映出这篇八股文写作技巧之高。

项煜的八股文写作水平能达此高度，与他曾倾全部心力于制义时文的写作不无关系。他在应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科乡试时，精神本已十分困顿，但一接到《尧独忧之》的题纸，立即精神大振，苦心构撰，写至“尧之视廷臣无一不可洪水”句时，忽呕血昏倒。第二天又挣扎着将文章续写完。凭着这种将八股文视为身心性命之学的精神，他才写出了令人称叹的好文章，也才在这次乡试中中魁。所以吴兰陔说读了该文，“犹觉纸上岌岌震动。此等鸿文，实与金（声）、陈（际泰）同一精彩”。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

◎叶绍袁

论古之贤人，似无足为身重者焉。

夫贫贱，人所轻也，乃首阳之下，有饿死之夷齐哉！且富贵贫贱之故，可胜感哉！生前赫赫，身后泯泯，不如无赫赫已。

景公之无称，以千驷乎？不以千驷乎？吾凭吊古今，又得至贫贱者，可与相较焉。

古之人有伯夷、叔齐者，非有诸侯之藉，南面之荣也；非有家食之安，尺土之积也。

萧然其境也，国无以为国，而家无以为家。望故乡而延佇，徒皇皇以奚之。四海虽大，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当时所以寄迹者，首阳之下焉耳。

亦萧然其身也，生无以为生，而死无以为死。登西山而采薇，徒噉噉以无食。善人虽富，不得饕餮而自给焉。当日所云命衰者，饿于首阳之下焉耳。

夫首阳之下，而岂人之所哉！三千八百，未尝过而问也；玄黄士女，未尝指而识也。夷之外惟齐，齐之外惟夷，二子者，低徊忸怩于其间，倘亦寂寞之甚也已。

饿于首阳之下，而岂人之常哉！商容之闾式，式不及此也；剖心之墓封，封不及此也。夷死而齐后，齐死而夷先，二子者，蓬颗蔽冢于其下，倘亦凄其之至也已。

故欲凭其墟而吊之，则首阳在望而已矣。彼景公之千驷，且不能彰故主之名也，而首阳宁足多哉！

欲指其迹而艳之，则穷饿自甘而已矣。彼千驷之景公，且不能

博一时之誉也，而夷齐又安望哉！

然而民至于今称之，何也？则夷齐不以贫贱轻，亦不以贫贱重也。世之为景公者可慨也！

【评析】名士风流的叶绍袁及其 万变不离本源的八股文

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道人、粟庵，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今江苏吴江）人。

叶绍袁自小攻读经史，学习八股时文，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科中了进士，官工部主事。他是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不耐烦剧，又反魏忠贤，便乞归养，从此乡居不出。

其妻沈婉君及三个女儿并有文才，诗名远驰。小女叶小鸾才情更是出众，声名尤著。他便一门之中，更相唱和，悠然自乐。妻、女卒后，他将全家诗文编辑成《午梦堂集》，以资纪念。

明朝灭亡后，他悲愤莫名。清兵南下，他弃家为僧（以上经历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誓不与之合作，还暗联义师，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也证明自小开始的八股文写作的确在他的头脑中培育起了牢固的儒家思想。最后颠沛流离，穷困而卒。其著述有《启祯纪闻录》等。

叶绍袁是天启年间的八股文高手。他的八股文有如他的品德一样，谨守儒家正统思想，但他学识广博，认题又细，在不偏离程朱传注的基础上，往往能独出己见。天启乙丑（1625年）科会试出了《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文题。这道题前人所作的文章堆积如山，都是以存商立论，虽系自出胸臆自作评论，却未把握题中真义。叶绍袁参加了这次考试，在作这道题时，通篇文章都讲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东山以疗饥，只还他一个“饿”字，并不说是饿死，用谭元春的话就是“高其饿而讳其死，若曰此何尝死也，即饿夫何伤焉”（见《制义丛话》卷之六），行文极有分寸，故金圣叹称赞此文“廓清从来恶习，真乃比于武事也”（见《明文小标题传薪》该文评语）。此文写夷、齐首阳一段之事，凄凉黯淡，笔端句句皆带感

情,避免了作此题时率意行文,有文无题之通病。

这篇八股名作的题目摘自《论语·季氏》。这句所在那节之经文为: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叶绍袁的这篇八股文曾受到当时及明末清初许多名士的称赞,例如金圣叹就十分欣赏它,其因盖出于它的确有其新颖独到之处。这首先表现在此文在相题方法上有新拓展。它冲破了八股功令,能联系题目的上下文来开掘题旨,但又做到了不脱离经文本。

在明万历以前,八股文是不能侵上犯下的,即作本题时不能牵入该题所在处的上下文。若文中涉及了上下文,则被视为不合格。这种既束缚士人思想,又割裂了经文意义的做法,在万历以后的八股文变革和古文与时文相融合的过程中被改变了。叶绍袁的这篇八股文即是一例。

以“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作文题的八股文在叶绍袁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写过,但无不是着眼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周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之事,以存商来立论,所说的话无非是求仁得仁之类的套话、老话。这种相题方法使该文无不千篇一律,陈陈相因,故万历以后之八股文坛把这些文章称为有文无题。但若敢于冲破不准侵上犯下的功令,将这个文题与其上下文相勾联,就可独辟蹊径,也才能真正把握住孔子说这句话的原生意。

叶绍袁身处八股文变革之时代,敢于改变旧有的相题方法,懂得有的题眼应觑前,有的题眼应觑后,而使题目与其上下文的要义即齐景公死的时候有马千驷,百姓无人称道,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下,老百姓千年之后还交口称颂之事相融合,扬弃了以存商立论的陈词滥调,写出了别开生面的好文章。

在这篇八股文中,叶绍袁既将题眼觑前,则对照景公,又觑后,则反激“民到于今称之”,从而得出“生前赫赫,身后泯泯,不如无赫赫已”的结论,从而使这篇八股有文有题,成为传世名作。但

作者又没有脱离经文，率胸臆自作评论，若像当时许多人那样，脱离经书去自抒己意，所作的就不是八股文，也难怪这些文章会被人斥为“芜靡已极”。叶绍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敢突破陈规，又能准确把握经书的精言妙义。所以金圣叹称赞此文“允可为相题法。若率胸自作评论，不顾题眼，但知题面，亦与有文无题等，此书理所须从上下文理会也。此文廓清从来恶习”。

该文在写法上也别具一格，颇有新意。开头两句用破题意的方法反吸下文。起讲即将论点点明，为全篇立论。起比将题目分成两层摹写，出股写首阳之下，对股写饿于首阳。中比和后比一路分承，对前激后，着色渲染，情景凄其，却无一字旁杂，让人自然明白齐景公死时百姓认为他无德可称颂，而伯夷、叔齐隐匿居首阳山下，生活贫寒，终至饿死却受到天下百姓千百年的称颂的原因，实在不是因为财富的多寡，而只是品德行为的不同所至。

全文语言清丽简洁，叙事议论结合紧密，很能打动人心，这也是该文能传之久远的原因。



涕出而女于吴

◎叶绍袁

齐君之女吴，知天者也。

夫女吴而涕，涕而不能不女也，景公其犹有齐也夫？

且弱小之役于人久矣，而不谓婚姻也。婚姻，天也。故逆天者战争之苦，必涂炭其生灵。而顺天者儿女之情，可保安其宗社。

吾观齐之景公而衰可知也。其涕出而女于吴，何也。

夫婚姻，嘉礼也。吴虽荆蛮，亦犹古公之孙子也。周末改物，亦犹王室之伯叔也。其来也固载色载笑而迤邐乎齐之境，其送也宜亦载笑载言而至止乎吴之都，何为睹于归之子而凄然绝耶？夫且听班马之鸣而黯然伤耶？

夫亦此一日也，非绶绥之日，而数百年社稷，邀灵婉变之日也。则今日送之境上者，犹是临淄之介女，而安保后日无黍离之感，使女之北望无家也。天而厌齐，将覆亡之不暇而能不悲焉？

此一日也，非结褵之日，而数千里河山，天涯绵邈之日也。则今日御之吴宫者，既以师昏之非礼，而安保后日无弃捐之怨，必女之南归得所也。天方授吴，其俘诸江南惟命而能不悲焉？

泣数行而何已。绸缪之好，伉俪之欢，景公不知也。迎止盈门之日，独抚膺而对无道之天。

涕沾臆以何极。望齐之思，虞山之痛，景公亦未知也。霸国最胜之遗，宁伤心而断膝前之爱。

在女也生离而死别，在景也国蹙而情哀矣。然而不可谓非知天者也。

【评析】文采风流的晚明小题文

叶绍袁诗文皆自成一家，其八股文也讲究文采，为文无不工丽，这从其名作《涕出而女于吴》题文即可看出。

这篇时文的题目出自《孟子》，这一句话所在之一节及其上一节之文为：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

《四书集注》中对这两节经文的注释为：“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称其德之大小。天下无道，人不修德，则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势之当然也。”“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吴，蛮夷之国也。景公羞与为婚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与之。”

这篇八股文融合了题目上下文的精义，并依据传注对齐景公因国势弱，为保国而顺吴，将女嫁给夷蛮之国的痛苦举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破题、承题和起讲部分，作者便立定了顺天者存的主旨，前段轻翻，后二比细贴，中二比一从齐国着笔，一就吴国着笔，揭示弱小必须顺天而行的道理。题面题意，如形影之不相离，都向题之所以然处落想，手法极为高明，题意阐释得深入全面。

文中对景公将女嫁吴时的矛盾痛苦心情作了深入描述，写得哀艳动人，充分显示出作者文学家的本色。吴蔚若把作者比为汤显祖，说：“百年社稷，千里河山，北望南归，厌齐授吴。工妙乃尔，真不减玉茗风流。”（见《明文钞》五编该文评语）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

◎文震孟

与勇者论政，直振之而已。

夫先劳非勇者所难也，而得此则已振所谓全挈政枢者也。

盖天下所以靡靡而无成绩者，持之以观望之心，而养之以丛脞之习。

问曰：明作有锐于督责而已矣，人情不远，我欲后而谓人往乎？

或曰：仔肩仅貌为担荷而已矣，世变綦殷，希乃绩而图乃便乎？

藉口于老成之持重，则谓无为事先；得意于时变之善观，则谓无为几先。我贻之后人，后人复贻之后人，而必创必革之业，坐视其颓腐矣。

肘掣于独运之难成，则能劳而不任；心惴于畏途之难愜，则欲劳而自阻。我委之他人，他人更委之他人，而克艰克勤之猷，俱付之废坠矣。

故政必在于先之也，一切迟回审顾之态勿参也。

政必在于劳之也，一切因循懒惰之念勿萌也。

天生豪杰之精神，原使建无前之伟烈。退焉承人之馀勋，悠焉享世之馀福，无论非委畀之初意，反于中怀，亦自惭恧而不可居。

天留宇宙之缺陷，时以俟补缀之能人。居高而逊震之动，在险而忘坎之艰，无论非经纶之素心，揆之政体，亦必溃坏而不可救。

故躬膺倡率之责，本无退托之地也。才觉优游之可图，便思避事为长策。何以不先则自憚其劳耳，劳则未有不先者也。

身际屯蛊之交，尤非暇豫之区也。每感处钝之多福，辄嗟竭蹶为颡愚。何以不劳则自怯其先耳，先则未有不劳者也。

此真勇者事也，则真子路事也。

【评析】方正峻洁的文震孟及其激昂悲愤之作

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

文震孟是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其祖父文彭也是著名画家，其篆刻更是开一代之风气。然而文震孟未承祖业，从小即在为科举辛劳以求。

他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科乡试即以《春秋》考中了举人，时年仅二十岁。其后却十赴会试不售，直至天启二年壬戌（1622年）科才荣登进士榜，殿试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成为轰动天下的八股文名家。时已年过五十。

为写好八股文，文震孟曾精研儒家经典，对《春秋》尤有心得，又笃于践行，故立身处事，都以儒家道德价值观来规范自己，为人十分正直。明朝自嘉靖、隆庆之后，状元很少有出众之人。熹宗改元，朝廷思获国士，大家都推举文震孟。殿试榜发，文震孟为状元，中外都庆幸此科得人。他身为诸生而名震朝野，便是为人方正峻洁所致。

他入仕时魏忠贤已揽朝政，禁讲学，兴党议，朝政日非。文震孟愤而上《勤政讲学疏》，中有“陛下味爽临朝，寒暑靡辍，政非不勤。然鸿胪引奏，跪立起拜，如傀儡登场已耳”（《明史·文震孟传》）的句子。魏忠贤为人十分阴险，且工于心计，先将疏文压住不上奏，等到熹宗皇帝看戏时才将疏文呈上，并摘“傀儡登场”语，说文震孟将皇帝比为木偶，不杀无以示天下。熹宗点头同意。一日，讲筵毕，魏忠贤就传旨，将文震孟廷杖八十。诸臣力争，魏忠贤不理。文震孟便弃官归里。

天启六年丙寅（1626年）冬，太仓进士顾同寅等以诗悼念熊廷弼，被揭发后波及文震孟，与编修陈仁锡等一并斥为民。

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召置讲筵，因连劾魏忠贤遗党王永光，得罪了朝中权臣，乃乘出封益府之机，归家不出。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复出，累迁为少詹事，又擢升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

学士。因不肯循例投刺司礼太监,又忤首辅温体仁,被奸相温体仁在皇帝面前屡进谗言而被落职闲住。归乡半年,因外甥姚希孟病卒,他悲伤过度,也去世了。有《姑苏名贤小记》、《定蜀记》、《约园全集》等著作传世。

文震孟不仅为人方正,且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极强。《明史》中赞他“以风节显”。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他到无锡去拜会东林党人,从此,与之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天启年间他被黜还乡,见地方官吏以官刑逼虎丘僧献佳茗,极为气愤,便作《薤茶说》予以揭露抨击。对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年)苏州民众因反对魏忠贤逮捕周顺昌而爆发的民变,他也持赞扬的态度。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他虽被削职为民,仍心忧天下,在苏州与武进吴钟峦、张溥等共论朝局,抨击首辅周延儒。这些行为,都是由八股文写作中所培训出的儒家正统思想而产生的效应。

文震孟是个八股文名家,他结交的朋友中,也有许多八股文高手,如冯梦龙、钱谦益等。与他感情最深的亲外甥姚希孟更是明末一位八股文名家。他们经常在一起谈文吟诗,交流八股文写作心得,对促进他们八股文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作用。

文震孟的八股制义与他的思想感情高度一致,激昂感愤,有澄清天下之志,正合了鲁迅的那句话:从血管里喷出来的都是血。

他的制义时文,思想纯正,一本经文与传注而又有所发明。如其《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题文中云:“以邦君之敬信而卒不能用圣人,夫非限圣人,限衰周也;邦君不能用圣人犹知敬信圣人,夫非露人情,露人性也。”这些话不仅将题之精义说得透彻之至,还透出一股感时伤世的忧愤之气,有很深的寄托。

文震孟八股文水平之高,从一个事例中足以体现。

熊廷弼是明末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万历年间曾授提督南直隶学道。他性格刚直严厉,极爱才,对那些无德无才的诸生极为苛严。若他们的八股制义写不好、品行不端,便要严刑拷打,《明史》称其“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明史·熊廷弼传》),结果熊廷弼被免职回了家。

对于这样一位对诸生要求十分苛严的提学使,各地秀才都畏

之如虎，惟有文震孟却以自己的文章将他折服，获得了他的器重。

熊廷弼在对苏州府的诸生进行岁试和科试时，要求非常严格，稍有差错，即受呵责甚至鞭打，引起众多秀才的不满。熊廷弼却不屑一顾，说：“本院千军万马且不惧，何畏尔等诸生乎！”

文震孟也是这次参试的生员，他不慌不忙，从容写作，挨到最后一个才交卷。熊廷弼一直坐在堂中等候。文震孟写完最后一句，便将自己的文章高声朗读了一遍，拍案大叫：“这等妙文，当吓煞老熊！”熊廷弼闻言大怒，要惩处他。文震孟说：“大宗师且慢，如宗师能在通场寻出一本胜过学生的卷子再责不迟。”熊廷弼见他如此自信，也便答应了。他把卷子带回仔细一读，不禁拍案叫绝，把他列为案首。从此与冯梦龙一道，视为其得意门生。

文震孟身处一个政治极为腐败的时代，忧国忧民之心充溢其胸，故其八股文均为感时伤世之作，苍劲悲凉之气，贯串其文，这一特征从其名作《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题文即可见一斑。

《四书集注》对这个题目的注释为：

“苏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

文震孟写作八股文既恪遵传统的做法又与时俱变，这在万历末年与天启之时，简直可称为凤毛麟角。这充分表现出文震孟方正高洁，思想言行皆遵奉儒家正统理念又不墨守成规之品格。

该文严格遵照正德、嘉靖后变化了的八股格式，文分八股，其内容则恪遵传注。不过，作者是从反面作文章，批判为政中的种种恶习，从而树立起了正面精神。文中所揭示的政坛弊端，皆为万历末年及天启年间所习见的。文震孟以代圣贤立言之口气，对这些腐败、丑恶的官场现象予以了抨击，一股激昂悲愤之情感，力透纸背。这就是文震孟八股时文的最大特点，也使他在天启八股文坛成为传统大旗的护旗手。俞宁世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他说文震孟的时文“老成忧国，豪杰悲时，非经生家言可及”（见《天崇合钞》该文评语），这确是知人知文之言。



道并行而不相悖

◎谭元春

观于并行者，而知有主乎行者也。

夫并行者相悖之端也，而道之在天地者不然，岂无所以主之乎？

且夫仲尼以语默进退为道，而天地以四时日月为道，使节序不足凭，而晦明不可知。彼苍苍者，其谁得而问之，而道则错行代明如斯矣。

错者杂出，并者同至；代者互更，并者齐曜。错则不并，代则不并矣。而何以谓之并行，且见者不悖哉！

并者以其一往而一来，非若往而不来者也。而久则易至于相忘，忘则悖。

不悖者即以其一往而一来，无碍于往而又来者也。而其妙正在于能并，并则行。

我见夫春夏秋冬者，亦世人定之以为春夏，定之以为秋冬，而天地则实有所为四序者，以就夫世之所谓春夏秋冬而毫不见爽也。彼其冥幻甚矣，而令人得以履端于始，归馀于终，此非蹉寒不夺酷暑之职，成功不侵将来之权，而何以若是之不爽矣。

我见夫昼夜者，亦世人以其明为昼，以其晦为夜，而天地则又有所谓两曜者，以界夫世之所谓昼夜而毫不见欺也。彼其高远甚矣，而令人得以土圭测之，玉衡窥之，此非晦者不入朔者之限，过者不争不及者之度，而何以若是之无欺矣。

故冬不如春生之美，月常减日照之半，而犹以为并者，不得移之于彼，亦不得赢之于此也。

有时暑未去而寒即交,有时日未入而月已生,而不以为悖者,各有未竟之事,各有将宣之令也。

若是者,吾以归之大德小德焉,而可以拟仲尼之大矣。

【评析】谭元春及其古文化了的时文

谭元春是天启年间以古文为时文的高手,他的八股时文别具一格,在天启八股文全面衰颓中独树一帜。

谭元春,字友夏,湖广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人。

《明史》中说他“名辈后于惺,以《诗归》故,与齐名”(《明史·谭元春传》)。

他二十岁时与同邑之钟惺结交,这时钟惺年已三十二岁。两人志同道合,共同编选了《唐诗归》、《古诗归》,使“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明史·钟惺传》),以致“钟、谭之说大炽”(《明史·袁宏道传》)。

谭元春从小即潜心于古文及八股文写作,然至天启七年丁卯(1627年)科乡试才考中举人,并夺得第一,称为解元,时年已四十二岁,而钟惺已于此前病逝于乡。此后参加过几科会试均不中。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他又进京参加会试,病死于旅次。

谭元春与钟惺同为竟陵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重要的古文家。他与钟惺一样,标举“性灵”和“幽深孤峭”,反对复古摹拟之风和公安派的“俚俗”。主张对古文进行革新,倡导为文要“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为伍”(谭元春:《诗归序》),要“孤怀”、“孤行”。他还主张不拘守古法,要对旧格套有所突破,曾说:“尝恨世人闻见汨没,守文难破。”(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他的古文追求奇特的文风,章、句、字均呈现出艰涩险僻的特点。

谭元夏也与钟惺一样,是一个八股文名家。他自小即浸淫于八股文的写作之中,与当时的士人一样,醉心功名,五十二岁仍不畏旅途劳顿,千里迢迢赴京赶考。在利禄的驱动下,他将全部心智都倾注在八股时文上,故对八股文有很精深的研究。在以古文为时文的大潮中,他是一个弄潮健儿,在时文的写作中运用古文写

作的理念与方法是必然之举,也使他在天启年间成为一个敢于领异标新,独具特色的八股文名家。

谭元春的八股文与其古文十分接近,在风格上追求奇特,构思、立意必求与众不同;在句式上追求骈、散相间,故文章凝炼、简整而别致;遣词造句必求生冷怪僻,标新立异,决无万历末年及天启时专以摹拟古人及剽窃《史记》、《汉书》词句的毛病。他虽然与公安派关系很好,特别尊重袁宏道,但也反对摹仿他们,文中没有公安派的“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的毛病,追求的是“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谭元春:《诗归序》),以致其时文经常不按固有格式写作,其名作《道并行而不相悖》便体现了这一点。

这篇时文的题目取自《中庸》,这一章之全文为: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根据朱熹的传注,这一章经文,是讲述圣人之德,并说:“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此言天地之道。”

文题“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这章经文中之一句,如只就题旨来阐释,题境实难绘画。即使按惯例,将章旨融会于题中也难以着笔。谭元春与竟陵派的其他人一样,是个文体的革新派,他有敢于冲破八股文立意及必须肖题之规定,其提比一股说并行,一股说不悖;其中比则将题目上文之“四时之错行”和“日月之代明”分述一番,根本不管语侵上文之禁,只就眼前情景,点缀数笔,唱叹一番。其观物察事都源自己见,皆从自己心灵流出,而不是乞灵于故纸,故显得见识迥异于常人,这种完全古文化的做法也被当时及后来的许多人视为妙法而奉行。王步青在评点此文时便称赞说:

“无限神奇,都在里间。后生妙解此诀,安得不心花瓣瓣开。”



曾皙嗜羊枣 一章

◎谭元春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以所独言不忍，而其意可想已。

盖曾子有不忍其亲之心，而嗜特独焉。

然则所同所独之论，所以晓丑而非以尽曾子也。且孝子之心，有非后世之所能知者，即以当时孝子之心，有非外人之所能知者，其原皆本于不忍。而要其不忍之事，所不忍之时，与所以不忍之故，其莫有知之者也。

即一羊枣耳，曾皙偶然而嗜之。曾皙死，曾子见羊枣而悲焉。人见其不食也，以为不忍而已矣。至孟子之时，犹传其不忍也，以为不食而已矣。

由是而想之，可以知其凄然、恹然之状也。必欲得而明之，无以定其如何凄然，如何恹然之因也，而乃求之于美不美，食不食耶？脍炙之言甚矣。

公孙丑之为浅人也，孟子亦仅与之浅言曰：夫羊枣自不如脍炙也。然而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独之所在，而曾子悲焉。

子知夫讳乎名之较姓有何差别，而讳惟其名者，非以独之故

耶？讳名者，天下人子之情也；不食羊枣者，曾子一人之情也。天下人子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独，所以一本也。曾子一人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独，所以养志也。曾子真孝子也。

嗟乎！孟子之言，其于食脍炙而不食羊枣之故朗如矣。而未尝言其所以不忍，则不忍之在当日者，有不可得而言者焉。夫不忍岂有声色、臭味哉，有所触而动，或无所触而亦动。见所独而触，或见所同而亦触。哀至则哭，何常之有。即曾子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况他人乎？此不可与饮食之人言也。

【评析】善作翻案文章的晚明八股

谭元春为文追求新奇，故喜于八股文中作翻案文章，其《曾皙嗜羊枣》一章题文便是这样。

这个文题，出自《孟子》。朱熹对用作题目的这段文章注释说：

“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曾子以父嗜之，父歿之后，食必思亲，故不忍食也。”

谭元春为文力求奇特，无论立意、写法及语句都力求不蹈别人旧辙。为达到其“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的主张，他打破八股文之禁忌，在该文中大做翻案文章。他扼住“不忍”二字，托言公孙丑为“浅人”，故孟子只“与之浅言”而推翻“孟子之时，犹传其不忍”的说法。

在八股文中翻孔孟言论之案，这在八股文史中是极为罕见的。但由于谭元春能“潜思遐览，深入超出，缀古今之命脉，开人我之眼界”（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将“不忍”二字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进行审视，故看得深透，能“立身于题外而于题中眼目仍自不失”，在议论中发前人所未发，所以虽为翻案文章，仍被视为正宗八股佳作。方苞说此文“果有一段议论发前人所未发，足使观者感动奋兴，亦不可以常说相拘执”，把它选入了《钦定四书文》之中，作为样文供清代士子们揣摩。

本文奇特之处还在于它并未严格按照代古人语气为之的规定，文中几处直称“孟子”，这亦是不同寻常的。其文采用了散体结构，语言晓畅，层层递进，完全是古文之写作方法。如此等等，都表现出谭元春为文不拘常格，力求奇特的风格。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艾南英

揭心之所以统众体者，而即思以惕之焉。

夫心官在思，故与众体异也。然必思而后得，则思要矣。

且人知物交之害，缘耳目以累心，而不知不善事心者，必使心等于耳目。盖心之职虽异于耳目，而吾必使心践是职，而后可以为耳目之主。

是故耳之官在听，而思其当听与不当听者，则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当听与不当听之理，遂了然吾前也。

目之官在视，而思其当视与不当视者，则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当视与不当视之理，遂了然吾前也。

当万感纷纭，而天君内应，此时谓之心仍其官则可，谓之得思则不可，何也？百虑憧扰，未始不与众交驰也。夫惟惺然者不昧，而后吾始能有思。而是思也，乃足以宰众感矣。

当一事未形，而内自撻攘，此时谓之心仍其思则可，谓之非物交物感则不可，何也？独睹中涵，未始不与众俱疚也，夫惟洞然者无累，而吾始谓能思。而是思也，果足以杜众诱矣。

盖耳目之役，以气动也，心之思亦以气应也，均是气耳。惟官在思而惕之以思，则以理驭气，而行乎感应之途而无差。

耳目之官，于吾身为视听之职也，心之官于吾身亦腑窍之列也，均是形耳。惟官在思而宰之以思，则以性治形，而握乎明聪之主而不乱。

然则，心以能思为职，是思之所以异众体也。而以思践吾心之职，则吾之所以善治心也。此之谓大体也已矣。

【评析】崇祯八股文振兴运动的主将艾南英 及其有感而发、朴质坚辣的八股文

崇祯八股文坛振兴运动的灵魂是艾南英。他不仅“以兴起斯文为任”(《明史·艾南英传》),还是八股文振兴运动的理论家和八股文写作高手,为明末八股文的振兴做出了很大贡献。

艾南英,字千子,号天佣子。东乡(今属江西)人。

幼极聪颖,七岁即作《竹林七贤论》,表现出很高的论辩天赋。好学,无所不窥。万历庚子(1600年)中秀才,年方十八岁,此后七应乡试均不中,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科乡试,始中举人,时年已四十二岁。这时因其座师“发策诋魏忠贤,南英对策亦有讥刺语。忠贤怒,削考官籍,南英亦停三科。庄烈帝即位,诏许会试。久之,卒不第”(《明史·艾南英传》)。

艾南英对自己科举考试中的辛酸苦辣,在其《前历试卷自序》中有着详尽的记叙。因为这是至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惟一一篇详细记叙了明代科举考试种种情况的文献,有很重要的资料和研究价值,特选录与其八股文有关的部分于下:

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闾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毘陵成弘正大之体,而闾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穀》、《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义自鹤滩、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与诸生等。每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艾南英虽终生未成进士,却“文日有名”。这个使他名驰天下

之“文”，既包括八股文，又包括古文。

艾南英是明末著名的古文家。他既有古文著作，也有古文理论。

他论文，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反对剿袭，主张师近人，学习唐宋古文。在唐宋文中又推崇八大家，于本朝则尊奉唐宋派的唐顺之、归有光等人。所以《明史》中说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序》）。

艾南英之所以能享誉文坛，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明末发动并组织了八股文坛的振兴运动。

“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英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明史·艾南英传》）实际上，艾南英是这四人中的核心。为振兴八股文，他呕心沥血，建树良多。

他出于正人心、纠士风以挽救衰微之国运的目的，对八股文的写作理念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八股文应“尊《学》、《庸》、《语》、《孟》之书，断以考亭之章句，因裁以为题，敷陈词义，如一出于圣人之言”（艾南英：《明文定序上》）。为了推行这个理念，他为别人及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写作了大量的序言来加以阐释、宣传。对不符合这个理念的文章进行了批判。他锋芒毕露，“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明史·艾南英传》）。为推行自己的主张，甚至与陈子龙发生了激烈论争。因为陈子龙等幾社的人为文理念与他的不同，他专程“至云间，抗颜南面。大樽以少年与之争。艾主理学，陈主议论。艾主秦汉，陈主魏晋”（见《天崇合钞》俞宁世评语），艾南英“酒酣论文，仗气骂坐”（《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四《复社纪事》），“互持不下，至于攘臂”。“虽论者轩艾轻陈，要其独主所见，不肯雷同，诚艺林盛事也”（见《天崇合钞》俞宁世评语）。

他与复社也有过节。复社由张溥、杨廷枢等人发起，而以周钟为之长，曾自刻《经翼》诸选，比之为咸阳国门之书。艾南英极力贬斥其见，又引发一场大辩论。

为了让士人们摆脱靡丽空疏文风的影响，让他们学有范文，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对历代名文和当代符合其写作理念的佳作进行选编，细加评点，刊行于世。他曾泛舟吴越间，以文来求教者如云。他将其堆积于几案之上，每当风日清美，泛舟于明湖之上，酒

酣兴至,开始评文,将其佳者置于船尾,探信者得知,马上走报各家说:“某某文中选了!”闻讯来其家中恭贺者盈门,喜宴连日。当时制义被艾南英选中者,有如登第之荣。如风行天下的《明文定》、《明文待》即是他花了多年的时间选编、评点,刊刻行世的。七年后,他总结了这两种书的得失,又选刊了《增补〈明文定〉、〈明文待〉》,收效更好。

因为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所作八股时文最合于他的为文理念,“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艾南英《序王子巩观生草》,载《明文海》)。为让世人认识他们四人也受时风影响,文中所出现了不合于其为文理念的谬误,从而明辨是非得失,他又别出心裁,刊刻了《四家合作摘谬》一书,将他们四人文中的谬误之处一一加以点评,在八股文坛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经过艾南英及其战友们的这番苦心孤诣的工作,终于收到了成效,据艾南英自己说,“圣贤之道,非果难明也,患无以倡之也”,经过“予与陈大士、罗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以《易》、《诗》、《书》、《春秋》、《礼》、《乐》之言代《语》、《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词洗里巷之习,一时后辈,从风丕变”。他在《增补〈明文定〉、〈明文待〉序》中详细叙述了这种变化后说,这种变化“是谁之力欤?海内有良心者,固当知其所自矣”,俨然以“转移风气”的功臣自居。

在晚明八股文坛上,艾南英的八股文虽不如金声、陈际泰、黄淳耀等人那么有名,但“朴质坚辣,三家皆莫及之”(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仍是时文高手,俞长城对他评价很高,说“精严如钱吉士,犹逊一筹”。

作为八股文振兴运动的发起者,为恢复八股文以程朱理学统一士人思想的功能,艾南英在进行写作时基本遵从程朱理学。

艾南英论文主理学,注重于朱熹集注中寻理,但他更强调以理论世,行文时往往有感而发,因题生义,故艾南英的时文原本经传,却不用一句经语,补题之妙,都为王鏊、钱福旧法,

而出以朴实坚辣，非王、钱二人所能及。然而，这种做法又使他的一些八股文产生于题旨发挥尚欠切实研寻的毛病。如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科乡试，他中举人时在场屋中写的八股文，就因此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刚健之概仍充盈其中，故王巳山称赞说：

“天启甲子科，艾东乡先生诚中流一砥柱也，而乡墨多不满人意。其首艺《君子坦荡荡》一句题文，于注中循理，故常舒泰之旨尚欠切实研寻，而清刚之气游行自在。在万历末造，实有救纤医俗之功，不可没也。”(见《制义丛话》卷之六)

然而，既要“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就不能拘泥于传注，陈陈相因。艾南英又是一个古文家，他的八股文与古文写法是融为一体的，能于正经正史之外，推及逸书、诸子，以史事为骨干，包罗万象，涵盖古今。故其文常有独到之见。这个特点在其《〈关雎〉乐而不淫》题文中即可看出。他对此作是比较满意的，自称近日作文，以此篇为第一。他在该文之后自跋云：

“此依毛传作也。所谓淑女，指三夫人、九嫔以下。后妃思贤求佐，而发为词气又如此和平，可谓得性情之正，当时文王刑于之化可知。时文牵来扯去，只是后妃得则许多宗庙、社稷、治平等语，以为如此方是乐而不淫，不知文王何故专靠后妃做圣贤也。”

该文依《毛诗》作题文经解，见识超群且又合乎孔子本意，“文则简老端凝”(林畅园语，见《制义丛话》卷之六)，确是以此为题的所有制义中之上乘之作。

世人均认为艾南英的天分在江西八股文派中，不如金声、黄淳耀、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五人，但他读书多，用功深，故其思想深刻，实能究察事物之理，作文时认题真切，并能联系现实，每有创见，出于五人之上。这个特点从其《心之官则思》二句题文可得到印证。

该文题目出自《孟子》，其经文为：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

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其注释云：

“官之为言司也。耳司听，目司视，各有所职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既不能思而蔽于外物，则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于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难矣。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职，则不得其理，而物来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而心为大。若能以立之，则事无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夺之矣。此所以为大人也。”

细察此作可以看出，艾南英为文在基本遵循朱熹传注的基础上，总是针对现实，细察题意，提出己见。此作既根据朱熹传注之意，指出“物交之害，缘耳目以累心”，又提出“不善事心者，必使心等于耳目”的见解，并针对现实，以“慎思”与“善思”作为全文的主旨。

崇祯之世，前后七子阴魂不散，在文坛上仍有较大影响力。而盲目崇信主司的庸腐程文，更是振兴崇祯八股文之大害，艾南英借题以道世事，提出“不善事心者，必使心等于耳目”的尖锐见解，主张慎思与善思，其讽世用意跃然纸上。文中阐释“心之官则思”，把思考与人的一般感知加以区别，接触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问题，见解新颖独到，超出当时人的认识水准多多。方苞称赞此文“清思锐入，题障尽开”（见《钦定启祯四书文》卷九该文评语），确是中肯之言。

艾南英是晚明著名的古文家，其时文与古文写作理念是一致的，特别是他要以时文作为论世的武器，更要借助古文的形式作自由发挥，故艾南英的时文在格式与写法上，往往与古文相一致。他的八股文，极少用太过拘牵的八股格式，常以散体或两截篇法来结构作品，顶多使用二股、四股、六股格式。其《民为贵》一章题文，针对的是崇祯时官贪吏酷，残害百姓，弄得民困国危的现实，文章上下古今，一层层深入阐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其中宾主、轻重次第曲折，起伏回旋，古文义法，无一不备”，“清古之文风味犹胜于黄（淳耀）、陈（际泰）”（见《钦定启祯四书文》卷九该文评语）。

艾南英性格刚正率直不能容物，持论刻核，树敌太多，既为时俗所忌，也使其八股文带有其性格影响所造成的不足，清代文炳在一种时文选的序言中对其文之得失作过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他说：

“千子先生留心古文，所选时义，书理或疏，体裁皆不俗。其稿始犯驳杂，继犯枯燥，极老极坚者，远过章（世纯）、陈（际泰）两大，特难遽投时好耳。”（见《天崇合钞》评语）



无 伤 也

◎艾南英

知人言之不足恤，而人当自信矣！

夫礼义之或愆，则所患也；彼不理于口，是何伤哉！

闻之曰：伤人以言，甚于戈矛。此特世俗之常情，而非所论于君子也！子告我曰：大不理于口，忧谗畏讥之心，何皇皇耶！

夫君子裋躬，何至以心为垢府；然有人于此，终其身无诳误可摘者，其中亦可疑也！

君子涉世，何至以身为诟端；然有人乎此，终其身无毁言能加者，其品亦可知也！

子之不理于口，吾直以为无伤耳！

闻世俗之繁言，而爽爽然惊，规规然自失，此怯胆也！大丈夫固当有相旷之怀，宁使有瑜有瑕，不甘无举无刺；谣诼之口，何足介其念也！

患物议之相侵，而平情以合污，辍行以弭怨，此俗肠也！大丈夫固当有超胜之韵，尊之圣贤不喜，呼之牛马不怒，诤张之舌，何足动其衷也！

嗟乎！何物庸众，而能誉豪杰也，谤固其所耳！一忌而欲杀，一恶而欲死，吾以闲心观焉，天下有可解颐如此者哉！

嗟乎！何物庸众，而敢誉豪杰也，毁固其分耳！造谗者手足俱乱，吠声者耳目若狂，吾以冷眼视焉，天下有可鼓掌如此者哉！

故褊衷者闻谤若刺于肌肤；而冥之以至理，则群声汹汹，犹婴儿之啼呼也，何相忤也！

盛气者闻毁不安于梦寐；而对之以达观，则群口嗷嗷，犹鸟兽

之鸣号也，何相怒也！

夫为士者，识欲其超，骨欲其劲；以天下誉之，夷然不屑；以天下非之，倘然不顾。若夫忧谗畏讥，则妾妇之事也！

【评析】借经义以道世事的崇禎八股文风

世人评论八股文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无异于戏台上演戏，优孟衣冠，啼笑皆非其真。然而艾南英却以古文为时文，其刚直尖刻，率性而为之个性常于文中透面而来，读其文如直面其人，其《无伤也》题文足以见此特点。

这篇文章，题目出自《孟子》，是艾南英与幾社陈子龙等人因文见不同闹出极大矛盾时，借题以抒发心中愤激之情而作。

陈子龙及其同伴为文好怪奇，务藻思。艾南英对此极力批驳，尤斥陈子龙，与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相砥砺，与之对抗。幾社之人十分忌恼，为驳四家文以解困，便故意扬艾，抑章、陈，弄得章世纯、陈际泰十分不悦，以至四位战友交谊不永，合而不终。章世纯还脱离了江西派参加了幾社。艾南英为此十分痛心，日有势孤力单之感，胸有忧郁需要发摅，便发愤以《无伤也》为题，作文以抒其意。文中有笑有骂，貌似旷达，实则愤极。感慨激愤，全出于其真性情。艾南英从不俯仰从俗，其清刚之气，也贯注于该文之中，让读者无不震撼。

艾南英不仅为文力主理学，要“因题生义”，切入现实，而且是个践行儒家伦理的节义之士。明朝灭亡，北京、南京相继失陷，江西郡县也尽沦亡。艾南英仅是一个老举人，并未得到过明王朝多少好处，却恪遵儒家伦理道德观，为抗清复明而舍命成仁。他东走入闽，“唐王召见，陈十可忧疏，授兵部主事，寻改御史”（《明史·艾南英传》）。第二年忧愤而卒。俞长城对他倍加推崇，称他“少负异才”、“名动海内”，夸奖他对推动崇禎八股文振兴运动所起的作用，说：“至于千子，则所谓公输运斤，指挥如意，师旷辨音，纤微必审者也。”并称赞其气节云：

“遭时丧乱，跋履间关，同时名士狼藉载路，而公独视死如归，

游说万端，终莫之屈，不愧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矣。”（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

艾南英发起八股文的救亡运动，又献身于抗清复国，其所作所为，是无愧于孔孟之义的。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陈际泰

家取则于身，故君子谋所以齐之者焉。

夫以不德之身，强行于物，即家且先格矣，岂能齐乎！

且夫家之难齐，甚于国之难治也！所谓甚于国者有二：国者，威权之所可馭也；用恩之地，而威权之分失矣！国者，耳目之所不接也；暱就之人，而耳目之际真矣！

威权不得而施，则反其道乃可以相易。

耳目不得而匿，则益其事乃足以相当。

其必先修身乎！一家之中，其为贤不肖者，不一而足。齐之者，将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狭邪淫比，禁之而不止者，无术以主之也！

吾修吾身，言必称先王，动必稽古昔；则作事可法，而无自恣其偷越之思；故其子弟之教，不肃而成！一家之中，其爱恶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齐之者，将使人人有秉礼度义之意。夫诟淬器陵，调之而愈莽者，无道以御之也！

吾修吾身，情欲之感，无介乎仪容；晏安之私，不形于动静；则用情正大，而无自开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齐而平！夫治家以和者，固不以乖戾致恩义之睽，而其弊或致于无节！治家以严者，固不以褻狎致妇子之嬉，而其弊或致于不乐！

故齐家莫修身若也！身修，固去其与与严之名，而兼乎和与严之利者乎！盖关雎麟趾之体，本于文德；而风火利贞之义，究归言行。然则欲齐其家者，其所先盖可知矣！

【评析】才气绝伦的陈际泰及其纵横开阖、 新意迭出的八股文

在崇祯八股文救亡振兴运动中，陈际泰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极富才情，又最用功，故其八股文在晚明文坛独树一帜，备受推崇。

陈际泰，字大士，临川（今属江西）人。

他为其父四十三岁时所生，自幼瘦弱，其父爱之特甚，怕其夭折，以“三婢”为其小名。旧时乡俗，以婢为贱，贱则命硬，可保长生，可见家人对他疼爱之深。

陈际泰自幼喜爱读书，家中却非常贫困，每天要上山拾柴、路上捡粪以贴补家用，但只要稍有闲暇，便取书诵读。他父亲怕他年小读书把身体弄坏，禁止他苦读，他却不管不顾，只苦于无钱购书，无书可读，便经常借邻居小儿之书“屏人窃诵”（《明史·陈际泰传》）。

陈际泰天分很高。八岁时从其姨兄处得到一本《书经》，四角都漫灭无棱，又无句读，“凡不可句者以意看注得之，凡字不可识者以意切声得之”（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竟然无师自通，并悟得终生受用的学习方法。

十岁时，从其叔父的药箱中偷甘草吃时意外地找到一本《毛诗》，有如获得一件稀世珍宝般惊喜万分。因怕被其堂兄弟知道抢去，连忙偷藏于衣袖之中。其婶喊“三婢吃早粥”，他宁可放弃这顿美餐，赶紧窃书归家，却被他父亲看破了，从他衣袖中将书抽出，极不高兴，说：“你这个崽又不听我的话，到田里看秧去！”

他便带着书到深山秧田边，既要驱赶吃谷种的鸟雀，又要提防山中偷袭的老虎，却将一本《诗经》从头至尾读了二十遍。他天天去看秧，天天诵读《诗经》。十天后秧出水，一本《诗经》竟已能背诵出来。

后来，他跑到其叔家，把书又放至药箱之底，其叔与堂兄弟都还蒙在鼓里。

陈际泰受时代喜好通俗文学的影响，对《三国演义》、《说唐传》等小说极感兴趣。就在他看秧田背《诗经》的这年冬天，从其族舅处借到一套《三国演义》，他便躲在墙角边晒太阳边看。他母亲喊他吃早粥不应，喊吃中饭也不应，直到感到饥饿时去找饭吃，粥和饭都已冰冷。母亲抓住他的衣襟要打他，又舍不得，只得由他去。

后来他母亲请其舅吃饭，责怪他说：

“你为何要借这样的书给你外甥看，书上尽是人马相杀之事，你外甥看得连吃饭睡觉都忘了。”

陈际泰连忙接腔说：

“娘，儿子不是看人物，是看人物下截的字啊，现在全都知道了。”

他舅父不信，“试挑之，如流水。十四岁则代父管蒙馆”（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因为他家住深山，朋友中没有习八股文的，他问舅父：

“舅，文章是什么？”

答曰：

“墨卷。”

回到家里，问他当蒙馆先生的父亲，“墨卷”是什么样的书。

其父也没写过八股文，不知墨卷是何物，便“为大言自靳曰：‘予无书不读，未识所谓墨卷者。’”（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后来才从钟美政处问到墨卷原来是选刻的乡、会试试卷。

钟美政“授之以郭青螺先生所选八十一篇，讽之如儿女说话。尔后凡写家信与寻常客子书皆用八股法。然泛观之，未尝知有所谓破承者。一日见郝鹿野《说书序》云：‘破承者，行文之冠弁。’因知文有破承，取八十一篇覆之，果然。自以其意为文，得二寸许，不自信又自喜也”（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二十岁之后，其文名开始闻于远近。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与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同时中秀才。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科中举人，四年后又中进士，时年已六十八岁。“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护故相蔡国用丧南行，卒于道。”（《明史·陈际泰传》）

在八股文起衰振兴运动的中坚、江西四子章、罗、陈、艾中，陈际泰这个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八股文高手是以出手快、作品多、质量高而著称于世的。

他为文才华横溢，聪敏已极，《明史》中说“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明史·陈际泰传》）。若有人向他请教，“辄口占以示，即未成章，或二股，或四股，每多精义。后集为《四书读》，稿中往往有前后足成之者”（《制义丛话》卷之七）。因其质量高，故留存于世者亦多。清代人说，“计大士稿之见于人间世者，仅及一千余篇，其蠹烂于梁间者，不知凡几。然有明执牛耳如震川（归有光）、思泉（胡友信）诸先生传世之作，亦不能多于大士，其余声华藉甚，不旋踵求其勺渾不可得。时文世界甚隘，而大士独得留千余篇，未可为不幸矣”（《制义丛话》卷之七）。

陈际泰悟性很高，他最懂得时文须与时俱变的特点，故他自述说：“泰文凡数变”（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清代人评价他这一特点时说：“盖大士才如江海，顷刻万变，又数十年，气运推移，故心思、笔力亦随之而异。《五家稿》所录浑脱直到古人，王选则较清微矣，周选或专取平近矣。”（《制义丛话》卷之七）

陈际泰的八股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无论其文风如何变化，却万变不离其宗，在尊奉程朱理学上是从不改变的，他自己曾说：“泰文凡数变，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透圣贤之义旨为宗。”（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其《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题文，可见这个特点之一斑。

此文题目选自《大学》，全篇体质纯茂，词旨明达，一改陈氏平日纵横跌宕的写法且一归于经术。

作这种理题，此前各位八股文名家高手，都遵循明初以来传统，多直用朱熹的传注以阐释之，至陈际泰出，才挹取群言，自出精义，与相发明，故能高步一时，无人能出于其右。所以俞长城说他“其学无所承藉，一览数行，手口耳目并用，质甚奇”（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其《惟大人能为格君心之非》题文，中幅举其体，后幅及其用，上自伊周，下举韩忠献、李文靖之事，都相融于尺

幅，无不显示其挹取群言，融液经典之才学。

陈际泰才华横溢，同一个文题他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写法，针对时局，从题中不断发掘出新的见解，写出同题的多篇八股文。其《充类至义之尽也》题文即有五篇，且篇篇皆为名作，有如鹏击貌抉，想穷天际，不可端倪。特别是其第二篇，“按理揆情，剖析精当，文之最醇者”（见《天崇合钞》该文评语），实达前代诸公未辟之境。王巳山对陈际泰一题多篇的做法有独到之见，他评论说：

“先生一题数义者尽多，独此五义，当是同时兴到之作，可使读者细讨古人文心不竭，意境如辘轳之相引。家蔚林以此为直接长沙《过秦》三论，柳州《西山》八记，分之则一篇自为首尾，合之则数篇自为首尾，而选家分离乖割，后学不睹其全，没却前人苦心矣。”（见《天崇合钞》该文评语）

在江西派中，陈际泰的性格旷朗而高傲，其文最为奇横，如风发泉涌，兔起鹘落。有人称他的文章有苏（轼）海韩（愈）潮之风，这并非过誉。其文纵横开阖，笔起波澜，实理虚情，推阐曲尽。



子曰：直哉史鱼 一章

◎陈际泰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卫有贤臣而皆不展其用，可惜也。

夫史鱼以不用死，伯玉以不用去，徒使直臣、君子之名见称于圣人，亦何益乎！

夫子意谓：甚矣，卫之多君子也。然其最著者，吾得两人焉。其一为史鱼，其一为我友蘧伯玉。史鱼之直声，古今所无，而伯玉之君子，吾党所少也。

夫史鱼于执简记，奉讳恶，足尽职业优劣之理，即史鱼于弥子瑕、蘧伯玉非有生平恩仇之分，而乃奸不去，贤不庸，目将不瞑。君不听，责不塞，死犹自罚。故曰史鱼之直声古今所无也。乃伯玉之道无可拘方，而彼独以推移行之。即伯玉之事无可形据，而吾能以情意况之。

故使邦有道也，史鱼曰：时幸圣明，不可不如矢也；而伯玉亦曰：吾将仕矣，固异局而同其符。

使邦无道焉，史鱼曰：世当昏垫，尤不可不如矢也；而伯玉则曰：吾将隐矣，将两地而行其志。

夫伯玉去就绰绰，诚无需于史鱼存没之荐。而史鱼中心养养，诚有窥于伯玉出处之贤。

甚哉！道相高，两人又以心相许也。史鱼生而伯玉庶几可仕；史鱼死而伯玉不得不卷矣。策后人不能故也，而长逝者恨有终穷乎！

君子曰：尸谏，忠有馀也。史鱼之死也，贤其生也。辟难，权不足也。伯玉之去也，贤其处也。然而卫以不竞矣。

【评析】气势雄浑，于正内见奇的陈际泰文

陈际泰之文，又每多新颖之处。其新颖处又极平正，只是别人看不到，说不出而已。其文每每言别人未尝言之理，开前代诸公未达之境，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能思众人思虑所不能至，故令人感到奇特。其《直哉史鱼》一章题文，即是一篇气势奇横，于正内见新的名作。

这个文题出自《论语》，《四书集注》中对这章经文的注释说：“史鱼自以不能进贤，退不肖，既死犹以尸谏，故夫子称其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故曰君子……杨氏曰：史鱼之直，未尽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后可免于乱世。若史鱼之如矢，则虽欲卷而怀之，有不可得也。”

从文中可以看出，陈际泰的八股文，并非直用朱熹传注，而是融液经史，荟萃群言，以一己之精神，透程朱之义旨以相发明。在该文中，他就认为史鱼之直，亦是君子之道，与朱熹的注释就有区别，因为崇祯乱世，需要这种不顾个人生死、敢于尸谏的精神，才能挽救危局。

该文将有道无道在伯玉事中插入史鱼总叙出来，又借势补点如矢，不仅避免了将有道无道两节分开对叙之板滞，还较寻常总叙之法更为奇变。

按照八股文之传统作法，将两对体交互做去，会凌题次。但作者借鉴了《史记》、《汉书》数人合传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笔法来写八股文，言人所未能言，发众人所不能见，使文章错综变化，不可端倪，正是正内见奇，熟后生巧，给人以奇特之感。文章议论奇横，纵横跌宕，神韵骨色，无一非古，是一篇时文古文融合无间

的名作。

陈际泰对八股文的独特贡献在于分股。他曾自叙说，他“所独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为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明为必如是而后尽也。若每股合掌，则四股可矣，何必八股哉！而病不止此也，将并其一股而忘之，何者？对股与出股一字不同，对股既严，而后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概而同之，则出股无论接句，即开头一句已苟无思矣，此并一股而忘之之说也。然不合掌又非于题外求不合掌也，文未至于一字不移，是八寸三分头巾，随人可戴也，病又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于此，而后文始刻，始高，行文之名始快。至于微远以取致，博奥以取理，所谓加务善之而所要不存焉。”（陈际泰：《太乙山房稿自序》）

万历末年之后，八股之对股与出股合掌与否，从不究问，故世间八股部分之合掌，历历可见。这是严重违反八股功令的。这样，“寝传失真，往往有略具八股之形，并无八股之意者。篇法则前后重复，股法则彼此模糊，于圣贤立言之意，既无所剖析，又何取排比而铺张之？”（见《天崇百篇》张兰陔评语）陈际泰既要振兴衰变已极的八股文，恢复其既有功能，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遍观其八股文，很难找出出股与对股有合掌现象的，其出股与对股无一句相同，且又不是从题外去求不合掌，所以其文做到了用排比而不见排比之迹，风格独具。张兰陔在《天崇百篇》中说：“大抵名家之文，从无合掌，而对法之灵奇变幻，剖析精微，至三婢先生而能事始尽。”所以艾南英说：“大士之先无大士，大士之后无大士。海内效大士者至众而终不能肖，无他，创与因之分也。”（艾南英：《陈大士近稿序》）陈际泰自称其“所独得者乃在分股”，便是其八股时文与众不同特点。

陈际泰的八股文善于抓住关键字眼，层层剖析，纵横奥衍，通篇全为该字传神，减没变化，奇妙无穷。陈氏凡作这类文章，“皆其熟极之候，更不用一毫才气，而神明于法者。此真钱（福）、王（鏊）后身”（见《天崇百篇》王耘渠评语）。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陈际泰在晚明都是最杰出的八股文名家，艾南英称赞他说：

“大士之文，置王（慎中）、唐（顺之）诸老弗论，其上之合圣贤之旨，次之与秦、汉、唐、宋大家相上下，而排空出险以御其自得者，则虽其怨家仇人不能以相毁……虽然大士身为诸生而天下翕然宗之，天下之为大士者，得其皮毛麟角则已躐巍科跻旣仕矣。”（艾南英：《陈大士近稿序》）又说：“向者，吾乡一二同人，以通经学古挽回斯道，而吾大士为功之首。”

他“变通先辈，自为面目，法甚高；为诸生时所作文遍天下，士大夫皆愿与交，名甚震，此宜速得志于天下矣”（艾南英：《陈大士近稿序》）。

然而，由于其文奇横，风格特异，虽“大士著书，其言满车”，“身为诸生而天下翕然宗之”，却因“不合于有司之尺度”，“乃老而始遇。盖知其为大士，文虽拙亦工。不知其为大士，文虽工亦拙。当时无论知不知，皆不知大士者也”（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这是陈际泰的悲哀，亦是八股取士制的悲哀。

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科会试，陈际泰试卷出自文震孟房，首题《其已也恭》四句，其文有精思，有大义，高足阔步，目空一世，文震孟一见即认定是陈际泰所作，欲取为第一名会元，而与项煜力争不得，置第二。榜发之后，果然是陈际泰之文，都为之叹惜。而项煜误以李太青为杨廷枢，将之取为会元，识文不明，受尽世人嘲笑。

陈际泰才思敏捷，又以博敏自雄，故其文中也有疵病。他自云三个月即遍读“二十一史”，当然未能细研，其中的地理、职官、兵刑、赋役等志，需以毕生精力细究方可通晓，三个月的时间，只能将其中列传部分匆匆一过，于可喜可恨事，或为击节，或为按剑，记于心中，也可资作文时用。而陈际泰不知藏拙，常于未深研处发挥，结果弄出错误，受到别人批评。如其《天之高也》一节题文，王夫之便批评他“于历法粗率且未晓了，出语便成差异。想其读史时，于历志无能晓处，便掷向一壁去。先辈于所未知，约略说过，却无背戾，惟不欲夸博敏。大士以博敏自雄，故乱道”（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陈际泰醉心于八股时文，不仅自己孜孜以求，也要求他的儿

子陈兴霸刻苦钻研,管教十分严厉。陈兴霸极为聪明,八岁时其父教他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只读三遍即能背诵。他“为时文气魄压千人”,又文思敏捷,“日十数题,题十数义,如父风”(傅占衡:《壶山集序》,载《明文海》)。他与弟弟陈少游自幼即通八股制艺,越是这样,陈际泰对他们的要求就越严。“梦中呼觉,令诵《考工记》,一字蹶,辄蹴下床与杖,甚于头触屏风。然观其文则喜不寐”,以至于陈兴霸与朋友们说:“吾他日训儿,当一以宽”(傅占衡:《壶山集序》,载《明文海》),可见其父苛严责之对其心理创伤之巨。

陈际泰之个性,及其对八股时文的迷恋,由此可见一斑。律己苛严,要求很高,这也是他的八股文能于晚明称雄一时的原因。

陈际泰时文具隽奥之风,其源根于经史,其灵浚于心思,其笔力出于周秦诸子,故能空前绝后,推陈出新,令人咀嚼不尽。其八股文大家之誉,是货真价实的。



圣人之忧民如此

◎曾异撰

极言数圣之劳心，而大人之事难言矣。

夫许行能贤于尧舜乎？自尧舜诸圣人，忧民如此其极也，事岂易与小人言哉！

尝谓人之易言其事者，皆未尝忧其忧者也。夫闾巷之小人，其所忧者未能出于一身家一手足之外。彼谓天下事亦复如此，而不知此蚩蚩小民，举千古天纵之聪明，几为之困也。

如许行之言，则必君之与民，泛泛然无所用其忧。即偶一忧焉，亦必其时之微予咨尔，不过如小民之勤动于饥飧，君相之平地成天，不过如妇子之抑搔其疾苦而止。乃今观于尧之命舜焉如此，舜之命禹、命益、命稷、命契焉如此，则是舜忧尧之忧如此，而禹，而益，而稷、而契，又忧尧舜之忧如此。

此夫为民上者，固未尝敢弛其忧曰：我能居尔，我能食尔，我能教尔。夫亦粗举其端，俟夫踵事者有可继耳。彼岂不能尽井里之制，详树畜之规而致师儒之事，以为势未可以遽求备，且歉然于忧民之仅如此也，而其焦心苦思已如此矣。

此夫戴圣人者，夫亦已共释其忧曰：吾既安居，吾既足食，吾既知教。幸其新出于难，且其民朴而欲易贍耳。使今人而仅居箠籛之居，食抽棘之食而服草创之教，彼其心方求多而未已，且愀然于上之忧我者仅如此也，而其时之宵衣旰食已如此矣。

且当其时，亦幸而数圣人比肩于一堂耳。再世而忧，则仅存一益。迨殷周之际，自阿衡旦望而外，皆非数圣人敌也。使尧之时而仅若三代之君臣，则其忧更有不止于是者。盖至今幸其千载一时

之盛，而犹皇皇然智力俱殫若是。

且其时，固不止此数圣人左提而右挈矣。奉若天时，则既命羲和，而皋夔诸臣，备明刑礼乐之官，皆为数圣人之辅者也。使数人而外，而更无协助之工尹，则其忧又有不止于是者。盖至今叹其有不可胜用之才，而犹屹屹然形神几困若是。

嗟！许行无多言，盍试忧民之忧焉，以观其暇与否也。

【评析】勉为制义却成名家的曾异撰及其 奇气排荡之文

这是崇祯八股文坛高手曾异撰的一篇八股名作，曾获后世高度评价。

曾异撰，字弗人，福建晋江人，生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年），卒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正月初三，终年五十四岁。

在晚明士林中，曾异撰是个饱学多才之士。他博通经史，曾为南赣巡抚曾纮更定王惟俭所撰《宋史》。他擅长诗与古文。诗作排荡有奇气，古文则清真悲怆，颇获时誉。但使他名满朝野的还要属其八股时文。

曾异撰是个秀才的遗腹子，家中尽管贫困异常，他那寡母还是晨纺夜织，供他读书习科举。襁褓中其母便喃喃教他读父书。六七岁时母亲篝灯于床，展书于枕，手纺口授，曾异撰则偃卧而读。十岁时学作八股，尤喜纵横排荡之风格。年轻时即中秀才，但蹭蹬科场，久困诸生，用他自嘲的话说，他是一个“为时义而不易售者”。直至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科才考中举人，这时他已四十九岁了。次年，他赴京会试，不中。三年后，他再次入京，参加癸未（1643年）科会试，又不中，怏怏而归，本身就是衰病之躯，经受不起长途风霜之苦和忧郁之磨，回家后一病不起。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正月初三，这个人家正在欢乐的日子，他却撒手人寰。一个才华横溢的智士就这样死于科举之路。

正因为是在八股取士的小路上奔波劳累了一辈子，曾异撰对八股取士制的利弊都看得极为透彻，思想中充满了苦闷与焦灼。他

悲愤地指出：“今天下之人才，帖括养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国家，亦帖括撑持之国家也。吾观三岁取士，名为收天下豪俊，当事者舍经义而外弗闻。再三试闈牒，偶有通达慷慨之士，不以为触犯忌讳而不敢收，则谓是淹滞老生，反不如疏浅寡学者。”他因此把士人生于八股取士的时代称为“不幸”（《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他认为凭自己的资质，若无科举之累，得肆力于诗古文，虽不能说一定会胜过司马迁、杜甫，也未必会在他们之下，因而对写作八股文充满了怨愤，说：“以此为应制帖括事，每一举笔，辄谓我留此数点心血，作一篇古文辞，数首数行，直得无拘无碍，而又庶几希冀于千百年以后，何苦受王介甫笼络。”

然而，作八股，求功名，释褐衣紫，显亲扬名是他挥之不去的情结。科举就像叫人上瘾的鸦片烟一样成了他毕生的追求，他曾与友人说：“私念我辈，既用帖括应制，正如网中鱼鸟，度无脱理。”对八股取士的批判态度，及其对功名富贵的无限眷恋，造成了曾异撰内心的极度苦闷与苍凉，产生了思想与行动的巨大矛盾，更造成了他命运的悲剧：从情感上他厌恶束缚思想的八股文，而在理智上，他又明白只有八股文才能让他脱贫致富，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故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仍以攻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作为自己的首选。

凭着他俊秀的资质，凭着他的苦攻，曾异撰成为晚明八股文坛上出类拔萃的大家，对晚明八股文的变革曾作出过理论上的贡献。

曾异撰因其真才实学，力主为学要经世致用，对八股有精湛造诣，故当时有许多文士请他为自己的诗文集和八股文集作序。在这些序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八股文变革主张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反对八股文言“腐妄不可用之理”和言“头巾帖括糊目而互相呼拜之学”。力主言理要“适于世事”，言学要参以“其人之世”，这就为崇祯年间八股文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时期救亡图存者主张八股文要“有所感触而后为之”，“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使经义为挽救危亡的国运而效力，其理论基础便是曾异撰的八股文言理须“适于世事”，言学要参以

“其人之世”的观点。八股文之所以能在崇祯末世出现血色辉煌，与曾异撰的推动有着重要关系。

曾异撰还是晚明文坛的八股文高手，他的八股文写得无不理足气充，纵横激荡，新见迭出。其论事类的文章皆为排荡经术之文，其谈理讲学之文则为清真快逸与定气、矜格、认脉、摹神之文。他意有所感，则以《四书》、《五经》之言，论今日之事，带着浓郁的现实色彩，经世致用的理念表现得特别明显。《圣人之忧民如此》即为其代表作之一。

这篇八股文的题目摘自《孟子·滕文公》。其所在章节的前后文为：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之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以上是孟子批驳许行否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不同而发的一段议论。《圣人之忧民如此》这个文题即摘自其中，它是孟子在列举了尧舜等圣人为救治百姓疾苦而作种种周全考虑与不懈努力的事实后所发的一句赞语。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赞同孟子的见解。

按照八股功令，曾异撰在作此题文时必须遵循孟子的原意，

并按朱熹的传注来阐发这句话中包蕴的微言奥旨,将其写成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这个题目前人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若按八股功令,只有嚼别人嚼过的馍,说别人说过的话,陈陈相因,迷腐妄不可用之理,这是曾异撰所不愿做的。

曾异撰身处万历之后八股文已开始变革的时期,他本人对束缚个性和思想的八股功令已心存不满,力求变革。故在他的笔下,八股文都能突破功令,以古文的理念来写时文,并以之表达自己对世事的看法。

曾异撰这篇八股文,并未按朱熹规定的题旨去赞颂尧舜等人如何忧民,而是灵心独运,异境特开,紧扣题中“如此”二字作阐发。在他看来,孟子所述尧舜禹益等圣人并不能解决所有民生疾苦,他们的才能不同,能解决的民生困苦也不同,“势未可以遽求备”,故只能慧眼识才,让他们在其他贤人的辅佐之下,解决不同的民生疾苦。“粗举其端,俟夫踵事者有可继耳”,在曾异撰看来,这才是孟子所说的“忧民如此”的真实含义。

应当说,曾氏的这种见解无疑是独到且正确的,具有实事求是的历史眼光,称得上是“妙笔精思”,“灵区独辟”(《明文钞》三编该文评语)。

曾异撰是力主为文要以《四书》、《五经》之言论当今之世的,他这么去揭示题旨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从万历后期开始,明代社会日益腐败,民生疾苦日益加重,其重要原因是万历、天启、崇祯皇帝都不能识拔才能之士,反而重用奸人阉党,排斥忠贞能干之士,使得国势日渐衰微,民不聊生。曾异撰在文中说:“且其时,固不止此数圣人左提而右挈矣。奉若天时,则既命羲和,而皋夔诸臣,备明刑礼乐之官,皆为数圣人之辅者也。使数人而外,而更无协助之工尹,则其忧又有不止于是者。盖至今叹其有不可胜用之才,而犹屹屹然形神几困若是。”这段话,就是对明末不能识拔人才的腐败政治的批判。

这篇八股文只有中、后四股,省去了提二股和束二小股,这是曾异撰对八股格式的一种变革。曾氏对八股格式对人的拘束牵制早有认识,在变革中自然会涉及这一关键,在以古文为时文时大

胆革新时文体式，而按阐述题旨的需要去决定体式，此文即将提比和束二小比省略。因提比是虚讲，只在题前着笔；束二小比用于回应提醒全篇，归结全文之意。而这些功用，曾异撰在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及大结处均已表现过，无庸赘述。一切从文章的实际出发，这就是曾异撰决定格式的原则和出发点。

曾异撰在作中比时其意思表面上是缩退一步，实则赶进一步。其出比从圣心来阐述，对比则从民心来阐述，两两对映，从而逼取题中“如此”二字的意义，构想奇妙。

后二比则翻进一层，旁见侧出，曲尽形容。

在作法上，作者在中、后四比中偏说“仅如此”和“不止于是”，纯用八股作法中的“加一倍法”作翻势来跌宕题意，逼撑下文，使“如此”二字空中激荡，逼塞全文。

该文气势磅礴，中后比凌空盘远，文意之曲折，用笔之伸缩进退，腾挪变化，无不入妙。逼取下句如在喉间，不吐不快，将题中“如此”二字完全表达出来，又不侵上犯下，曾异撰八股水平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庄暴见孟子曰 全章

◎黄淳耀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生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箫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

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乐无古今，惟同民者为能好也。

盖先王乐民之乐，故其乐至今传也。如齐王之所好，与独乐何异！

昔齐自敬仲奔齐，韶乐在焉，至宣王之世犹存。孟子至齐，与王论政者屡矣，无一言及于古乐，以为仁义不施，则虽日取先王之乐而张之于庭，无益也。

一日庄暴以王之好乐语孟子，有疑词焉。及孟子以庄子之语诘王，有愧词焉。彼特以古乐在齐，而耽此鸮辟骄志之音为非宜尔。虽然，王果以昔日之乐为足以治今日之齐乎哉！

夫国不期于大小，期于好乐。乐不期于古今，期于同民。今也知独乐之不若与人，知少乐之不若与众，是天下之知乐者莫如王也。知与人之为乐而故独之，知与众之为乐而故少之，是天下之不好乐者莫如王也。王之心必曰：“吾何独矣！吾不有妾御乎哉？吾何少矣，吾不有便嬖乎哉？”嗟夫，此王之所以为独，此王之所以为少也。

今夫临淄之中不下十万户，王之妾御、便嬖不过数百人。王日与此数百人者鼓乐田猎之是娱。而此十万户中，耳不绝悲叹之声，日不绝流离之状，此虽伶伦复作，仪舞再来，民亦必疾首蹙頞，以为安得此亡国之音也，况世俗之乐乎！

然则好乐之甚者可知已。欲民之乐闻，莫如发德音；欲民之乐见，莫如下膏泽；欲民之善颂善祷，莫如播仁声。至于德洋恩普，收

六国而臣之，击壤有歌，殿屎不作，则王之乐，亦洋洋乎来矣。后世闻之，以为此非东海之风，而王者之作也，岂不盛哉！

言至此则王必动容而思矣。吾故曰：天下之知乐者莫如王也。言至此，则王必敛衽而退矣。吾故曰：天下之不好乐者，莫如王也。

【评析】身文并烈的八股文名家黄淳耀及其 古健老到、沉郁苍劲的八股文

在晚明八股文坛上，人品与文品俱为人称颂的人物首推黄淳耀。未成进士前，“见朝政得失，时事兴废，作为文章皆本经济。既成进士，犹嗜学不衰，国步既移，即以身殉，遂成一代完人”（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为八股文史增添了一道奇光异彩。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嘉定（今属上海）人。

黄淳耀自幼即有志于儒家之学，“并发于至情，体于实践”，“弱冠即著《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后为日历，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明史·黄淳耀传》）。

吴梅村对黄淳耀的儒学素养也推崇备至。他说：

“其于考据得失，训诂异同，在诸儒不能通其条要，陶庵顿五指而数之，首尾通涉，铢两历然，虽起古人面与之讎问，莫能难也。其为人清刚简贵，言规行矩，早有得于濂、洛之传。尝谓人曰：‘吾比来为文，初无所长，然皆折衷大道，称心而立言，质之于古，验之于今，其不合于理者亦少矣。’”（《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黄陶庵文集序》）

黄淳耀“为诸生二十年，与其弟伟恭，其徒侯几道云俱昼夜讲性命之学”。未中进士时，在钱谦益家中坐馆，深受钱谦益器重。他利用钱氏家富藏书的条件，尽读孤本宋版，学问大进。又极关心国家兴亡，每日读邸报，常为国事之坏太息流涕。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科在南京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归益研经籍，缊袍粝食，萧然一室”（《明史·黄淳耀传》）。他体念时艰，甘过清贫生活，与未中进士前一般无异。

甲申国变,北京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称帝,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科中进士者都授予官职。黄淳耀恪守儒家正统道德价值观,不事征逐,淡泊名利,从不与名士争长较短,故只有他一人不去南京赴选。

不久,清兵南下,攻陷南京,弘光朝覆灭,兵逼嘉定。嘉定士民推八股名家、冯梦龙的友人侯峒曾及黄淳耀为首据守嘉定县城。黄淳耀的弟弟、诸生黄渊耀亦参与其事。

嘉定军民满腔忠义,浴血死战,却因大雨崩塌城墙,且无援兵,嘉定城终于失守,清兵大举攻入。侯峒曾携二子从容投水自尽。黄淳耀怆然太息,与弟黄渊耀入一庙中,也欲自尽。

僧人说:“你未曾为官,可以不殉国死难。”

黄淳耀悲愤地说:

“城亡便与之皆亡,岂能以做没做官来做偷生之借口!”

他向僧人要来笔墨,于粉墙书曰:

“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明史·黄淳耀传》)

寥寥数言,语极惨烈,虽为自责,实哀国事。然后从容“投笔绝命,扼吭而死”。张岱则记叙说,黄淳耀“嚼舌喷血于壁,因投缯自尽,至今僧舍血迹犹存”(《石匱书后集》)。俞长城云:“癸未一科,名士如林,而皆出于浮饰。大节既堕,文亦鲜传。惟陶庵发于至情,体于实践,故身名并烈。昔人云举业不妨功,惟患夺志。若尽如陶庵先生者,则励志莫如文,又何患乎?”(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这种评价是十分公允的。黄淳耀节操文章在晚明都属一流。他“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门人私溢之曰贞文”(《明史·黄淳耀传》)。而最能体现其学养,阐孔孟之精妙,探性命之奥旨,显现其才华识力的,还属其八股时文。他之所以能终生服膺孔孟之道,也得力于八股文对他的滋育。

黄淳耀“为诸生时,深疾科举文浮靡淫丽”,会失去八股文统一士人思想的功能,造成政局进一步失控,便全身心投入到对八股时文的钻研与振兴中去。他默默耕耘,欲以自己的文章道德来

昭示世人，八股文的正宗在何处，从而影响士人，使其人心文章皆归于正。

黄淳耀是晚明著名的古文家，他学识广博，读史详审，吴梅村曾说黄淳耀于“迂、固以下诸史，朱黄钩贯，略皆上口”，善熔经史于一炉。他又是一个关心朝政得失，时事兴废，欲借经义来发摅胸中之奇的爱国志士。为能自由表达其救亡拯世之见，他的时文皆以古人理念与作法为之，以《左传》、《史记》、《汉书》的笔法，发孔孟之义理，切当世之弊端，笔触苍劲而常带感情。指事类情，肝胆呈露，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读者义理之心勃然而生；警痛之论，可使机变者抚心内愧，瞿然自失。其时文已与古文浑然相合，气局雄浑阔大，笔法古健老到，情韵沉郁苍劲，实直接《史记》、《汉书》以来文章正统，在晚明八股文坛独步一时。其《庄暴见孟子曰》全章题文即是其代表作。

这一章题文出自《孟子》，《四书集注》对这一章经文的注释为：

“范氏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若必欲以礼乐治天下，当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杨氏曰：乐以和为主，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濩，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齐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黄淳耀是明代一个“笃践履”的儒士，其八股时文当然会一本程朱理学，故该文以同民乐为经，以古乐今乐同独乐众乐少好乐不好乐为纬，凭着作者高度的概括力，以及把握题旨精义的本领，将一个长达四百多字，内容纷繁的题目阐释发挥得淋漓尽致，且文中所指，又切中天启、崇祯现实，可见作者写作水平之高，堪称名家。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文纯以古文笔法写就，“纵横出没，自成一则古文。其中有提缀，有顿挫，有驾驭，皆有法度可寻”（见《天崇百篇》该文张兰陔评语），其“置题如阵，弄题如丸，意度波澜，自



然入古，而无抚古之迹，纯是一片神力酝酿而成”（见《天崇百篇》该文王巳山评语），“笔墨化意，非龙门以下所可拟”，“学者于此一艺，能神会其妙，不难御风而行矣”（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可见明清八股文坛，对作者融古文与时文为一体，以雄快之文字，指切时事，发摅胸中之奇的能力是赞不绝口，推崇备至的。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魏禧曾指出：“八股之法，病在于排比有定式”（见《制义丛话》卷之七），因而有碍于对题义的自由发挥。黄淳耀的八股文多指切时事，言及世道人心，“皆本经济”（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故在写作时常突破八股格式，以散体或二截、三截结构为之。他特别擅长全章题文的写作，大都循题节次而发议论，兴会跃腾，自具龙翔凤舞之概。且全以摹神审势为主，不屑于机法，而讲求机法者，却都不能达其水平。这正是黄淳耀之擅长独绝之处。其《庄暴见孟子曰》一章题文纯以散体来阐述。其《小弁小人》全章题文从“小弁”说到“凯风”，再说到虞舜，共分三截，全未按八股格式，却合于古文之法，文气逼近韩愈与苏轼。当时陈子龙三吴派兴，专尚凌驾串插，遇此等文，反以揆讲讥之。他们不知道凌驾串插，隆庆、万历时已为人广泛采用，造成许多弊端，要振兴八股文，便不能再加提倡。只有依照发挥题旨需要而采用不同体式，才能自由表达己见，写出既切合题之奥义，又动人心弦的好文章来。

在明、清两代，衡量一个文士的道德文章如何，一是看他是否身体力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二是看其八股文中是否恪遵程朱传注，阐释的是否为原汁原味的儒家正统思想。以此为标准来对照黄淳耀，可以看到，这两条他都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他不仅对儒家之学能“发于至情，体于实践”，在国家破灭之初，虽“欲以智自全，自五月十七日以至七月四日，城亡与亡，卒完大节，不愧为海内名士也”（张岱：《石匱书后集》）；在八股文写作中，他以恢复八股文的载道功能为己任，下笔为文，流露出的全是纯粹的儒家正统思想。故把黄淳耀视为一个真儒家，应该是够格的了。



见义不为无勇也

◎黄淳耀

圣人以取义望天下，而激其本明之心焉。

盖勇生于义，义立于为，第曰见之而已，吾何望哉！

且夫人有识以明内，则可帅气使必行；有气以充外，亦可扶识使必达。而吾终不敢谓天下大事皆取办乎识多气少之人。夫非气与识离而为二也，识尝主乎事之发，而气尝主乎事之成。事不可以有发而无成，故人不可以有识而无气也。

今天下事会多矣，名教亦凜矣。使是非之所存，必不与利害相反，则古今安得有忠良。

使好恶之所寄，必不与诽誉相违，则人心安得有廉耻。

奈之何有见义不为者，居平私忧窃叹，以究当世之利病。事至，则循循然去之，曰：将有待也。逮所待者既至矣，则又自诬其前日之议论以为狂愚。此其力尚足仗哉！

夙昔引绳批根，以刺他人之去就。身临，则缩缩然处之，曰：期有济也。至所济者罔闻矣，则又反诋乎贤豪之树立，以为矫激。此其气尚可鼓哉！

巽懦出于性生，则虽学问经术，本异庸流，而举平日之所知所能，尽以佐其浮沉之具。

畏葸积于阅历，则虽醇谨老成，不无可取，而因此日之一前一却，遂以酿夫篡弑之阶。

祸福何常之有，避祸深而英华销沮，遂并其不必获祸者而亦避之，彼其心非恶义也，恶义之可以获祸也。然至藏身之固既得而观望周章。久矣，为笑于天下矣。

生死何定之有，畏死极而中情回惑，将并其可以蠲死者而反蹈之，是其死非合义也，不合于义而又不免于死也。原夫贤愚之身同尽而防检空裂。甚矣，进退之失据矣。

若此者，谓之无勇。世岂有无勇之人，而可与之慷慨誓心，从容尽节者哉！

是以君子治气如婴儿，欲其专也。

用气若人帅，欲其静也。

不敢轻喜而易怒，虑其气之旁有所洩也。

不敢留力而玩时，虑其气之内有所阻也。

气盛故塞乎天地，行乎渊泉，而无不之也。气纯故达乎百为，贯乎万事，而无不当也。

呜呼！是亦足矣。

【评析】直刺时事、发抒忠愤情怀的救亡时文文风

最能体现黄淳耀忠义情操，又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其深念时艰，发抒悲愤之情，直刺时事及当权者之作。当他于钱谦益家坐馆时，钱氏声名正盛，且又极为器重黄淳耀，黄淳耀却从钱氏日常为人中看出其灵魂深处的卑污，作《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哉》题文以刺之，全是目击心痛之言，极富识人之明，极具批判力。明亡后，钱谦益果真降清，其识人之深、见事之远由此可知。其《与人言而无信》全章题文、《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全章题文等都具有哀民感事、针砭时弊、献计献策、远见卓识的特点，无不脍炙人口。其中《见义不为无勇也》题文，更为卓绝，备受推崇。

该文题目出自《论语》。黄淳耀有感于当时许多官员满口仁义道德，却满肚子男盗女娼，作此文以刺之。他针对当时世事，阐释了孔子“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观点。他分析了义与勇，义与为的关系，指出“今天下事会多矣，名教亦凜矣”，因而在节义面前应抛开个人名利、进退，不避生死，能舍生取义，方为见义勇为。否则，口称仁义道德，而处处顾及个人私利，决不可能有见义勇为之举。

黄淳耀捐躯赴义的志向与陈子龙、夏允彝这些人是相同的，

而平日的为人及品德远高过他们。他不依门户，不逐声气，方正恬淡之性有如天生而成。其文指事类情，皆发自肺腑。且自有八股制义以来，他人能言者未必能行，只有他能见诸于行，故别人读了此文，必然会受其感染，油然而生义理之心。

该文沉郁激宕，行墨间挟忠义贯日月之气，已造苏轼雄文之堂奥，读之可歌可泣，不能以一般制义时文视之。

黄淳耀既是醇儒，又潜心探究拯世治国之道，故其制义时文，有不少是借题以发挥其治世之见解的。这类文章，最为雄快，指画精详，有经国安民的真知灼见。其《守望相助》题文，阐述井田封建之制，就井田制的兴废来表达其治民理财之见解，直切当时世事。文中述及井田制本是圣人为中国先民虑及深远而设的制度。井田坏，则兵法、地利、士气、民情俱坏，不止农赋之病。文章条画明切，可见作者指切时世，忧国忧民之心。文之中二比云：

凡守者聚而处，望者散而布。聚之则苦其多也，散之又苦其寡也。今即平日之什伍联缀者，弯弧击柝而互生其形势。此为彼守，不必仰食于所守之家，故不厌多；彼为此望，不必身践其所望之处，故不嫌寡。是耨锄棘荆之间，而俨然有旗鼓之节矣。

凡守者来而拒，望者往而伺。彼来则恐其力不敌也，我往则恐其情不得也。今即平日耦俱无猜者，献禽馐兽而驯习于险阻。以八家为一家，守而实则自为守，故其力悉敌；以八家为一家，望而实则自为望，故其情悉得。是芒蒲被袂之下，而森然有部勒之方矣。

从这二比可以看出，作者从寓兵于农立论，原本经术，深切事理，指画精审，于题境绝非附会。该文从阐述井田之中显现其治民方略，可以保甲，可以筹边。黄淳耀之才干器识如此，可惜未能让其一展身手。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陈子龙

论鲁大夫之才，而知春秋家国之事矣。

夫春秋之时，政将在家，而小国方困，即夫子之论公绰可睹也。

且天下多故，事变日生，列国之臣，非才无以自见，以为盛德寡营之士，无地可以置之，而不知其非也。公室患其才少，私门患其才多，此当今之大患矣！而人与地往往相违，故得其宜者寡耳。

吾观鲁大夫孟公绰之为人也，宽平而有守，恬淡而不欲，其在鲁之事，我不暇论，或以为名高鲜实，使之守职，足以堕事；或以为德隆誉盛，登之朝右，可以显君。我以二者皆非也，彼固有所优，而亦有所劣也。其所优则为赵魏老矣。夫家臣之长也，而曰老者何？无所为之名也，谨持管钥而已；无所事之意也，以德辅导而已。此家不干政，陪臣不执国之义也。夫晋伯衰矣，而政将在赵魏。位名为世卿，而权实为盟主，则才略辐辏之人进矣。入谋于私室，而出行于诸侯，则智术倾危之士来矣。然而其始也，借权以削其国；而继也，乘间以图其家。如是者往往而有故。巨室大家每乐其才而畏其害也，诚以公绰为之，雅量足以坐镇，竞端可以潜夺，岂不家国俱荣哉？

若夫滕薛之为国也微矣！势不如大国之卿，而名为列国；地不馀一邑之广，而交于四邻，此其势必无可以自存者。庶几有一二人焉，具应变之才，怀无方之智，振纪纲以內治其臣民，挟礼义以驰执于盟主，然后可以强自支厉，迁延岁月耳。若云以静守之，以德化之，此事之不然者，而公绰所长者在此，是以知其不可为滕薛大夫也。

嗟乎！当此之时，化家为国之兆成矣！故才智之士不以仕于私朝为耻，而分裂篡窃之事将作。诚得清静之人不助其成谋，则大国可以不灭。

当此之时，并弱兼小之势见矣！故衰微之困，常以降于皂隶为忧，而盟会讨伐之风将息。苟非敏略之臣力扶其衰绪，则小国何以救亡。

夫大国未篡，而小国未亡，则霸者之风可以复见，而惜乎不能也，此春秋将为战国之势也。夫子固知之，而寄慨于公绰耶？

【评析】欲靠振兴八股文来挽救世道人心的 陈子龙其人其文

在晚明八股文的救亡振兴运动中，陈子龙及其幾社的战友们，力主以复兴古学来挽救衰颓的八股文。其主张虽与江西派的艾南英等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亦在八股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陈子龙、夏允彝、包尔庚等幾社健将都成为崇祯八股文坛的名家。

陈子龙，原名介，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

陈子龙“生有异才”，少习经史，潜心于义理性命之学，“析理匠心，刊华就实”，颇有成就。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科中举人，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科中进士，选任绍兴推官。

陈子龙有经世才干，在绍兴推官任上，曾单骑去招抚被官逼而反的东阳诸生许都部众，他因此而擢升为兵科给事中。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事福王于南京，献练水师及防守要策，请禁宦官骚扰百姓，召还正直被黜之臣，都表现出他的才具卓识。后见福王无意复国，反而荒淫无度，上疏劝谏，却不听从，心为之寒，便以乞终养而归田舍。

不久，南京被清兵攻陷，夏允彝赋绝命词后自尽身亡。陈子龙开始并不想以身殉国，“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为僧。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明史·陈子龙传》），却被奸人告发，在苏州被清兵捕获，于押解途中与其好友夏允彝一样乘间投



水殉难，时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年仅四十。其高尚节操，受到后人景仰，连清朝廷都对其忠义进行表彰，乾隆时赐谥“忠裕”，祀忠义祠。

陈子龙善为文，各体皆能，是晚明著名的文学家。吴梅村称他“诗歌古文倾一时”（《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四《复社纪事》），“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八《宋直方林屋诗草序》）。他与幾社七子皆好读《文选》，善骈俪之文，《明史》称他“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这些成就，都是在其复古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陈子龙自幼攻读儒家典籍，学习八股文，牢固地树立起了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他目睹自万历末年以来的乱世，激发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思想。在他与复社、幾社、江西派文人看来，文章是经国大事，其兴衰关乎国之气运，故都想以振兴文运来振兴国运。不过，他们振兴文运的理念却各有差异，《明史·文苑传序》中说：“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寥寥数语，即点破了其间差异之所在。

在陈子龙及幾社、复社诸子看来，文风只有雅正，才能正人心，淳风俗。而近世之文，无论体式、思想，都芜杂不经，不足以担当此任，只有复兴古学，才能振兴当代文坛，承担起正士心，淳士习，进而挽救明王朝危机之重任。故他将自己发起成立的文社就命名为“幾社”，寄托着他及其战友们复兴古学的希望：“幾者，绝学有再兴之机，然后得幾其神之义也”（杜登春：《社事始末》）。所以，他在编刊崇祯五年的幾社文选本《壬申文选》的凡例中就提出“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秽，大雅不道，吾知免矣”。

晚明著名文人吴梅村正是看到了陈子龙等人的良苦用心，指出：

“当先皇帝初年，海内方向古学，一二通人儒者，将以表章六经，修明先王之道为务。”（《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黄陶庵文集序》）

正是出于这种复古理论的指导，陈子龙重举前后七子的复古

大旗，视其文为雅正，而把扫荡前后七子，“各争鸣于一时”，使得“宗李、何、王、李者稍衰”的“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明史·文苑传序》）的文章贬为“俚秽，大雅不道”，公然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变革主张。

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幾社诸子大写拟古之作，短钉古语，难以卒读。

而令陈子龙文名大振的，还不是其诗词古文，当属其八股时文，因为八股时文是专门用以载输程朱理学，培养士人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最为有效的工具，明清两代统治者及绝大多数士人也最看重它。《明史》中说陈子龙“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明史·陈子龙传》）的原因也在于此。陈子龙是晚明的八股文名家，又是一个壮烈殉国、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传统的伦理观念助长了他的八股文名，而他的舍生取义之举又证明了八股文塑造士人灵魂的巨大功能，抬高了八股文的身价。

陈子龙是崇祯八股文振兴运动的主将，他为八股文的起衰去弊作了许多努力。

一是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文社，讲求八股制义，议论朝政得失，“月有课，岁有帙，疑义窒辞于是乎质之，闻过于是乎规之”（徐世溥：《蔚社亭序》，载《明文海》），整个文社之人形成一种共同的文风，且以之去影响社外之人，以文会友，搞得很热闹。如幾社中之包尔庚，“文最平实”，不合于陈子龙、夏允彝作文要有奇险艰涩之风的主张，故“陈、夏诸君屡讥之，乃刻苦砥砺，格遂一变。盖幾社七子好读《文选》，然多用于骈俪，惟宜整（此为包尔庚字）有峭拔之笔，摇曳之故耳。世人朗诵宜整数过，竟不能解。所谓过门大嚼之夫，与之烹清茗，食橄榄，徒觉烦苦厌人。知味之难，自古叹之”（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戚藩亦为幾社中之八股文高手，其文促音急节，完全遵守幾社文规，故受到陈子龙等人的称赞。通过结文社，交文友，切磋八股技艺的办法，使其以兴绝学来作为振兴崇祯八股文的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在东南各地士人中得到普遍认同。

为了让士人们学有样板，将他们从庸腐空疏的程文中解放出

来,按照自己的为文理念去进行八股文写作,陈子龙等还和书坊合作,选刊时文,从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到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由徐孚远主持选编,刊刻了《幾社会义》共七集。其中所收,全为陈子龙及与之同气相求者所作之文,全都体现了幾社复兴古学的为文宗旨,内容一本儒家正统,写法出自秦汉之文。每集《幾社会义》出来,都受到考试士子们的热烈欢迎。幾社的为文理念广为士子们所运用,参加幾社的人也越来越多,超过了百人之数。

由于陈子龙为文力主“规摹西汉”,与艾南英等力主学习唐宋八大家,于本朝则尊崇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派在理念上有差异,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两者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据吴梅村说,“千子之学,雅自命大家,熟于其乡南丰、临川两公之言,未尝无依据。顾为人褊狭矜愎,不能虚公以求是。尝燕集弇州山园,卧子年十九,诗歌古文倾一世,艾旁睨之,谓此少何所知,酒酣论文,仗气骂坐,卧子不能忍,直前殴之,乃嘿而逃去。已复侨居吴门,论定帖括,挟异同,贾声利,故为抑扬以示纵横”(《吴梅村全集》卷二十四《复社纪事》)。吴梅村这种说法不无偏见,因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一是吴伟业中会元时,“天下争传其文,而艾千子独出其所为书相訾訾”,相互间有成见,说话自不客观;二是吴梅村是张溥的学生、复社重要成员,与陈子龙的交情很深,感情自然倾向陈子龙而诋斥艾南英。

倒是俞长城对艾、陈两人争论的评价较为客观、公正。他说:他们二人那场争论,虽“至于攘臂,要其独主所见,不肯雷同,诚艺林盛事也……申酉兵起,卧子致命,东乡亦殉难。吴闽千里契合,故曰君子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

俞宁世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观二公节义文章,百世犹为兴起,岂与世之面是背非,始昵终睽者比哉!”评价亦为公允。

虽然陈子龙意欲复兴古学以挽救明王朝的危机,但这些学说毕竟离时代太过遥远,而崇祯时又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时代已不容许他脱离现实去拟古,况且,陈子龙还是一位有志于经世致用又有才干的政治家,他“壮而力学,悔其少作,则东乡亦为称道勿

置”(俞长城:《百二十名家选》),幾社与江西派之间为文理念的歧见终于在现实救亡的需要面前弥合了。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他在选刻时文的基础上,与徐孚远等选编了《皇明经世文编》五百餘卷,中多“议兵食,论形势”,有关“国之大计”之作,可见其学问已彻底转向了“国是人才,边情水利,凿然欲见诸施行者”(《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何季穆文集序》)。其八股时文更多直刺时事之作。

方苞曾指出幾社、复社人士八股时文的共同特点,他说:

“大概有所感触而后为之,借题以发摠胸臆,明季幾社、复社前辈文多如此。其后行身强半有气骨。”(《方苞集·集外文》卷五《与贺生谿禾书》)

陈子龙在中进士之前数年,随着国事日危,其八股文多为感世之作,往往是借题来发抒其政见,或议论朝局人才,或筹划民生边事,语语皆切中时弊,表现出他具有很强的经世之才。

陈子龙好读史,亦深于史,于历代人物,朝政成败得失,均有独到之见,故每借八股文题以抒其议。与黄淳耀所不同的是,黄氏议论时常常出于题旨之外,而陈子龙虽天才迅发,好上下古今,其文却切合时务,而敷以藻艳,《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但于题之脉缕,仍不差一黍。这从其名作《孟公绰》一节题文可以得证。

这篇八股文之文题出自《论语》,《四书集注》对这一节经文注释说:

“公绰,鲁大夫;赵魏,晋卿之家。老,家臣之长。大家势重,而无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无官守之责。优,有餘也。滕、薛,二国名。大夫,任国政者。滕、薛国小政繁,大夫位高责重。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杨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则为弃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与崇祯八股文振兴运动的其他主要人物一样,陈子龙也是一个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名家,只不过他是取法于晋、魏,主议论而已。这篇时文,即是以古文之法为之,仅看其结构,就打破了八股格式,而随议论的需要作了安排。

该文在起讲处按切春秋时势后，即分两大段来进行义理阐发。第一段先议论说明孟公绰的本领，再说明老之职掌，赵魏时势。第二段先说滕、薛时势，次说大夫职掌。然后用二比议论定公、哀公时势。末尾又用议论收结，纯用古文笔法。

该文从春秋大势立义，虽似别生枝节，但作者烂熟先秦历史，切合定公、哀公时衰败之势，上不入五伯，下不及七雄，语在一人而理关全势，将孔子之言全部包蕴在内，与朱熹之传注也不相悖。凡有关崇禎世道之论，都借题而予以阐发，“眼力、笔力俱绝”（《天崇合钞》该文俞宁世评语）。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陈子龙

圣人以举错言智，而权行其间矣。

夫枉直有相使之机，而举错之权大也。夫子亦言夫智者之用乎？

若曰：天下之事甚繁，而必重夫用人之权者，不独以成天下之务，而将以动天下之心也。下之人莫不翘翘然有望于上，而上无以动之，亦何以为操术之明乎，是非所论于知人者矣。天下之人，非直则枉，用人之权，非举则错，此其大端已。

天下之不能无枉者势也，而往往轻于弃绝。君子伤之，教之以善，未必从也，岂舍我所能行，而他有所致欤？

天下之不皆能直者亦势也，而往往无所兴起。君子耻之，感之以化，未必兴也，岂舍彼之甚慕，而别有所动欤？

于是知举直错诸枉，而使枉者直在其中矣。

天下虽大，得其情而驭之，不难制也，人独何恶于直乎？为直而无以自见，则废然反矣。苟游于至明之途，而贤愚无所混杂，以是风动宇宙，表正人伦，甚亟也。彼枉者纵不能尽知其美，而独无相竞之心乎？夫亦驱策之至神矣。

气质虽远，乘其动而易之，不难变也，人岂无慕于直乎？为直而不免枉名，则愤然激矣。苟断于不爽之鉴，而贞淫不得并陈，以是扶进人心，崇起教化，至顺也。彼枉者岂不亦甚难其行，而能缘他途以进乎？夫亦转移之极易矣。

盖下之得与上相抗者，无以大服其心也。上之所令在乎此而所取在乎彼，则不得不从其所取之实，而弃其所令之名。苟举错之得当，则人将乐其名实之既一，而皆有孜孜不已之意。

上之不能齐其下者，无从叩发其事也。我以为礼乐之途，而彼以为功名之路，则不得不乐其功名之易，而忘其礼义之难。苟举错之居正，则人将喜其难易之可信，而各有循循共赴之志。

夫劝赏无遍加也，而效至于此，以是知用人之权不可轻，用意不他及也，而化通于远。以是知知人之明不可学也。

【评析】清新古健的陈子龙时文

幾社早期之文，多务怪奇，矜藻思，因此而受到艾南英的多方批评。只陈子龙、夏允彝两人偶尔有清古雄直，永不刊没之作，因为他们能在文中发抒其爱国忧民之真性情，精光自不能掩。陈子龙庚午（1630年）科在应天中举之作《举直错诸枉》一节题文，便是一篇可以名世，可以传世之作。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论语》，是孔子回答樊迟问仁时所说的话。这一章经文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这几节经文的注释说：“爱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务。”“曾氏曰：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不仁者远，言人皆化而为仁，不见有不仁者，若其远去尔。所谓使枉者直也。子夏盖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陈子龙这篇文章，依据孔子之言及朱熹之传注去阐发题旨，其语脉承知人这一要义说下，而句前句后，自隐隐舍得仁字之意在内。樊迟之疑惑，子夏之顿悟，都包含在文中，若将其说尽，则无餘地，文便太直露。作为八股文高手，陈子龙便能既遵题旨，又能不犯上、侵下，而融上下文意于己意，淡远悠扬写出，故文章有神无迹。

该文温柔敦厚，仍不掩其骨理之遒峻。一顿一挫，一起一伏，章法极为巧妙，故被人赞为“象外峰峦，非尘中物色”（见《天崇合钞》该文韩求仲评语）。作为在考场中匆匆写出的乡试闈墨能达此水准，可见陈子龙八股文学养之深厚。

值得称道的是艾南英见到此文，并不因两人之间为文理论有分歧便抹杀它，反而给予很高评价，他评点该文说：

“清真古健，不染一尘。通篇中曲处、转处，每比中曲处、转处，直有老笔瘦硬之意。”（见《天崇百篇》该文艾南英评语）

可见艾南英并非如吴梅村所攻击的那样“为人褊狭矜愎，不能虚公以求是”，而是颇为公允的。

陈子龙及幾社诸子如夏允彝等，与艾南英等江西四子虽为文途径各别，但在依照儒家正统观念阐发义理以正人心上是一致的。故陈子龙有的八股文绝似江西四子之作。如其《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题文，作者把握住题中这个“命”是气数之命，而不是“五十而知天命”之“命”，再加上朱熹注中添加的一个“信”字，一层层阐发，揭示出分别君子、小人之途径，颇似陈际泰的笔意。因义理原本无二，“而浸润于古籍亦同，故辙亦有时而合也”（见《天崇百篇》该文方苞评语）。且陈子龙“用魏晋风藻，论圣贤名理，绝胜西江”，此文“命字专指死生祸福，不夹入造命，较章大力（章世纯）作更有把握”。可见爱国救亡的灵犀，使得江西派与幾社之文心一线相通，殊途同归。

陈子龙的八股文，深于魏晋，曾受艾南英的批驳，因晋人尚清谈，相互标榜，废弃礼法，小者灾及其身，大则祸延于世。但陈子龙为爱国志士，胸中具有后世事迹，用以阐发题蕴，促音急节，言简而义闳，苍然之色，渊然之光，令人不可逼视。其《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题文，针对崇祯时事，运以魏晋笔法，“扼定没世起义，字字危悚，鞭之见血，高在出以清新”（见《天崇合钞》该文王巳山评语）。全文清腴隽永，凸现出作者冰洁情操，实为晚明八股文坛上少有之作，受到后世高度评价。八股文坛推崇人品与文品的一致，陈子龙的八股文，在其死难后大多散失，仅存的寥寥数篇都受到后人高度评价，其因盖亦出于此。



位卑而言高 一节

◎罗万藻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臣无罪而不足以劝，耻之而已。

盖贫仕之情，不在立朝行道者之事也，故位卑言高之罪，罪累上也。

且人主之礼其大臣也，罪不及焉，非难于罪大臣也，宽之以自责之路，而动之以耻，故大臣之以无罪而辱，有不如小臣之以有罪而荣也。

夫大臣何可一日不为行道计也！道既已行矣，古人犹有颺言载赓之风，以动色于几康，而不忍效小臣之为。

立朝已无愧矣，古人犹有明农复辟之事，以风示其廉退，而不贪立朝廷之上。

世之衰也，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大臣不能言，复不能退，故小臣愈益言之而愈益攻之，人主不得已而治之以其法。大臣不自安，更究之以其私，是故位里言有之臣往往不免也。顾其立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独何也？夫人主禁小臣之言而予大臣以功名之全，纤悉于小臣之罪而宽大臣以不待督责之意，此所谓动之以耻也。

今不念其道之不行，复不思其身之宜退。处具瞻之地，而隐情惜己，以发天下痛哭流涕之狂。居风节之总而恃禄固身，以授窞蹈瑕之路。故吾谓位卑言高之罪，罪累上也。其累上奈何耻之也？乃

知立朝轻重何常之有。彼功名进取之士，勇于为人，而疏于自量，更何爱？吾谓使人主尊此能言者而立于朝，则天下事之当言者必日相继。而使人主当此能言者而不之罪，则天下士之能言者必复接踵而进。

而人主难之，讽大臣自处之道也，彼立朝者而不知耻，何哉！

【评析】人品高洁的罗万藻及其清微淡远的文品

罗万藻，字文止，江西临川人。天启七年丁卯（1627年）科举于乡，以后终困公车，屡赴会试而不中。崇祯中行保举法，其乡试座师、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十分赏识他，便保举他应诏，他却推辞不就，认为以这种方法入仕有损名节。

明亡，他不再持独善其身的态度，立即投身于抗清行列，福王时出任福建上杭知县。弘光朝灭，唐王立于闽，擢礼部主事。

艾南英在福建延平为抗清劳累忧愤而病逝。罗万藻“哭而瘵之”（《明史·罗万藻传》）。由于悲伤过度，“居数月亦卒”，其对友情之看重，品德之高尚，于此可见。

临川是个出文人的地方，特别是万历以来，临川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万历以后，此地八股文名家辈出，成为晚明八股文写作的重镇。八股文名家汤显祖即是临川人，他的小题文集巧秀逸，为明代一绝。其学生很多，特别是他弃官归里后，号称临川“后四才子”的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都拜在其门下，学习八股文。后来他们都成为了明季八股文坛的巨子，号为江西四家。罗万藻在这四人中，名列第二，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罗万藻从汤显祖那儿学到立身处世之法。汤显祖教诲他“必须不要钱，不惜死”，勉励他要正直做人，清廉用世，人品文品都要高洁。罗万藻以其清白人生实践了汤显祖的教诲。对其文其人，文盛堂全稿本中所叙给予了恰当的评述，其言曰：

“窃闻四公之为人也，陈（际泰）旷朗而傲疏，章（世纯）豪宕而楔刻，艾（南英）则刚正简直不能容物，惟罗（万藻）沉静淡易，独无矜竞之风。此四公之人品，即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契密，然陈、



章皆为南中声气所构，至隙于东乡（艾南英）。而罗独巖然始终无少闲，此又以文品验人品，信旷朗豪宕者易摇，而沉静淡易者难动也。”

此言对人品即文品的评述，于江西四子，确是知人知文之言。清代著名八股文评选家张兰陔就认为罗万藻因人品高，故其“文品应在四家之上”（见《天崇百篇》张兰陔评语）。罗万藻的八股文清微淡远，雅正隽秀，自成一家，自有其过人之处。张兰陔称赞他的一些文章“若仿陈无已《诗派图》，章（世纯）、罗（万藻）当追配涪翁矣”。不过，正是由于文如其人之所致，也给其文带来了一些短处。其为人极为方正，其为文便义不苟立，词不苟设，颇为峻洁，却不能流转变化，故其文便多直致无回曲，气脉不长，生涩深奥，“有过于幽微处，使人猝然索解不得”（见《天崇百篇》张兰陔评语）。读其文了无悦然之感。其《道之以德》一节文便兼有此长处与缺陷。由于罗万藻平时对义理钻研很深，故文中无世俗鄙陋之见，识见高明，但太拘泥于传注，文气不能流转通畅，给人以生涩之感，后人评罗万藻之“才不逮”，文多不能波澜起伏，“所以不及金（声）、陈（际泰），学者不可不知”，“读罗文止文，当学其深，不当学其涩”（见《天崇合钞》评语）。

罗万藻作为晚明一个著名的八股文高手，江西四家之一，当然有不少八股文写得精粹深醇，备受后人称赞。据艾南英说，罗万藻、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都作过，并同为传世名作的《推恶恶之心》题文，是他们考中秀才时在试场所作，“是年予入县学，与府学同题，予置第二，而评语珍赏，似胜于首卷。府学首名则吾友罗文止（万藻），次陈大士（际泰），次章大力（世纯）。”（艾南英：《明文待》中该文评语）可见罗万藻八股文水平不在当时名家之下。其《临之以庄则敬》三句题文，为其乡试中举之闱墨，主考倪元璐极为欣赏，评语中说此文“骨采坚秀油然，经籍之光，义与词皆粹美无疵”。

作为崇祯八股文振兴运动的中坚人物，罗万藻之文亦不乏直刺时世，借题发摠胸中激愤之作，且多“文境苍深穆然”（见《钦定启祯四书文》卷九方苞评语）。如其《位卑而言高》一节题文，便是

这样一篇针对当时“大臣持禄依违，而言事者攻之不已”的国事而借题发挥其意的传世名作。

这篇文章之题出自《孟子》，《四书集注》对这一节经文的注释为：

“以出位为罪，则无行道之责。以废道为耻，则非窃禄之官。此为贫者之所以必辞尊富而宁处贫贱也。尹氏曰：言为贫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根据这一文题所在全章经文及其注释之意，所谓“贫富，谓禄之厚薄”，即指官之大小。作为文题的这一节经文只是本章“辞尊居卑”的注脚。

该文针对神宗皇帝册立东官之争以来，特别是天启间魏忠贤乱政时朝中大臣无人敢直言大义，反而是杨涟、魏大中、高攀龙、左光斗、袁化中等言官微臣大义凛然，不顾身家性命，起而抗争的现实，“借题摅发胸臆，剴切之旨，出以蕴藉风流，在作者稿中不可多得”（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汤予明则说此文“既侧重大臣说，全以下截运化上截，就文论文，作法既佳，而议论更极痛快，文气亦复疏古”（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

以江西四子为代表的晚明江西派诗古文辞，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即以八股时文而论，如罗文藻此作横空盘硬，自成一家之言，为拯救天启至崇祯之间败坏已极的文体，转移风气，起了导向作用，受到后世八股文界的推崇。



孔子曰：天下有道 一章

◎侯峒曾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圣人慨世变，而深致意于有道焉。

盖道之行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而又何所不尽然也哉！

孔子时不惟无明天子，抑亦无专诸侯，独有大夫者日与其臣窃国，而因以相窃耳。故不得已，因鲁史定褒讥以自附于庶人之议。然而其事变，其心悲，喟然叹曰：“吾安得有道之天下而一观王化哉！”盖天下大柄，礼乐与征伐二者，而总恃有道以维持其间。道非他，天子出之，诸侯以至庶人画而守之者是已。权不替，故可大；势不分，故可久。持此长世，虽万世无敝可也，而不虞无道者之转相出也。

去天子最近者诸侯，而其大夫能以冒上亡等之说逢君而首乱，则递而拟之，何不至焉。

去天子最远者陪臣，而其大夫能以鬻权窃柄之术率属而作俑，则尤而效之，又何诛焉。



既自诸侯而大夫而陪臣，则亦自十世而五世而三世，转降转逆，亦倏得倏失，有断断不爽者，而大抵皆大夫之故也，则皆无道之故也。于斯时也，庶民与清议出矣。

庶民诚非有诟谮之心，而人势已移，则真是真非，亦欲以空谈维国是，厥民诚不司议论之责，而大权既散，则匹夫匹妇，若思以公道救人心。向使天下而有道乎，则礼乐征伐固自天子出矣，政必不在大夫矣。彼庶人者，岂能与结绳画象之理静守于无言，而敢为议哉！

今乃知去势家之操柄，而即可还共主之威灵。然欲扶廊庙之纪纲，亦还藉于草茅之笔舌。夫庶人者，能折大夫之权以归柄于天子，使天下而不终出于无道，则其议焉可已。使天下而终出于无道，则其议尤不可以已也。《春秋》之作，真不得已也。

【评析】节操忠烈的侯峒曾及其借经义 以抒激愤之作

侯峒曾虽是崇祯时的八股文高手，但他能在明代八股文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与其由八股文培育出来的高尚节操不无关系。

侯峒曾，字豫瞻，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人。

其父侯震扬，当过吏部给事中，曾“上疏力阻熹宗召还客氏”（《明史·侯震扬传》），又劾大学士结纳魏忠贤的后台客氏和官中为非作歹的宦官，得罪了魏忠贤，而屡遭魏忠贤的打击，去官以归。这是一位有正义感，敢言直谏，且有见识的士大夫。他的品行，深深地感染了侯峒曾及其弟弟们。

侯峒曾有双胞胎弟侯岷曾、二弟侯岐曾。侯岷曾年仅二十一岁即卒。侯岐曾在明亡后以诸生身份积极投入抗清复明斗争，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其兄侯峒曾的好友、抗清英雄陈子龙兵败藏于他家，事泄被捕遇害，时年五十三岁。

侯峒曾幼时即聪颖多智。据其友人冯梦龙说，侯峒曾与侯岷曾少年时被人认为“如渠亭、仙从二人。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渊。’”（冯梦龙：《侯雍瞻〈西堂初稿〉序》，载拙著《冯梦龙新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侯氏三兄弟幼时即在其父指导下攻习八股时文,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年),侯峒曾年十五,与其双胞胎弟岷曾和时年十一岁的侯岐曾同应童子科,“兄弟三人咸负夙慧,且貌若连璧,所至人皆聚观,倾动城邑。既试于有司,文采殊众,当事者旌之曰江南三凤。”(侯元瀚:《侯忠节公年谱》,载拙著《冯梦龙新论》)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熊廷弼督学江南,亲阅试卷,严明确有声。侯峒曾与冯梦龙俱受熊氏赏识,在岁试中侯峒曾被取为第二名。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侯氏三兄弟与其父友人冯梦龙跟从侯震旻“读书于虎丘铁花庵”,侯峒曾“所为文章日益富,有《鞞鞞编》行于世。句曲张宾王先生榜倡冶城大社,府君兄弟赴之,有夺席之誉”(侯元瀚:《侯忠节公年谱》)。由这些记载可知,侯峒曾在十九岁以前,其八股文名已著于一方。

他于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科中进士,历任南京武选司主事、文选司主事、江西提学参议、浙江右参政。任官清正廉明,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捕杀土豪猾吏,为民兴利除害,名震朝野,被吏部尚书郑三俊举为天下贤能监司(见《明史·侯峒曾传》)。他结交俱为忠义、贤能人士,尤与史可法、陈子龙善。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清兵南下,攻陷南京。嘉定士民推侯峒曾及黄淳耀为首共守嘉定县城。他们满腔忠义,浴血死战,却因大雨崩塌城墙,且无援兵,嘉定城终于失守,清兵大举攻入。侯峒曾拜告家庙,携二子从容投水自杀。成为一个以身殉节,被后人崇仰的忠臣义士。侯家可谓满门忠烈。有《侯峒曾文集》四十卷存世。《明史》有其列传。

作为一个满腔忠义、力矫时弊以救世的志士,侯峒曾身处万历末年以后的社会环境中,曾投身于八股文的振兴运动,其八股文自然会呈现出理醇气足,并借经题以抒胸中积郁的特点,具有苍浑感慨之风格。其《天下有道》一章题文,即足以体现其风致。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论语》。《四书集注》对这一章经文的注释为:

“先王之制，诸侯不得变礼乐，专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则其失之愈速，大约世数，不过如此。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论天下之势。”

作为文题的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节，专门指责大夫。而相连的下一章又是论列鲁国大夫季氏专政之事，所以侯峒曾审势按脉，根据当年之世变，以天下无道，则大夫专权乱政作为通篇之要领，并针对天启时宦官乱政的时事，对春秋时大夫、家臣专权乱政展开批判。全文大义凛然，纵横如志。虽前后运旋，却一气贯注，“全是理势之自然，非串插家舞文伎俩。故势峻而节和，雍雍然而具先民气体”。张兰陵称此作“文成法立，绝无差排纲布之迹。结末更得立言本旨”（见《天崇百篇》该文评语）。

侯峒曾极善把握题旨，相题行文，又擅长机法，故无论何种题目都能作得理精气足，连八股文界最感头痛的截搭题他都能写得一气灌注，浑然一体，极见功力。他那篇题目取自《孟子》的截搭题名作《强而后可 良不可》即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学。

这个题目所在的经文讲述的是晋大夫赵简子命“善御者”王良为其幸臣嬖奚驾车去射猎的故事。结果一天下来，幸臣一无所获。回来后幸臣就说王良是“天下之贱工也”。王良得知，就请他再坐自己的车去射猎一次。幸臣不肯，“强之而后可”。这次去一早晨即“获十禽”。幸臣回来后对赵简子说，王良乃“天下之良工也”。赵简子便叫王良专为该人驾车。“良不可”，说这个幸臣“不善射，以法驰驱则不获，废法诡遇而后中也”（朱熹对这节经文的注释，见《四书集注》）。

侯峒曾在作此题文时，擒定该章经文的首尾，以“可”“不可”互为回环，熟练运用吊、渡、挽的手法，穿插中间，以“嬖臣之所可，不能易技士之不可也。夫奚所谓良，正良所谓贱也。则良岂以强奚者，为奚强哉”作为破题与承题，将王良作为议论的重点，贯串全文，使割裂了经书的截搭题文变得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这个题目“本具操纵开辟之势，文即因之，而起伏顿挫，缓急乘除，自有天然节奏。得手尤在前半，撮不可于可之中。则牛鼻已归掌握，运用中间，如百道飞泉，争趋一壑，其势不容暂停”（见《明

文钞》该文评语)。王巳山这段评语揭示出作者对文题把握功夫的深厚。清代周国器则说,该文“于首句内争据上游,以下从中注尾,自有风利不得泊之势。入后萦缩前文,层层波纹,转益多姿。就中却见得良之操纵自由,顷刻变换,非壁奚、筒子所能测,故不仅以机法擅长,起结都关正旨,亦此等题定法”(见《明文钞》该文评语)。

作为史可法、陈子龙、冯梦龙等八股文名家和以节操著称者的友人,侯峒曾也曾在八股文振兴运动中一展身手。虽然在高手济济的晚明八股文坛他还算不上顶尖人物,但也特色鲜明,可独树一帜。尤其是他作为官清正廉明,为民兴利除害,明亡后力抗清兵,携子殉国的种种举动,无不证明八股文对其灵魂塑造和才能培养具有的巨大功能。



送往迎来

◎刘 侗

事之存乎往来者，国有常经焉。

夫人之往来者无常，而主其往来者不可以无常也，经故有送且迎之事。

盖所谓经也者，天下国家之常也。亦以有常待无常也。是故束带有常职也，经费有常数也，冲僻有常所也，虽播迁流寓，适而往，适而来，处之若素焉。不然，而途有不速之客，国无即次之旅，即诸侯且不宜若是，岂先王之纲纪四方者，而忍出此哉。

则试就文武之待往来者思之。

以彼自我国而往，固已有山高水远之艰。迨至迢迢去路忽焉中止，则其情更可悲矣。吾何道焉，而使之去吾国若去其乡也。先王曰：是有送往之经在，达天下之大节，虽道路有难，而不时必达，行人之掌也。司宾客之启闭，虽门关无几，而送必及疆环人之掌也。匪直此也，有客信信，有客宿宿，我先王犹若恨相去之何速者，至今周官不犹具乎？何以不赋草虫而赋黄鸟也，岂非送往之政息而不举也哉？

以彼自他国而来，固已有去国怀乡之感。迨至落落此邦不我肯綮，则其情更可悯矣。吾何道焉，而使之适吾国若命其家也。先王曰：是有迎来之经在，稍聚以待宾客，向聚以待羁旅，委人之职也。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遗人之职也。匪直此也，嘉宾燕燕，嘉宾敖敖，我先王犹若恨相见之何晚者，至今周官不犹布乎？何以不歌鹿鸣而歌鸿雁也，岂非迎来之政息而不举也哉？

夫父母孔迩，周之所以王也，车若讶士不戒侯不在疆，识者遂知卫陈之替。则有国家者，若之何其不以往来为念也。

【评析】得竟陵派精髓的刘侗及其 奇雉古雅的八股文

后世得知刘侗文名者，皆因其与人合撰了一部风格冷隽的《帝京景物略》。其实，在晚明让其文名大著的，不是此书，而是其八股制义。

刘侗，字同人，号格庵，湖广麻城（今属湖北）人。

他的家乡麻城，在明代以治《春秋》闻名天下。以《春秋》一经而取功名，后位居高官者大有人在，故“国朝人称山阳《礼记》，麻城《春秋》”（光绪刊《麻城县志》卷四十《杂记》）。麻城世家子弟，当过甘肃巡抚等职的梅之焕自豪地说：“敝邑麻，万山中手掌地耳。而明兴独为《麟经》藪。未暇遐溯，即数十年内，如周、如耿、如田、如李，如吾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马智自任。”（梅之焕：《麟经指月叙》）

刘侗受家乡学风影响，自幼研习儒家经典，“治举子业，耻剽窃为文章”，于《春秋》一经，尤有心得。刘侗又与钟惺、谭元春等同为湖广大同乡，故其为文又受到竟陵派的影响，文风与竟陵派相近。《四库全书总目》中说：“侗本楚人，多染竟陵之习，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

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科，刘侗考中进士，在京任官，曾因“文奇”而被礼部奏参。几年后，改授南直隶吴县知县，于赴任途中病逝于扬州。

在晚明八股文坛，刘侗以擅长写《春秋》制义时文著称。

然而，治《春秋》有很大困难，万历时以《春秋》而取举人、进士功名，任过户部尚书的《春秋》制艺高手李长庚曾根据其经验说“习《春秋》有三难，亦有三快”：

《易》、《诗》、《书》、《礼》同出圣经，义理显著。有《尔雅》及汉诂诸书，宋儒循而注之，虽微义不存而词旨晓

然。惟《春秋》褒贬刑赏在一字中，或在言外，而变例杂出，异同不嫌，令学者以臆相推测，其难一。

国初功令，《春秋》左氏、公羊、穀梁、程氏、胡氏并用，而后专用胡氏。有明知其过刻者，有意于宋南渡后事，故相形断者，未必一一尽合，而功令所在，不得不抑心意以从之，其难二。

国初经题仍宋经义，或出数题之大意中相近者，或相反者，听各为条答。而后乃以某传某句搭题：或传意影搭，或脱母搭，或取左氏搭，或取各注疏搭，若射覆臆钩。他经入闈止虑文之不佳，《春秋》入闈先虑题之不习，其难三。

然他经制词造格与《书》艺同，多用宋儒注疏中语。无论子史，即六经，语稍僻，字稍粗，音稍聩者，不得轻入。士之好古文词者，谓时艺薄之。而《春秋》奉左氏为祖称，门风特异，语在他经艺号壮者，置之《春秋》艺中，尚觉萎茶，所称引与古文词无异，其快一。

他经时艺多俳体，比辞相对，限之以八。蹶弛之材，不得少骋。而《春秋》体裁可为短长，如论如策，不为三尺文格所拘，其快二。

士各执一经，势难兼习，博者不过借字句以供笔端耳。《春秋》则引用各经，相为表里，中与《诗》义相发者比之传序更明。《易》筮之法，赖左氏以存；《乐记》一书，止存其理，而聆音辨器，不如《左》、《国》之晰。斯以一经全五经之用也，其快三。

刘侗出自《春秋》研治人才众多，心得最深的麻城，且其地还有《麻城麟经诀法》，只授麻城人，外地不得偷学（见光绪刊《麻城县志》卷四十《杂记》），刘侗研习《春秋》，天时、地利、人和皆占尽，故他能化解研习《春秋》的“三难”。

而研习《春秋》的“三快”，又正足以发挥其为文之所长。

写作《春秋》题文，其“制词造格”，“所称引与古文词无异”，刘侗是一个“好古文词者”，其古文写作的风格用于其他经书的八股

文写作不相宜,于《春秋》制义的写作正好相合。他为古文词时句子往往省略动词,常以名词或形容词作动词用;他喜用重叠词作谓语,爱用冷僻字眼,从而形成一种奇僻的笔调。这种用词造句风格正好与《春秋》时文的写作相合拍,他可在《春秋》时文的写作中大展其所长,从而形成了他制义时文的独特风格。

《春秋》制义的写作可不拘束于八股格式,不严格要求必用排比之格,“比辞相对”,“体裁可为短长,如论如策,不为三尺文格所拘”。这种文体功令,正适宜于刘侗驰骋才情。

刘侗为文“多染竟陵之习”,反对拘囿格套,主张彻底摆脱摹拟,自抒己意。《春秋》制义在文体上的特点,正好符合其领异标新的写作宗旨,便于其施展才学。

出于上述原因,加上刘侗广博的学识功底,他成为了晚明八股文坛上以擅长于《春秋》文著称的文士,连对明代八股文最为挑剔的王夫之,也对其《春秋》制艺赞不绝口。他说:

“人各占一经,已不足以待通儒。乃于所占之经,视为续貂之狗尾。塾课先习浮烂之词,文场取塞终篇之责。《五经》大指,已属面墙;先圣精微,永续茅塞。《诗》则采辑诗赋四六中最下俗艳语,用为无盐之粉黛;咏叹淫佚之意,百无一存。《春秋》则以俗吏爱书、讼魁牒状丑诋之词,取已往之君臣,恣其诟厉。数百年来,能免于此者,千无一二。近世名人略为洗涤:《诗》则黄石斋(道周)、凌茗柯(义渠);《春秋》则刘同人及路君朝阳,逸群道上,庶几不负明经之目。”(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五十二则)

刘侗的《春秋》制义,不仅能正确把握其精义,且《春秋》为“拨乱之书”,“孔子以东迁作,胡氏以南渡传。经、传皆有忧患愤发之意焉,高皇帝(朱棣)尊用儒说,独取胡氏列学官者,非但以其为严冬大雪,独秀之松柏也,取其忧患愤发之意合焉,而可为异日拨乱之书也”(冯梦熊:《麟经指月·序》)。刘侗深悟其旨,在“夷氛东肆,庙算张皇”的天启、崇祯之际,所作《春秋》制义,皆能直刺时事,又因其古文笔调,“取类广以僻”,词句短奇,音节急促,结构谨严,使其文呈现出冷峻的风格,正合《春秋》制义的本旨,故王夫之称之为“逸群道上,庶几不负明经之目”。

刘侗还擅长小题文的写作，他的小题文能剔发微旨，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故也受到王夫之的称赞。

明代万历以后，受时风影响，八股文的语言多用乡谈俚语，王夫之斥之为“浪子插科打诨，与优人无别”（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四十九则）。而刘侗耻剿窃为文章，用语追求奇僻冷隽的风格，故乡谈俗语皆不入其文，加上他对题旨把握准确，在万历以后八股文“芜秽”成灾时别具一格，这便是受到王夫之称赞的原因。在王夫之看来，“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四十九则），八股文只有雅正，才能保持其载道的功能。所以，他对万历以后八股文文体和内容上的任何变革，都持反对态度。语言不纯，甚至引市井俚谚以入文，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刘侗能不让“此风一染笔性”，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十分难得，受到王夫之的高度评价是必然的事。

刘侗的八股文对题旨把握的准确及其语言的奇僻古雅，可从其典制题《送往迎来》题文中大致见端倪。

这个文题为两扇题，故刘侗以两大股来阐发它，通篇文章显现出古雅的风格。“古雅而不入情，繁芜耳；入情而不古雅，鄙俚耳。此文又入情，又古雅，寒俭者挹其风华，华瞻者师其刻划。”（见《明文小題贯》该文评语）清代楼季美的这段评语，正道出了此文的特点。说其古，是文中多用古文词，僻语、粗字、声音，皆入于文。文中多用重叠字作谓语，如“有客信信，有客宿宿”，“嘉宾燕燕，嘉宾敖敖”等。又多用排比句式，如起讲开头“天下国家之常也”一句有一个“也”字，下文又连用四个“也”字，句式显得奇拗诡异。以致于楼季美认为是“调头不顺，在《明文小題贯》选用此文时，竟将后面四个排句中的“也”字删去，可见他并不真正识文。其上半股原文是“吾所闻文武之政，盖尝踌蹰毕虑而为往者地矣。以彼其自我而往，应亦有山高水远之艰可念者，于是迢迢去路之稽迟也。吾何以使去异国者若去其乡，所恃有送远之经在”，这种古拙的文字，充分体现了刘侗奇诡冷隽的固有文风，可是楼季美看不出刘侗文的价值所在，竟认为其“出笔拙而且滞，绝无调头”，擅自将其文改成现在的模样，索然无味，致使刘侗的文风荡然无存。



孽子

◎刘侗

同为子而独难，是又子之仅也。

夫人尽子也，而吾独孽，吾敢不为子乎？吾敢遂为子乎？

孟子曰：臣与臣言臣，子与子言子，此亦人世之大凡也。乃有时臣不敢与臣言臣，子不敢与子言子，而此一臣与此一子，不幸而两不相值耳。设幸而相值，而此臣正欲诉之此子，而此子亦正欲诉之此臣，则岂非臣固孤臣，而子又即孽子乎？夫子亦何尝之有父母爱之，家之祯祥也；父母恶之，即家之妖孽也？

即孽亦何常之有？我生不辰，天作之孽也。我罪伊何，自作之孽也。

于是而不谓所遭之是子也，而谓之孽子。

是不谓所遭之实孽也，而犹称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独我子也乎哉，至父不嗟予子，母不嗟予子，而子道曲折甚矣。

亦属于毛，亦离于里，夫非尽人之子哉，至不以我为子，不以我为人，而子身频死屡矣。

朝廷远而家庭近，世有吊孤忠者矣，未有吊孤孝者也。独至孽子而家更之远竟若朝廷。

君后严而家人亲，世有未被君恩者矣，无有未被亲恩者也。独至孽子而二人之威侔乎君后。

故将谓不肖子不孽，圣子独无孽乎？幸为文，不幸为舜，其子而圣，文所同也。舜而孽，圣所独也。

将谓顽父有孽，慈父独无孽乎？幸为曾，不幸为闵，其父不慈，

曾所同也。慈而孽，闵所独也。

又将谓馀子有孽，嫡子独无孽乎？幸为周襄，不幸为晋共，其孽而嫡，商所同也。嫡而终孽，共所独也。

嗟哉！子也，骨肉奇而险阻备。幸哉，孽子也，天伦迫而鬼神通矣。

【评析】语言诡奇、句式短促的刘侗小题文

刘侗还擅长以灵隽之思致，来写说事说物的单句题，洁净中含静光远致，可以验宕心灵。《孽子》即是其代表作。

此文的题目取自《孟子》，该节经文为：

“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四书集注》中对这节经文的注释说：

“孤臣，远臣也；孽子，庶子，皆不得于君亲而常有痰疾也。达，谓达于事理，即所谓德慧述知也。”

所谓“痰疾”，按朱熹的说法，“犹灾患也”。孽子，古时男子常一夫多妻，非嫡妻之子叫做庶子，也叫孽子，地位卑贱。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人之所以有道德、聪明、本领、才能，经常是由于他有灾患。只有那孤立之臣，庶孽之子，他们时常提高警惕，考虑患害也深，所以才通达事理。

此作前半部分别发孽字的字面，后半部分阐释孽字的精义，而将独字夹于其中叙写，使得题旨得以全面深入地阐发。

作者运用了反跌、正醒、侧剔、倒煞等各种手法，如以“岂非臣固孤臣，而子又即孽子乎”侧出子字；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独我子也乎哉”反跌出独字等等，将题旨揭示阐发得淋漓尽致。

该文用语带有浓重的刘侗特色。其用字奇险，如以“父母恶之，即家之妖孽”，“我生不辰，天作之孽也”来写孽字，便与常人理解不一样，所以有人称此文“字字奇，字字快，字字险”（见《明文小题传薪》该文评语）。

文章以孽为祸孽之孽，与传注中所注庶子之意是相悖的。然而像《孽子》这种说事说物的单句题，与理题不同，在晚明时只要

义理无违，可按己意阐发。作者以灵隽之思致，揭示出理解孳子的新视角，使陈陈相因的义理别出新意，足以验宕心灵，为八股文坛中之乐事，故受到王夫之的称赞。王夫之说：“汤义仍（显祖）、赵济鹤（南星）、王谿庵（思任）所得在此，刘同人亦往往近之，余皆不足比数”（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第四十九则），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刘侗的八股文由于喜用短而奇的句式，喜用“诡俊纤巧之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故形成了笔势峻促、锋颖刻锐的风格，在晚明八股文坛独树一帜。